

埃及卷

雷钰　苏瑞林▷著

AI JI JUAN



商务印书馆

西北大学211工程资助项目

主编／彭树智

中东国家通史

埃及卷

雷钰　苏瑞林▷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东国家通史 埃及卷/彭树智主编;雷钰,苏瑞林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ISBN 7-100-03884-7

I. 中… II. ①彭… ②雷… ③苏… III. ①中东-通史 ②埃及-通史 IV. K37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62043号

ZHŌNGDŌNG GUÓJIĀ TŌNGSHǏ
中东国家通史
埃 及 卷
彭 树 智 主编
雷 钰 苏瑞林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884-7/K·780

2003年12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0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4¼ 插页5
定价:26.00元

收藏于开罗博物馆的纳尔迈调色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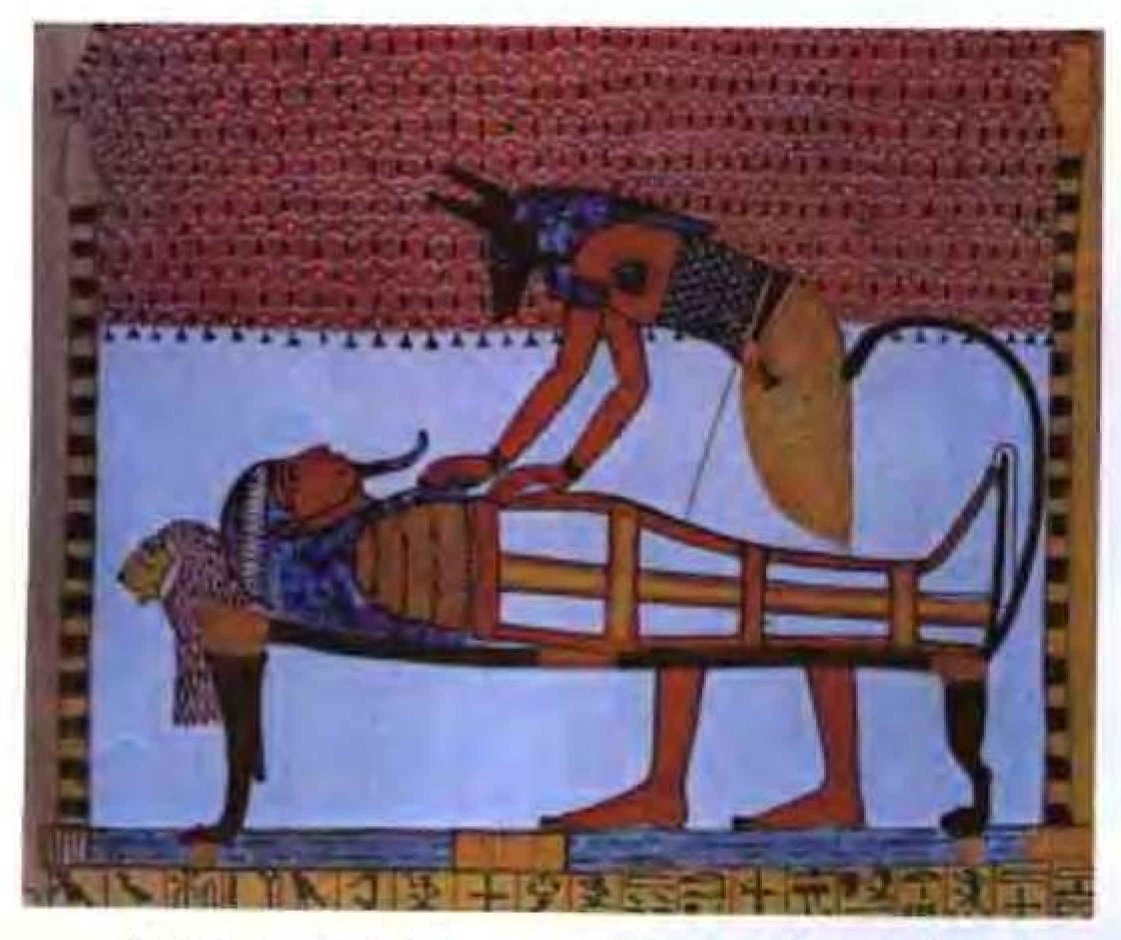




古王国的书吏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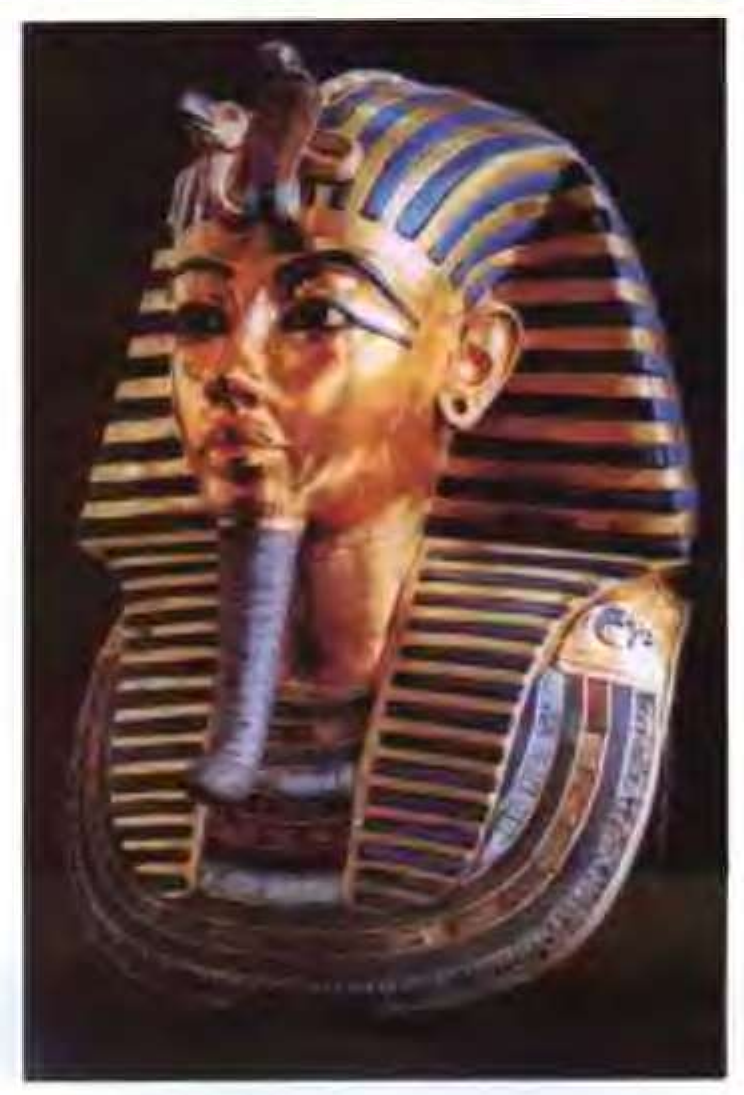


孟卡拉金字塔及其狮身人面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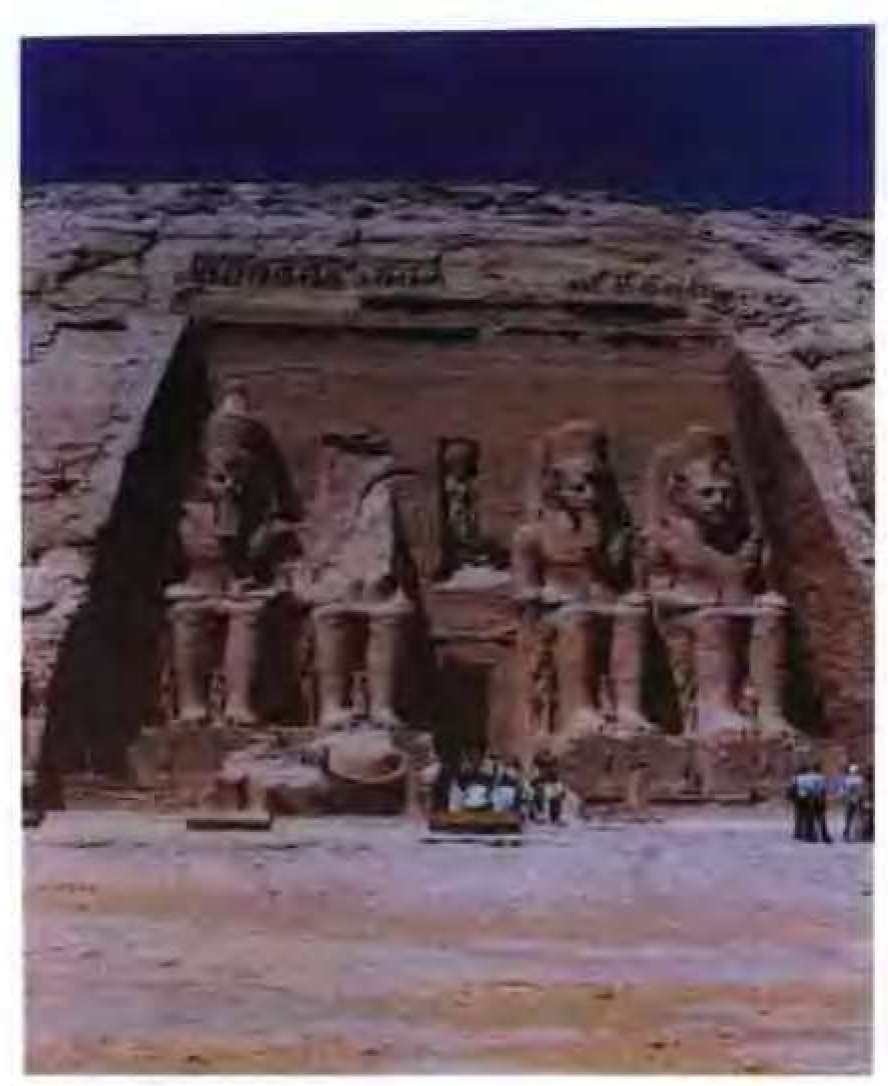


阿努比斯神为法老的木乃伊举行“开口”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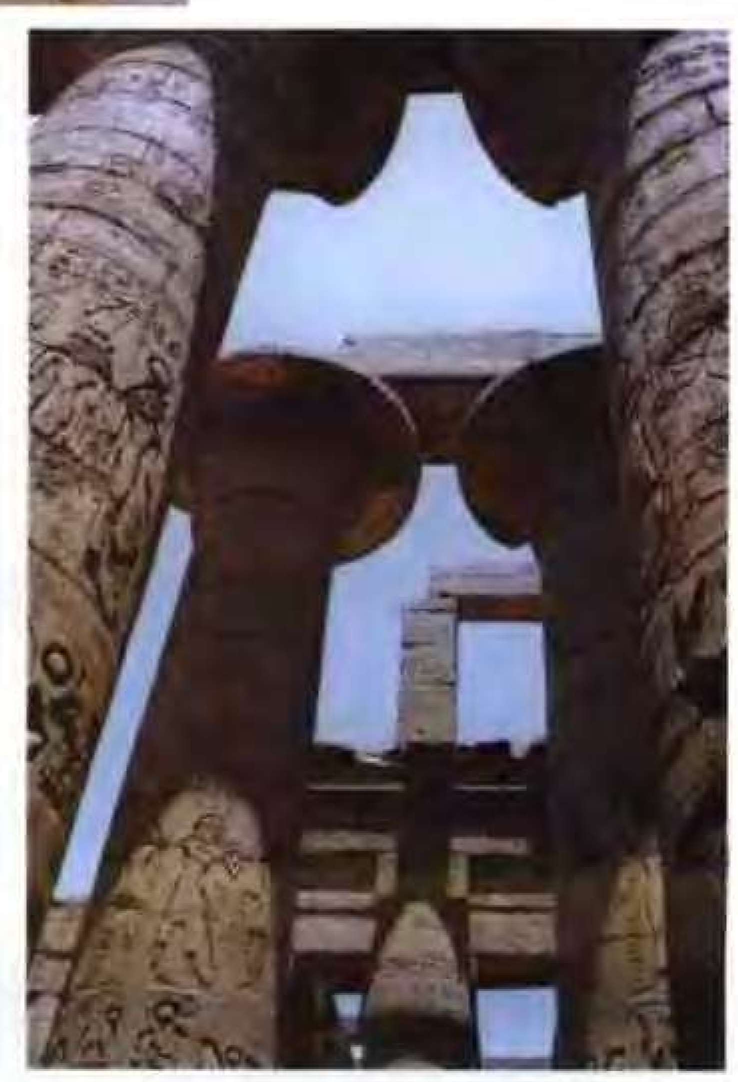
埃赫那吞全家尽情沐浴着阿吞神的光泽



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



拉美西斯二世的
阿布·辛拜勒岩窟庙



卡纳克神庙的巨型石柱

萨瓦里石柱(庞培柱),如今成为亚历山大市的标志。



西奈山下的圣·凯瑟琳修道院



阿里王朝的缔造者
穆罕默德·阿里



伊斯兰思想家、社会
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布杜

埃及独立运动领袖
萨阿德·柴鲁尔





埃及首任总统加麦
尔·阿卜杜勒·纳赛尔

1978年9月，萨达特总统（左）与美国总统卡特（中）、以色列总理贝京共同签署《戴维营协议》。



1994年5月，在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中）主持下，巴以双方在开罗签署《加沙—杰里科自治协议》。



开罗市的标志——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

开罗市内的穆罕默德·阿里之子易卜拉欣帕夏雕像



开罗市区尼罗河两岸的迷人景色



开罗大学校园

目　录

绪论:埃及概况

一、自然环境

横跨亚非两大洲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简称埃及,地跨亚非两大洲,大部分领土位于非洲的东北角,只有苏伊士运河以东的西奈半岛位于亚洲的西南部。地处东经25°到35°,北纬22°到32°之间,东临红海并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接壤,南连苏丹,西接利比亚,北濒地中海与欧洲遥望。面积为100.2万平方千米,海岸线长约2 700千米。

埃及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地当亚非欧三洲交通要冲。介于亚、非两洲的苏伊士运河沟通了地中海和红海,使印度洋与大西洋相通,是连接亚、非、欧三洲的桥梁和东西方海上交通的捷径,具有很高的战略地位和经济价值。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使西欧到印度洋之间的航程比绕道非洲好望角缩短8 000~10 000千米。苏伊士运河长172.5千米,宽160~200米,水深15米左右,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运河之一。

从地质上说,埃及属于古老的北非高原的一部分,白垩纪的努比亚岩系占有很大的面积,地势是南高北低。因此,自远古时代

起，埃及在地理上就分为上下两部分。以开罗南郊为界，向南直到第一瀑布是上埃及，以北为下埃及。在上埃及，除中间的尼罗河谷地外，东西两侧砂岩峭壁对峙，峭壁之外是广袤的沙漠；下埃及则是地势低平尼罗河三角洲地带。尼罗河和沙漠构成了埃及的主要地貌特征。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曾经孕育出光辉灿烂的古代埃及文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至今，埃及仍在中东地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尼 罗 河

尼罗河全长 6 650 千米（埃及年鉴数字），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

从地理学的角度看，尼罗河是地球表面一个形成较晚的地理现象，它具有目前的形态和规模不会早于距今 2 万年左右的洪积中期。冰河时代，北非处于多雨期，尼罗河北部河系已相当发达。在尼罗河及其支流巨大洪流的冲击下，形成了满是砾石的河床以及尼罗河两侧的砾石台地。约在 1 万年前，多雨期结束后，尼罗河上游的地形发生了重大变化，赤道湖泊高原和埃塞俄比亚的降水成为尼罗河的主要水源，即形成青尼罗河和白尼罗河两个源头。

青尼罗河发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上海拔 1 840 米的塔纳湖。埃塞俄比亚高原是由火山岩堆积而成，沟壑纵横，因而青尼罗河流势湍急，河道曲折。回转于巨大熔岩之间的青尼罗河汇集了多条支流，为尼罗河提供了 70%的泛滥洪水。洪水暴发时，河水呈深褐色，来势汹涌，一泻千里。白尼罗河发源于中非，全长 840 千米，与青尼罗河相比，流势流量都大为逊色。青、白尼罗河经过各自的

长途跋涉后，最后“相会在喀土穆”，二流归一，被称作努比亚尼罗河。青尼罗河在到达喀土穆时，水位比白尼罗河高出5米。在泛滥季节，深褐色的青尼罗河水与灰绿清澈的白尼罗河水在米格尔汇合时，泾渭分明，流过很长一段距离才融为一体。

从米格尔到阿斯旺，约1 900千米，努比亚尼罗河穿行在苏丹北部的丘陵地带，呈“S”形，河道固定而明显，堤岸很高，基本上能抵挡住洪水的猛烈冲击。努比亚尼罗河的特点是落差大，水流急，形成了6个瀑布群。这一特点对于保存河水流量大有裨益，因为努比亚尼罗河流经非洲最炎热的热带沙漠中心地区，蒸发量是赤道湖泊高原的一倍，而在近2 000千米的流程中，水源较少，只汇人了尼罗河的最后一条支流——阿特巴拉河。

努比亚尼罗河在北纬22°线附近流入埃及境内，习惯上称作尼罗河。埃及境内的尼罗河长1 350千米，从南向北纵贯埃及大地，两岸形成宽约3～16千米的狭长河谷，在开罗以北冲积成巨大的三角洲。尼罗河既是沟通上下埃及的天然大动脉，也是埃及人民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尼罗河对于埃及的意义，远远大于尼罗河流域的其他国家。因此，早在法老时代，埃及就流传着“尼罗河就是埃及母亲”的谚语。

长期以来，治理和利用尼罗河一直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阿斯旺大坝建成后，尼罗河水被挡在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纳赛尔湖内。水库面积为5 000平方千米，蓄水量可达1640亿立方米。河水从阿斯旺大坝开闸放出，流经丘陵地带，从第一瀑布落下后即进人黄金河段，河面开阔，平均宽度为700米，浩浩荡荡流向开罗。在开罗以北23千米处，尼罗河被拦河大坝分流拉希德河和杜姆亚特河两支，分别注入地中海。从高空俯瞰，尼

罗河呈扇面展开，河川纵横，形成了以开罗、亚历山大和塞得港为三个顶点的三角形冲积平原，即著名的尼罗河三角洲。三角洲的面积约为24 000平方千米，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是埃及人口密集、经济繁荣的核心地带。

沙　漠

埃及的沙漠是撒哈拉大沙漠向东部的延伸，在埃及分为西沙漠和东沙漠。沙漠占全国面积的96%以上。沙漠地区矿产资源丰富，还出产各种石料和次宝石。

西沙漠是指苏丹国以北，从尼罗河谷往西，直到埃及、利比亚边界的广大区域，面积为68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8%。西沙漠平均海拔高度不足500米，由南向北逐渐倾斜。这里是世界上最炎热、最干燥的沙漠地区，到处都是由剥蚀岩层形成的连绵起伏的白色耀眼沙丘。在这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只有几块绿洲洼地点缀其中，生活着一二十万人。埃及最大的沙漠绿洲是位于西沙漠北部的法尤姆洼地，受尼罗河的水力侵蚀而成，地势低洼，法尤姆市低于海平面25米。

东沙漠位于尼罗河谷之东，绵延至红海沿岸，面积约22.5万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22%。东沙漠的平均高度为800米，地形复杂。东面是崇山峻岭，朝红海的一侧，壁立千仞，沿海平原狭窄。西面是石灰岩高原，中、南部的红海山脉高耸陡峭，千米以上的山峦较多。与西沙漠相比，东沙漠的自然条件要优越些。这里有多条干河，干河和床底下和岩层缝隙间，均可觅得水源。居民的聚居地，大都在沿海一带或矿井周围。自古以来，东沙漠与尼罗河谷的关系都比较密切，埃及人很早就试图在东沙漠里开凿运河，

沟通尼罗河与红海,最终在波斯统治时期如愿以偿。

西奈半岛

西奈半岛是埃及在亚洲的领土,面积约为6万平方千米。西奈半岛夹在地中海、苏伊士湾和亚喀巴湾中间,呈倒立的三角形,地势向北倾斜。北部的阿里什地区是辽阔的沙土平原,其中只有部分土地适宜耕种。中部是提赫地区,在地质上属于由红色、深灰色和绿色的砂岩所构成的坚硬而古老的高地。《圣经》中被称作"埃及小河"的阿里什干河由南向北穿过该地区,进入阿里什地区,给西奈半岛带来了一线生机,纳赫勒城位于其中游。由苏伊士向亚喀巴方向延伸的提赫山脉,形若巨弓,将提赫地区同南面的图尔地区分开。图尔地区是红海高原的延伸,火山喷发后的熔岩凝结于此,巉岩嵯峨,号称是世界上最崎岖坎坷的地方之一。图尔地区中央的凯瑟琳山,海拔2 637米,是埃及的最高峰。

西奈半岛地处干旱地带,除北部冬季降雨较多外,中部和南部地区雨水极少,炎热干燥,因而沙漠广布,与东沙漠遥相呼应。

历史上,西奈半岛以出产铜和绿松石而著称,这里可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的地区之一。

西奈半岛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圣地,东西方文明交往的必经之路。根据《圣经》记载,摩西带领希伯来人从尼罗河三角洲出发,奇迹般地渡过红海后,进入了西奈半岛。在最终到达上帝"应允之地"前,他们在西奈半岛上流浪了40年。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了"十诫",这标志着犹太教的诞生。

气候特征

受地理位置和地形等因素的影响,除北部地中海沿岸属亚热带地中海型气候外,埃及大部分地区属热带沙漠气候。

地中海对埃及气候的影响仅限于沿岸40千米的范围内,而红海沿岸由于有高原阻隔,对内陆气候的调节作用较小,因此,埃及气候的南北差异很大。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年平均温度为20℃,最低为7℃,夏季凉爽,昼夜温差较小,冬季多雨,年降雨量在100~200毫米之间。上埃及的年平均气温为25℃,最低为17℃,最热时白天气温可达40~50℃,冬夏、昼夜温差大,酷热干燥,年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下,沙漠地区甚至常年无雨。

每年四五月间,低气压从埃及北部经过,燥热的南风不断从撒哈拉沙漠地带刮来,飞沙走石。这种恶劣的天气要持续50天左右,俗称"五旬风"。5月以后,地中海上空的气压高于埃及境内的气压,凉爽的北风从地中海徐徐吹来,起到了调节气温的作用。因此,埃及人的房屋多为坐南朝北,即门向北开,既可减轻干热的沙漠风暴的侵扰,又能接纳来自地中海的丝丝凉意。

自然资源和经济概况

埃及的矿产资源主要有石油、铁、锰、磷酸盐等。石油探明储量约为60亿桶。油田主要分布在西奈半岛的阿布鲁代斯、苏德尔、阿塞勒和红海沿岸的拉斯加里卜、古尔代盖等地。铁矿储量约为6 000万吨,主要分布在阿斯旺地区、西部沙漠的拜哈利耶绿洲和红海沿岸的古赛尔地区。锰矿主要分布在西奈半岛南部的乌姆布吉迈和沙姆沙伊赫地区。磷酸盐储量约为70亿吨,分布在红海

西岸的塞法杰、古赛尔和尼罗河沿岸的锡巴伊耶等地。此外,尼罗河三角洲和红海沿岸等地区蕴藏有丰富的天然气,在法尤姆地区和西奈半岛还发现了铀矿。

埃及的灌溉农业十分发达,农村人口约占全国人口56%。由于灌溉设施的改善,埃及农业不再受尼罗河定期泛滥等自然条件的支配,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得到了较为充分合理的利用,农作物每年可收获2~3次。在尼罗河谷地和三角洲地区,每年11月到翌年的五六月间,种植小麦、大麦、豆类、洋葱等冬季作物;3~10月种植棉花、水稻、甘蔗、芝麻等夏季作物;7月中旬至12月下旬,种植小米和玉米等秋季作物。法尤姆绿洲盛产粮食以及葡萄、椰子等经济作物。棉花是埃及最重要的农作物,种植面积略少于玉米。埃及是中东地区种植棉花最多的国家,1998年产棉34万吨,占全国农业总产值的1/3。埃及长绒棉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3以上,而且品质优良,纤维可长达37毫米,强力高,成熟度好,含糖量少,造纺性强,一直是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

埃及是中东地区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石油、旅游、侨汇和运河收入为其四大经济支柱。传统上以纺织、食品加工等轻工业为主。近年石油、钢铁、电力、化肥、水泥、机械等重工业发展较快,其中石油工业尤为突出,1998年的石油产量为4 070万吨。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石油工业异军突起,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如今,石油已取代棉花的地位,成为埃及首要的出口商品,位居四大经济支柱之首。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埃及的水力发电业。阿斯旺高坝建成后,12台前苏联制造的水轮发电机的装机容量为210万千瓦,每年发电100亿度,占全国发电量的1/3。

埃及的旅游、交通业发达。旅游业是埃及的支柱产业之一。

每年都有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到埃及观光旅游。埃及境内的尼罗河是贯通南北的天然航道，加上运河的长度，可航水道总长约3 000千米。如前所述，价值意义最高的还是苏伊士运河，运河收入一直都是埃及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埃及的外贸对象主要有美国、德国、英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埃及主要出口棉花、大米、纺织品、原油及其产品、洋葱、棉籽油和磷酸盐，同时进口机械、运输设备、化工产品、牲畜及畜产品、粮食等。

重要城市

首都开罗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南端，占地457平方千米，人口685万。它与毗连的吉萨省和克鲁比亚省一起统称为大开罗，总人口1 5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4，是世界十大超级城市之一。开罗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交通枢纽和重要国际航空站。千年古城开罗历史古迹比比皆是，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的巨大圆顶和高耸云霄的宣礼塔是开罗的标志。

历史名城亚历山大是埃及第二大城市，人口338万多，高高耸立的萨瓦里石柱(庞培柱)是其标志。它濒临地中海，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阳光明媚，景色宜人。埃及总统经常到此避暑接见外宾，故有"第二首都"之称。亚历山大是埃及最大的海港，一条连接大陆与法罗斯岛的道路将它分隔成西港和东港。埃及80%～90%的进出口物资都要经过西港。此外，它的纺织业、汽车修配、石油提炼和造船业等也很发达。

扼据苏伊士运河北口的塞得港是全国第二大海港城市，是煤炭和石油贮藏港，有完备的船舶修理设备。为了把塞得港建成商

品转口基地和国际贸易中心，1976年3月，埃及政府宣布它为“自由港”，即享有海关免税（只收取一定的地方税）、商品进出口自由和外币买卖自由等特权，成为埃及改革开放的窗口。

位于苏伊士运河南端的苏伊士城，因苏伊士湾而得名，为全国第三大海港和石油、化工、煤炭的生产基地。苏伊士城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古就是埃及东部港口，既是连接红海沿岸各国，通往索马里、伊朗、印度和中国的海运口岸，又是埃及和一些非洲国家前往沙特阿拉伯朝觐的主要通道，所以，当地居民骄傲地称之为“红海的明珠”。值得一提的是，在苏伊士城以北17千米的沙鲁法地区，1980年贯通了一条连接埃及本土与西奈半岛的苏伊士运河河底隧道——艾哈迈德·哈姆迪隧道。这是连接亚非两大洲的第一条河底隧道，是埃及人民引以为豪的仅次于阿斯旺高坝的第二大工程，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意义。

南方重镇阿斯旺是埃及通往非洲内陆的门户和贸易中心，是努比亚人的聚集地，阿斯旺高坝使其名声大噪。每年11月到次年3月，这里阳光充足，干爽宜人，绮丽的热带风光吸引着大批游客，成为埃及著名的避寒胜地。阿斯旺盛产花岗岩，古代方尖碑和金字塔的上等石料大都开采于此。

艾斯尤特是上埃及最大的城市，人口超过25万。该城有一座颇有影响的伊斯兰大学，长期以来发展成原教旨主义运动的中心。这里曾发生过袭击游客的恐怖事件，因而有相当数量的军队驻守。

二、人文环境

国 名 由 来

埃及是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简称。关于“埃及”一词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说法。

通常，被认为是从拉丁语演变而来的，是古希腊人对尼罗河下游地区的称谓。公元前10世纪前后，希腊人乘船到尼罗河三角洲的孟斐斯一带，与埃及人进行易货贸易。孟斐斯人崇拜普塔神，尊它为创造万物的创造神和技术保护神。受当地人影响，希腊人也信奉普塔神，并称孟斐斯为“普塔神之地”，译成古希腊语为“爱及柏图斯”(Aigyptos)。据说，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荷马史诗》中，后又从希腊语转化到拉丁语，进而派生出当今通用的“埃及”一词。

然而，在埃及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古埃及人称呼当时的首都孟斐斯为“赫库普塔”，并以此代表国名，有亚述人的楔形文字泥板为证。由此，古希腊人称埃及为“爱及柏图斯”。

其实，最初古埃及人称尼罗河河谷和尼罗河下游三角洲为“凯麦特”(kmt)，意为黑色的土地，是指尼罗河泛滥后沉积于两岸的淤泥；而称河谷以外的沙漠为“台斯莱特”，意为红色的土地。

古埃及周边的闪米特人在其阿拉米语中称埃及为“米斯尔”(Misr)，意为辽阔的国家。阿拉伯人占领埃及后，即以米斯尔相称。我国宋代后，据此音译为“勿斯里”、“密昔尔”、“迷思耳”、“密思儿”等。至今，埃及和其他所有阿拉伯国家仍沿用这一名称。

国家的标志

国庆 埃及的国庆日是7月23日。1952年7月23日，由穆罕默德·纳吉布少将和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中校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在开罗发动“七月革命”，推翻法鲁克王朝，开创共和国时代。

国旗 根据埃及1984年10月第144号法令规定，国旗由自上而下的红、白、黑三个相等的长方形组成，红色象征革命，白色象征纯洁和光明前途，黑色象征过去的黑暗岁月。国旗中央绘有国徽图案，一只昂首挺立的萨拉丁金色雄鹰。

国徽 中心图案是一只带有条纹、头向左的金色萨拉丁雄鹰，象征着勇敢忠诚和胜利。鹰的胸部绘有一枚镶着白边的红、白、黑三色盾徽。鹰和盾的图案是穆罕默德部落的徽记，三种颜色的寓意与国旗相同。雄鹰屹立的基座上用黑色阿拉伯文书写着国名——“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国歌 埃及的第一首国歌诞生于1872年，是由伊斯梅尔总督请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创作的。埃及共和国成立后，直到1960年，才由著名音乐家卡迈尔·塔维尔在女歌唱家乌姆·库勒苏姆的歌曲《时代，我的武器》的基础上创作出新国歌。1979年，第149号共和国总统令确定由人民音乐家赛义德·塔尔维希作曲、阿卜杜·瓦哈卜修改的《我的祖国》乐曲为新国歌。1982年，第590号总统令规定：在欢迎外国元首或重要代表团时，演奏乐曲，不唱歌词；所有官方和民间庆祝集会必须演奏《我的祖国》乐曲并唱第一段歌词，即：

我的祖国，我的祖国，我的祖国，

我爱你，我忠于你。

埃及啊，我的母亲，我古老的土地，

你是我的归宿，我的希冀。

尼罗河恩似雨露，

你忠实的儿女永远保卫你。

我的祖国，我的祖国，我的祖国，

我爱你，我忠于你。

我的祖国，我的祖国，我的祖国，

我爱你，我忠于你。

这首优美明快、豪迈抒情的国歌，充分表达了埃及人民热爱祖国的心声，深受人们的喜爱。

国花　**莲花**即荷花，素有“埃及之花”的美称，是圣洁、祥和、善美的象征。白莲花是埃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埃及人自古爱莲，莲花则点缀着古老的埃及文明，一束白莲花就伴随了拉美西斯二世3200多年。在古埃及艺术作品中，亭亭玉立的荷花随处可见，太阳神从绽开的荷花上冉冉升起，神庙圆柱的柱顶一般都呈莲花状。在古埃及的社会交往中，荷花既是亲朋好友之间相互馈赠的典雅礼物，也是男女之间表达爱慕之情的信物。

埃及穆斯林

伊斯兰教是埃及的国教，穆斯林占总人口的90%左右。在埃及，真主安拉无时无处不在，从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新闻、社会生活、风土人情，一直到家庭、个人的思想观念和言行举止，都离不开伊斯兰教。然而，埃及毕竟是一个有着古老文化传统的国家，与中东其他伊斯兰国家相比，它是一个面向世界，比较自

由开放的国度。

阿拉伯人是埃及的主体民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7%。他们信仰伊斯兰教，讲阿拉伯语。除阿拉伯人外，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埃及还居住着贝都因人、努比亚人以及少量苏丹人和北非的柏柏尔人，他们也信仰伊斯兰教。

埃及的阿拉伯人是阿拉伯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素有"老大哥"之称。阿拉伯人的祖先起源于阿拉伯半岛，所操的阿拉伯语属闪·含语系闪语族。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后，一方面，他们逐渐与当地人通婚融合；另一方面，迫于帝国统治的压力和经济利益的驱使等诸多因素，绝大多数埃及人放弃了原有的基督教和多神教信仰，皈依了伊斯兰教。

经过千余年的演变，埃及的阿拉伯人，按人种分属高加索人种，亦称欧罗巴人种。他们一般肤色较浅，有的呈淡黄色或浅褐色，黑发有波纹，有的好似羊羔毛。脸型窄长，五官突出，大眼睛，黑眼珠，高鼻梁，阔嘴巴。阿拉伯妇女年轻时大都体态丰满，婀娜多姿，但进入中年后往往发福，有的甚至臃肿，行动不便。

贝都因人泛指在西奈和广袤的沙漠地区逐水草而居的古老游牧民族，约10万人。埃及的贝都因人也是从阿拉伯半岛迁徙而来的穆斯林。贝都因人分部落，每个部落有一名"谢赫"(酋长)。一部分贝都因人至今仍在沙漠里游荡，他们以帐篷为家，以骆驼代步，以放牧渔猎为生，有时也靠制作小手工艺品养家糊口。而另一部分贝都因人已在尼罗河流域或绿洲中定居，政府为他们提供住房和必要的生活设施，他们的生活习俗正在逐步改变。

努比亚人乃哈姆族(也称含族)的后裔，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苏丹喀土穆以北直到阿斯旺一带，居住在埃及

境内的约有 15 万人。由于同北方的密切交往，尤其是与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融合，努比亚人的血统发生了变化，皮肤呈褐色，并皈依了伊斯兰教。然而，努比亚人并没有被阿拉伯人完全同化，除使用阿拉伯语外，还保留着努比亚语和一些民族特征，甚至还沿袭着一些古埃及法老时代的习俗。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和小手工业。由于身处贫困山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不少人背井离乡，到北方大城市做苦力谋生。

埃及穆斯林最重要的节日是圣纪、开斋节和宰牲节（古尔邦节），日期均按伊斯兰教历而定。圣纪是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时间是教历的 3 月 12 日。圣纪作为穆斯林的节日，开始于 912 年的埃及。圣纪的主要内容是在清真寺里诵经祈祷，追忆穆罕默德的生平经历。开斋节是教历的 10 月 1 日，以庆祝斋月的结束。节日里，除聚集在清真寺举行会礼外，人们要穿上节日的盛装，喜气洋洋，走亲访友，宴请宾客，富人还会向穷人施舍。教历的 12 月 10 日是宰牲节，主要活动是会礼和屠宰牲畜，以此来纪念先知易卜拉欣为遵守安拉的意旨，甘愿牺牲爱子易司马仪的壮举。宰牲节也是朝觐之日，一些虔诚的穆斯林前往麦加履行朝觐义务。

科普特人

“科普特（Copt）”一词是从希腊语演化而来的，原意为埃及人。阿拉伯人进入埃及后，则沿用此称呼。通常，科普特人被看作是信仰基督教的古埃及人的后裔，占总人口的 10%左右。

埃及的科普特人与阿拉伯人都以埃及人自居，备感骄傲。事实上，在血缘、宗教、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和延续性。642 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以前，埃及是一个基

督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在阿拉伯人进入尼罗河流域之后的三个世纪里，埃及的民族成分发生变化，曾有90%的埃及穆斯林都是改宗的科普特人。

科普特人大多居住在开罗、亚历山大和艾斯尤特等大城市。他们使用阿拉伯语，除宗教信仰不同外，在日常生活中与阿拉伯穆斯林已无明显区别。他们一般比较富裕，多为商人、地主、医生、教师、工程师和政府职员，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布特鲁斯·加利博士，他曾担任埃及副总理和联合国秘书长。除埃及外，苏丹、伊拉克、科威特、以色列等国也有少量科普特人。

科普特人信仰的基督教被称为科普特教，与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差异很大，曾被视为“异端”，隶属于科普特教会。科普特教会的独立性很强，最高统治者亦称教皇，统辖包括埃塞俄比亚在内的科普特教区。全埃及约有1 200座教堂、8座修道院和1 500名神职人员。教士们一律戴黑帽，穿黑袍，蓄长须。教皇和大主教是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从50岁以上年长资深、德高望重的神父中选举产生，不再采用以前的抓阄法。

在“老开罗”，科普特教堂随处可见，其中有现存最古老的教堂“空中教堂”，以及艾布·萨尔加教堂、圣乔治教堂和圣巴尔巴拉教堂等。游客信徒纷至沓来，到此参观游览，寻访“圣迹”。如今，位于新城的巴托里亚利克教堂是开罗最雄伟的教堂，是科普特教皇驻节地。

为了保存和弘扬科普特文化，1908年，科普特贵族摩尔库斯·西美卡帕夏在开罗创办了科普特博物馆。博物馆位于开罗老城区的巴比雍城堡遗址上，规模不断扩大，并与周围的科普特教堂融为一体。博物馆收集了大量石刻、壁画、金属制品、纺织品和手稿等

珍贵文物，既反映科普特人宗教、文化、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又展现了古埃及文明与古希腊罗马文明交往的伟大成就——科普特文明。如今，科普特博物馆已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科普特学”和埃及基督教文化的研究中心。

穆巴拉克总统上台后，宗教政策相对宽松，科普特教因此而进入一个新的复兴时代。在新的基督教精神的基础上，科普特教会努力加强与世界范围的基督教之间的联系。为避免科普特语的消亡，科普特教堂开办学习班，讲授科普特语，不断呼吁和鼓励人们学习科普特语。因为，科普特语仅为宗教人士掌握，只在教堂里使用，被称为“宗教语言”，普通的科普特人对此几乎是一无所知。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生存的最后一座堡垒，那些科普特民族的有志之士正努力地防守着。

科普特人的主要节日是圣诞节和复活节，尽管与西方基督教的日期不同，但内容和形式大同小异，节日庆典在教堂内举行，届时总统要派代表出席。近年来，这些节日具有明显的世俗倾向，几乎成了埃及全民性的节日，举国同庆。

“老大哥”的人口问题

受尼罗河母亲的恩惠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埃及人口位居阿拉伯世界榜首。人口众多，曾经使埃及人引以为豪，然而不断膨胀的人口已使埃及不堪负重，人们惊讶地发现：埃及将面临“人口爆炸”的危机。

埃及的人口增长速度过快。20 世纪初，埃及人口为 1 200 万，到该世纪末已增至 6 598 万(此外还有侨民 300 万)。仅仅一个世纪，埃及的人口就增长了 5 倍多。人口出生率为 2.7%，妇女的综

合生育率为3.5个孩子。若按此人口出生率计算，到2010年，埃及人口将突破1亿大关。国家每年的经济增长额，几乎全被新增加的人口消耗掉了。

埃及的人口密度位居世界前列。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埃及94%的人口分布在不到全国总面积4%的尼罗河两岸、苏伊士地峡区和沙漠绿洲上，而且主要是集中于开罗、亚历山大、坦塔等大中城市。同时，大量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更是雪上加霜。

人口问题给埃及社会带来了许多不良后果，尤其是在粮食、住房、教育、就业、医疗、城市建设和公共设施等方面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困难，极大地影响到埃及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正如穆巴拉克总统所说："这对埃及的发展是'最大的威胁'"。

因此，穆巴拉克总统上台后，十分重视人口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减缓人口增长速度。1981年成立全国人口委员会，1993年正式设人口部，在全国推广"家庭组织"计划（即计划生育），号召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埃及政府还制定了控制人口的目标，力争在21世纪初将人口增长率控制在1%～1.5%之间。

其实，据俄罗斯科学家艾尔舒·卢吉茨的最新研究发现，古埃及人可能是最早实行计划生育的民族。为了控制尼罗河谷人口的增长，古埃及人发明了不少避孕方法。公元前13世纪，他们用软皮革、动物的肠子、膀胱等内脏来制作避孕套。当时的埃及人还从鳄鱼身上提炼出的一种看上去像蜂蜜一样的药物来避孕，称之为"鳄鱼膏"，据说十分有效。

然而，如今作为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埃及的宗教观念根深蒂固。为此，政府同伊斯兰教机构密切配合，从《古兰经》中寻找计划生育的理论依据，以消除穆斯林的宗教顾虑。爱资哈尔大学提出，

《古兰经》明文规定，母乳喂养婴儿要达两年之久，这本身就是在限制妇女生育；《古兰经》要求保证人们的健康和智力，而只有少生孩子才能做到。同时，埃及计划生育部门加强在电台、电视台以及报刊上的宣传力度，并向全国各地派遣多个宣传小组，成立4 000多个计划生育服务站，传授简单的节育技术并提供避孕药具。

由于埃及采取切实可行的计划生育措施，到了20世纪90年代，已初见成效。为表彰穆巴拉克总统对控制埃及人口做出的贡献，1994年联合国授予他人口奖。尽管如此，埃及政府丝毫不敢放松人口工作。除了继续推行计划生育措施外，大力开垦荒地，鼓励劳务输出，以减轻国内的人口压力。

第一章　法老时代的历史变迁和文明交往

一、埃及文明的起源

"尼罗河的赠礼"

每年7月中旬，受非洲中部季风雨的影响，尼罗河河水开始上涨，俗称"落泪"。尼罗河的泛滥期长达4个月，期间，携带大量有机质和矿物质的泥沙顺流而下，沉积在尼罗河两岸，形成肥沃的冲积平原。由于黑色淤泥是沉积在先前的砾石层上，部分积水会渗入地下，排进大海，从而避免形成沼泽或盐碱地。古代埃及人把这种极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的黑色土地称为"凯麦特"，并以此来称呼其国家。与此相对的是"红色土地"，则成了他们对其他贫瘠荒芜地区的贬称。

利用尼罗河的泛滥和水位高低的变化，古代埃及人很早就掌握了一套简单而有效的"流溢"（洪水）灌溉方法。当洪水自然地或人为地流入低洼地带后，埃及人修筑堤坝将水蓄积起来，形成一连串平均深度为1.5米的洪水池塘。10月末，尼罗河水位降低以后，埃及人开始播种，并着手利用蓄积已久的洪水。他们挖掘沟

渠，引水浇灌低处的农田，直到次年 1 至 4 月间农作物成熟。

从红海沿岸到大西洋之滨，尼罗河冲积出的河谷盆地和三角洲是惟一的天府之国，被誉为“地中海的粮仓”。因此，早在法老时代，埃及就流行着“埃及就是尼罗河”的谚语，甚至还形成了给河神娶妻的节日风俗。每逢 8 月 28 日“忠诚节”，埃及人将盛装的少女载至河中央，然后抛入激流中献给河神。公元前 5 世纪，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曾游历过埃及，他由衷地感慨道：“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埃及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尼罗河在某种意义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尼罗河母亲孕育了埃及文明，富饶的埃及大地尽情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埃及人。

远古时期的民族融合

1974 年 1 月 28～31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开罗举行了关于古埃及居民的讨论会，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和相关学科，引用诸多证据，对古埃及居民的人种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尽管没有得出一个公认的结论，但大多数学者具有明显的倾向性，认为，如果不拘泥于严格的科学定义的话，古埃及人应属于非洲人种，即尼格罗人种。在建立王朝之前，埃及的居民以黑人为主，其行为和思维方式均体现出非洲特性。

目前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可以进一步解决古代埃及人种的归属问题。例如，通过测定皮肤中的黑色素量即可确定人种归属。这是因为，皮肤中的黑色素不易溶解消失，甚至能保存在几万年前遗留下来的动物化石中。在巴黎人类博物馆体质人类学实验室，埃及学家皮特里成功地测定出埃及木乃伊皮肤中的黑色素含量，从而断定古埃及人确系尼格罗种。

总之，根据科学家的研究、考古资料中的艺术形象以及文学作品里的描述，古埃及人的外貌特征逐渐明晰了。他们身材细高，长头颅、椭圆形脸，肤色黝黑。然而，这些特征却被来自西亚那些具有宽阔头颅的移民冲淡，逐渐演化成为大家所熟知的古埃及人——中等身材、骨骼健壮、大脑袋，宽脸厚唇密睫毛、肤色较浅、身体光洁，女性通常要矮小苗条些。

从语言学角度来讲，古埃及人是非洲的哈姆语系的部落与亚洲的塞姆语系的部落长期融合而成的，他们的语言属于闪·含语系，或称亚非语族。这些原始的、不同的部落和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已在考古学上得以证实。根据考古资料，古埃及早期文化既具有古代非洲文化的传统，又带有一些明显的古代西亚文化的特征。

文明的曙光

尼罗河流域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在古埃及文明产生之前，埃及的原始人群已经历了数十万年，甚至数百万年的进化历程，即所谓的史前时代。从考古学的角度讲，史前时代包括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但是，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等因素，埃及的古代遗存主要保留在上埃及。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埃及的旧石器时代大约开始于 175 万 ~ 75 万年前，结束于约公元前 1 万年，原始人群主要出没于尼罗河西岸的台地上。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是奥杜韦文化，其主要特征是使用天然手斧和用卵石制作的砍砸器。奥韦杜文化之后是阿舍利文化，距今约 20 万 ~ 9 万年。阿舍利文化的范围较广，在开罗附近的阿巴西亚、底比斯以及尼罗河的台地上都发现了连续几层的阿舍利文化遗址，发掘出大量的手斧。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是位于阿斯旺以北大约 50 千米的考姆翁布遗址，距今约 17 000 年，至少延续了 5 000 年之久。这片冲积平原动植物资源丰富，可常年维持人类的生存，被称为“食物采集者”的原始人群在此过着渔猎采集生活，他们已能打制比较细致的石器，典型的石器是经轻轻压剥修饰出刀刃的狭长叶片。值得一提的是，1978 年，由美国、波兰和埃及联手的史前埃及调查团在考姆翁布以南、距今 18 300 ~ 17 000 年的库巴尼亚干河遗址上的重大考古发现。考古学家发现了烧焦的 3 粒大麦和 1 颗单粒小麦等谷物，研究表明实属人工栽培。换言之，尼罗河流域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农业的地区。

公元前 10000 ~ 前 7000 年，埃及进入中石器时代，即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在尼罗河流域和西沙漠等地出土了许多具有明显的中石器时代特征的箭头、石镰、燧石工具和石磨具等细石器。

大约从公元前 7000 ~ 前 4500 年，埃及步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广泛分布于上、下埃及，其文化遗存非常丰富。传统上是以上埃及的塔萨为典型，以下埃及的法尤姆文化 A、麦里姆达文化和奥玛里文化为代表都是农牧业混合型的文化。埃及人从渔猎采集生活过渡到了畜牧农耕生活，逐渐由“食物采集者”演变为“食物生产者”，从而过上较稳定的定居生活。考古学家在法尤姆地区发现了埃及最古老的农耕遗迹。古埃及人已开始种植亚麻，以及来源于西亚的大麦和小麦，并驯化了牛和绵羊。尽管如此，采集和渔猎在古埃及人的生活中仍占有相当的比重。此外，还出土了来自红海和地中海地区贝壳，定年为公元前 5000 年左右，这是埃及最早的对外交往的证据。

磨光石器的流行和陶器的发明是新石器时代的标志。埃及磨制石器的种类主要有磨光的石斧、刮削器、尖状器、镰刀、箭头等。除石器外，还有骨针、象牙饰品、石灰石调色板等。陶器已相当普遍，样式品种繁多，但工艺简陋，陶质疏松，多呈单色(红色、棕色或黑色)。此外，从麦里姆达遗址还出土了纺车。

新石器时代只持续了3200年左右，不足旧石器时代的百分之一，但是它在史前文化的发展中却具有决定意义，开启了埃及历史上的铜石并用文化阶段。

文明的诞生

公元前4500年左右，埃及进入铜石并用文化时期，即埃及历史上的前王朝，尼罗河流域逐步迈入文明的“门槛”。典型的铜石并用文化遗址有上埃及的巴达里文化、涅伽达文化Ⅰ和涅伽达文化Ⅱ，并以此将埃及铜石并用文化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

巴达里文化时期(约公元前4500～前4000)，埃及仍属于农牧业混合型文化。这一时期最大的成就是铜器的使用，西奈半岛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冶炼铜的地方。但铜器大多来自西亚，数量十分有限。人们的基本生产工具仍是石器，最常见的是石镰。巴达里文化的典型陶器是具有黑顶的红色或黑色光面陶，称为“黑顶陶”。

巴达里文化时期，埃及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在巴达里文化遗址，曾出土了许多妇女小雕像，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妇女的崇拜；妇女的坟墓通常要比男性的大，说明妇女在氏族中的地位明显高于男性。

涅伽达文化Ⅰ(约公元前4000～前3500)亦称阿姆拉文化，主要分布于涅伽达一带，以阿拜多斯附近的阿姆拉最为典型。这一

时期的燧石工业是在巴达里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手斧、尖状器和石镰等石器的制作已相当精美，明显是出自熟练工匠之手，社会分工日益明显。但铜器工具仍然非常稀少，出土的铜器有薄铜片和一端卷成小环的铜针。在此遗址上出土的几乎全是精制陶器，除红光陶和黑顶陶外，还第一次出土了白线光面陶，即在红色陶面上饰以白色的几何线条。说明手工业水平和审美意识较前有进一步发展。

涅伽达文化Ⅰ，埃及文化已发展到氏族公社末期，出现了私有制和王权的萌芽。例如，从涅伽达墓穴出土的一个黑顶陶和一块陶片上，分别出现了后来象征王权的红冠和鹰的形象，说明王权思想已开始出现。此外，还出土了一些男性特征十分明显的小雕像，反映男性地位的提高。私有观念和剩余产品加快了对外交往的步伐，埃及人的商品意识明显增强。他们与西亚建立了密切的商业关系，用黄金交换绿松石、玻璃珠等奢侈品。

涅伽达文化Ⅱ（约公元前3500～前3100）又称格尔塞文化，仍处于铜石并用时代。这一时期人们的活动范围较前有了明显的扩大，他们下到尼罗河谷地，开始利用尼罗河的洪水。燧石工业已达到娴熟和完美的程度，金属器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主要用于制作鱼叉、短剑、刀和针等工具。该期具有代表性的陶器是彩绘陶，绘有动植物和人物图案。说明人类对自然界及自身认识的加深，并有能力来表达这种认识，而这些图案则逐渐演化成埃及的象形文字。文字的发明标志着埃及终于跨入文明的门槛。

涅伽达文化Ⅱ是埃及氏族制度解体、国家逐步确立的时期。埃及最早的国家可能出现在涅伽达。从墓葬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阶级分化、贫富不均的现象已相当明显，并在一些出土的器物上

已出现战俘奴隶的形象。这时的国家形式多为小国寡民的城邦，很可能是一种为适应水利灌溉的需要，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联合附近的村庄而组成的联合体。埃及人称之为斯帕特(Spt)，希腊人称诺姆，汉译为州。国王(阿塔兹)名誉上拥有军政、司法和宗教等方面的大权，但由于氏族贵族的势力仍很强大，对国王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在希拉康坡里斯曾发掘出前王朝末期蝎王和卡王的文物。生活在大约公元前3150年的蝎王，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第一位知道姓名的国王。在蝎王权头标上，蝎王头戴白冠，腰系象征王权的牛尾。在以后的几千年里，牛尾巴一直被当作国王最正式礼服的组成部分。

前王朝末期，正是城邦的形成时期，其具体数目和情况尚不清楚。它们可能各自独立，有自己的首城、军队以及宗教信仰等。各城邦为了占据在农业生产、水利灌溉和贸易发展的主导地位，长期对立，冲突和战争不断。在上埃及曾出土过一把石刀，象牙刀柄上的浮雕刻有俘虏和在水上搏斗的场面。在希拉康坡里斯的墓画中也发现了战争场面。城邦之间的混战，直到早王朝时期才结束，上、下埃及趋于统一。

蝎王时代的对外交往

涅伽达文化Ⅱ，埃及的对外交往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在格尔塞地区的墓葬里出土了大量的舶来品，如天青石、银、铅和铜制品，反映了埃及的对外交往情况。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对蝎王墓的发掘。

1988年，德国考古研究所驻开罗的考古学家冈特·德莱尔，在阿拜多斯发现了蝎王的坟墓。蝎王的墓葬较为完整，埋葬间保留

一个神龛和象牙笏，其他7间墓室里堆满了用于装油、肥肉、面包和啤酒的坛子和盘子、装衣物的杉木箱、石器皿以及象牙和骨制品。令人大为震惊的是，考古学家断定，有3间墓室的坛子是用来储藏葡萄酒的，其中两间墓室里就有700多个容器。假设这些坛子当初都盛满了葡萄酒，总计储量达1200加仑，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数量。然而，在公元前4000年代末以前，埃及连棵野生的葡萄藤都没有，这些葡萄酒从何而来？答案就是这些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坛子。

蝎王墓的大多数容器是带有下小口径的瓶子，这种形状也许是易于封口和长途运输。根据U.哈同的研究，从这些容器的构造、形状、装饰等特征上看，它们来自不同地方，例如有把柄的坛子来自巴勒斯坦和约旦各地。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些坛子在盛满葡萄酒后，经西奈半岛的陆上交通运到埃及。有学者认为，蝎王的势力已渗透到巴勒斯坦一带，并开展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殖民活动。这些葡萄酒或许是作为贡品运抵埃及的。因此，这些坛子提供了蝎王时代埃及与西亚之间的交往的重要例证。

蝎王墓中最有争议的发现是160块邮票大小的骨头和象牙笏板，上面刻有简单的图形，冈特·德莱尔认为那是最早的象形文字。果真如此的话，埃及的象形文字就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比公认的两河流域最早的楔形文字早大约200年。

二、早王朝——统一王国的开端

纳尔迈称霸埃及

据托勒密王朝的埃及祭司马涅托记载,从古代埃及国王美尼斯创建的第一王朝到希腊人征服埃及,埃及经历了 31 个王朝,通常被称为"法老时代"。近代的埃及学家将法老时代划分为早王朝、古王朝、古王国、第一中间期、中王国、第二中间期、新王国、第三中间期和后埃及等 8 个时期。其中,早王朝时期包括第 1～2 王朝,时间约为公元前 3100～前 2686 年。

马涅托认为,美尼斯是第一王朝的建立者,古埃及统一国家的缔造者。他在上埃及建立国家后,征服了下埃及,并在尼罗河谷地和三角洲的咽喉地带建立新都——白城,希腊人称之为孟斐斯。20 世纪 80 年代曾出土过一件刻有美尼斯名字的陶器,研究表明,美尼斯很可能是一统埃及的第一位国王。但是,有些埃及学者对美尼斯的真实性深表怀疑,他们认为最早称霸埃及的应是名不见经传的纳尔迈,其依据是来自希拉康坡里斯的重大考古发现。1898 年,在希拉康坡里斯"大宝藏"出土的纳尔迈权标头、调色板、象牙圆筒印和利比亚贡赋调色板等珍贵文物,生动地刻画了纳尔迈征服下埃及和利比亚的情景。此外,还有一种折衷观点,把美尼斯和纳尔迈视作一人。

前王朝后期和第一王朝初,各州为了攫取人口、牲畜和财富等,不断发动战争,相互兼并,从而形成埃及历史上的第一个"战国"时代。征战的双方往往采取结盟的手段,因而,争霸和联盟是

这一时期的主要政治态势。《纳尔迈调色板》和权标头上均刻有4个高举本州旗帜的人物形象，显示出盟邦的力量。纳尔迈在蝎王的统治基础上，率领盟邦多次出击，大获全胜，称霸埃及，被看作是第1王朝的创建者。

《纳尔迈调色板》正反两面都刻画着精美的图案和象形文字符号，反映了以纳尔迈为首的上埃及盟邦远征下埃及，战胜"纸草之国"的盛况。调色板上的纳尔迈身着紧身衣和短裤，腰系牛尾，手执权标头，尽显王者风范。调色板的两面分别刻有纳尔迈头戴象征上下埃及王权的白冠和红冠，表示他在埃及的霸权地位。在石板背面的中段，两个人牵着两头长颈交叉的狮头怪兽，两头怪兽相对而立，长颈在中间巧妙地构成一个圆形。这种动物长颈呈"8"字形相缠形象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圆筒形印章常见的图案，这说明埃及和两河流域可能很早就开始了交往。

当然，纳尔迈的统一活动并未实现"最后的"和"完全的"统一，在他之后还反复出现过"两个权力"对立的局面，上下埃及之间，甚至各州之间仍保留其传统势力。在早王朝时期，上埃及有16个州，下埃及有10个州。

早王朝的统一活动

纳尔迈之后，第1王朝经历了7位王的统治，他们不断发动战争。通常认为，阿哈是纳尔迈的继承人，在阿哈的碑文中称他"得到上下埃及"，他曾在三角洲建立了一座祭拜涅特女神的庙宇。第3位王哲尔继续向北扩张，可能远征过利比亚和西奈半岛，向南攻打到努比亚地区的第2瀑布。从第1王朝开始，整个法老时代埃及人的历史都与努比亚交织在一起。努比亚有丰富的矿产（金、铜

等）、人力等资源，埃及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努比亚掠夺的基础上。

第5位王登是早王朝时期统治时间最长的国王，他第一次采用象征上下埃及“两个权力的合一”的红白双冠和表示“上下埃及之王”的树蜂衔，表明他在整个埃及的权威。在此之前，上下埃及国王的标志分别是苏特树（一种古老的植物）和蜜蜂。

第2王朝历经10位王的统治，他们对北方的征服规模不断扩大。创建者名为亥特普塞海姆威，意思是“两个权力和睦共处”，他使南北两个分裂的权力再度统一起来。在第9位王哈塞海姆的雕像和其他文物上，清楚地记录了他与北方发生战争的情形。在其两尊雕像的基座上，分别刻有他杀死“北方的敌人47 209人”和“48 205人”的字样，表明他对北方发动过巨大规模的战争，而“哈塞海姆”的含义正是“权力的出现”。在哈塞海姆的基础上，其继承人哈谢海姆威才真正完成了统一大业。在埃及的国王中，惟有他采取了分别代表下埃及和上埃及的“荷鲁斯和塞特”的双重王衔，“两主（即荷鲁斯和塞特）在他统治时和睦相处”。

国家的统一是埃及社会历史发展的需求和必然结果，为社会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国家机器日趋完善，王权逐步确立并世袭化；另一方面，国家的统一为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出现的马斯塔巴式王墓或贵族墓，全方位地反映了早王朝的生产力水平，以及人们的君权意识、宗教思想和价值观念等社会状况，无疑是早王朝时期社会的一个缩影。

三、古王国——统一王国的确立

政治变迁和对外交往

早王朝结束后，埃及赢来了大一统的古王国时代，确立起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此期间，埃及人开始修建金字塔，并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金字塔，故亦称金字塔时期。古王国定都于孟斐斯，包括第3～6王朝，约公元前2686年～前2181年。

埃及地处非洲大陆的东北角，从周边地理环境上看具有一定的闭塞性，但是这并未影响埃及的对外交往。古王国历代国王都采取了战争与和平相结合的交往方式，在与利比亚人、亚细亚人和努比亚人等发生军事冲突的同时，开展带有掠夺和强制色彩的商业贸易活动，可谓商业远征。

根据都灵王名册和其他文物，第3王朝至少有5名国王。哈谢海姆威之子萨那克特和乔塞尔先后继承王位，然而都灵纸草把后者看成是新王朝的奠基者，事实上，他的确开创了第3王朝的业绩，是该王朝最有作为的君主。在他统治期间，国力逐渐强盛，经济有了发展，新城市不断兴起。国内形势安定，向南已扩展到第一瀑布附近，并在北方成功地阻击了东部边境游牧民和西部利比亚人的骚扰。第3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是末代王胡尼，长达33年或34年。他在上埃及的厄勒藩汀(今阿斯旺)修建了一座堡垒，以巩固在南方的统治。

据马涅托记载，“第4王朝包括了属于不同家系的、孟斐斯的

8王”。胡尼的儿子斯尼弗鲁创建了第4王朝的伟业,其美名流传至今。在位期间,他南下征服了努比亚,这在埃及历史上尚属首次。有《巴勒莫石碑》记载为证,他“击破尼西人的境土,获男女俘虏7 000人,大小牲畜20万头”。在北方,他曾取得过西战利比亚部落和东征西奈半岛的胜利,并成为埃及在西奈半岛铜矿场的奠基人,被当作该地区“伟大的神”和庇护者加以崇拜。斯尼弗鲁还发展了与地中海民族的贸易关系,尤其是从西亚地区运回大量的优质木材。在其著名的“弯曲金字塔”里发现的杉木木梁,则是当年与腓尼基人交往的最好明证。

斯尼弗鲁之后的几代国王,都因金字塔而举世闻名。斯尼弗鲁之子胡夫继承王位后以其大金字塔名扬天下,但关于他个人的史料却不多。他也远征过西奈半岛,在那里留下了“克努姆·胡夫,伟大的神,穴居人的摧毁者”的铭文。胡夫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拉杰德夫和哈夫拉先后继承王位。拉杰德夫是埃及历史上最先称自己为“拉(太阳神)之子”的国王。以第二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闻名于世的哈夫拉也自称是“拉之子”,并在三角洲地区修建了太阳神庙。哈夫拉之子孟卡拉继承王位后,社会安定,文化昌明。据希罗多德记载,他“以仁政来治理他的人民”,“他是国王中最公正的审判者”。

第4王朝末叶,王权与日益显赫的祭司集团发生冲突,地方贵族势力也不断壮大,“王冠开始失去它往日的权威性”,国家面临危机。尽管第6王舍普塞斯卡夫是一位很有魄力的国王,但也未能摆脱颓势,挽回大局。他在吉萨为父亲孟卡拉的金字塔完成了最后的综合建筑,但他却不愿为自己修建象征太阳神崇拜的金字塔,而是在远离吉萨的萨卡拉建造了一座“过时的”马斯塔巴,而且,他

的名字中也无"拉"的字样，以此来与宗教势力抗衡。但是，祭司贵族最终还是占据上风，并建立了第5王朝。

马涅托记载，"第5王朝是由厄勒藩汀的8王组成"，但他列出的是9位国王。以赫利奥坡里斯强大的宗教势力而建立的第5王朝，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宗教神话色彩。韦斯特卡尔纸草记录了关于第5王朝起源的传说，把头三位国王乌塞尔卡夫、萨胡拉和尼斐利尔卡拉描写成拉神的儿子和皈依者。因此，他们不断向拉神捐赠大量的土地，兴建供奉太阳神的庙宇，并竖立起巍峨的方尖碑。方尖碑的顶端反射着太阳的光芒，显示出拉神的无边威力。

第5王朝历代国王的另一共同点是，承袭传统，继续向外扩张，积极对外交往。该王朝遗留下的一些铭文和壁画中，记录了埃及与西沙漠、西亚沿岸地区和努比亚交往的情形，其规模明显超过前代。"王冠之主，上下埃及之王萨胡拉"（西奈半岛的铭文）是第5王朝最伟大的国王，他创建了埃及的海军，并开辟了由尼罗河三角洲到叙利亚的海上通道，更大规模地开展对外交往。萨胡拉曾派遣舰队访问蓬特（索马里，一说埃塞俄比亚）和巴勒斯坦海岸，带回珍贵的药材、宝石和木材等货物。同时，在陆上，他对东北方、西沙漠不断用兵。第5王朝的最后两位国王，杰德卡拉（又名伊塞西）和乌那斯父子也颇有作为，继续同周边国家和部落开展商业远征，并在各地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杰德卡拉以开采哈马马特干河和西奈半岛的采石场和矿山而著名，他的名字被刻在马格哈特干河和位于第二瀑布的哈拉发干河的岩石上。在厄勒藩汀的纪念物上，描写了乌那斯巡视南方的情景，他亲自接见努比亚首领，并带回一头长颈鹿。在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古城毕布罗斯港，人们还发现了一口描绘战争场面的瓮，上面刻有他的名字。此外，在乌那

斯的金字塔中还发现了迄今最早的金字塔文，祝福他像奥西里斯神一样，“复活又生存”。

据马涅托，第6王朝由孟斐斯的6王组成。新王朝建立后，宗教集团和地方贵族势力强大，王权脆弱，因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国王往往是因其大臣而为后人所知。

美列卢卡是第一任王特悌统治时期最有影响的权贵，任维西尔（现代埃及学家借用阿拉伯语对宰相的称谓）和首席僧侣等要职。他的马斯塔巴接近特悌的金字塔，规模宏大，结构复杂，是北萨卡拉最好的马斯塔巴之一。

乌尼是珀辟一世及其两位儿子麦然拉和珀辟二世当政时期的宠臣，可谓“三世宠爱集一身”。珀辟一世曾先后5次派他远征西奈半岛和巴勒斯坦。麦然那统治时期，开始了被称为对“非洲内陆腹地进行最早探险”的活动。麦然那曾两度派乌尼出征南部，从第一瀑布附近带回用于建造王后金字塔的花岗岩和石棺。然而，对努比亚各地的军事征服最终由哈尔胡夫完成。他身兼中央和地方的多种要职，特别是作为上埃及的总督和厄勒藩汀地方的统治者。功德盖世的哈尔胡夫颇得麦然那和珀辟二世的赏识和重用。麦然那曾3次派哈尔胡夫出使尼罗河第三瀑布附近的伊阿姆等地，“把南方的土产携回埃及”。有趣的是，哈尔胡夫还从努比亚给珀辟二世找了一个能歌善舞的矮黑人，令8岁的小国王异常兴奋。珀辟二世致信表示感谢并表达其急切心情，哈尔胡夫则非常自豪地把这封信刊刻在其墓碑的正面，以示后人。

马涅托记载，珀辟二世在位时间长达94年，是古王国统治时间最久的国王。在其统治后期，内忧外患日趋严重，国家最终陷人无政府状态。各州的地方贵族脱离中央，建立世袭政权；周边的利

比亚人、努比亚人和东方的游牧部落等从四面八方侵袭埃及。珀辟二世之后，形势急转直下，王位更替频繁，最终，尼托克利丝登上了国王宝座，她是已知最早的埃及女王。

建造金字塔的原因

金字塔是古王国时期国王的坟墓，外形呈角锥体，墓基为正方形，四面是 4 个相等的等腰三角形。底阔顶尖，远远望去犹如汉字的"金"字，被形象地称为金字塔。金字塔在古埃及文中称"庇里穆斯"，意为高。

在尼罗河的西岸，以古王国的首都孟斐斯为中心，形成了一大片王室墓地。因为埃及人认为，日出为生，日落为死。他们居住在尼罗河东岸，陵墓则要建在河对岸。据统计，现已勘查到 97 座金字塔，分布于从开罗附近的吉萨到上埃及的希拉康坡里斯一带。但多数已坍塌，保存较完整的仅有 30 多座。

金字塔建筑外形简约，并非埃及人缺乏想像力，而恰恰说明他们对纪念性建筑富有深刻和独到的理解，展示出他们那成熟的艺术构思和超人般的精神魄力。浩瀚神秘的沙漠衬托着金字塔形体的精确、稳定与力量，无论从力学还是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都给人以神圣不可动摇的感觉。世界上任何古代建筑都没有像金字塔这样，让人感到如此神秘和敬畏。

金字塔的兴建最能体现古王国的时代特征，以及古埃及人的精神追求和生存观念。

首先，金字塔是古王国中央集权制的产物。古王国时期，埃及开始确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在专制主义统治下，君主具有法律、行政、财政、军事和宗教等一切方面的无限权力，实行以个人意

志为转移的绝对统治。作为至高无上的君主，他可以随心所欲地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为他修建金字塔；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地发动对外战争，以获取建筑金字塔所必需的石材、木料、矿物和人门等。

其次，金字塔建筑是古王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古王国时代，埃及仍处于金石并用时期，还保留某些原始性。然而，随着统一王国的确立，社会形势的相对稳定，必然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进而为金字塔的修建奠定了物质基础。国家的统一，直接带动了上下埃及的正常交往，有利于合理有效地开发利用尼罗河资源。因此，古王国时代的灌溉面积不断扩大，并逐步实现犁耕化，农业和园艺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从而使埃及人积累了充足的剩余产品。

最后，金字塔建筑是古王国时期宗教信仰的化身。随着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王国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古王国意识形态领域也相应发生变化。人们对于太阳神拉的崇拜成为宗教生活的主流，君权神授和神化君主的思想普遍存在，同时，人们越来越多地追求永恒世界的享乐，而这一切的有机结合体就是金字塔。

阳光是万物之源，埃及人对于太阳的崇拜由来已久，早王朝时期就开始崇拜拉神。太阳神的形象之一就是：用金箔包裹的角锥体岩石，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如果把它放大若干倍，也就是金字塔了。当然，最初的信仰只是一种纯朴的自然崇拜，而在古王国君主专制体制下，君主的无上权威来自神授并要实现自身的神化。因此，中央集权统治赋予拉神更多的社会属性，拉神成为君权的保护神和象征，国王是拉神的儿子，国王死后其灵魂要借助金字塔的力量与拉神结合，以实现永恒。

金字塔是国王与拉神相会而升天的场所，其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金字塔的外形的作用。埃及人把金字塔称为

梅尔，意为“上升的地方”。阶梯金字塔给国王的灵魂提供升天的阶梯，据金字塔文记载，“阶梯……作为国王升上天空的东西。”而光滑倾斜的角锥体金字塔则象征着辐射的阳光，国王的灵魂可以顺着太阳光线升天。另一方面，是在金字塔里保存国王的遗体。古王国时代，埃及人的来世观念已根深蒂固。他们深信：死后灵魂和尸体相结合并能获得永生。为了追求永生不灭，就必须永久地保存尸体，因为尸体一旦腐烂或残缺不全，灵魂就无以附着而消失。灵魂不存在了，那才是真正的没命了。为了使灵魂和肉体实现共存共生，埃及人发明了制作木乃伊的技术，甚至把动物的尸体也制成木乃伊。

永恒的生命必然要有一个永久的居所，于是，准备身后事就成了埃及人的终身大事。因此，为国王修建“永恒的城堡”——金字塔，自然是倾国倾民的头等大事。金字塔不仅是一座供国王在冥世享乐的宫殿，而且还留有供国王灵魂出入的通道。

金字塔文明

金字塔起源于马斯塔巴，经历了阶梯金字塔和角锥体金字塔两个发展阶段，是长期以来埃及陵墓自然演变的结果，凝结了几十代埃及工匠的智慧和心血。

埃及第一座阶梯金字塔是乔塞尔王时期建立的，位于萨卡拉。阶梯金字塔的发明应归功于天才的伊姆荷太普。伊姆荷太普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原是一个小官吏，后来担任维西尔、赫利奥坡里斯的祭司长和总建筑师等要职，成为一位非常显赫的大人物。在主持修建乔塞尔王的马斯塔巴时，为了体现君主的威严，伊姆荷太普别出心裁，采用石料将已建成的马斯塔巴向四周扩展，

并在此之上增加了几层马斯塔巴。马斯塔巴重叠在一起，逐层向上缩小，呈阶梯状。经过几番扩建，最终建成了一座6层的阶梯金字塔。由于在建筑工程等方面的卓越成就，伊姆荷太普被誉为“设计巨大建筑的第一位巨人”，是埃及第一位被载人史册的艺术家，甚至被后代奉若神明，尊其为“普塔之子”。

乔塞尔王的阶梯金字塔是金字塔建筑的开端，并为其继承者所效仿，直到胡尼王时期才发生了变化。胡尼王金字塔位于美杜姆，其主体部分仍是一座阶梯金字塔，后用石块将塔身的阶梯填平，改造成具有倾斜面的角锥体的金字塔，阿拉伯人称之为“假金字塔”。尽管如此，胡尼王的金字塔是由阶梯金字塔向真正金字塔转变的尝试，最后实现这一转变的是斯尼弗鲁王。

斯尼弗鲁王在达赫舒尔设计建造了第一座角锥体的金字塔，但在建到一半时发现倾斜度偏大（54°31′），为了减轻塔体内部屋顶的负荷而收缩塔身，将倾斜角度改为43° 40′，从而形成了下陡上缓的菱形模样的金字塔，即所谓的“弯曲金字塔”，或“折角金字塔”。对于这样的畸形金字塔，斯尼弗鲁王当然深表不满，于是他又命人建造了一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角锥体金字塔。角锥体金字塔是金字塔最完美的形式，不禁使人联想到太阳光从云层裂缝中投射下来，照耀在大地上的效果。此后，在斯尼弗鲁王金字塔的构造和模式的基础上，建造金字塔的技术日臻完善，好大喜功的胡夫、哈夫拉和孟卡拉在尼罗河西岸建造了举世瞩目的吉萨金字塔群。

长期以来，面对规模巨大，工程浩繁，结构严谨，独具匠心的金字塔，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甚至将它归功于外星人。直到1991年，埃及考古工作者在吉萨高地的金字塔附近发掘出一片墓地，才揭

开了这个困扰已久的谜团。坟墓是用建造金字塔的边角料修建的，其形状与金字塔的外形相符。从墓壁的象形文字得知，墓主是建造金字塔建筑工人，其中还包括工头、妇女、儿童，共有 160 人。从工人脊柱形状可以看出，这些劳工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有的还曾骨折伤残。他们长年累月在工地上劳作，携妻带子，以此为家。这与建造金字塔需要固定劳工相一致。

第 5 ~ 6 王朝，由于王权的日趋衰落和人民的强烈反抗，金字塔是越建越小，通常都在 90 米以下，而且质量低劣粗糙，有的甚至是用碎石块垒成。最后，随着古王国的崩溃而消失殆尽。

然而，"一切都怕时间，时间却怕金字塔。"经历了四千多年的风沙侵蚀，金字塔依然故我，成为人类建筑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其实，早在法老时代金字塔就已成为古老的奇迹。历代游客们"到此一游"之类的"涂鸦"足以为证。大约公元前 1600 年，一位名叫阿罕穆斯的埃及人，在萨卡拉金字塔的墙壁上虔诚地刻道：看上去"天堂就在里面"。拉美西斯二世的四儿子卡姆瓦塞特，是第一个行动起来保护修缮金字塔的古埃及人。他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和资金，进行实地考察，并用象形文字标明墓主。卡姆瓦塞特堪称是世界上第一位埃及学家和考古学家，现代博物馆标注学的鼻祖，至今仍被人们怀念和称道。

第一中间期

古王国结束后，埃及陷入严重的分裂与混乱状态，即进入所谓的"第一中间期"。它包括第 7 ~ 10 王朝，时间约从公元前 2181 ~ 前 2040 年。

第一中间期是古王国向中王国的过渡阶段，其主要特征是：中

央政权严重瘫痪，小国林立，战乱频仍；灌溉系统遭到严重破坏，饥馑不断，民不聊生；神和君主的地位受到冲击，人们的信仰出现危机；艺术水平明显下降。从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混乱局面。《聂非尔提预言》中描述道："大地像陶钧一样翻转起来"。《祭司安虎同自己心灵的谈话》中也叙述："一年比一年困难了。国内叛乱了。国家蒙受创痛。到处在忧伤。"

第一中间期虽然维持了连续发展的4个王朝，但时间短暂，往往不过数年或数十年，而且，统治范围也十分有限。第7、8王朝以孟斐斯为首都，其统治范围始终未超出京畿一带。第9、10王朝建都于赫拉克利奥波里斯，逐步扩大到北部三角洲和中部一带，大有统一上下埃及之势。但是，仍摆脱不了内忧外患，内有人民起义、贵族叛乱，外有贝都因人入侵，尤其是南方的底比斯又兴起了第11王朝。第10王朝与第11王朝并存，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底比斯王朝依靠其有利的地理位置，联合周围的力量，对赫拉克利奥波里斯政权采取刚柔并举的政策，终于灭掉了第10王朝，重新统一埃及，开始了中王国时代。

四、中王国——统一王国的重建

政治变迁和对外交往

中王国时期埃及再次进入大一统时代，大约从公元前2040～前1786年，经历了第11王朝中后期和第12王朝的统治。中王国时期，中央的集权统治基本上没有达到古王国时代那样绝对集中的程度，中央政府集权与地方贵族分权的矛盾几乎贯穿始终。

第10王朝建立于公元前2133年,由7王统治142年。在第5王孟图霍特普二世当政期间,他彻底消灭了第10王朝,把上下埃及置于第11王朝的统治之下,成为"两地统一者"。在第19王朝的一个王表中,把孟图霍特普二世同第1王朝的纳尔迈、第18王朝的建立者雅赫摩斯并列为各个统一时代的开创者。孟图霍特普二世致力于恢复和加强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统治,巩固埃及的边境安全,他力图清除渗入埃及的外部势力,并恢复了对外的军事征服活动。孟图霍特普二世的远征多数是为了守卫埃及的边界,带有惩罚性质,并未阻止住努比亚人、利比亚人和亚细亚人的渗入和骚扰,他甚至还利用努比亚人和利比亚人来充实其军队。

孟图霍特普二世之后,国内形势相对稳定,因此,他的继承者孟图霍特普三世、四世在位期间,不断致力于发展经济,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尤其是与红海沿岸的贸易。孟图霍特普四世重新确立与蓬特的商业关系,为了便利通商,还在红海沿岸新建用赛尔港。

然而,第11王朝的中央集权政策严重危害到地方贵族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公元前1991年,维西尔阿蒙尼姆赫特发动政变,推翻第11王朝,建立了新王朝,并将首都迁到法尤姆地区的伊悌·托威,使该地区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

第12王朝共有8王,历时205年。在阿蒙尼姆赫特统治期间,继续对利比亚人和西奈的亚细亚人发动了远征。在埃及的东部边境地区建筑了一道"大公墙",在南方的第二瀑布塞姆纳设立了一些堡垒,还在第三瀑布的凯尔玛和努比亚建立边防哨所。阿蒙尼姆赫特统治后期,让儿子塞索斯特里斯摄政以实现权力的顺利交接,这种作法为后世沿用,从而使第12王朝建立起长期稳定的统治。

阿蒙尼姆赫特之后，国家处于经济恢复、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对外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在塞索斯特里斯一世给儿子的《教谕》中，十分自豪地记述了他对努比亚人和亚细亚人战争的胜利。阿蒙尼姆赫特二世继续开展对努比亚、蓬特、西奈和叙利亚的远征和贸易。大臣塞哈托尔的铭文写道："我作为一个青年人巡视了铜山（西奈），并且我强迫（努比亚）首领淘金"。在上埃及陶德的阿蒙神庙废墟中发现了4个箱子，里面装有银器、爱琴海式的罐子、美索不达米亚风格的印章和天青石护身符。在乌伽里特（今叙利亚境内），还出土了一尊阿蒙尼姆赫特二世女儿的雕像。这些发现是中王国与西亚，甚至是爱琴海世界交往的有力证据。

塞索斯特里斯二世时期，在第一、第二瀑布之间的阿巴尼筑起了堡垒和城墙，把埃及的边界延伸到第二瀑布以南的米尔吉萨。在北方，开采西奈的铜矿，尤其是金矿，并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保持联系，接受了叙利亚的贡品。塞索斯特里斯二世的最大成就是开发法尤姆地区，为以后开展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奠定了基础。

经过几代国王的努力，到了第5王塞索斯特里斯三世时代，中王国财力雄厚富足，政治清明，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塞索斯特里斯三世是中王国最有作为的国王。一方面，他进行行政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制。剥夺地方贵族征收赋税、蓄养军队的权力，禁止他们建造豪华坟墓。另一方面，对外扩张，加快对交往的步伐。他4次亲征努比亚，把埃及的边界推到第二、第三瀑布之间的塞姆纳，并修建了8座泥砖堡垒（要塞遗址至今犹存）。在厄勒藩汀凿平瀑布疏通尼罗河道，开辟了"卡考拉（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王名）之路"，其宽度和深度足以适应当时最大的战舰和商船的航行。

在西奈半岛，他对绿松石和铜矿的勘探和开采达到了空前的

程度，甚至还建造了永久性的屯驻地和防范贝都因人袭击的堡垒，而所有这一切都已在当地发现的数十块铭文中得以证实。与此同时，埃及与西亚的交往规模也在扩大，大量的东方人，包括农民、工匠和士兵都来到了埃及。

阿蒙尼姆赫特三世之后，其子女阿蒙尼姆赫特四世和索布克尼弗鲁女王先后继承王位。在他们的短暂统治下，国势衰微，尤其是女王当政致使国内局势更加动荡，混乱不堪，从保存至今的诅咒文献中可见一斑。尽管如此，对外交往仍未中断，两位国王都接受过来自毕布罗斯和叙利亚等地的贡品。

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国家的重新统一和安定，中央集权统治的恢复和加强，以及对外交往的扩大，极大地促进了中王国时期社会文明的进步。农业、手工业、商业和语言文化等方面都繁荣昌盛起来，成为地中海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享有很高的声誉。

农业是古代埃及的经济命脉，而水利灌溉事业则是发展农业的前提条件。中王国时期，水利灌溉系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尤其是对法尤姆地区的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这里修建了巨大的排水引水工程，2500 公顷的沼泽荒地变成了良田。在尼罗河第二瀑布附近的舍门赫和库麦赫发现了尼罗河水涨水高度的记录，说明在中王国时期对尼罗河水观察范围的扩大。对尼罗河洪水的有效利用，以及水利灌溉设施的修建，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从而保证了粮食的丰收，因此，这一时期关于饥荒的记载明显减少。

中王国在手工业方面的发展亦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青铜器的广泛使用和冶炼技术的提高。古埃及早在第 3 王朝末和第 4 王

朝初就发明了青铜器，但数量很少，仅限于制作少数珍贵物品，如权杖和戒指等。直到中王国时期，青铜器才流行起来，生产规模逐渐扩大，生产出一些雕像、钵等器具。因此，有的学者认为，中王国时期是埃及的青铜器时代的开端。青铜器的广泛使用，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然，在青铜器时代，石器的使用还很普遍。此外，中王国时期还出现了玻璃制造业和卧式织布机，其玻璃制品保留至今。

中王国的商业贸易相当发达，明显超过了前代。在法尤姆附近的新兴城市卡呼恩发掘出不少研究价值极高的商业文书，反映了中王国时期的商品货币关系和城市生活的发达程度。中王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往来也扩大了。一方面，向周边地区发动带有军事掠夺色彩的远征，在客观上带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埃及同努比亚、蓬特、叙利亚、巴勒斯坦、两河流域以及爱琴海世界都建立了商业联系，在上述地区都发现有属于中王国时期的埃及物品，进一步印证了中王国对外贸易范围的扩大。另一方面，外籍商人也活跃于埃及市场，其足迹遍布埃及各地。这在当时的墓室壁画中可以得到印证。例如，壁画《商人们的行列》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贸易盛况，形象地描绘了在埃及的西亚商人的形象。他们的外貌特征极富异国情调，身着色彩绚丽的长袍，留着长长的披肩发，牵着毛驴，带着奴隶，活跃于埃及市场。

涅 杰 斯

中王国时期，随着奴隶制私有经济的发展，埃及社会形成了一个新的特点：一批中小奴隶主阶层——涅杰斯，逐渐成长壮大，并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

涅杰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以及社会分化的结果。涅杰斯最早出现于古王国末期的文献中，原意“小人”，指受奴隶主剥削的贫穷自由民。第一中间期，他们中的一些人地位发生了变化，上升为小私有者阶层，是当时各州军队的重要来源，为州长所倚重。为了得到涅杰斯的支持，在《给美利卡拉王的教谕》中就强调，贵族要调整与涅杰斯的关系。

社会经济和社会分化的进一步发展，又导致了涅杰斯的分化。在第一中间期就出现了“强有力的涅杰斯”，到中王国时期，这种分化更为明显。部分涅杰斯已跻身于大奴隶主行列，占有大量土地，并踏上官宦之路，甚至担任州长或成为国王的心腹大臣。如第11王朝的涅杰斯伊提，号称国王“惟一的朋友”，出任底比斯的司库。在格伯林出土的《伊提石碑》上写道：“我是凭借自己的力量而成功的优秀的市民（涅杰斯）。”他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奴隶，还有十几群大小牲畜。在“不结果实的年代中”，他养活了格伯林的400人。

涅杰斯在政治上支持中央集权统治，其前途和命运与王权息息相关。因此，涅杰斯成了王权同地方贵族势力斗争的支柱，第12王朝时期王权的恢复和强大正是依靠了涅杰斯的力量。但是，作为一个包含着普通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社会阶层，大多数涅杰斯的社会地位仍很低下，有的涅杰斯甚至不得不“哀求施舍给他们一顿晚餐”。

第二中间期

埃及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王尼托克丽丝终结了大一统的古王国，埃及进入第一中间期；而第二位女王索布克尼弗鲁则完结了统一的中王国，埃及再次陷入分裂境地，开始了第二中间期。这也许

是历史的偶然，但的确是惊人的相似。

第二中间期延续了200多年，约公元前1786～前1567年，包括第13～17王朝。以底比斯为中心的第13王朝似乎是第12王朝的继续，但与之并存的还有：以三角洲西部克索伊斯为中心的第14王朝，以三角洲东部的阿瓦利斯为中心的第15、16王朝，而第13王朝尚未结束之时，又在底比斯兴起了第17王朝。因此，在第二中间期，统一的中央集权不复存在，几个王朝各霸一方，国家再次陷入四分五裂的割据状态，存在着严重的内忧外患。

第二中间期，埃及曾爆发了大规模的贫民奴隶起义。与第一中间期的起义相似，这次起义的具体时间、过程和结局尚不清楚，但一般认为，《伊普味陈词》是记述该事件的第一手资料。伊普味是一个奴隶主，站在起义的对立面，因而《陈词》中充斥着攻击谩骂的语言和刻骨的仇恨。但透过奴隶主贵族的咒骂，我们可以对这次起义有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

从《陈词》的描述来看，贫民、奴隶等社会成员是起义的主力军，"暴徒顷刻间占领了京城"，摧毁了中央集权统治。"国王被暴徒废黜了"，"国家的首长逃亡了"，"政府机关已被打开，它们的清单已被夺去"，"埃及的谷物已成公共财产"。"奴隶变成了奴隶的占有者"，"贵人饥饿而陷于绝望，奴仆却受到服侍"，"所有的女奴隶随便讲话"。起义席卷全国，规模空前，甚至连涅杰斯奴隶主也成了起义军的打击对象，整个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但是，在起义获得成功的同时，也给整个社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社会秩序极混乱不堪，农业灌溉系统荒废，仓库空虚，饥荒不断，"蛮人已从国外进入埃及"。

希克索斯人统治埃及

"希克索斯"一词意为"异方山国之酋",马涅托解释为"牧人王"。他们的成分较为复杂,很可能包括来自西亚的迦南人、胡里特人,甚至还有印欧语系的部落。他们对埃及的征服,实际上是长期渗透的结果。早在第一中间期,希克索斯人就开始渗入埃及。中王国末期到第二中间期初,他们陆续进入三角洲东部地区,并以阿瓦利斯为中心建立了第15、16王朝,同时不断向南扩大其势力。阿瓦利斯从中王国时一个不知名的土著居民点迅速繁荣起来,"起到国际性商贸中心的枢纽作用"。希克索斯人在埃及建立了百余年的有效统治(约公元前1730~前1570),基本上维持了埃及原有的政治制度和行政机构,采用埃及传统的王室头衔,并吸收埃及的官员参政。他们赞赏埃及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全方位地吸收埃及文明,很可能还与埃及人通婚。他们使用象形文字,崇拜埃及的神灵,例如,他们几乎全盘接受了埃及的拉神信仰,其国王自称拉神之子,并模仿埃及国王的做法,将其名字写在椭圆形的王名圈里,以祈求太阳神的庇护。

事实上,希克索斯人在统治埃及北部的同时,还占据着西亚的部分领地。因此,希克索斯人的统治在客观上沟通了埃及与西亚,促进了两地人民的正常交往。在接受埃及文化的过程中,希克索斯人也把西亚的某些先进文化带入埃及,为埃及文明注入了新的血液。最为突出的是,埃及人从希克索斯人那里学会使用马拉战车,制造复合弓箭、青铜短剑、盔甲等新式武器和装备,而所有这一切都为日后埃及军事帝国的腾飞插上了翅膀。

希克索斯人的征服是埃及历史上第一次遭受外族统治,因而

激起了埃及人的民族仇恨。底比斯的第17王朝国王卡美斯与其弟雅赫摩斯,成功地领导了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约公元前1553年,埃及军队攻克了阿瓦利斯,将希克索斯人驱逐出境,埃及重新获得统一。公元前1567年,雅赫摩斯一世继承王位,创立第18王朝,开始了新王国时代。

五、新王国——埃及的帝国时代

埃及帝国的崛起

新王国时代(公元前1567~前1085)包括第18~20王朝,首都底比斯。新王国建立后,立即恢复了传统上的对外远征。经过诸位国王的南征北战,逐步造就了一个地跨西亚北非的大帝国,古代埃及进入鼎盛时期。

雅赫摩斯将希克索斯人驱逐出埃及后,乘胜追击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一带,从而使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巩固了东北边防之后,他又转而进攻努比亚,曾多次镇压当地的暴动。雅赫摩斯的继承者阿蒙霍特普一世执政时期,曾多方出击。向北,率军平息三角洲地区利比亚人的叛乱;往南,航行至第二瀑布的塞姆纳,修复多处要塞;朝西,对利比亚用兵。

图特摩斯一世时期,埃及帝国初具规模,他可以说是埃及帝国的奠基者。他多年征战,不仅挫败了叙利亚巴勒斯坦人,而且同当时的西亚强国,由胡里特人建立的米坦尼王国进行激烈的争夺,将埃及帝国的北部边疆推进到了叙利亚北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西岸,并立碑为界;在南方,他将埃及边境扩展到尼罗河第三瀑布以

外，并在托姆波斯岛上“为他的军队建造了一座堡垒”。据图勒的传记铭文，图勒在图特摩斯一世执政时担任努比亚总督，说明当时埃及对努比亚的占领已经稳定下来。

埃及帝国的完成者是著名的图特摩斯三世。他即位时年仅10岁，由继母哈特舍普苏特王后摄政，直到他在位的第22年。哈特舍普苏特当政期间，对努比亚和西亚均发动过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但最有影响的行动当属远征蓬特，运回了黄金、象牙、香料等一大批战利品。图特摩斯三世亲自执政后，仅在几个月内就安定了国内局势，进而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远征。在此后的20年间，图特摩斯三世竟17次远征叙利亚、巴勒斯坦。他击溃了以卡迭什为首的叙利亚联军，打败米坦尼王国，将埃及版图扩大到幼发拉底河以东，并立碑为界。图特摩斯三世在叙利亚的胜利震撼了整个西亚，巴比伦尼亚、赫梯和塞浦路斯等地纷纷向其称臣纳贡，巴比伦尼亚的国王还将一位公主送给埃及法老为妃。铭刻在卡纳克神庙的回廊上的《图特摩斯三世年代记》，生动地描述了进军西亚的全过程以及其他重大事件。在南方，图特摩斯三世把埃及的边界推进到第四瀑布以外。图特摩斯三世征战一生，终于形成了埃及历史上空前的大帝国，因此，有人称他为“第一个伟大的征服者”把他比作古埃及的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还有的学者认为，严格地讲，从图特摩斯三世起，埃及的国王才称为法老，原意为“大房子”，是臣民对专制君主的尊称，如同中国的“陛下”。法老后发展成五大王衔之一。

图特摩斯三世以后的诸位法老通过各种手段，竭力维持帝国在西亚北非的统治。他们继续向外用兵，平息各地的叛乱，掠夺财富和奴隶，但基本上未超出图特摩斯三世帝国的范围。军事上的

绝对优势确保了法老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地位，并对西亚和努比亚采取不同的政策。

在西亚，除了在一些重要的城市要塞驻兵外，各地基本保持分立自治，由当地的王公贵族进行统治。新王国时期，以夷制夷的思想十分明确。埃及人的做法十分高明，他们把被征服地区的王位继承者带到埃及作人质，迫使其接受埃及文化。这些被同化的王子们一旦重返故国，继承王位，便与埃及建立起牢固的关系，充当起宗主国的忠实附庸。此外，法老们还采用了更有效外交手段——政治联姻。如图特摩斯四世迎娶了米坦尼公主，同叙利亚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西北部的胡里特人建立起同盟友好关系。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国势鼎盛，他基本维持了一个和平安定的帝国，政治联姻取代了军事扩张。他先后娶了两位米坦尼公主、两位叙利亚公主、两位巴比伦公主和一位赫梯公主。联姻使他声威远扬，他的名字出现在巴比伦、亚述、也门、安那托利亚，甚至是克里特、迈锡尼等地。

同为被征服地区，努比亚似乎成了埃及的殖民地。法老委派其亲信(通常是王子)担任“库什总督”来统辖努比亚，源源不断地向他贡纳黄金和奴隶。

法老的集权统治

军事帝国的建立进一步强化了法老的专制统治。新王国时代的专制主义制度发展到了法老时代的最高水平，主要表现在：专制君主权威的增大、政府官僚机构的完善以及军事力量的膨胀。

新王国时代，法老至高无上权威首先来源于假定的神性。法老享有 5 个与神等同的头衔，以体现其神性和权威，达到稳固集权

统治之目的。最为极端的是，为了无限夸大法老的神性，强化法老的权威，哈特舍普苏特女王和阿蒙霍特普三世竟捏造了所谓“神圣诞生”的神话。

当然，法老的权威更多地体现在对专制主义政府机构的控制。作为专制君主，法老具有无限的权力，其言行意愿就是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所有的行政、军事和宗教等部门的官吏均由他任命，典型的“朕即国家”。新王国时代，随着帝国的建立，行政部门和官僚机构不断扩大，并日趋完善。维西尔仍位居行政官员之首，其职责是监督和管理行政、司法、经济和神庙事务。为了适应空前庞大帝国的形势，并有效防止维西尔的权力过于集中，从图特摩斯三世开始，法老同时任命两位维西尔。一个管理上埃及和努比亚，一个管理下埃及和西亚属地，后者的权力较大，国王出征时，由他代理朝政。维西尔之下，设有管理各种具体事务的政府机构或官吏。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重要的官职有财政大臣、国库监督、宫廷书吏、市长等。帝国时期的官僚机构具有明显的多元化色彩，事实上，与维西尔实力相当的还有库什总督和阿蒙第一先知。库什总督是法老为了统辖努比亚而设立的新官职，多由王子担任，权限很大。在底比斯，阿蒙第一先知是阿蒙祭司集团的领袖，管理阿蒙神庙的祭祀活动和财政，其地位仅次于维西尔。帝国中后期，阿蒙第一先知经常兼任维西尔，成为埃及真正的统治者。

强大的军事实力是维持一个庞大帝国专制主义统治的基础。新王国时代，埃及的武器装备和军队组织明显得到改善，战略技术也有所提高。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法老经常是御驾亲征。他非常重视军队建设，下令在被征服地区招募雇佣军(沙尔丹)。新王国的主要兵种有步兵和战车兵。在对外战争中，战车兵立下了汗

马功劳。这一时期,海军也发展起来了,主要用于军事运输。军队将士的社会地位较高,享有一些特权,并有机会担任教俗职务。

法老与阿蒙神庙的关系

法老们不仅依赖官僚机构和军队来维护帝国的统治,而且还要依靠神庙这根精神支柱。法老利用祭司贵族维护和神化自己的专制统治;祭司也利用王权来为自己谋求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王权与神权的有机结合成为埃及君主专制的显著特征之一。

由于底比斯的国王们是打着"阿蒙神"的旗帜赶走了希克索斯人的,使原来默默无闻的阿蒙神从此名声大噪,与法老的神威交相辉映。然而,阿蒙神毕竟是底比斯地方神,影响力十分有限,一时难以取代拉神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为了解决由于王朝更迭给人们带来的信仰危机,新王国的统治者将阿蒙神与拉神合为一体,创造出"阿蒙—拉"。

阿蒙神借助拉神的威力扶摇直上,一跃成为众神之神。它既是国家的主神,也是王权的保护神,因而阿蒙神庙,主要是底比斯的卡纳克神庙和卢克索神庙获得的赠与最为丰厚。在帝国建立的过程中,法老们把对外征服取得的胜利都归功于神的保佑,给予神庙慷慨的捐赠。尤其是图特摩斯三世时期,对神庙赏赐有加。主要原因是,他曾在底比斯神庙当过祭司,正是得益于阿蒙祭司的扶植他才重返王位。图特摩斯三世每次凯旋都要捐给神庙很多战利品。他曾一次就献给神庙 2 800 斯塔特土地、1 578 个奴隶,以及其他财富。据《哈里斯大纸草》的数字,底比斯阿蒙神庙拥有劳动力 86 486 人,牛和其他牲畜 421 362 头,耕地 864 168 斯塔特,海船 83 艘,甚至还拥有 56 座埃及城市和 9 座叙利亚城市。总之,阿

蒙神庙僧侣依靠阿蒙神的崇高地位获得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富可敌国，声威大炽，成为一个仅次于王室的社会团体，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祭司集团经济实力的膨胀，他们在政治上的野心也滋长起来。他们不再满足于主持各种宗教仪式和节日庆典，而要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操纵王室事务。哈特舍普苏特女王时代的"阿蒙的高僧，南北的先知长"哈普塞尼布曾红极一时，官至维西尔，集宗教和行政大权于一身，直接插手王室内部事务。图特摩斯三世时期的蒙凯帕列塞尼布，除了阿蒙高僧、阿蒙神庙总建筑师和工匠监督长职务外，还是操纵国库的财务大臣。总之，阿蒙神庙势力对王权构成直接威胁，这不仅使法老对阿蒙神庙祭司产生了疑虑，而且也对阿蒙神的信仰本身也产生了疑问。所以，早在图特摩斯四世时代，一个古老的太阳圆盘神阿吞神便被抬出来加以崇拜，以此来遏制阿蒙神庙的势力。

到了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王权与神庙祭司集团之间的矛盾已开始表面化。阿蒙霍特普三世即位后，政府的行政、财政大权都被阿蒙神庙的僧侣控制。但是，他顶住了强大的压力，撤掉祭司出身的维西尔普塔赫摩斯的职务，任命一位与阿蒙神庙无关的拉莫斯担任维西尔。而且，还任命了军事书吏之子阿蒙霍特普为"上下埃及的先知"，而传统上这一职务应由底比斯阿蒙神庙的高僧担任。他甚至敢于打破传统观念，违背祭司集团的意愿，立平民女子泰伊为王后，并在底比斯为阿吞神建造神庙，以阿吞神的名字命名其卫队。为博取王后的欢心，他在 15 天之内修建了一个人工湖，并与她一同乘坐"阿吞的闪光号"泛舟湖上。

阿蒙神庙的祭司集团也不甘示弱，他们企图阻止阿蒙霍特普

四世继承王位。在斗争的过程中，阿蒙霍特普四世依靠孟斐斯和赫利奥坡里斯僧侣的支持，最终登上了王位。他毫不掩饰对阿蒙神庙的仇恨，采取果断行动，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

埃赫那吞宗教改革

阿蒙霍特普四世改革的核心是废除传统的阿蒙神，推行新的阿吞神的崇拜。一方面，阿蒙霍特普四世下令关闭阿蒙神庙，宣布与阿蒙僧侣决裂，清除所有建筑物、铭文、地名和人名当中的阿蒙字样或图画；另一方面，竭力宣扬阿吞是惟一的、创造宇宙万物的最高神。宣称自己是阿吞的儿子、来自阿吞的身体，拥有阿吞的力量，是阿吞在人间的化身，永生不灭。他率先改名为埃赫那吞，意为“服侍阿吞的人”，并赐予尼斐尔泰提王后尼弗·尼弗鲁·阿吞的尊号，意即“阿吞是美中之美”。

埃赫那吞亲自出任阿吞神的最高祭司，在全国各地大建阿吞神庙。神庙的布局以能享受到最强烈的阳光为原则，因为阿吞神不像别的神灵那样，躲在神庙幽暗的神龛里，阿吞是“光芒四射，赶走黑暗”的光明之神，他要在阳光普照的祭坛上接受人们的祈祷。阿吞神不再具有人形，他更多地体现了精神的力量。它被描绘成光芒普照的太阳圆盘，光芒的末端是给埃及带来生命、健康和幸福的手。在阿吞神的照耀下，万物充满生机。从阿玛尔纳遗址出土的文物上，可清楚地看到阿吞的光辉形象。为了讴歌阿吞神的威力和公德，埃赫那吞亲自吟诗作画，倡导现实主义的文艺革新思想。他在歌颂阿吞的诗中写道：“神啊，您无所不能，您的力量谁也不能与您相比，您才是惟一的真神。”在他看来，阿吞神不仅是埃及

人的共同信仰，而且也是当时埃及人的已知世界，主要包括西亚和努比亚地区的神。阿吞还是万物欢乐的源泉，他使小羊“在原野里跳跃”，使飞鸟“在沼泽中飞舞”。

为了纯洁人们的信仰，彻底消除底比斯阿蒙僧侣势力的影响，埃赫那吞在远离底比斯的希尔摩城附近，即现今的阿玛尔纳，另建新都“埃赫塔吞”，意为“阿吞的地平线”或“阿吞的视界”。迁都是埃赫那吞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因此，这场改革又被称为“阿玛尔纳改革”。首都周围 180 平方千米的区域被宣布为阿吞的财产，除建造了大规模的阿吞神庙外，还有设施齐全的宫殿和官邸等建筑物。阿玛尔纳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埃赫那吞在此进行了 15 年的“太阳圆盘专制主义”统治。

遗憾的是，无论是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宗教改革家，埃赫那吞都是一个失败者。他所依靠的主力军是新兴的军事贵族——涅木虎，大多出身于贫穷的，低下的自由人。与阿蒙神权势力和底比斯旧贵族结成的反对派的势力相比势单力薄，无异于孤军奋战。他推崇的阿吞神的信仰以及他本人的叛逆行为也不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因为多神教信仰早已根植于埃及社会，若要以一个全新的自然主义的一神教取而代之，绝对不是他力所能及的。当他从 100 多座建筑上刮去他父亲名字中的“阿蒙”字样时，埃及人已对他失去了信心，在他们眼里这是多么的大逆不道，无论如何他们都不能去敬仰一个不尊重先辈的法老。于是，人们开始憎恨他，咒骂他，暗自信仰自己的神灵。

公元前 1362 年，埃赫那吞死后，底比斯的阿蒙神庙势力卷土重来。祭司贵族承认埃赫那吞的女婿图坦哈吞为法老，责令其恢复以阿蒙神为首的多神信仰。图坦哈吞改名图坦卡蒙，下令凿去

和擦掉所有"阿吞"和"埃赫那吞"的字样，宣布埃赫那吞为"罪人"，改革之都埃赫塔吞为"不法之地"，并定都于孟斐斯，随后又还都底比斯。改革烟消云散，一切又回到了从前，而且王权对神权更加依赖。

尽管如此，埃赫那吞仍不失为"一个历史上不朽的人物"。他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神教，永远为后世缅怀。1940年，西格蒙德·弗罗伊德在《摩西和一神论》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极其敏锐的论点，即埃赫那吞就是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的摩西。此观点后被阿曼德·奥斯曼接受，他对《圣经》和埃及宗教文献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写成《摩西——埃及的法老》一书，轰动一时。

此外，在艺术领域，埃赫那吞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开拓者。由他倡导的艺术革新，一改古埃及沉闷的艺术气氛，给埃及艺术带来了新鲜气息，是埃及艺术史上的里程碑，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埃及帝国的振兴

埃赫那吞改革前后，围绕宗教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致使埃及国内矛盾重重，国力大为削弱，不得不奉行所谓的"和平外交"政策，既无力对外扩张，也无法维持帝国的霸业，国际威信骤然下降。最为突出的是，埃及在西亚的霸权地位受到来自小亚的赫梯人的挑战。赫梯人乘虚而入，企图取代埃及称霸西亚。埃赫那吞统治期间，赫梯的势力已渗透到幼发拉底河流域。埃及的盟国米坦尼和巴比伦先后向埃及求救，但埃赫那吞却沉醉于赞美阿吞的欢呼声中，对此无动于衷。因此，西亚局势动荡不安，危机四伏。图坦卡蒙统治时期，曾出兵收复西亚失地，但收效甚微。

第19王朝建立后，统治者雄心勃勃，力图摆脱第18王朝以来的困境，恢复图特摩斯三世的霸业，重振帝国雄威。因此，埃及与赫梯在西亚展开了争夺霸权的战争，并且愈演愈烈。

军人出身的塞提一世热衷于对外扩张，他轻而易举地解除了利比亚人的威胁，并在历次远征西亚的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埃及重新统治了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直至奥伦特河的卡迭什附近的广大区域。卡纳克神庙的铭文记载道：塞提一世"打败了赫梯人……使怯懦的叛乱者停止了活动。"

拉美西斯二世

公元前1304年，塞提之子拉美西斯二世即位，他是新王国最后一位强有力的国王。他在位67年，创下古埃及之最。1881年7月5日，他的木乃伊被发现，如今完好无损地陈列于开罗博物馆。现代医学证明，他患有心脏病和动脉硬化症，他的牙齿已严重破损。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大名鼎鼎的拉美西斯二世死于不足挂齿的牙床脓肿。

拉美西斯二世崇尚武力，积极备战。为了便于同赫梯作战，他在尼罗河三角洲东北部兴建港口城市培尔—拉美西斯（意为拉美西斯的房子），执政第十年迁都至此。他还招募雇佣军，扩大军事实力。在位第五年，拉美西斯二世组织了大约2万人的兵力，划分成4个师团，分别以阿蒙、拉、普塔和苏太克神命名，准备同赫梯一决胜负。他御驾亲征，率领阿蒙师团北上，攻打卡迭什城。赫梯军队事先也做了充分的准备，联络了约有2万人的庞大阵营，迎战埃及军队。由于拉美西斯二世求胜心切，没有等到与其他师团协同作战，就率先向赫梯发动进攻，结果落入敌军的圈套，他本人也险

些被俘。然而，埃及文献却极力夸耀拉美西斯二世的伟大功绩和胜利，但实际上埃及已丧失了在西亚的霸权地位。尽管如此，赫梯军队还是遭到重创，始终未能越过大马士革。两军对垒，势均力敌，在西亚形成了对峙局面。

卡迭什战役以后，两国之间又断断续续地进行了长达16年的拉锯战，均陷入困境，最终，双方都愿意和解友好。约公元前1284年，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国王哈吐什里三世签订了埃及—赫梯和平条约，从而结束了两国之间近一个世纪的争霸战争。条约确定了两国之间的“永久又美好的和平和美好的兄弟关系”，“永远不侵入”对方的“领地”，并在西亚划分了势力范围。因条约原文刻在银板上，故又称“银板条约”，通常被看成是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国际条约。现存的有阿卡德语和赫梯语文本，以及卡纳克神庙和拉美修姆祭庙墙壁上的石刻。和平条约的签署后，两国基本上相安无事，双方的友好关系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哈吐什里三世的长女和次女先后嫁给了拉美西斯二世。

除西亚的战事外，在拉美西斯二世时代，埃及与其他地区的战争也时有发生，其中主要是对利比亚人的战争。从塞提一世起，利比亚人在饥荒的压力下，就不断向三角洲一带渗透，严重威胁了埃及的安全。拉美西斯二世时期，不得不迎战驱逐，并沿西沙漠修建了一条长约340千米的防御线，连接了一连串的堡垒要塞。

拉美西斯二世是埃及历史上最热衷于建筑的君主之一，称得上是古埃及最大的“建筑业主”。据称，保留至今的古建筑一多半都与他有关。他使卡纳克神庙多柱厅得以竣工，为卢克索神庙增添了许多新楼宇。在尼罗河西岸，他为自己建造了巨大的陵墓，并完成了阿布·辛拜勒的岩窟庙。从南部的努比亚直到尼罗河三角

洲，到处都耸立着他的纪念碑。拉美西斯二世的建筑活动使人联想起在《圣经》中"加重担苦害"犹太人的法老，他很可能就是那位强迫犹太人做"苦工"的法老。

拉美西斯二世妻妾成群，后宫佳丽数以百计，他甚至还娶了几个女儿为妻，共有100多个儿子和50多个女儿。拉美西斯二世的后裔人多势众，在他之后的400多年间成为一特殊阶层，其中不乏杰出的统治者。

帝国经济的繁荣

埃及帝国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西亚北非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使埃及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在农业生产中，新王国时期已采用轮种制，广泛使用新式的梯形犁和骡马等畜力，并发明了一种新的提水装置——沙杜夫，即桔槔。沙杜夫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提水灌溉的扬水器。同先前那种靠人力挑水浇灌高处农田的劳动量相比，沙杜夫可以大大减轻人们的负担，提高灌溉农业的功效，促进了农业经济的繁荣发展。

新王国在手工业方面的进步最为突出。建筑业蓬勃发展，纺织业、金属加工业和玻璃制造业等行业的生产技术显著提高。

建筑业一直都是古代埃及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新王国时代，国力强盛，大兴土木，神庙、宫殿和陵墓的建筑盛极一时。从尼罗河口一直到第二瀑布以南，神殿、陵墓和方尖碑等纪念性建筑星罗棋布，其数量超过了前代的总和。如今埃及的建筑遗迹，大多都建于该时期。气势恢宏、无与伦比的卡纳克和卢克索两大神庙，堪称为埃及神庙建筑的典范。"帝王谷"岩窟墓是新王国时期独具特

色的陵墓建筑。新王国的首都几经变迁，埃赫塔吞是保留至今最完整的城市遗址之一。

新王国时代，以亚麻和羊毛为原料的纺织业也相当发达，纺织技术得到明显改进。大约在第 18 王朝中期出现了只需一人操作的立式织机，不仅取代原先由二、三人同时操作的卧式织机，而且还增宽了布幅。

新王国处于青铜时代的发展期，金属制造业技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无与伦比的图坦卡蒙黄金面罩，已成为埃及古代文明的象征之一。在金属冶炼中，一人可踩两只的脚踏风箱取代了吹火管，使炉温大幅度攀升，从而提高了青铜器的质量和产量。在提高炉温的基础上，铜制品的制作方法也发生了变化，除沿用过去的锻造法外，又发明了铸造法，提高了效率和工艺水平。此外，新王国时期还出现少量的铁制品，但多半是陨铁，或从赫梯进口。

玻璃制造业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已能生产出紫水晶、黑色、蓝色、白色、红色、棕色、黄色和无色透明玻璃，并具有一定规模。仅在底比斯就发掘出好几座第 18 王朝时的玻璃作坊，一些珍贵的玻璃器皿和工艺品甚至保存至今。

新王国时期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以及对外交往的进一步扩大，极大地促进了埃及商业的繁荣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尽管埃及的对外贸易仍由王室垄断，大多则属不平等的交易，常带有对外掠夺或强迫的性质，但它在地中海地区的商业地位，国际贸易持续增长。此外，国内贸易相对宽松，市场活跃，并出现了真正的商人。这在《鲍拉克纸草》中得以印证，它记录了商人出售肉、葡萄酒和糕点等商品的情况。在铸币尚未出现的情况下，物物交换的情况还很普遍，但埃及人已习惯利用白银、黄金、铜和谷物作为交换媒介。

金属的价值按重量计算，计量单位为里德。他们更多的是使用银作为价值尺度，因而在商务文书中，“银子”几乎成了“支付”和“货币”的代名词。如租用和买卖奴隶、土地等都以实物进行交易，但要注明值多少银子。

帝国的衰落

第18王朝后期的埃赫那吞改革、与赫梯长达一个世纪的争霸战争，尤其是来自小亚和爱琴海地区的“海上民族”以及利比亚人的侵扰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严重削弱了埃及国力，致使国内外矛盾十分尖锐。

海上民族伙同利比亚人曾两度进犯埃及。公元前1229年，拉美西斯二世之子美楞普塔统治时期，海上民族与利比亚人结成联盟，首次侵袭三角洲地区，对埃及构成严重威胁。美楞普塔率军迎战，大获全胜。据《卡纳克铭文》记载，共杀死9 376人，但实际上是8 729人。公元前1192年，埃及再次遭受外敌人侵。第20王朝的拉美西斯三世不愧为新王国时代最后一位伟大的法老，他动用了埃及在巴勒斯坦的驻军，为埃及赢得了短暂的安宁。

尽管拉美西斯三世维持了埃及帝国最后的繁华，但却不能扭转颓势，其统治则成为埃及由盛到衰的转折点。拉美西斯三世之后，古埃及帝国在西亚地区的军事扩张和强大统治已走到尽头。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各邦国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日趋强大，趁机摆脱法老的束缚，不再向埃及归顺和纳贡。

埃及国内各种矛盾不断激化。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造墓工人暴动，盗墓贼猖獗，国家陷入混乱之中。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再度尖锐，篡权夺位的宫廷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王权与阿蒙神

庙势力之间的斗争又起，并直接导致了帝国的崩溃。

阿蒙僧侣集团的势力急剧膨胀，严重削弱了王权。埃赫那吞宗教改革失败后，阿蒙神权势力反攻倒算，甚嚣尘上。拉美西斯二世时代，阿蒙高僧的职务已成世袭制，不再由法老任命，《阿蒙高僧罗伊的铭文》就是有力的证据。阿蒙僧侣集团的经济实力也空前雄厚。据著名的《哈里斯大纸草》记载，底比斯阿蒙神庙占有劳动力 86 486 人，大小牲畜 421 362 头，田地 864 168 斯塔特，城镇 65 座等财富资源，远远超过了其他神庙。拉美西斯三世对阿蒙神庙祭司集团的慷慨赠与，使祭司贵族的实力膨胀到了顶点。他们拥有相当于当时埃及人口 1/3 的奴隶，占有 1/7 的可耕地，还有 50 万头牲畜和来自 168 个城镇的贡赋。在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下，阿蒙僧侣与王权抗衡，越来越多地介入国家政权。

拉美西斯十一世时，高僧荷里霍尔实际掌握了国家大权。他在卡纳克神庙以法老自居，管理上埃及事务，并以库什总督的身份控制着上埃及和努比亚的军队。与此同时，斯门德斯以行政长官的身份管理培尔—拉美西斯以北的三角洲地区。公元前 1085 年，拉美西斯十一世死后，荷里霍尔和斯门德斯二分天下，持续了近 500 年的新王国到此结束。埃及进入后埃及时代，或称后帝国时代。

六、后埃及——法老时代的终结

第三中间期

后埃及时代包括第 21～31 王朝（公元前 1085 年～前 332），

通常又分为第三中间期和后埃及两个阶段。在此期间，埃及经历了分裂、复兴和衰落的演变过程，最终被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

第三中间期(第21～25王朝)，埃及的政治形势严峻，中央集权统治瓦解，国家四分五裂，多个王朝交叠存在。

第三中间期之初，古埃及再一次出现了南北两大政治集团并存的分裂局面。高僧荷里霍尔僭取王位后，建立了以底比斯为中心的神权政府，基本保持独立，但他不得不承认北方斯门德斯的法老地位。这主要是因为，上埃及地方贵族势力的迅猛增长。一方面，阿蒙僧侣贵族的后裔世代享有各种头衔，逐渐演变成实力雄厚的行省贵族；另一方面，其他宗教势力亦不可忽视，如孟斐斯的普塔神高僧职务也实行世袭制，并称霸一方。

然而，斯门德斯创建的第21王朝(公元前1085～前945)，从一开始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其有效统治仅限于首都塔尼斯(即培尔—拉美西斯)一带。由于法老们过分依赖外国雇佣军，利比亚人的势力不断壮大。他们乘中央政权瓦解之机，与地方僧侣贵族结成一股新的分裂势力。公元前945年，第21王朝普撒塞尼斯二世去世后，利比亚人舍尚克僭取王权，在布巴斯提斯建立第22王朝(约公元前945～前715)。舍尚克就是《圣经》里的士撒，约于公元前930年，他出兵巴勒斯坦，“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了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第22王朝末期，对内加强控制北方贵族，对外与亚述保持密切关系，奥索尔康四世曾向萨尔贡二世献上12匹埃及大马。

约公元前818年，利比亚人帕杜巴斯特又在莱翁特坡里斯称王，建立第23王朝(约公元前818～前715)，与第22王朝并存，并得到了底比斯政权的承认，但更倾向于第23王朝。除了第22和

23 王朝外，三角洲地区还存在着几股大的割据势力。

在这种极度分裂的形势下，公元前 727 年，舍易斯的地方统治者泰夫那克特又建立了的第 24 王朝（约公元前 727～前 715），即舍易斯王朝。泰夫那克特雄心勃勃，试图与第 22 和第 23 王朝结盟，一统天下。但是，努比亚人皮安西以底比斯阿蒙僧侣的求援为由，出兵埃及。努比亚人长驱直入，攻占孟斐斯，横扫三角洲，并于公元前 715 年，灭掉第 22、23、24 王朝。皮安西任用地方王公贵族管理三角洲地区，并派兵驻守，自己则挥师南下，在那帕达建立了第 25 王朝（公元前 716～前 656），又称努比亚王朝，马涅托称之为埃塞俄比亚王朝。第 25 王朝时，在王冠上加了双蛇形标志，象征着埃及和努比亚的统一。然而，事与愿违，泰夫那克特复辟，恢复第 24 王朝的统治；亚述人不断进犯埃及。

公元前 716 年，夏巴卡即位，决心彻底摧毁第 24 王朝，一统天下。但是，面对亚述的强大攻势以及三角洲地区的分裂势力，夏巴卡节节败退，退回那帕达。统一梦想再度破灭，直到第 26 王朝的建立，埃及才结束了第 3 中间期这种分崩离析的局面，进入一个新的复兴时代。

后埃及的复兴

后埃及又称后期埃及时代，包括第 26～31 王朝（公元前664～前 332），是埃及法老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

公元前 664 年，利比亚人普撒美提克一世在三角洲的舍易斯建立第 26 王朝，即舍易斯王朝。普撒美提克一世致力于埃及的统一大业，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他与小亚的吕底亚王国结盟，首先制服了三角洲地区的亚述附庸，然后驱逐亚述人，恢复独立。此

后,他又以三角洲为根据地,通过阿蒙的权威,扩大他的实力和影响,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埃及迅速走上复兴之路,创造了法老时代的最后的辉煌。

舍易斯王朝时期,适逢埃及进入铁器时代,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商业和对外贸易异常活跃,国力强大。尼科二世时期最为突出。他与犹太王国等结成反巴比伦联盟,并集中力量建立地中海和红海舰队,以抵制新巴比伦王国的扩张。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尼科二世着手开凿沟通尼罗河和红海的运河,但未竣工。尼科二世还雇佣腓尼基水手组成舰队,从红海出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成功地绕航非洲大陆。

此外,舍易斯王朝的统治者大都十分迷恋埃及的古王国时代,极力模仿和恢复古王国时期的传统习俗和文化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利用埃及的本土文化来抵制日益盛行的希腊文化。到了阿摩西斯统治时期,埃及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到了"空前繁荣的时代"。平民出身的阿摩西斯以"智巧"赢得人民的爱戴。他向神庙献祭,建造巨大的神庙,出现了诸如诺克拉提斯这样的新兴城市。

然而,不幸的是,埃及人的和平盛世在波斯人的铁蹄声中戛然而止。

波斯帝国行省

公元前 526 年,波斯王冈比西斯率大军攻打埃及,势如破竹,翌年征服整个埃及。埃及沦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波斯帝国的行省,这在埃及历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波斯皇帝自诩为法老,他们在埃及的统治被列为第 27 王朝,一直持续到公元前 404 年。

冈比西斯对埃及行省严加控制，遭到埃及人的强烈反抗。当冈比西斯远征努比亚时，埃及人揭竿而起，但被镇压。公元前522年，冈比西斯死后，起义烽火再起。公元前518年，大流士在平息西亚叛乱后，远征埃及，迅速扑灭埃及反波斯大起义的熊熊烈火。大流士无比骄傲地在其碑文中宣称："我是波斯人，我征服了埃及。"

大流士吸取冈比西斯的教训，对埃及的统治有所缓和。他保留了埃及传统的宗教信仰和地方崇拜，为埃及人修缮神庙，颇得人心。此外，大流士还下令继续挖掘尼科二世的运河。他声称"在这条运河挖掘成后，战舰由埃及经过这条运河到达波斯。正像我所愿望的那样。"开挖运河的目的跃然纸上，而这正是当年尼科二世放弃运河工程的主要原因。长达84千米的运河是大流士在埃及历史上写下的最精彩的一笔，终于实现了埃及人多年的夙愿。埃及人不会忘记大流士，他的名字出现在埃及各地的纪念物上，其次数超过了其他所有波斯王的总和。

然而，埃及毕竟是波斯帝国的一大行省，每年要向帝国缴纳贡赋。700塔兰特白银和大量的谷物使埃及人不堪负重，忍无可忍。公元前404年，乘波斯帝国内乱之际，埃及再度爆发起义。在利比亚人阿米尔塔伊俄斯领导下，终于取得胜利，结束了波斯人在埃及的第一次统治。

阿米尔塔伊俄斯二世创建的第28王朝，仅仅维持了6年的统治，就被第29王朝取代。第29王朝建立起以门德斯为中心的新的家族统治，直到公元前380年被第30王朝替换。

公元前343年，波斯王阿塔薛西斯三世亲率大军远征埃及。第30王朝末代王涅克塔尼布二世逃到努比亚，被迫退位。波斯人

彻底征服埃及，再次将埃及纳入波斯帝国的版图，此即第31王朝。阿塔薛西斯三世对埃及采取了残暴的报复政策，大肆破坏劫掠神庙，亵渎埃及神灵，践踏埃及文明。因此，在公元前332年，当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以“救世主”的名义进军埃及时，受到古埃及人的热忱欢迎。

第二章　博大精深的法老时代文化

一、宗教

自 然 崇 拜

如果不了解古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就不能真正理解古埃及的历史文化。

古埃及人的原始宗教是典型的自然崇拜，在他们眼里，神灵无处不在，山川河流、鱼鸟虫兽、人类祖先等都是他们的崇拜对象。埃及人对动物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几乎没有不被他们膜拜的动物。走进古老的埃及神殿，仿佛置身于动物园。各种各样的动物粉墨登场，神气活现。其实，动物并非神祇，只不过是诸神在人间的化身。比如公牛的形象代表拉神（有时是蚱蜢）、普塔神和奥西里斯神（有时是山羊）；鳄鱼代表索贝克，是底比斯和法尤姆地区的神；鹰代表荷鲁斯等等。这些动物活着的时候备受人们的崇拜，有的死后还被制成木乃伊，用亚麻布仔细包裹；体型较小者可直接封存在陶罐一类的容器里，然后安葬。

埃及的神灵，也有的呈人形的，但更多的是人和动物的结合体，如狮身人面像，这是埃及人的创造。因为在他们眼里，动物身

上存在着使人敬畏、羡慕的特性，例如，狮子、鳄鱼和蟒蛇等体现了令人恐惧的威力，母牛和羊代表强大的生殖力等等。如果不借助动物的外表，人就会显得势单力薄，无依无靠。

同多变的形象一样，埃及的神灵兼具了多重性格。他们虽神通广大，却如同凡夫俗子，有血有肉，有爱有恨，难逃生老病死。

多神崇拜的埃及，神灵与政治的关系相当密切。神的故事往往是整个埃及历史中盛与衰、善与恶、生与死的隐喻。鹰神荷鲁斯是国王的保护神，它张开双翼庇护着国王。出于对国王的敬畏，人们以圣兽、圣禽的名字来称呼他们，比如"蝎王"、"蛇王"等。国王被视为万能的、神圣的统治者，是神在民间的代言人，甚至成了太阳神拉之子，就连额头上还有一个凸起的、象征着智慧和生命的蛇标。

太 阳 神

在众多神祇中，太阳神的地位至高无上，它既是自然力的体现，又是王权的象征，充分体现了埃及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有关太阳的神话和传说在埃及流传甚广，是埃及人宗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盛不衰。

赫利奥坡里斯是古埃及人崇拜太阳神的中心。赫利奥坡里斯的太阳神学理论认为，一天当中太阳的形态因时而异，所以太阳神有四种名称，即拉、阿图姆、哈拉凯悌和凯普利。拉是中午的太阳，泛指太阳神。在希腊语中，拉与赫利奥坡里斯等同。阿图姆特指晚上的太阳，其形象是活人模样，头戴上下埃及的王冠，手握安柯(生命)架和权杖。哈拉凯悌是地平线上的荷鲁斯，是与天空神和隼鹰神相联系的太阳神，被描绘为一个长有隼鹰头、顶着太阳圆盘

的人,凌空翱翔,穿越天宇。凯普利是早晨的太阳,被想像成一个长着甲虫头的人。这四种太阳神经常互相结合,产生复合神,"变异"成拉—阿图姆、阿图姆—凯普利和拉—哈拉凯悌。

太阳神是万物之源。根据赫利奥坡里斯神学的创始论,阿图姆是惟一的创造者。它最早出现于混沌之水中的"原始丘",在"奔奔"石头上升起。阿图姆是众神之父,它"吐"出了大气之神舒,"咳"出了湿气女神泰富努特。舒和泰富努特生出大地之神盖伯和天空女神努特,而后者又生了奥西里斯和伊西斯、赛特和涅菲悌斯两对儿女。他们互为夫妻,繁衍生息,其中荷鲁斯就是奥西里斯和伊西斯的儿子。"神家族"的各个成员各司其职,创造宇宙万物,掌管宇宙秩序。

太阳神不仅赋予万物以生命,而且还象征着永恒。每天早晨,太阳神从尼罗河的东岸冉冉升起,在天空中缓缓运行,普照大地;黄昏时分,落入西沙漠中;夜间,它在黑暗中穿行,获得新生。从光明与黑暗的交替中,古埃及人得到了启示,认识到生与死不过是永恒生命的一个过程而已,太阳神寄托着他们对永生的追求。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建造了无数座祭奉太阳神的庙宇。

数千年来,埃及人对太阳神的崇拜可谓忠贞不渝。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他们的信仰也发生过一些变化,然而,无论是飞黄腾达的阿蒙神,还是离经叛道的阿吞神,都是出于对太阳神的崇拜,不仅没有损毁太阳神的光辉形象,反而使太阳神获得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多的社会属性。

新王国伊始,阿蒙神平步青云,声名极盛,但在埃及诸神中它实数"小辈"。最初,它只不过是底比斯的风神和空气神,常常呈现出人形,头带羽毛王冠,有时也以公山羊和鹅的形象出现,难成大

气候。为了取得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新王国的统治者从太阳那里借来了“神光”，将阿蒙神与拉结合为“阿蒙—拉”。阿蒙—拉实质上是新形势下的天人合一，即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的产物。

来 世 信 仰

在埃及，生与死的界限异常清晰：尼罗河谷狭窄的绿洲被漫无边际的沙漠包围，生机勃勃的绿洲与荒凉的沙漠反差强烈。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求生的愿望愈加强烈，他们渴望灵魂不灭，追求死后复活，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尼罗河沿岸的先民们或许就有了来世观念，他们已养成安葬死者的习惯。前王朝时代，人们通常是用席子或皮革包裹尸体，埋人较浅的圆形沙漠墓穴，而不占用耕地。由于埃及气候炎热干燥，蒸发量极大，加上疏松的沙漠透气性强，沙漠里的尸体逐渐脱水，形成褐色的天然干尸，并得以长久保存。不朽的干尸激发了古埃及人的想像力，促使其来世观的形成和发展。于是，他们潜心营造着来世，谱写着灵魂不灭的神话。

在古埃及人的观念中，人生在世有两大要素，一是肉体，二是灵魂（“巴”）。人死后，灵魂长存，尽管灵魂离开了肉体，但尸体仍是灵魂存在的基础。为使尸体永存，埃及人精心制作木乃伊。在古埃及人看来，现世是短暂的，来世才是永恒的。死亡是人生的开始，来世生活与现世没有两样。他们把生前的居所称为“宿”，陵墓才是永远的“家”。为了来世的复活和快乐，上自法老，下到百姓无一不是在为来世做准备。法老们总是挖空心思、倾其国力为来世建造永恒的居所，从马斯塔巴到金字塔，再到国王谷，无一例外。普通老百姓为此也不惜耗费毕生精力和全部财富，他们建造陵墓，

购置棺材，雕刻墓壁，以确保“死得其所”。因此，古埃及王宫及民宅等世俗建筑，在数量、规模和装饰标准上都远远比不上冥世建筑。

然而，第一中间期的动荡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人们的来世信仰。当人们看到金字塔被盗，法老至高无上的木乃伊被曝尸于野，再也无法进入永恒的来世时，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恐惧。他们彷徨、怀疑，开始重新思考这个世界的秩序。于是，奥西里斯审判的故事广为流传。

奥西里斯死而复生的神话反映了尼罗河的周而复始的泛滥和季节交替的规律，表现出古埃及人对农业神的崇拜。后来，奥西里斯演化成掌管来世的冥府之神，他在来世的入口处设一审判庭，死者必须在此接受其审判。死者先作自述，证明自己生前清白，智慧和诚实之神托特负责记录，然后由狼首人身的阿努比斯称死者的心。阿努比斯是木乃伊作坊的领班，他负责为刚制成木乃伊举行开口祝福仪式。天平的一头是死者的心，另一头是象征正义和真理的鹭头女神玛奥特的羽毛。天平两边平衡，即能证明死者清白，他便可进入来世，获得永恒，否则窥伺在一旁的死亡怪兽阿米特将心连同尸体统统吃掉。这一画面经常出现在法老和贵族陵墓的浮雕壁画中，是古埃及人对自然和社会认识的高度概括。

奥西里斯审判的神话，反映了埃及人的“今生”和“来世”的二元论的原始世界观。对于那些没有能力建造豪华陵墓的普通百姓来说，奥西里斯审判的故事无疑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以往他们不敢过多奢望的来世，现在已经具体化了，并触手可及。简单而具体的做法就是在人殓时准备上一份通行证——《亡灵书》，以接受奥西里斯的检查。《亡灵书》被埃及人称作“即日升天”，一般是由祭

祀用第一人称写成的祷文和咒语，阐述死者的清白，详细描绘来世的生活和进入来世的线路。书写在纸草上的《亡灵书》格式固定，图文并茂，文过饰非。新王国时期，《亡灵书》十分盛行，可从店铺里买到，就连目不识丁的文盲也要为自己备上一份。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来世、为了永生，而来世永生的前提条件则是木乃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木　乃　伊

"木乃伊"一词起源于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意为"用蜡制的或沥青"保存的尸体，这是因为埃及人的干尸呈黑色而使人产生的误解。后来，拜占庭人以讹传讹，将它引用到希腊语和拉丁语中，并广为流行。在这里，木乃伊特指古代埃及人用特殊的防腐药品和埋葬方法保存下来的人类和动物的尸体。制作木乃伊是古埃及人的重大发明，在古代世界绝无仅有。它的产生集中地体现了古埃及人的来世信仰观。

受天然干尸的启示，大约从第1王朝开始，埃及人便对尸体采取一些防腐措施，用涂有树脂的麻布包裹尸体。这是制作木乃伊的初步尝试，加工出的尸体还不能算作木乃伊。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到了古王国第4王朝时期，古埃及人才可以制作出真正意义上的木乃伊。首先，在尸体的左肋开口，取出极易腐烂的肺、肝、胃和肠等内脏，经清洗防腐处理后，分别储存在被称作"卡诺匹斯"的罐子里，以便来日随木乃伊一起入葬。心脏和肾脏例外，经防腐处理后，用亚麻布包好，放回原处。因为埃及人相信，在冥国"天使认识心脏并要摸肚子"。接着，用泡有香料的椰子酒清洗腹腔，塞满洋甘菊头，临时包扎起来，置入泡碱里40天，以脱去水分和油脂。

取出后，去除包扎填充物，清洗晾干，再用桂皮、乳香等香料填实复原，并涂抹油膏保护皮肤；最后，用精细的、几乎透明的麻绳捆好，再缠绕上浸过树脂的亚麻带子，并饰以珠宝和护身符。全过程共需 70～80 天。

木乃伊制成后，还要举行为期 70 天的"开口(放)仪式"，即对木乃伊或是对死者的雕像浮雕"注入生命力"，迎接其"卡"，以保证死者在冥世的复活和永生。据林德纸草记载，对身体的各个部位要举行 17 种开口仪式。通常是对木乃伊喷香料、洒水，用所谓带有魔力的箭和护身符触动木乃伊或雕像的口、手和足等部位。

中王国时期，制作木乃伊的技术几乎没有进展，加工质量和工艺水平甚至不如古王国时代。

新王国时期，木乃伊的制作技术臻于完善，无论是防腐包扎技术，还是对面部和身体的修复技艺都发展到了完美的地步。为了更过地保存尸体，从第 18 王朝起，埃及人开始处理大脑，用钩子从鼻腔里掏出脑髓，然后塞满胡椒防腐。古埃及人认为，大脑易腐烂，是没有价值的东西，心脏才是智慧的源泉。其他制作程序则与古王国时代相似。在新王国的墓室里，就有描绘制作木乃伊的壁画，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整个加工过程。

木乃伊的制作方法不仅因时因地而异，而且因贫富贵贱而有天壤之别。以上所述是希罗多德所谓的"最完备的"制作方法，费用极高，普通人家难以承担。据希罗多德记载，还有两种简单易行的制作方法：一种是把松脂通过肛门注入体内，封口后置入泡碱里若干时日，然后再打开肛门放出已被溶化的内脏；另一种更简便，直接把尸体放入泡碱里 70 来天，以脱水干燥。

古埃及人也将他们崇拜的动物制作成木乃伊，这些动物有公

牛、朱鹭、鳄鱼、猫和猴子等。大约4世纪，埃及人停止制作木乃伊。

木乃伊是古埃及人留给后人一份厚礼，令世人着迷。他们无声地见证着历史，演绎着古埃及的文明。如今，运用现代医学技术手段，如X光、CT扫描以及法医鉴定等，专家们可以通过分析他们的血型、细胞等，发现他们的血缘关系。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科学家们还可以通过分析DNA，判断木乃伊的家族关系，给他们建立一个“家谱”，从而揭开更多的不解之谜。

二、文字

象形文字的发明

象形文字从大约公元前4000年代产生到4世纪失传，在尼罗河地区使用了3000多年。迄今发现的最晚的象形文字铭文是公元394年罗马皇帝提奥多西时期的一篇铭文。

埃及的象形文字古老而神秘，神灵造字的传说在古埃及流传甚广。古埃及人认为他们的文字是神赋予人间的启示，是由掌管知识和魔法的智慧之神——托特神创造的。托特神被古埃及人刻画成人身朱鹭鸟头的形象，左手执一书板，右手握笔书写，向人们传授文字书写、计算和制定立法的本领。托特神的崇拜中心在赫尔摩波利斯，有时也被刻画成狒狒的形象。因此，古埃及人崇拜文字，认为文字具有伟大、神圣的力量，写字是神的活动，例如给某事物取名就意味着在创造它，相反，若要加害某人，莫过于从雕刻完毕的石头上或是书写好的纸草上凿去和擦掉其名字。

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最早是从图画文字演变而来的。最初，人们使用一些形象、直观的图形代表具体事物。大约到了涅伽达文化Ⅰ，当图画文字有了一定的积累，但仍不能满足人们对文字的需求时，人们便开始用表意符号和表音符号来表达日益丰富的语言文化和物质生活，于是，图画文字逐渐演化成象形文字。

象形文字最早可能出现在位于开罗南的阿拜多斯。根据1999年的报道，考古学家在这里的蝎王墓中发现了骨骼和象牙标签，每个长2厘米、宽1.5厘米，上面刻有1至4个象形文字。此外，还出土了刻有象形文字的陶器和泥质图章。对这些文物的分析测定表明，标签和陶器是公元前3200年的杰作，而图章的年代则可追溯到公元前3400年。这是迄今为止在埃及发现的最早的象形文字。

此外，考古学家在上埃及的埃尔—阿姆拉和塔萨等遗址出土的文物上，也发现和确认了最初的许多象形文字的雏形。

象形文字的结构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有近千个基本的图形符号组成，即使常用的也多达700个。从结构上看，由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和限定符号三部分组成。

表意符号是用一些图形符号表示所指具体事物的含义。在早期象形文字中，能够用形象直观的图形来代表某一具体事物的均以其图形来代表，即以形表意。如以具体的图形代表自然界的日月星辰、花鸟鱼兽以及人类的衣食住行、行为举止等，这是象形文字的初级阶段。若单一图形符号无法确切表示某一事物的含义，他们就用引申和象征的方法确定某物。如用太阳的图形表示日、

白天等含义;用吃的图形表示饥饿、说话等含义。为了区别象形文字的本意和引申含义,他们往往在表示本意的图形下加一条横线。

尽管有关文字的最早的例证是出自美索不达米亚,但是,现在最早的表音文字却来自埃及。表音符号实际上与表意符号同形。古埃及书吏将一些表意符号当作音符,用来表示词的发音,通常为辅音。用作音符的象形文字,只代表特定的音节,不再表意。如猫头鹰的图形读作 m,脚的符号读作 b,面包的符号读作 t,嘴的符号读作 r 等,均失去了原有的含义。表意符号包含了几种情况:一音一符、二音一符、三音一符和四音一符等。约公元前 600 年前后,象形文字形成了较完善的表音符号体系,有 24 个表音符号、许多双辅音和三辅音符号。由于古埃及文字中没有注明元音,因此,至今无法得知古埃及人是如何拼读词汇的。埃及学家约定俗成,在需要元音的地方统一加进元音字母 e 来拼读。

表音文字的产生和运用丰富了古埃及人的语言词汇,他们能够将复杂的抽象概念通过其发音表示出来,从而扩大了象形文字的使用范围。

由于没有元音,古埃及词汇中的许多词都是由相同辅音组成的,其具体含义无法准确区分,因此,古埃及人又创造出一些限定符号来界定词汇的具体含义。限定符号或叫部首符号,也是由表意的象形文字符号构成,本身不发音,置于词尾,相当于汉字的部首符号。由于象形文字没有标点符号,词与词之间也无间隙,所以,限定符号成了断词的重要依据之一。

象形文字的书写方向灵活多变。一般从右向左,但也可从左向右,自上而下,或由中间向两边分写。通常,行文的始端由句中表示人和动物的象形文字符号的朝向来决定。由于象形文字的各

种符号本身就是一幅幅形象生动的小图画，书写起来犹如绘画，多姿多彩，美不胜收。

总之，古埃及人创造的象形文字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图画文字，也是世界上最形象最生动的字体之一。象形文字的发明是古埃及人的一大成就，在人类文明史上独树一帜，占有一席之地。尽管古埃及象形文字没有直接发展成真正的字母文字，但其中的单辅音符号被看作是字母文字的萌芽，对腓尼基字母的产生起了重大作用，许多腓尼基字母符号就起源于古埃及象形文字。

象形文字的演变

象形文字的笔画繁多，书写起来十分复杂缓慢，难以掌握。只有少数被称为“书吏”的人才能精通象形文字。书吏是最早被记录下来的一种头衔，也是最常见的头衔之一。在使用象形文字的几千年里，书吏们不断简化书写方式，先后出现了祭祀体文字和世俗体文字。

希腊罗马统治时期，祭祀体文字仅限于古埃及祭祀们使用，专门用来书写宗教文献，神秘复杂，高深难解，因而得名。祭祀体可能最早出现于古王国第 5 王朝。最初的祭祀体文字与象形文字的差别不大，直到中王国的第 12 王朝，古埃及文字才开始脱离象形的特征。新王国时期，祭祀体文字臻于完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书写系统。书写方向已基本固定，从右到左。它的使用范围十分广泛，没有任何禁忌，主要写在纸草上，用来抄写文学作品、商业文书、账目、公文、信件和图书目录等。但是，由于这种字体逐渐发展为一种草体字，而且各种祭祀体文字符号常常存有差异，所以读起来相当困难。大约在公元前 700 年前后，祭祀体逐渐被世俗体取

代。

世俗体文字字体简单,便于书写,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它类似于字母文字。世俗体的书写方式较为规范,从右向左书写在纸草之或平软的材料上。与祭祀体相比,世俗体明显是一种大众化的文字,流传广泛。它不仅用于书写官方的各种公文、契约和法律条文,也用于商业和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希腊化时代,它与希腊语并存,常用来书写各种告示,著名的罗塞塔石碑就是最好的例证。世俗体文字一直沿用到公元 4 世纪,被科普特文字取代。

纸　草　纸

埃及人的书写材料很丰富,他们在纸草纸、石料、木料、陶器、皮革、金属和麻布上书写象形文字,但其中最主要的是纸草纸。

纸草是一种古老的水生植物,属多年生绿色长秆草本,丛生于池塘和沼泽地的淤泥中,切茎繁殖。茎高三、四米,呈三角形,边长四、五厘米,光滑无枝叶,越往上越细,顶端长着一撮细长的针叶,像一把散开的硬毛刷。茎中心有髓,白色疏松,含淀粉。古代,在尼罗河河谷,尤其是下游三角洲的大片沼泽里,纸草丛生。现在,野生纸草已不多见,只有在青、白尼罗河沿岸和西西里岛等地才能找到。

纸草是尼罗河赐予埃及人的珍贵礼物之一。古埃及人对纸草推崇备至,视为北方王国的标志,国王手持纸草形状的权杖。在古埃及的艺术作品中,纸草非常普遍,一些建筑物的石柱多采用纸草茎状,并刻有纸草花图案。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纸草占有重要地位。纸草的用途相当广泛,除造纸外,纸草水下的白茎,类似茭白,可食用;绿茎可用来盖房、造船,编织草席、草鞋、箩筐等日用品;干

根可提取香料，用于祭祀和驱赶蚊蝇等。据《圣经》记载，摩西就是被放在纸草编的箩筐里，漂浮在尼罗河上而被埃及公主救起的。

当然，纸草最独特、重要的用途还是造纸，并因此得名。纸草的希腊语音译为"帕皮罗斯"，英文、法文和德文等语种中"纸"一词都起源于此。然而，纸草造纸术究竟是何时发明的，至今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古埃及的纸草纸比中国的造纸术要早得多。诚然，这是两种类型的造纸术，工艺流程和技术要求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开罗西南郊的萨卡拉出土的无字纸张是迄今为止最早的纸草纸，这是在第1王朝的一位大臣墓里发现的，距今有5000多年。最早的有字纸草纸是第5王朝国王纳菲尔·卡·拉时代的账本残片，距今亦有4500多年的历史。

根据哈桑·拉加卜博士的研究证实，古埃及人的造纸方法大致如下：削去纸草绿茎外层硬皮，将茎髓切割成薄片，浸泡水中；把充分吸水的薄片纵横交错地平铺在亚麻布上，用木槌敲打、压平后，再覆盖一层亚麻布，压上重物晾干；数日后，揭开外面的亚麻布，得到的就是一张米黄色、纹理清晰的纸草纸。把单页的纸草纸粘贴续接在一起，卷在木杆上，便制成数十米长的纸草卷。珍藏于大英博物馆的著名的"哈里斯"纸草卷长达40米。纸草卷一般保存在木箱或陶罐里。

纸草纸不仅是古代埃及重要的书写材料，而且还是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销往西亚和欧洲各地。据公元前1100年的纸草文献《温·阿蒙航海记》记载，阿蒙从埃及装运500卷精致的纸草纸抵达腓尼基。古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等都曾使用过来自埃及的纸草纸。但是，纸草纸易受潮、易燃，不易长期保存，至今流传于世的纸草纸文献十分有限。目前，仅发现近10万张用各种

文字书写的纸草纸文献，内容包括法律、宗教、天文、地理、文学等，是了解古代社会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翻译和研究这些古代文献，就形成了一门学科——纸草学。

9～10世纪，当中国的造纸术在传入埃及后，逐渐取代了纸草纸的垄断地位。因为中国纸张具有原料广、成本低、产量大、价格低廉、携带方便的优势。另外，尼罗河下游支流减少，沼泽面积减少，农民改种其他作物。纸草和纸草纸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销声匿迹了千余年。直到1968年，当有人在西沙漠的奈特龙洼地发现了20棵野生纸草，人们才确信纸草在埃及尚未绝种。

古埃及虽然大量生产纸草纸，但生产技术未见诸文字记载。可能是出于国家垄断造纸技术的目的，不予公布。公元50年左右，罗马历史学家贝利尼曾根据传闻记录了某些生产情况，但由于他本人并未见过纸草，讲述得有欠缺。18世纪末，拿破仑远征埃及后，随军学者发现了许多纸草纸，运回法国加以研究，但始终未揭开生产纸草纸的奥秘。

1960年，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1956～1959）回国后，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已失传千余年的纸草造纸术。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苏丹南部找到了纸草，并移植到开罗的尼罗河畔。引种成功后，拉加卜进一步钻研造纸术。经过反复的实验，拉加卜博士终于揭示了古埃及人造纸的奥秘。

拉加卜博士先后找到了几种造纸方法，生产出的纸张与古代的纸草纸一模一样。1977年，他获得了种植和加工生产纸草的国家专利，并在法国荣获纸草纸研究博士学位。于是，拉加卜在开罗市尼罗河畔建起了“拉加卜博士纸草博物馆”，集研究、展览、生产和销售于一体，是埃及最著名的旅游点之一。

三、文学

早期的文学体裁

象形文字和纸草纸的发明使用，为古埃及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流传奠定了基础。古埃及人创作许多脍炙人口、形式多样的文学作品，在古代中东地区乃至整个古代世界都占有重要地位。早在古王国之前，埃及就产生了歌谣、神话、戏剧、传记等各种文学体裁的文学作品。

歌谣可能是埃及最古老的文学体裁，起源于民间，口头传诵，它是埃及先民们语言文化的结晶。为了改进口头传递速度，人们往往会发明一定长短的语句，句尾尽量使用相同的韵脚以便记忆和动听。文字的出现可以更有效地记载、表达和传播知识，人们将口口流传的诗句记录下来，即从最初的口头文学过渡到书面文学。从内容上看，歌谣是劳动人民生产生活和喜怒哀乐情绪的真实写照。一首名为《打谷歌》的歌谣唱道："给自己打谷吧！公牛啊！给自己打谷吧！给自己打谷草来作饲料，打出粮食给你们主人吧，不要叫自己休息呀，要知道今天凉快啊！"这一类的歌谣犹如我国《诗经》中的《硕鼠》和《伐檀》等诗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充满对剥削者的仇恨和讽刺，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心声。

神话反映了古埃及人对人类与宇宙的起源、生与死、善与恶等问题的探索。为了表达对神的敬畏和强烈的宗教情感，人们把神话改写成剧本，搬上了神庙的祭台，最早的戏剧应运而生。遇到重大节日，甚至国王和王后也亲自登台亮相，举国同庆。

传记是古埃及人重要的文学形式之一。它常常被国王、贵族用来歌颂其生前的光辉业绩，以昭示天下，求得来世的永恒。传记一般刻在墓室墙壁、墓碑上，也有纸草纸传记文献。流传下来的古王国时期的主要作品有《梅腾传》、《大臣乌尼传》和《哈尔胡夫传》等，记述传主的辉煌业绩，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梅腾传》详细记载了其官职履历，以及获得的殊荣和财富。《大臣乌尼传》以散文形式写成，其中还穿插了一首战歌。《哈尔胡夫传》堪称是古王国时期传记文学的典范。作品中充满溢美之词，称颂传主的军事业绩和品行，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给饥饿者面包，我送赤身裸体者衣服，我送无船过河者上岸。"此后，传记创作持续不断，但大都继承了古王国时期的风格。

"埃及世俗文学的黄金时代"

中王国时期，中央集权统治相对薄弱，为埃及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自由风气由此滋长，现实主义倾向明显增强，文学创作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埃及人以简约优美的中王国方言创作出小说、散文和教谕文学等体裁的作品，反映了社会现实，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这一时期被誉为古典时代或"埃及世俗文学的黄金时代"。

小说是在中王国时期开始流行的，由民间的口头创作发展而来，其中不少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劳动人民愿望的优秀作品。《能言善辩的农夫》描写一个农夫进城买粮食，遭遇劫匪，农夫向财政大臣莲西告状。农夫靠着机智勇敢和雄辩，寻求正义，最后使抢劫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中王国时期是埃及散文创作的黄金时代，出现像《辛努亥的故

事》这样的传世之作。辛努亥是第12王朝阿蒙尼姆赫特一世的侍从，在宫廷政变中逃到巴勒斯坦一带。尽管他在异国他乡生活优裕，却深深地眷恋着埃及，怀念往日的宫廷生活，归心似箭。最后，他得到国王塞索斯特里斯一世同意，终于返回魂牵梦萦的故乡。作品语言规范，结构严谨，叙事性强，形象生动，堪称古埃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之一。

教谕文学又称训诫文学或智慧文学，是古埃及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学体裁，一般采用独白、对话、谚语或箴言的创作形式。它源于古王国时期，最初大多是贤人（国王或维西尔）对其儿子臣下的教诲之词，包括行为规范、伦理规则等内容，告诫后人应如何驾驭臣民，立身处世。古王国时期最早的一部教谕文学作品是《对卡盖姆尼的教谕》，即第3王朝胡尼王对他儿子卡盖姆尼的人生教诲。第一中间期出现了比较著名的《对美里卡拉王的教谕》，其实就是第10王朝国王阿赫托伊三世留给新国王的政治遗嘱。阿赫托伊三世制定了作为国王应遵守的"规矩"，并灌输"不要作恶，忍耐是美德"的处世原则。

经历了第一中间期的动荡，中王国时期的教谕文学有了巨大的发展，其内容和形式基本定型。从遗留下了几部重要的教谕文学作品来看，其思想性发生了变化，内容更加丰富，不仅劝诫人们树立良好的品质，而且要防患于未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阿蒙尼姆赫特的教谕》和《杜阿乌夫之子阿赫托伊对其子珀辟的教谕》。阿蒙尼姆赫特一世是第12王朝的创建者，他首先告诫儿子要提防阴谋分子，"不要信任一个兄弟，不要认识一个朋友"。后者是一位贵族对儿子的谆谆教诲，他利用对比和比喻的手法，宣扬惟有读书高的思想。他劝导儿子努力学习，争取当一名书吏，以出人

头地。

中王国之后，教谕文学再没有太大的变化和发展。第二中间期的《伊普味陈辞》(或译为《一个埃及贤人的训诫》)最为著名，被史学界广为引用。它出自贵族伊普味之手，面对动荡的政治局势，他告诫人们要敬畏神灵，维护王权。

诗　歌

新王国时期，教谕文学继续流行，然而最能体现这一时代特征的文学成就则是诗歌，恰似中国唐代。诗歌是古埃及文学中最古老的体裁之一，新王国时代的诗歌运用了诸如比喻、夸张、重叠和虚拟等修辞手法，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一般说来，有赞美诗和爱情诗两种，不少优秀作品流传至今。古埃及人用赞美诗来赞颂他们崇拜的神灵或国王，现存有《普塔神之歌》、《奥西里斯颂》、《哈匹颂》、《阿蒙一拉颂》和《阿吞颂诗》等。其中，流传甚广的是《哈匹颂》，即歌颂尼罗河的诗篇，哈匹神象征着尼罗河水。古埃及人在诗歌中如此赞颂着哈匹神：

他是恐怖和快乐之神。
他集万物于一身。
他为耕牛提供食草，
为所有的神灵准备了祭品。
他居住在冥世，
统治着天界与大地。
他是土地之神，
他添满了谷仓，充实了库房，
他也关心穷人的命运。

与赞美诗相比，新王国时代的爱情诗则技高一筹，语言精炼，朴实动人，形象地反映了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恋之情，深受人们的喜爱。现存的爱情诗代表作有以下4个抄本：切斯特·贝蒂纸草1；哈里斯纸草500；都灵纸草断片和开罗博物馆陶罐片段。

四、建筑

马斯塔巴

马斯塔巴是早王朝时代兴起的一种陵墓，因外形酷似现代阿拉伯人的长凳马斯塔巴而得名。早王朝时代，国王一般都有两座马斯塔巴，一座在孟斐斯附近的萨卡拉，另一座位于阿拜多斯，前者往往大于后者。

从19世纪末期开始，考古学家陆续发掘了早王朝时代多位国王王后和达官显贵的马斯塔巴，成为研究早王朝历史的重要依据。从发掘情况来看，最早的马斯塔巴王墓是阿拜多斯的王墓B10，或许属于纳尔迈，长11米，宽9.4米。第1王朝最大的马斯塔巴是萨卡拉的第3035号乌吉姆，即登王的墓，长57.3米，宽26米。地上有45间储藏室，地下建筑是在岩石中开凿出的3间墓室。与此相对应，阿拜多斯的登王墓的规模就小得多，长仅为23.5米，宽16.4米。在国王陵墓周围，通常还分布着一些贵族的小型马斯塔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萨卡拉的马斯塔巴才是国王真正的墓地，阿拜多斯的则是具有宗教意义的“衣冠冢”。

马斯塔巴由地上建筑和地下墓室两部分组成，由阶梯连接。建造马斯塔巴的主要材料是来自黎巴嫩的杉木和晒干的粗制泥

砖，后来也采用石灰石或花岗岩。长方形的墓坑一般约 3~4 米，用十字墙分成若干间墓室，居中较大者是安放棺椁的主墓室，其余为陪葬墓室和储藏室。早王朝一般采用木棺。第 1 王朝时，埃及人还没有掌握制作干尸的技术，仅以麻布包裹尸体。从第 2 王朝开始，人们开始采用在尸体上涂抹树脂的防腐技术，以保全尸体。主墓室的木棺周围放置着装满食物的陶器和石器，还有装有珠宝首饰衣物化妆品的匣子和箱子等陪葬品。储藏室的陪葬品更为丰富，存放着确保墓主来世所需的各种食物和用具，诸如谷物、葡萄酒、家具、燧石和铜制的工具和武器等。所有墓室用木梁和木板篷顶，并留有一个楼梯口通往地面。墓室顶上的长方形建筑也分为若干小间，备有在葬礼上使用的一些小型祭祀用品，如有供死者来世享用的小船（丧葬船）等。

古王国初期，马斯塔巴的建筑艺术发展到了顶峰，并为金字塔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吉萨金字塔群

开罗西南的吉萨省的吉萨高地有 9 座保存较为完整的金字塔，其核心是胡夫、哈夫拉和孟卡拉祖孙三人的金字塔。这三座金字塔是埃及文明的象征，代表着埃及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伟大奇迹。古埃及人将金字塔这种形式的建筑及美感发挥到了极致。工程之庞大，设计之精巧，建筑技艺之高超，甚至已出乎后人的想像，达到了难以阐释的地步，留下许多不解之谜。

这三座金字塔都是用淡黄色的石灰石建造的，四面原来还贴有一层磨光的白色石灰石，犹如三座陡峭光滑的山峰，矗立在漫漫黄沙之中，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同时，金字塔又将太阳的光辉折射

到埃及大地上，让人们享受太阳神的恩泽。

位于吉萨金字塔群最北边的是胡夫金字塔，又称大金字塔。它规模宏大、质量卓越、设计精巧、结构严密，号称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金字塔原高146.5米，1889年巴黎埃菲尔铁塔（320米）建成以前，它一直都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由于风沙烈日的侵蚀，如今塔顶剥落了约10米。基座边长230米，共用去230万块平均重2.5吨的石块，最重的达15吨。大金字塔建筑工艺之完美超乎了常人的想像。例如，巨石之间没有用任何黏合物，仅仅靠磨得很平的石块自身的重量垒砌在一起，就能紧密契合，薄刃不入，而且坚不可摧。塔内设有走廊、庙堂和三个墓室，并饰以各种雕刻和绘画，犹如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

在胡夫的大金字塔西南160米处是哈夫拉的金字塔。哈夫拉的金字塔比大金字塔矮了3米，但因地势较高，看上去还略为高大些。它有上、下两个入口，内有两个墓室，其中一个存有石棺，此外，还有一座保留完整的祭殿建筑。

雄居于哈夫拉金字塔西北的狮身人面像，即斯芬克斯像，是与三座金字塔同样辉煌的旷世之作。在古埃及人眼里，狮子是力量的象征，它忠实地守卫着进入天堂的门户，气势威严，神圣不可侵犯。雕像的面部是根据哈夫拉的相貌雕刻而成，身体形如卧狮，向东而卧，远眺尼罗河。除两只前爪外，由整块岩石雕刻而成，高约20米，长55米，如果再加上它伸出的前爪就有73.5米。狮身人面像的面部已斑驳不堪，15世纪一位狂热的苏非派穆斯林砍掉了它的鼻子，后来拿破仑的士兵又在其头部留下了步枪弹痕。

位于最南边的是孟卡拉的金字塔，其规模和质量比前二者大为逊色。塔高仅66.5米，只相当于胡夫大金字塔的一半。但是，

孟卡拉金字塔的附属祭庙的建筑风格与前者有所不同，更像是第5王朝的庙宇，说明祭祀太阳神的仪式比先前更加隆重。

国　王　谷

中王国时期，金字塔已是一场旧梦，成为昔日的辉煌。人们曾试图恢复建造金字塔，但京畿的河谷地形，不宜建造大型的金字塔。迫使他们放弃建造金字塔的另一因素是金字塔过于招摇，难保安全，所有的木乃伊都难逃曝尸于野的厄运。于是，他们选择了面向尼罗河畔的山崖，凿石开山，营造永久的栖息之所——崖墓。最著名的是贝尼哈桑崖墓群，共有40座崖墓。这种墓葬方式后被新王国继承发展。

新王国伊始，图特摩斯一世就命令建筑师伊内尼为自己建造一座免遭盗劫的“永恒的居所”。为保密起见，伊内尼独自一人，在尼罗河西岸的山谷中实地考察了两个月，终于在距代拉—阿布那加5千米处，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山谷。在陡峭、隐蔽的悬崖上，能工巧匠们开凿石洞为图特摩斯一世建造陵墓，开创了“国王谷”岩窟墓的先河。此后500余年，新王国的法老全都葬于国王谷。与此相匹配的是，在国王谷南方4千米，地势更加险要的山谷中，则埋葬法老的妻室儿女，即所谓的“王后谷”。

岩窟墓通常由倾斜向下通道、前厅和墓室等构成。至今已在国王谷发掘出62座岩窟墓，其中包括举世瞩目的图坦卡蒙墓。图坦卡蒙墓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整个墓葬保存完好，举世无双，被誉为“地下宝库”，共出土了2000多件重要文物，令世人叹为观止。

神庙建筑

神庙建筑是埃及人的又一伟大杰作，体现了他们的智慧和艺术才华。无论哪种神庙，都采用坚固的岩石叠砌而成，宏大轩昂，透出庄严肃穆的气氛。

大约在古王国时期，古埃及人的建筑风格已基本形成，如建筑物以轴对称，平面多为长方形、宫殿门和墙壁的装饰等，这些风格一直延续到希腊化时代，尤其是各种类型的柱式结构。埃及人可能是柱式建筑的创始人。从壁画上可以看到，早在石器时代，埃及人就将纸草捆起来作房柱。在以后的几千年里，石柱成为埃及建筑艺术中非常富有表现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石柱厚重、宏大、典雅，晚期的精美细致，装饰得令人眼花缭乱。埃及人对柱式装饰的热衷以及在这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其他民族，并对欧洲古典时代的建筑艺术影响很大。

在中王国以前，神庙建筑在古埃及已相当普遍，但式样简单，规模有限。其实，一座完整的金字塔建筑群还要包括神庙。在金字塔的东面要建造一座祭奠神庙，庙前有一条道路通向尼罗河岸的小庙，以便接应来自尼罗河东岸的国王灵柩。至今，哈夫拉金字塔还保留了完整的祭庙，格外引人注目。从第 5 王朝开始，太阳神庙已初具规模。神庙通常围绕着露天庭院而建，四周有围墙。庭院中间设有巨大的祭坛，甚至还有方尖碑，东面有一条通道与尼罗河岸的小庙相连，南侧有供太阳神乘坐的"太阳舟"，古埃及人相信太阳神每天都要乘舟遨游太空。

新王国时期，神庙建筑突飞猛进，并成为该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物，从而使埃及进入所谓的"庙宇时代"。这时的庙宇建筑模

式已相当规范，一般是南北朝向，排列有序，一系列的建筑物均被建在通向神庙殿堂的中轴线上。神庙建筑群一般由斯芬克斯大道、门楼、带有柱廊的庭院、立柱大厅和祭祀殿堂组成。从门楼到祭祀殿堂，建筑物的地势逐渐降低，从明亮的庭院和大厅过渡到昏暗的祭祀大殿，那种阴森神秘的气息使人不寒而栗，显示出无比庄严的威慑力量。在神庙的墙壁和列柱上刻画着浮雕和碑文，增强了建筑的表现力。有些神庙的门楼前还竖立着一对方尖碑，并有通往尼罗河畔的道路，路边排列着羊头狮身石像。在祭祀过程中，只有法老和高级祭司才能进入神殿祭拜，一般官吏和老百姓只能分别在立柱大厅和庭院中朝拜。位于底比斯南郊尼罗河东岸的卡纳克神庙和卢克索神庙，是古埃及最著名的神庙建筑。

新王国时代，随着法老权势的极端膨胀，对法老的个人崇拜也达到顶峰，法老本身就是神灵。除建造太阳神庙外，还要为法老建造祭庙。祭庙有两种用途：法老在世时，用于崇拜法老及其保护神；法老去世后，作为祭祀他的享殿。为了隐蔽起见，新王国的祭庙与陵墓(在国王谷)是分开的，这与古王国不同。

新王国后期，祭庙规模不断扩大，发展成神庙和宫殿合而为一的建筑形式，以拉美西斯二世在底比斯的宫殿拉美捷斯神庙为代表。从该神庙遗址废墟上可以看出，它保持着神庙的形制，在长方形的平面上按纵轴排列的结构。第一庭院的右侧是法老的寝宫；第二庭院是神秘的列柱大厅，是觐见法老的场所；接着是三个小柱厅，最深处是圣殿，供奉着阿蒙神。神庙全部用石头建造，到处都是已被神化的拉美西斯二世的巨型雕像和浮雕，还有他与赫梯订立的和约全文。此外，保存最完整的是拉美西斯三世的祭庙，其形制和卡纳克神庙相同，功能则与拉美捷斯神庙相似。

卡纳克神庙和卢克索神庙

卡纳克神庙是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神庙建筑群，始建于古王国时代，一共有50多位国王参与建造这座神庙，尤其是新王国的图特摩斯一世、阿蒙霍特普三世、塞提一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等法老对神庙的建筑做出了巨大贡献，直到托勒密埃及时期才竣工。工期之长创下了世界之最。

卡纳克神庙区的四周筑有围墙，东、南墙分别长510米，北墙长530米，西墙长700米，大致呈梯形。除了位居中央的阿蒙神庙外，还包括穆特神（阿蒙之妻）庙和孔苏神（阿蒙之子）庙等大小几十座各式神庙。巨大的神像随处可见，据统计，共有5 000多座。

阿蒙神庙建筑群呈正方形，巍峨凝重，气势恢宏。整座神庙共有10道塔门。第一座塔门高43米，长113米。神庙区内原竖立4座方尖碑，现残存2座。当然，最能表现埃及神庙建筑艺术构思的还是著名的多柱大厅。它占地约5 000多平方米，共有134根擎天大柱，均为整石凿成，分16排而立。中间的12根巨型石柱高21米，承托着重达70吨的横梁，托起的似乎是整个宇宙苍穹。圆柱直径有11米，5个成年人也合抱不住，圆盘似的柱顶上可同时站立上百人。石柱的直径甚至大于它们之间的距离，气势逼人，震撼无比。置身其中，仿佛大山压顶，给人以强烈的压抑感和神秘感。多柱大厅真可谓古埃及人的惊世绝伦之作，不愧是世界上最壮观的大厅。

从卡纳克神庙往南，穿过1千米长的斯芬克斯大道，就到了卢克索神庙。道路两旁排列着百余尊羊首狮身石像，至今仍有近百座雕像留存。每年尼罗河泛滥季节的第二个月，阿蒙神都要从卡

纳克神庙出发，乘大船到卢克索神庙去看望他的姬妾们。这是古埃及最重大的宗教节日之一，一般要由法老亲自主持，场面十分壮观。

卢克索神庙兴建于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拉美西斯二世时竣工，是古代埃及黄金时代的建筑典范。卢克索神庙为单一的阿蒙神庙，规模较小，但布局合理，完美地体现了上述古埃及神庙的建筑风格，著称于世。神庙呈长方形，南北长 260 米，东西宽 55 米。最早的核心建筑是阿蒙霍特普三世时代建筑的柱廊(14 根石柱)，中庭和多柱厅(32 根石柱)。柱廊上有浮雕，刻画着祭祀阿蒙神的场面，柱头宛如绽开的单瓣纸草花。拉美西斯二世时增建的塔门，长 65 米，高 25 米。塔门入口两边各安放着 10 米多高的拉美西斯二世石雕坐像，基本保存完好。坐像前面不远处矗立着两块方尖碑，但东边一块在 1831 年被穆罕默德·阿里送给了法国人，现立于巴黎协和广场。

法老们为了炫耀其文治武功，总是命人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刻画在神庙的墙壁、天花板、圆柱和梁枋上。长此以往，累积下来的象形文字和浮雕彩绘图画达数千平方米，从而使古埃及历史上许多重要文献得以保存下来，其中最著名的有《图特摩斯三世年代记》、拉美西斯二世远征西亚的战争场面及其与赫梯国王签署的和平条约等。

方 尖 碑

方尖碑是埃及独创的一种艺术美，具有典型的埃及风格，好似一把巨型宝剑，直刺苍穹。仰望方尖碑，后人无不叹为观止。同金字塔相似，方尖碑也是太阳神的象征，又称“小金字塔”。方尖碑的

象形文字读作“奔奔特”，其寓意和象形文字的符号似乎与赫利奥坡里斯神学创世论中的“原始丘”和“奔奔”石头有关。

古王国时期，人们将竖立在神庙中央。从中王国时期起，庙宇入口两侧开始竖立方尖碑，成为神庙特定的标志。保存至今最早的方尖碑是第12王朝塞那斯雷特一世下令雕凿的，高20米，重121吨，立于赫利奥坡里斯城的拉神庙前。据记载，最高的方尖碑可达52米。保存至今最高大的方尖碑是图特摩斯二世时建造的，高32米，如今耸立在意大利圣约翰广场。此外，还有一些著名的方尖碑流散在法国、英国和美国。

制作方尖碑时，首先需开采一整块上好的花岗岩，然后细心雕凿，刻上国王的名讳和封号。石料大都来自上埃及。在阿斯旺以南2公里处的古采石场，至今还有一块新王国时代遗留下的方尖碑石料，是古埃及人开山取石方法的佐证。该碑长42米，四周已凿出一道深槽，只要将木头塞入石槽内，然后灌上水，膨胀的木头就会使其开裂。然而，因碑身出现裂缝而不得不放弃。

方尖碑的底座为正方形，碑身近似于正方柱体，自下而上逐渐缩小，碑顶呈角锥体。当初，方尖碑的尖端还镶有金、铜或合金，在阳光的照耀下，光芒四射，无声地褒扬着太阳神及其伟大创造力。另外，金属顶也可起到避雷的作用。

尽管方尖碑没有金字塔般雄伟浩大，但从采石到竖立，同样需要高超的技艺，不失为古埃及人创造的又一奇迹。据推测，竖立方尖碑时，古埃及人可能采取的方法是：先在碑座四周砌石垒土成斜坡，将碑拉上坡道；用绳索控制着方尖碑，轻轻放入“井”底的碑座上，并用套在上部的绳索将碑竖正；待碑立稳后，清除周围的砂石泥土。一座方尖碑就赫然玉立，大功告成。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了

不起的工程，从哈特舍普苏特女王的方尖碑铭文中可以得到印证。"花岗岩石采自南方石矿，顶部纯金精选自国外。自（尼罗）河上远处即能看到它们。它们光芒四射，普照大地。太阳从两碑间升起，与碑交相辉映，金碧辉煌，蔚为壮观………千百年后见此者，想起我的功业，必会说：我们不知道，不知道他们怎样建造起一座金山！"

阿布·辛拜勒岩窟庙

新王国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庙宇建筑——岩窟神庙，或称石窟庙。哈特舍普苏特王后和图特摩斯三世最早在岩壁上开山凿洞建造这类神庙。除前面门楼外，整座神庙都建在岩窟里。最著名的当属拉美西斯二世的阿布·辛拜勒岩窟庙。拉美西斯二世表示，这些"永恒之石"是为了诸神和自己的光荣而建造的。

阿布·辛拜勒岩窟庙建于公元前 1257 年，雕凿在尼罗河西岸 166 米高的峭壁上。门楼宽 38 米、高 31 米，依岩壁雕凿而成，自然向上倾斜。入口两侧是 4 尊高 21 米的拉美西斯二的坐像，一张嘴巴就有 1 米长，气势磅礴。岩窟庙纵深 61 米，由狭长的柱廊和三重大厅组成。在前半部分的洞窟厅堂里，有两排 8 根 9 米高的人形支柱。最里面的祭祀殿堂内自左至右，依次是普塔神、拉美西斯二世、阿蒙神和拉—哈拉凯悌的坐像。最令人惊奇的是，每年的 2 月 21 日和 10 月 21 日清晨，阳光准时从狭窄的正门射进神庙，洒在拉美西斯二世的脸上和身上，光线由弱变强，直至整座雕像都沐浴在被称为"神光"的万道霞光之中。四五分钟后，阳光缓缓右移，照亮阿蒙神的左半身。整个过程持续 25 分钟，随后，庙内一片昏暗。据说，这一奇观是建筑师为纪念拉美西斯二世的诞辰日（2

月 21 日)和登基日(10 月 21 日)而特意设计的。人们称这两天为“太阳节”,2 月太阳节是麦收的开始;10 月太阳节是尼罗河涨水的结束。

在阿布·辛拜勒岩窟庙的北边,拉美西斯二世还为哈托尔女神及其最宠爱的王后纳斐尔泰丽开凿了一座小巧精致的岩窟庙,人们习惯称之为小庙,而将阿布·辛拜勒岩窟庙称为大庙。小庙的入口处有 6 尊高 10 米的精美雕像,法老与王后并肩站立、身材等高,这在埃及历史上绝无仅有。在埃及众多的国王和王后的雕像中,王后的身高往往不及国王的一半。两座神庙交相辉映,是古埃及文明的一对瑰宝,反映了古埃及人卓越的石窟建筑水平。

然而,20 世纪 60 年代初,埃及修建阿斯旺高坝,两座岩窟庙都面临被水淹没的厄运。于是,在埃及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紧急呼吁下,从 1963 年 11 月开始,50 多个国家投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拯救行动。经过缜密的研究考察,专家们决定采取分割成块,整体搬迁方法。他们将两座山头从中间劈开之后,把两座神庙切割成 1 036 块 9 ~ 30 吨的巨石,迁移到比原址高 60 多米的地方,在钢筋水泥的支撑和黏合下按顺序组装拼合,恢复原样。最后,在两庙上面架起拱形钢筋水泥保护顶,以复原山体外形,同时也使两庙固若金汤,稳如泰山。浩大的工程直到 1968 年 9 月才结束,历时 5 年,耗资 4 200 万美元。为了纪念这一壮举,工作人员在神庙新址埋藏了一本《古兰经》、搬迁工作的文件以及一些埃及硬币和报纸。令人稍有遗憾的是,迁移复原后,太阳照射在拉美西斯二世身上的日期比原先晚了一天,太阳节也得推迟一天。

城　市

同金字塔和庙宇相比，古埃及城市的遗迹简直是微乎其微，几乎荡然无存。由于古埃及人轻视现世生活，建造城市时多采用不耐久的泥砖结构，再加上天灾兵燹，已所剩无几。至今，我们只能通过一些艺术作品来欣赏古埃及的"城市风光"。

前王朝时期，在砖石建筑之前，木结构曾流行一时。在著名的第1王朝第4王杰特的纪念浮雕《蛇王之碑》上，我们有幸目睹阿拜多斯王宫的风采。这座木结构的宫殿看上去十分灵巧，檐头上还有一些用芦苇做成的装饰，没有以后砖石建筑的那种沉重感。

据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第12王朝国王阿美尼姆赫特三世曾在法尤姆的莫里斯湖附近建造了一座"迷宫"，由宫殿和神庙组成，分上下两层，共有3 000间房子。

尽管城市的建设在当时也是一项重大的工程，当年的底比斯跨越尼罗河两岸几十平方千米的河谷丘陵地带，有上百个城门，号称"百门之城"。在《伊利亚特》中，荷马是这样描述新王国都城底比斯的：

底比斯，那里的人们屋宇豪华，拥有无数珍宝；

底比斯有城门百座，门前是马行道；

一百名骑马拥甲的武士，日日巡城两遭……

从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出，古埃及宫殿建筑风格是追求对称美，一般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面是国王处理公务和会客的大厅，经柱廊、庭院可直接通往后面的起居室。宫殿内环境幽雅，工于修饰，各殿堂的墙壁和天花板上一般都刻画着再现宫廷生活、祭祀场面和自然风光的图画。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早已灰分湮灭，化作乌

有。如果说还有一个例外的话，那就是阿玛尔纳了。人们侥幸地发现阿玛尔纳遗址，它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可管窥出古埃及宫殿的建筑风格。

1887年，一位农民偶然在阿玛尔纳发现刻有字符的泥板，引起专家学者的极大重视。泥板被运到伦敦，经专家研究后断定：这350多块用阿卡德语书写的楔形文字泥板，是米坦尼、巴比伦、赫梯等西亚王国致埃及法老埃赫那吞的书信，史称"阿玛尔纳书简（档案）"。根据这一重要线索，考古学家皮特里确定了埃赫塔吞的具体位置。经过系统的发掘，清理了阿玛尔纳的层层泥沙之后，改革之都埃赫塔吞重见天日。

埃赫塔吞位于底比斯以北300千米处，按照法老的要求，新都城没有城墙，西面临尼罗河，其余三面被半圆形的山崖环绕。大体分为北城、中城和南城三部分，王宫和神庙位于中城。在阿玛尔纳王宫里，阿赫那吞极力追求埃及民宅欢快随意的风格，美丽的壁画随处可见。他让画师们记录下他的宫廷生活，绘制成壁画，装饰王宫。

如前所述，新王国后期，王宫神庙合而为一。拉美西斯三世在位时，埃及的国势衰微，因而其神庙的特点是防范意识明显加强。王宫外筑有两层极厚的围墙，围墙外还有护城河和吊桥，顺着中轴线延长的位置上是两座用于防卫的塔楼，万无一失。

五、美术

艺术风格

古埃及艺术成形于在早王朝时期。古王国时代可谓是埃及艺术史上的古典时期，各种艺术法规已基本确立，即“孟斐斯风格”，以后埃及艺术都以此为传统。第一中间期，时局的动荡变化，人们观念的变化，为艺术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中王国时期，艺术的宗旨是恢复孟斐斯传统，不过，由于地方势力的日趋活跃，也出现了一些新尝试。经历了第二中间期的洗礼后，新王国的艺术焕发青春，以崭新的面貌表现出来，但真正反映激变的是伴随埃赫那吞宗教改革面生的“阿玛尔纳艺术”。这是一场真正的艺术革命，埃及艺术走下神坛，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风格。这以后，战事频仍，王朝更迭，异族入侵，埃及艺术几经盛衰。令人惊奇的是，埃及人始终不渝地恪守自己的古典传统，抗拒着外界冲击力，表现出顽强的艺术生命力。

对于沉迷于神与灵的古埃及人来说，艺术只不过是其宗教信仰的外在表现，他们创作的动机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了来世，试图用艺术来圆其永恒之梦。因此，埃及的艺术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如宗教仪式般神圣庄严，充满种种不变的法则，正如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所云，埃及艺术是“来世的艺术”。然而，埃及人又十分迷恋阳光下的快乐生活，其理想非常纯朴，就是希望在冥世也能如此快乐，因而在艺术创作充满了现实主义色彩。古埃及人创造的这种理想典范，对以后西方的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埃及人从尼罗河的周而复始中获得永恒的概念，那么他们是在石头上找到了永恒的形式，因为石头的坚硬和不朽最能贴近埃及人对永恒的追求。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在竭尽全力地用石头为其谋求永恒，并“在岩石上砍凿出他们的艺术”。他们在营造陵墓、神庙等建筑物的同时，还要费尽心机地塑造能够承载其灵魂驶向来世的雕像。

古埃及雕刻艺术具有强烈的色彩感。没有着色的艺术品被认为是不完整的。在埃及语中，“颜色”和“自然”是同一个词“jwn”。古埃及造型艺术用色统一，无明暗变化，不求光影效果。颜色并非只是为了美观，而且也是图解某种信息的手段。男性身体一律涂红棕色，女性则用黄色。前者表明他们常从事户外活动，后者则显示其深居简出、养尊处优的生活。同在造型上的理念一致，埃及人在着色上表现出对纯色的嗜好。尽管他们也有红、黄、蓝、绿、黑、白等颜料，但一般不掺杂使用。

总之，数千年来，埃及艺术风格变化缓慢，相当稳定。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固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矢志不渝地追求永恒的来世，在漫长的历史中演化出一种比较固定的艺术程式，升华成威严、神秘的艺术精神，从而创作出典型的埃及艺术形象：高大、神圣、威严、永恒。坚硬而美丽的石头没有辜负古埃及人的重托，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实现了他们追求永恒的理想，并将埃及大地充实成一座世界罕见的、宏大的艺术宝库。古埃及的艺术成就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影响之大超过了其他几大古代文明发祥地，仅是开罗博物馆就收藏了30余万件精品，欧美各大博物馆都有很多收藏品。然而，人们已发现的艺术品的数量还不到全部遗存的1/3。对于埃及的地下宝藏，一位当代考古学家是这样形容的：“只

要你把铲子插入地下就一定有所收获。”

雕　　像

尽管古埃及艺术与政治、宗教交织在一起，功利性极强，但这并不影响其审美观。在古埃及语中，“雕像”一词与“美”、“理想”诸词同源。在埃及人的传统观念里，神灵是美的化身和最高典范，于是，花岗岩般稳定和静穆就成了古埃及艺术的最高境界。当他们将国王奉若神明时，总是用“国王就像神那样英俊”的语句来赞美，而反映在雕刻艺术上则是竭尽全力美化国王，使他拥有神一般俊美、威仪和智慧的高大形象。作为永恒的替身和来世生活的身躯，雕像要符合“美”的最高典范，因此，个个都仪表堂堂，丰满健硕，神圣肃穆，具有明显的唯美主义倾向。在神与理想的掩饰下，人们难识庐山真面目。然而，正是这些无明显个性的刻画才使国王更具威慑力，就像那矗立于大漠中的金字塔，静止、简洁而神秘。

典型的古埃及石像保留了长方体和立方体岩石块朴素严峻的特点，具有笔直、几何形的效果。雕刻家通常使用直线，尤其注意石头整体气势之美，很少在石像上作自然主义的描写。他们习惯采取高度概括的手法，保留突出点，省略细部，这种风格使埃及雕像给人以刚劲、洗练的感觉，体现出艺术上高度的理解力和创造力。人物造型多取静态姿势，直立或端坐，躯干挺直，朝向一致，直视前方，目光深邃，神情漠然，超然物外，仿佛置身于冥世之中。为增强雕塑的生命感，古埃及人常对岩石雕像做些点缀，如用水晶、玻璃材料镶嵌眼珠，给雕像的身体、头发、眉毛、胡须涂上颜色，精心镂刻厚厚的发套等。

自前王朝起，就出现了大量的雕像，其中绝大多数是国王的雕

像。

第2王朝最后一位国王哈谢海姆威的坐像是已知最早的国王雕像之一。他身着庄严的祭服，头戴峨冠，正襟危坐。尽管头部残缺不全，但丝毫未损其尊贵气度。这是埃及雕刻中最早的正面律的典范，身体各部的比例及其构图姿势均为后世所效仿。第一个成功仿效者就是首位被载入史册的埃及艺术家伊姆荷太普，其杰作是乔塞尔王坐像，后来成为雕刻法老坐像的范本。这是一尊与真人等高的坐像，在乔塞尔的金字塔祭庙密室里发现。乔塞尔王右手握拳置于胸前，左手平伸放在膝上，头戴菱形方巾，道貌岸然，令人肃然起敬。但遗憾的是，雕像脸部严重受损，水晶眼珠已被盗挖。

藏于开罗博物馆的《哈夫拉坐像》，是埃及雕刻艺术规律集中体现的范例之一。雕像用坚硬细密的黑色闪绿岩制成，技巧娴熟。合乎人体比例的国王端坐在宝座上，面容庄严，目不斜视，双腿合拢，双臂紧贴身体，双手放在膝上，显然是乔塞尔坐像的翻版。雕像表现对国王神圣化的意向：神鹰荷鲁斯栖于国王头后，张开双翅庇护着他。

现存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孟卡拉和他的王妃》是一座典型的双人雕像，既显示国王的威仪，又展现王妃的风姿。夫妻并肩而立，妻子身材略低于丈夫，一手揽着丈夫的腰，一手轻抚他的胳膊。在古埃及，夫妻双人雕像比较普遍，也有的采取妻子蹲跪在丈夫的腿旁的姿势，儿童常被安置于双亲之间，男孩站立，女孩或立或跪。

《阿蒙霍特普坐像》是中王国最古老的雕像。该雕像从造型到色彩都很有创意。着色简单而对比强烈，由红、黑、白三色组成：头戴下埃及红色王冠，黑色的神圣胡须和皮肤浑然一体，身穿白色祭

服，一反古王国时期严肃威严的“神圣法则”，令人耳目一新。

新王国时期，受西亚艺术风格的影响，轻松明快、精致优雅的艺术倾向悄然兴起。就连先前以严肃著称的法老雕像，也流露出鲜活的气息。法老像的面部出现了表情，线条柔和而流畅，既保持庄严的仪容，又表现出各自的特征。《哈特舍普苏特女王坐像》和《图特摩斯三世坐像》等是这一时期优雅风格的代表作。前者表现这位杰出女政治家的端庄秀丽和自信庄重；后者刻画了年轻法老的英俊健美和神圣威严。

现存于柏林博物馆的《尼斐尔泰提王后像》是阿玛尔纳时期的杰作，也是埃及艺术史上的一朵奇葩。雕刻家摒弃传统的僵硬模式，细致入微地塑造了王后端庄、典雅、高贵的美好形象。她的轮廓清晰，五官线条柔和，嘴角挂着一丝微笑，略为夸张的脖子则显示了她的矜持尊贵。然而，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其丈夫埃赫那吞的雕像，现存于开罗博物馆。埃赫那吞要求艺术家们毫不掩饰地刻画法老作为“人”的形象，而非神的化身。尽管他的塑像仍沿用了法老的装束，头巾、胡须、权杖一应俱全，但丝毫看不出法老的威严形象，反而是一副连普通人都不如的病态畸形模样。他文弱而清瘦，长脸细眼，厚唇尖颏，乳房隆起，腹部突出，臀部肥大，与文献中的记载相符。有人据此推测，他可能患有肺结核、脑下垂体亢进、生殖腺机能不足等病症。如此大胆客观地表现法老的真实面貌，真乃空前绝后。

新王国后期，以拉美西斯二世为代表的法老大都好大喜功，其雕塑硕大无朋。前文所述的阿布·辛拜勒的拉美西斯二世巨像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为了突出法老高大伟岸的形象，雕塑家采用强烈对比的手法，在法老巨像的小腿间刻着王室成员小雕像。

王室贵族的来世生活自然离不开奴仆的服侍，因而在他们的陵墓里还陪葬着一大批从事各种劳动的“小人物”雕像。从古王国末期开始，表现下层民众的小型石刻、木雕的创作逐渐活跃起来。艺术家在刻画小人物时，不必考虑程式的要求和限制，反而游刃有余。这些着色随意、稚拙的雕像，平常而亲切，富有情趣。《书吏凯伊像》刻画了一位正在工作的宫廷书吏形象。他盘腿而坐，双腿间放着写字板，右手握笔，正在聆听上司的指令以便记录，神情专注。《碾麦的女子》和《酿酒的女子》等作品真实地刻画了下层妇女在劳动中呈现出的力与美，给古埃及压抑的艺术氛围增添了几分亮色。

古埃及的木雕主要用以塑造平民形象，其艺术风格与小人物的石雕相似。雕塑家们就着木头质朴、轻灵的特点，加上轻松自由的写实手法，创作出不少反映古埃及风土人情并且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的佳作。尽管《村长像》是古王国王子卡帕尔(第 5 王朝)的塑像，但他专司农业，有着平民般的气质，因而显得真实、生动、亲切。在底比斯出土的《伊梅莱斯贝像》生动刻画了中王国一位妙龄女子的形象，她的娇艳俏丽使人不禁联想起埃及的古老情歌，美得让人难以忘怀。现存于开罗博物馆的群雕《牧归》表现了牧人放牧归来，主人清点牛群情形，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景。

古埃及在塑造人物方面的经验，深深地影响了古典时代的希腊乃至中世纪以后的欧洲。

浮　雕

古埃及浮雕大多刻画在坟墓和神庙的墙壁或石柱上，也有刻在权标头、调色板等小物品上。《纳尔迈调色板》是迄今为止在埃

及发现的最古老的历史纪实石刻。神庙作品的主题是祭祀宗教活动，以及国王的政绩、国事大典，向神庙捐赠的明细表和冥世的生活环境等。墓室作品主要取材于日常生活，记载墓主的生活经历，展现其豪华奢侈、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以及仆人们农耕牧放的劳动场面，目的是满足死者来世继续享受现世生活的愿望。因此，浮雕成了古代埃及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和百科全书，是研究埃及古代文化和历史的重要资料。

在雕刻过程中，一切艺术形式都必须服从叙事目的，主题十分突出。中心事件总要占据画面的重要位置，没有客观的远近大小的概念，因为古埃及人的视觉方式和空间概念很独特，他们对空间的认识来自心中的理念，即最重要的形象永远最大。所以，墓主的单人像常占据最醒目的部位，甚至比父母的形象还要高大，以显示其独尊地位。尽管人物形象有大小之别，但人体比例、造型法则却大体一致，并为世代沿用。在刻画人物群像时，一定要避免相互遮挡，每个人间隔一定距离，朝一个方向列队，在必要的时候还要用象形文字分别标明名字及从事的工作。

《孟卡拉与两个女神像》是古王国时期浮雕作品的典范，工匠们正是运用上述规则展示了法老的神性和尊严。正中的国王头戴高高的王冠，体格健壮，气宇轩昂。在他左右各站一女，可能是国王的妻子或女儿，被雕刻成女神模样，从面把国王烘托成人间神灵。

在中王国的浮雕中，出现最多的是宗教祭祀场面，甚至有国王在祭神仪式中翩翩起舞的情景。在一块方柱浮雕上，塞索斯特里斯一世头戴王冠、手持权杖在生产收获之神面前跳舞，祈求帮助。这与古王国的浮雕形成鲜明对比。古王国的国王至高无上，诸神

只不过是国王的陪衬，垂手站立于国王雕像之后。

哈特舍普苏特女王祭庙门厅墙壁上的浮雕《女王诞生和养育图》代表了新王国艺术风格的新倾向。作品以传统的多层横带式构图，图文并茂地展示女王为其杜撰的“圣诞”故事。

在卡纳克神庙大量的浮雕和绘画作品中，首屈一指的是《图特摩斯三世年代记》。这是图特摩斯三世历次出征的记录，塑造了他矫健威武、气宇轩昂的君王形象，充分显示阿蒙神和法老的荣耀。为炫耀法老的战功，墙上还刻着许多单个俘虏，身上标有象形文字符号，分别代表各个被征服的民族和国家。后来，类似的题材形式在立柱大厅里也有，出现在塞提一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的浮雕上。

阿玛尔纳的浮雕反映出改革巨变时期现实主义的艺术特点，让人感知埃赫那吞对艺术独特的见解。他鼓励艺术家们抛开埃及雕刻传统的正面律法则，脱去法老神圣严肃的外衣，甚至允许以法老的私生活为素材，这在法老时代是空前绝后的。最典型的作品是埃赫那吞全家浮雕图，刻画了法老一家沐浴在阿吞神的光芒之手下，尽享天伦之乐的人间美景，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法老形象。

在阿玛尔纳艺术的余晖下，新王国后期的埃及艺术异彩纷呈，造就了法老时代最后的辉煌。塞提一世祭庙的浮雕被称作“埃及最华丽的殿堂标本”，保留了古埃及最优秀的浮雕作品。给人印象至深的是《穆特女神哺育塞提一世》，阿蒙神之妻穆特用丰满的乳房喂养已成年的塞提一世，母子情深，以示塞提一世为阿蒙神之子。雕刻手法细腻练达，女神和法老身上的衣纹细密，质地柔软的薄衣之下，身体轮廓隐约可见，线条流畅，立体感强。

拉美西斯二世时期，艺术创作“供不应求”，为提高工效，工匠

们"投机取巧",发明了阴刻浮雕法。只要在石头或墙壁上刻下凹陷的图像即可,无需凿平背景使雕像突出。采用此手法雕刻的《拉美西斯三世狩猎图》最有代表性。在拉美西斯三世祭庙塔门上,法老策马驰骋,追捕野牛,生动明快,引人入胜。

当然,这些作品都是围绕"大人物"、遵循一定的造型法则而制作的,在古埃及艺术领域的地位举足轻重,但埃及艺术中也不乏摆脱法规束缚的上乘之作,格外引人注目。这类作品大都形象而生动地刻画了普通民众的工作生活画面,真实地反映古代埃及的社会面貌。这些不合乎规则的创作,充分展现艺术家的灵性,给埃及艺术注入了新鲜血液。

绘　画

古埃及绘画的许多艺术法则都与浮雕相似,但它更充分地体现古埃及的艺术风格。绘画人物的基本造型是以侧面表现,头部与下半身朝同一方向,眼睛、眉毛则展示全正面,以体现无所不及的视野。双肩为正面,这有助于表现双手的动作及手执的器物。胸部也为正面,以便传达服装、饰物的细节,同时显示出魁伟身躯或丰满的身材。在一些画家的笔下,古埃及女性的曲线美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将衣服画得特别贴身,或仅在袖口、裙裾处草草勾画几笔,近乎裸体。

在有限的空间,艺术家为表达最多的内容,就借助于象形文字。每个象形文字本身就是一幅小图画,由这些小图画组合构成一个大画面。一幅壁画实际上就是文字符号的扩大与延伸,最后,艺术家赋予这些有象征意义的图像强烈的装饰意味,并有机组合起来,使人们分不清那到底是画还是文字。书画同源,相得益彰。

同浮雕一样，绘画主要用于装饰宫殿、神庙和陵墓。绘画的优势在于成本低廉，制作方便，因而更加普遍。但是，绘画作品不易保存，天长日久便不留痕迹，流传至今单纯的绘画作品并不多见。值得庆幸的是，古埃及的绘画与浮雕经常混合使用，伴随着“永世长存”的浮雕，一些较为完整的早期壁画才得以保留。

古王国的《美杜姆的鹅群》可谓古埃及绘画的发轫之作。这是一面墓壁的边饰画，构图均衡对称，设色鲜明和谐，至今鲜艳如初。

中王国时期，壁画比浮雕更为普遍，在各州长的岩窟墓中很常见。对现实生活的生动描绘和对自然界细致入微的观察是中王国壁画的新内容，而且艺术水平颇高。这类岩墓对于保存壁画十分有利，所以大量作品流传至今。在贝尼哈桑发现的《拳击图》描绘了拳击场上的精彩场面，上有上百个人物，形象各异，栩栩如生。开罗埃及博物馆收藏的《母子牛图》表现了舐犊情深的感人画面，流露出古埃及人对动物的厚爱。

新王国时期，绘画进入黄金时代，不再是浮雕的附属品，已发展成完全独立的艺术形式。绘画的处理手法更加纯熟、大胆、灵活多样，表现了艺术家惊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匠师们不再拘泥于先前的法则程式，而是自由自在地创作。他们直接用墨线勾轮廓，然后涂上色彩。明亮的黄色和白色逐渐取代了传统沉闷的青灰色。在构图上也突破了传统的横带结构的限制，以便表现那些人物众多的大型歌舞和享乐场面。在许多描写战争、狩猎、宴饮、音乐、舞蹈等画面上，人物的运动感、体积感表现得比过去生动真实，并有通过衣纹来表现人体美的倾向，绘画水平显著提高。

新王国贵族的墓室壁画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绘画的水平，反映了新王国的盛世丽景。走进贵族尼塔姆的陵墓，墓壁上的歌舞场

面格外引人注目。四个乐女很随意地坐成一排，身穿密褶羽衣，佩戴华贵的宝石项链手镯，头戴时髦的圆锥形香料饰物，悠然自得。最右边的吹着笛子，其他人击掌合拍。两个裸体舞女在一旁随着节奏翩跹起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右边两位乐女的面部和身体完全是用正面来表现的，在埃及绘画中，两只眼睛都呈现出正面角度是很罕见的。与此相反，在两位舞女身上却打破了传统的正面律程式，除眼睛外，她们全身都以侧面来表现。此外，出自底比斯阿蒙神祭司纳赫特墓室的《三个女乐师》也非常著名，堪称埃及最优美的壁画。三位女乐师优雅华贵，神情自若，尤其是中间拨弄诗琴的裸体少女，顾盼生姿，右腿弯曲，左腿支撑身体，突破了传统的站姿。

阿玛尔纳时代，绘画艺术也达到了高峰。绘画样式丰富多彩，除传统的墓壁画，还有王宫壁画、地板画、布画、纸草画以及各种器皿装饰画。在王宫遗址上，一幅描绘自然风光的彩色地板画至今清晰可辨。画面上纸草花儿盛开，一群野鸭在草丛上展翅起飞。绘画手法清新自然，用笔自由疏朗，层次分明，弥足珍贵。

六、科学

天　文　学

远古时期，埃及人就痴迷于探索宇宙的奥秘，并对宇宙产生了最初的构思和想像。在埃及人的原始宗教信仰中，有关创造宇宙的神话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把宇宙看作是一个长方形的盒子，盒底呈凹形，代表大地，他们生活在大地的中心。盒盖是苍穹，由 4

根天柱支撑。星星是悬挂在天上的灯，大地的四周环绕着宇宙之河，尼罗河是其支流。太阳神每日撑船驶过宇宙之河。

浩瀚的宇宙赋予埃及人无尽的想像空间，他们认为星象与人的生死、命运相关。为了寻找吉凶祸福的征兆，观测天象就成了祭司的职责之一。经过长期的观察研究，他们掌握了太阳、月亮和其他行星的运行规律，进而给星体命名，划分星座。新王国时，埃及人已知道 43 个星座，如大熊星座、天鹅星座、天蝎星座、猎户星座、仙后星座和牧夫星座等。在 12 王朝的墓穴中发现了迄今最早的星象图，在新王国的陵墓和神庙里也有类似的星座图和星座表。在塞提一世陵墓的天顶上，埃及人用人物和动物表现不同的星座和方位，其比拟的手法十分接近现代人的星座图。这种星座图可用来确定夜间时刻，供死者在冥界旅行使用，此外还是占星术的天宫图。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拟人化星象图。古埃及人甚至还发明了测定各星体位置的梅尔开特天文仪器。胡夫金字塔的南北中轴线与地球子午线惊人地接近，足以说明当时的测量人员已掌握相当丰富的天文知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埃及，预先确定尼罗河水的涨落的必要，产生了埃及的天文学。"埃及人通过观察天象以及季节、昼夜的变化规律，从而准确地预测出尼罗河的泛滥日期。在天文观测基础上，古埃及人制定了历法。最初，他们根据月亮的盈亏变化制定了阴历，后来通行太阳历，而阴历仅用于确定宗教节日。古埃及人发现，每年阳历的 6 月 15 日（古埃及历的 7 月 19 日），在三角洲地区尼罗河涨水与太阳、天狼星在地平线上升起同时发生。他们把这种现象之间相隔的 365 天定为一年，实际上比现在的太阳年（地球绕太阳转一周）少 1/4 天。一年分为 12 个月，每月 30

天，共有360天，外加5天节日。古埃及人又根据尼罗河涨落和农作物的生长变化，将一年分为3季，每季4个月。第一个季节叫阿赫特，是尼罗河水泛滥期（7～10月）；第二个季节叫佩雷特，是农作物播种和生长的季节（11～2月）；最后一个季节叫夏矛（3～6月），是农作物成熟和收割的季节。

在一张纸草的背面，人们发现了一些有关历法的记录，其中记有不为今人所知的古埃及人的星期原则，不同于通常使用的旬（10天）。古埃及的太阳历对罗马共和国晚期凯撒制定的儒略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古埃及人的时间概念比较明确，他们把每天分为24小时，白昼和黑夜各占一半，并分别利用日晷和水钟来测定白昼黑夜的钟点。希腊人对埃及人的水钟加以改进，制成漏壶。此外，人们根据河马隔几分钟就要伸出水面呼吸的特性，用河马头来代替分钟。

医　　学

古埃及人在医学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享誉古代地中海世界。早在公元前二千年代，埃及医生就应邀赴安那托利亚半岛，为赫梯王室成员诊治疾病。波斯国王居鲁士也曾派使者到埃及，为他请眼科医生。一些希腊古典作家对埃及医术也倍加推崇，有近百个埃及医生的名字就是通过希腊古典著作而得以流传。其中，在古代埃及和希腊化时代，医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身兼御医的伊姆荷太普，被古希腊人奉为“医神”。

长期以来，古埃及的医学一直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也许，这是得益于加工制作木乃伊。在制作木乃伊的过程中，埃及人积累了大量的医学知识，尤其是解剖学（或外科学）方面的知识，为医学的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他们对人的生理状况和人体器官及其功能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认识到心脏是人体之本以及脉搏与心脏跳动的关系。

通过对木乃伊的研究，可以清楚地了解古埃及的医疗水平。在一具古王国木乃伊的下颚上，曾发现两个排脓的小孔。在木乃伊的口腔里，留有用矿物胶泥填料补牙的痕迹，甚至还发现了由金线做的齿桥，以连接两颗松动的牙齿。

古埃及医学文献，又称医学纸草卷的发现和破译，则全面地展现了古埃及人的医学成就。

古王国时期的《施密特医学纸草》是迄今为止埃及最古老的医书。它实际上是一篇关于骨外科和外科病理学论文的副本，对48个病例进行系统的研究。从中我们了解到，埃及人已知道缝合伤口，使用木板为断裂的骨头复位等医学知识，许多治疗方法沿用至今。

1872年发现的《埃伯斯纸草》长20.5米，是迄今最长的医学纸草卷。该纸草不仅包含900个医治各种内外科疾病的处方，包括药名、剂量和服用方法，而且记载了各种病症及治疗方法，甚至还有医学美容知识，如矫正视力、除皱纹、取痔、改变肤色、染发等，堪称是古代埃及人的一部医学百科全书。

此外，还有许多医学纸草文献详细地记载了大量的医学知识，如《拉洪纸草》主要涉及妇科疾病的诊治，《埃德温·史密斯外科学纸草》记述了创伤和骨折的治疗方法，《切斯特—贝蒂纸草》记载了肛门和直肠疾病的诊治方法。尽管在这些医学文献中也夹杂着一些巫术，但瑕不掩瑜，仍具有高度的科学性，不失为古埃及医学进步的象征。

古埃及人的医药知识亦十分丰富，他们从动物、植物和矿物中提取有效成分，制成各种药品。通常，他们取动物的脂肪、血液和骨头制药。古埃及人很可能最先将蓖麻油、曼陀罗花、小茴香、莳萝、胡荽等植物用作药材。奶、蜂蜜、葡萄酒和啤酒也被用来治病。他们采用烘干、碾磨等方法加工药材，制成各种服用方便的油膏、糖浆、栓剂等成品药。例如，把产于腓尼基的杜松树枝碾碎后浸入水中，制成眼药水，疗效显著。

数　学

古埃及人的数学成就来源于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为了在尼罗河畔谋求生存，聪明的古埃及人很早就学会了计算。他们可以准确推算出尼罗河泛滥的日期；河水退落后，他们重新丈量土地、划定地界，并能计算出土地面积。在建造金字塔、神庙、房屋等建筑和分配实物资料等领域，同样也离不开数学。因此，古埃及人十分重视数学。在数学纸草文献《林德纸草》的开篇，数学被看作是“获知一切奥秘的指南”。《林德纸草》又称《阿赫摩斯纸草》，现存于大英博物馆。

在实践中，古埃及人积累了丰富的数学知识。胡夫金字塔底座四边的平均误差只有 1.55 厘米，测量技术之精确，几何形体之完美足以见证之。除《林德纸草》外，著名的数学纸草文献还有《莫斯科数学纸草》和《阿那斯塔西纸草》，记载了古埃及算术、代数和几何学方面的数学知识。

古埃及人用象形文字符号表示数字（包括分数），并发明了十进位计数制度。如在纳尔迈权标头上从 1 到百万的十进位制数字符号是，用一竖代表 1，用一段拱形线代表 10，用一段卷曲线代表

100,以一种量绳的起端代表 1000,意义垂直向手指代表 1 万,以蝌蚪代表 10 万,以一个举起双手的人形代表 100 万。由于没有位值制,他们表达数字的方式相当繁琐,即把代表数字的符号加以重复,需要用许多符号来表示一个较大的数字。如在书写 987 这个数时,需要用 9 个表示 100 的符号、8 个表示 10 的符号和 7 个表示 1 的符号。埃及人的分数概念很独特,用 1/2、1/3、1/4 等分数符号来表示其他分数,分子总是 1,如用 1/2 + 1/4 来表示 3/4。传说这些分数符号来源于有关荷鲁斯和塞特的神话。塞特挖去荷鲁斯的一只眼睛后,切割成的小块即是分数,并能利用表示分数的符号进行分数运算。尽管埃及人很早就有从分数直到百万的符号,但尚未出现代表零的符号。算术主要采用叠加法,乘除法也是化作叠加步骤来运算,除不尽者用分数表示。加法和减法符号是使用一个人走进和走开的腿形来表示。代数运算可以求解一元二次方程。

古埃及人是几何学发明者。他们之所以在几何学方面成就卓著,这与其思维习惯密切相关。若要测算田地的面积、谷仓的容量或是某个建筑项目所需建筑材料的形状和数量等,他们从不采用抽象的推理,而是以图形提供实际的解决办法,从而得出准确的结论。他们能计算出三角形、矩形、梯形、圆形的面积,以及角锥体和圆柱体的体积,推算的圆周率为 3.1605。欧几里德正是继承了古埃及几何学的成果,使之系统化,成为一门有严密体系和推理演算方法的学科。

七、永恒的古埃及文明

法老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往

众所周知，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希腊文明的源头是爱琴文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而爱琴文明的中心是克里特岛。克里特岛是爱琴海上最大的岛屿，横亘于埃及和希腊之间，海运便利，是南连埃及，北通希腊本土的桥梁。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克里特岛大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优势。在克里特人的对外联系中，与当时最富裕的埃及的交往最多，获益最大。在克里特岛，人们甚至发现了"数量惊人的"埃及前王朝时期的石质器皿。公元前2500年左右，双方建立稳定的贸易关系。克里特人使用的黄金、象牙、皂石印章、彩瓶和高级装饰品等大多来自埃及。有些埃及人还在克里特岛定居下来，带去先进的金属冶炼和农耕技术，并逐渐与当地居民融合。埃及新王国时期，通过海上直接航行，双方的交往更加密切。这在图特摩斯三世的阿蒙第一先知蒙卡皮拉萨和维西尔列赫米拉的墓画中得以印证，他们的墓壁上分别刻着："海中诸岛克夫提乌大君和平抵达"，"克夫提乌大君进来贡品"。

作为爱琴文明的一部分，迈锡尼文明后来居上。与克里特时代相比，同埃及的交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在迈锡尼的竖井墓中就出土了很多工艺水平相当高的埃及产品；在埃及出土的迈锡尼陶器的数量也远远超过了前代。

希腊古风时代(公元前8～前6世纪)，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埃及与希腊世界的文明交往更上一层楼。在海外殖民中，希腊人

在埃及三角洲西部建立了一个贸易中心诺克拉提斯，并在此定居。广泛的商贸活动，使埃及对希腊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希腊人利用了埃及文明历经数千年才取得的丰硕成果，从中汲取着养分，促进了希腊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例如希腊人以埃及雕刻为师，塑造了体态和结构都非常接近埃及风格的阿波罗神雕像。直到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才开始摆脱埃及传统的雕刻程式手法的束缚，在真实生动方面超越了埃及，突破了埃及文明3 000年间固守的一些禁区。

希腊古典时代，希腊文明在埃及文明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蔚为壮观。埃及成了兴师重教的希腊人的文化天堂。文人墨客纷纷走访埃及，像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著名的哲学家德谟克里特等都曾游历过埃及，为古老神秘的埃及文化而折服，流连忘返。他们用极其钦佩羡慕，甚至崇拜的语气描述着埃及见闻，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非希罗多德的《历史》莫属。

在长期的广泛交往中，埃及文明深深地融进了希腊文明之中。在希腊文明的文化遗存中，埃及文化的影子无处不在。在埃及文明的滋润下，希腊文明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希腊人沉醉于古埃及人辉煌的建筑成就，吸取精华并从埃及柱式结构中找到了灵感。他们逐渐摆脱埃及程式的束缚，形成自己的柱式建筑风格，为西方古典建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希腊的柱式风格又被罗马人发扬光大，并沿用至今。

另一方面，随着同希腊世界交往的扩大，希腊文化在埃及流传开来。埃及的造型艺术和工艺品开始模仿希腊的样式。埃及绘画中出现了希腊风格的肖像、壁画以及对色调阴影的重视，与过去那种用线条勾出轮廓，再平涂上色的埃及传统绘画相比有了明显的

进步。

古埃及文明源远流长

在人类历史的最初阶段，古代埃及人创造了高度发达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文明；发明了纸张、墨水、时钟、历法、象形文字等象征着文明进步的物品；留下了巨大金字塔、庙宇和方尖碑等几乎都是空前绝后的标志性建筑；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学以及高度发达的天文学、医学和数学等科学知识；他们的神话传说和神的形象早已跨越了国界等等。他们具有现代人都不可思议的智慧和精力，取得超乎寻常的伟大成就，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除上述对西方文明的深远影响外，埃及文明通过腓尼基人、叙利亚人、犹太人、波斯人等诸多东方民族亦流传下来，成为东方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埃及象形文字是腓尼基字母赖以产生的基础。在赫梯人和亚述人的艺术形象中，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屡见不鲜。波斯人把大量的埃及工匠掠到波赛波利斯，让他们按照埃及神殿的样式建造宫殿。后来，波赛波利斯的柱廊又传到了南亚次大陆，印度人在华氏城也建起了柱式宫殿。埃及出产的地毯坐垫，花色多，编织精巧，他们设计的图案传人叙利亚后，一直沿用至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总之，千百年来，埃及文明通过各种方式、渠道向外传播、渗透，甚至是通过其他文明辗转延续下来，成为人类永恒的文明。

第三章　东西方文明的撞击交融

一、托勒密埃及

亚历山大征服埃及

公元前332年11月，亚历山大几乎兵不血刃地进入埃及。尽管他在埃及只停留了几个月，但他一改波斯统治者的做法，开展一系列的友好活动，赢得埃及人的称赞和爱戴。

亚历山大非常重视埃及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到埃及后，他首先参拜埃及诸神，表示信奉埃及的太阳神、尊重神庙祭司，立即得到埃及祭司们的拥戴，因而获得埃及法老的称号。希腊的许多艺术家也同期抵达孟斐斯，举行盛会以示庆贺。

离开孟斐斯后，亚历山大沿尼罗河向西挺进。在尼罗河入海口，他亲自勘选城址，"用大麦粉在黑土地上画出战袍形状的城郭"，作为统治埃及的中心，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亚历山大城是他在东方建造的第一座城市。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无比英明，这里的确适宜建造伟大的城市。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亚历山大城一直都是东部地中海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其历史作用甚至超过了后来的唐代长安城。

亚历山大继续向西前进，来到锡瓦绿洲拜谒阿蒙神庙，请示神谕。埃及人深信，亚历山大只有在神的引导下才能成功穿越沙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波斯国王冈比西斯曾派5万大军进军锡瓦绿洲，妄图捣毁阿蒙神庙，结果全军覆没，葬身沙海。今天，通往锡瓦绿洲的交通仍不太便利，可见当年亚历山大的旅途是何等艰辛。埃及祭司们对亚历山大的壮举大加赞赏，公开宣称他是"拉之子"，"阿蒙的宠儿"。这样，亚历山大取得埃及法老的"合法"地位，真正确立了在埃及的统治。亚历山大沿袭了波斯帝国的行省制，但不同的是，他把埃及分成两个行省，任用埃及人担任总督，只留下少量马其顿驻军。

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离开埃及，继续东征。

托勒密王朝的集权统治

公元前313年，亚历山大因染疟疾在巴比伦去世。当时，亚历山大的儿子尚未出世，王位虚悬，亚历山大帝国顿时陷于混乱之中，其部将为争夺王位和领地而战，帝国濒临瓦解。

在20多年的混战中，曾任亚历山大贴身护卫和马其顿舰队司令的托勒密脱颖而出，显示出了非凡的政治外交才能。托勒密不失时机地在巴比伦会议上提出瓜分帝国遗产，由将军出任的建议。他称心如意地占有了富庶的埃及，并费尽心机地将亚历山大的遗体运回埃及，葬于孟斐斯，从而使他在埃及的统治合法化并得以稳固。

担任埃及总督期间，托勒密秉承了亚历山大的政策，俨然是埃及"仁慈"的合法君主。为了巩固他在埃及的权势和地位，他一方面不断加强内政建设，努力保持与希腊本土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

却招募雇佣军，扩充军事实力，以防备埃及人的叛乱，并向周边地区扩展。待时机成熟之后，公元前 305 年 11 月 7 日，托勒密自立为王，定都孟斐斯，并在下埃及建起一座以他名字命名的新城托勒迈斯，成为希腊人的又一大聚集地。公元前 304 年，他又给自己加封了“索塔尔”（“救星”）的神圣称号，宣扬其神性。他广施仁政，十分注重塑造自身形象，深得埃及人的信赖和爱戴，因而在他死后，被埃及人奉若神明。

托勒密一世之后，到公元前 30 年被罗马帝国征服，托勒密王朝经历了 14 代君主的统治。托勒密王朝以埃及为主体，最强盛时，领土还包括南叙利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西南、色雷斯和赫勒斯滂沿岸地区和地中海的一些岛屿，也称得上是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

政治上，托勒密王朝把原马其顿的具有军事民主制遗风的君主制、希腊人的传统观念与埃及古老的法老专制统治相结合，建立了以国王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形成了一整套希腊化的统治新模式。

国王把埃及视为其私产，他本人就是国家的化身。国王是全国的最高统治者，集各项大权于一身，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国王之下，设有系统的官僚统治机构，主要依靠希腊·马其顿人控制中央和地方的军政大权。在中央高级官吏中，财务大臣最重要，相当于宰相，统管国家的谷仓和金库，并兼管部分行政事务，权倾天下。在地方，托勒密王朝基本沿袭埃及旧制，设州（诺姆）—县（托波斯）—村三级行政区划。起初，马其顿的武将对于管理地方事务往往不能得心应手，因而需要利用当地埃及人进行统治。上下埃及约设 40 个州，埃及人可出任州长，但实权由驻扎在各州的希腊·马其顿将军（斯特拉提戈斯）控制。此外，在各级行政机构中还设有

谷仓和金库，由专人负责收集谷物和税金，上缴国库。

托勒密王朝的垄断经济

托勒密时代的社会经济建立在法老时代经济基础和希腊人的管理体系之上，颇具特色。托勒密王朝主要以垄断和税收的手段控制经济，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

垄断和专营是托勒密时期埃及经济生活的突出特征。国王将埃及国土据为己有，垄断农业生产。土地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国家直接管理的“王田”，一类是包括庙田、屯田、禄田、赐田和私田等在内的“授田”。王田的耕种者被称为“劳伊”（希腊语“居民”），他们是通过契约形式承租王田的佃农。他们在各州“管理人”的监督下，按照国家的规定进行生产。除耕种土地外，劳伊还要服劳役，承担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连租带税需缴纳收成的一半以上。农民的依附性和负担明显强化。除了租佃王田外，他们还耕种庙田、赐田或屯田。除农业外，国王垄断和专营的部门和生产领域有银行、油料、纺织、造纸、制盐和酿酒等。以油料为例，从种植到销售，每一个环节都由政府完全控制。油料必须在当地政府监督下在国家的油坊里加工，然后以固定价格出售。严格的垄断制度，促使托勒密王朝最大限度地搜刮民脂民膏，仅垄断专利一项，每年的收人就达约 15 000 塔兰特。

托勒密的税收可谓多如牛毛，无孔不人。土地、房屋、园圃、家禽、牲畜、奴隶、人头、财产继承、买卖交易、关卡交通等都在纳税之列，估计税收种类在 200 种以上。除土地税交实物外，大部分以货币纳税。为了简化税收程序，国王有时也实行包税制度。

尽管如此，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的社会经济并未停滞倒退，

相反却呈上升趋势。奴隶制相当盛行，奴隶市场活跃，用途广泛，使用于各行各业。

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的改进。出现了牲畜牵引转动的扬水车；精选良种，实行轮耕；发展畜牧、养猪、养蜂等家庭养殖业，甚至还从国外引进良种改良本地绵羊。骆驼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驯养的。依照希腊人的传统，托勒密王朝特别重视种植葡萄和橄榄。为了保护葡萄生产，对进口葡萄酒课以重税。值得一提的是，托勒密二世对法尤姆绿洲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开发，开垦出大片肥沃良田。经过约 40 年的发展，耕地面积翻了一番，达到 1 300 平方千米。由于这里气候适宜人，农作物一年两熟，人口迅速增至 30 万，从而发展成拥有近 200 个村落的法尤姆省，并成为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最繁荣、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

手工业的发展尤为显著。纺织、制陶、造纸和金属加工等传统手工业更上一层楼。亚历山大城的手工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里的纺织工场能生产出 14 种不同规格的毛呢，其金属加工尤以镶嵌花瓶蜚声海外，五彩透明的玻璃制品更是享誉世界数百年。

为了扩大商业利益，加强对外贸易，托勒密二世凿通了法老未竣的连接红海与地中海的运河。他还派人开发非洲东海岸，建立了一连串远达索马里的商业据点，派出海陆卫队保证商路的安全。因此，当时的商业贸易十分活跃，其发展水平超过了前代，成为地中海世界的贸易中心。埃及商人的足迹已遍及非洲北岸、爱琴海诸岛、小亚沿岸乃至黑海地区。埃及输出的货物主要是粮食、亚麻布、纸草和玻璃制品等。尽管托勒密王朝实行进口高关税制，但是来自地中海世界的金属、木材、大理石、染料和橄榄油等，中国的丝

以及南阿拉伯和印度的药材、香料和宝石等奢侈品还是源源不断地流入埃及。

托勒密王朝的社会关系

托勒密王朝对马其顿·希腊人与埃及人采取双重标准，仅从语言上就可反映出他们的主从地位和尊卑贵贱。希腊语是托勒密王朝的官方语言，通行于军队、法庭和各级行政管理部门，相反，埃及语则降至从属地位。马其顿·希腊人移民埃及后，他们用希腊语称当地居民为科普特人，意为“埃及人”，以示优越。

在法律上，两大民族之间界限分明，地位悬殊。托勒密王朝在希腊人中实行城市法，对埃及人则实施土著民族法，形成两种法律制度并存的局面。

马其顿·希腊人的数量虽远不及埃及人，但却是托勒密王朝的主体民族，即享有特权、受法律保护的公民团体。他们多居于城市，特别是亚历山大城、诺克拉提斯和托勒迈斯这三个希腊化的自治城市，基本保持传统的希腊生活方式。托勒密王朝实施城市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上层的需要，维护其优越的社会地位。若案件涉及到埃及人，则要组成混合法庭，两种法律体系同时运行。但在实际操作中，马其顿·希腊人往往会占据上风，以城市法取代埃及人的土著民族法而告终。

在城市法的保护下，马其顿·希腊人还自发组织了许多俱乐部式的“学院”。这不仅是希腊人接受传统教育的场所，也是其尊贵身份的象征。然而，生活偏远地区的马其顿·希腊人的情况则大为不同。为了适应当地环境，迅速致富，有的希腊人热衷于学习埃及语，甚至与当地人通婚，承认那些进入其家族姓氏中的埃及姓名。

两大民族之间的正常交往与融合势不可当。

在对待埃及人的政策上，托勒密王朝初期的统治者较为严厉。对埃及人实施的土著民族法，实质上是将埃及人置于被征服的从属地位。法律禁止埃及人与马其顿·希腊人通婚。公元前312年，禁止埃及人携带武器。为了监督和防范埃及人，马其顿军队驻守各大要塞，辅之以希腊人、犹太人等组成的雇佣军。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17年，埃及人开始在军队里大显身手，其社会地位才随之发生变化。然而，直到托勒密王朝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埃及人的社会地位才真正得到改善。埃及人可以充任军队和地方的高级将领和官员，一些资深的埃及老兵享有与马其顿军人同样的待遇，可以拥有份地。

如果还有一个例外的话，那就是托勒密王朝从一开始就继承了亚历山大大帝的"优良"传统，笼络埃及的高级僧侣祭司集团，把希腊的神与埃及的神认同合一，从而使埃及人从心理上接受托勒密王朝的统治。托勒密王朝对埃及神庙祭司集团网开一面，允许他们占有土地，享有特权；维护埃及固有的宗教秩序，遵奉埃及神灵，修建神庙。古埃及规模最大的卡纳克神庙终于竣工了，这座陆续建造了近2000年的阿蒙神庙是人类文明史上建筑时间最长的一座大型综合建筑。此外，还在许多交通要道上建造了集祭祀、防守、水文、税收等功能于一体的新型神庙。

然而，所有这一切还是难以弥合埃及人与马其顿·希腊人之间固有的民族矛盾。尽管许多埃及人努力学习希腊语，试图跻身于上层社会，但最后还是发出了"我不知道举止如何像一个希腊人"的感慨。因此，民族矛盾相当尖锐，并贯穿于托勒密王朝统治始末，埃及人从最初的罢工逃亡演化成武装起义，罗塞塔石碑就是明

证。从公元前2世纪中叶至公元前1世纪中叶，此起彼伏的起义更是愈演愈烈，底比斯地区曾几度独立。与此同时，希腊化世界内部的纷争亦未停息，王朝内部的争权夺利则不断加剧。托勒密王朝江河日下，穷途末路，最后不得不引狼入室，俯首于罗马人的刀剑之下，进而将埃及拱手让给了强大的罗马人。

"埃及艳后"

克列奥巴特拉(公元前69～前30)"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啊！"——是美、爱和权力意志的混合物。她以聪明美貌、阴险毒辣著称于世，她那短暂而传奇的一生跌宕起伏，极具戏剧性，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尽管历史资料并不多，但有关她的传说、文学作品却汗牛充栋，经久不衰。有人甚至幽默地提出了所谓的"鼻子理论"，如果克列奥巴特拉的鼻子矮上一点，那么历史将重写。然而，从现存的雕塑和铸币头像看，她是一位典型的古希腊人：脸形椭圆、大眼睛、鹰钩鼻，似乎并非花容月貌、倾国倾城。

公元前51年，克列奥巴特拉的父亲托勒密十二世去世，弟弟托勒密十三世即位。不久，她便与托勒密十三世结婚，共同执政。托勒密王朝时期，这种兄弟姊妹之间婚配的血缘婚姻相当普遍，这或许是借助埃及古老传统来取信于埃及人，当然主要还是为了巩固希腊人的统治，确保大权在握。托勒密二世就曾休掉发妻，立同胞姐妹阿尔茜诺为后，因而得到了"菲拉德尔弗斯"("爱他姊妹的人")的绰号。

公元前48年，因宫廷内部矛盾激化，姐弟失和，托勒密十三世将克列奥巴特拉七世逐出王宫，并得到庞培的支持和保护。不久，罗马执政官凯撒为追击庞培，进军埃及。凯撒在《内战记》中称，由

于局势紧急,为使军队尽快登陆,他下令烧毁停泊在东港的船只。据推测,火势蔓延到岸上,损毁了港口附近的建筑物,其中可能就有图书馆。

凯撒出面调停托勒密王室内部的纠纷,召见双方代表以弥合姐弟间的矛盾。克列奥巴特拉让仆人用毯子把自己裹起来,从密道扛进王宫,突然出现在惊愕万分的凯撒面前。古典作家在记述这一情节时,非常精辟的套用了凯撒向元老院报告塞拉之捷的三句名言:“她来了。看见了。征服了。”克列奥巴特拉的魅力彻底“摧毁”了战无不胜的罗马统帅。表面上姐弟重归于好,但大权实际落入已成为凯撒情妇的克列奥巴特拉之手。公元前47年,托勒密十三世奋力抗争,结果战败而死,克列奥巴特拉的异母兄弟托勒密十四世即位。克列奥巴特拉又下嫁给了这位比她小10岁的新国王,共同摄政,但仍与凯撒保持暧昧关系,并为凯撒生下凯撒里昂。公元前44年,克列奥巴特拉应凯撒之邀前往罗马,但好景不长,凯撒遇刺身亡,被迫携子逃回埃及。克列奥巴特拉谋害了托勒密十四世,将凯撒里昂扶上王位,是为托勒密十五世,终于实现了与儿子共治的夙愿。

公元前41年,凯撒的部将安东尼在索塔斯城召见了克列奥巴特拉,他紧步凯撒之后尘,随她前往埃及。公元前37年,安东尼为了争取埃及的支持,巩固他在东方的统治地位以对抗屋大维,他遗弃了屋大维的姐姐屋大维娅,迎娶克列奥巴特拉。克列奥巴特拉则试图借助安东尼的力量恢复托勒密王朝鼎盛时期的版图。两人一拍即合,联手对付屋大维。

公元前34年,安东尼出征亚美尼亚,胜利归来。他按照埃及的仪式,在亚历山大城举行凯旋式,与克列奥巴特拉同登黄金宝

座。他宣布凯撒里昂为凯撒合法儿子，称作“众王之王”，克列奥巴特拉为“众王之女王”，并将罗马东方领土的一部分赠与克列奥巴特拉及其子女。罗马哗然，群情激昂。罗马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以侵占罗马人民财产为由，对克列奥巴特拉宣战，并剥夺安东尼的一切职权，宣布他为“祖国之敌”。公元前31年9月，屋大维进军埃及，双方会战于亚克兴海角，克列奥巴特拉和安东尼溃败，先后逃回埃及。

公元前30年，屋大维攻克亚历山大城，安东尼自刎。克列奥巴特拉被俘后不久，绝望地将毒蛇放入自己的胸口，结束了年仅39岁的生命。屋大维按照克列奥巴特拉的遗愿，合葬二人。与此同时，屋大维在上埃及找到了托勒密十五世，将他诱骗回亚历山大城后处死。至此，延续了275年的托勒密王朝告终，埃及并入罗马帝国版图。

“地中海的新娘”

托勒密王朝的统治对埃及人民来说或许是一场灾难，但从文明交往的角度来看，它却开辟了埃及文明与希腊文明相互交流、融会贯通的新局面。一方面，埃及文化融入繁荣的希腊化文化之中，对西方文化做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埃及人也从希腊文化中吸取了精华，特别是在建筑装饰艺术方面，并集中的体现在亚历山大城——“地中海的新娘”身上，她是埃及文明与希腊文明的结晶。

亚历山大城是在亚历山大本人勘选的城址上，由著名建筑师迪诺克拉蒂斯设计建造，呈现出完美的希腊建筑风格。这是一座长方形的城市，街道笔直，垂直相交，长6 000米、宽约30米的主干大道横贯东西，其面积是雅典的3倍以上，居民多达70余万。

市内划分为5个区,分别以希腊文的头5各字母命名。规模最大的建筑群当属王宫,约占全城总面积的1/3~1/4,中央管理机构、法院大厅、博物馆、图书馆、神庙、竞技场、浴室、广场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体现了希腊城市的外在特征。

亚历山大城的航运条件非常优越,以其庞大的海陆货运量和发达的城市加工业著称,无与伦比。托勒密一世在亚历山大城与法罗斯岛之间,筑有一条长1 400米的长堤,将海岸隔成东、西两个港湾。托勒密二世时,又在法罗斯岛上建造了巨型灯塔。由于连接尼罗河与红海的运河也在同期开通,所以,亚历山大港成为沟通了红海—尼罗河—地中海交通的枢纽,堪称当时最大的国际商港和经济中心。

新城落成后,托勒密二世迅即迁都于此,并以隆重的仪式将亚历山大的灵柩安葬在"西马"(意为陵墓)内。相传,这是一座正方形的庭院建筑,墓室和祭庙位于中央,连为一体,从通道可直接进入存放亚历山大金棺的墓室。这样,亚历山大城名副其实,并成为埃及乃至地中海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然而,亚历山大城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与其说是政治经济的,毋宁说是文化上的。它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前沿阵地,在总结和发展希腊古典文化的同时,充分吸收和利用了埃及文化,孕育出辉煌灿烂的希腊化文明。尽管其文化形态尚属希腊文化范畴,即以希腊语为载体(克列奥巴特拉七世是惟一会讲埃及语的统治者),承袭了希腊文化传统,但亚历山大城毕竟是坐落于埃及大地上,深深地根植于埃及文化的沃土里,从中汲取了充足的养分。倘若离开了埃及丰厚的文化底蕴、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以及埃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一切都将不堪设想。难怪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反

复强调埃及人的“巨大业绩”，例如在谈到希腊神的起源时感慨道：“较大的一部分则是起源于埃及的”，充分展示了埃及文化的重大作用。

亚历山大博物院

托勒密王朝虽以武力开国，却对文化事业怀有浓厚的兴趣，慷慨解囊，奖掖学术，兴办教育。前已述及的埃及祭司马涅托正是受托勒密一世之命，用希腊语撰写了三卷本的《埃及史》。尽管此书已散佚，现只留下一些残片及王朝和国王的年表，但极具参考价值。亚历山大城逐步取代雅典成为地中海地区最大的文化中心，在东西文化的交流中处于领先地位。由国王兴办的博物院和图书馆代表了希腊化文化的最高发展水平。

亚历山大城的博物院最初是一座缪斯神庙，属于王宫的一部分，后演化为托勒密王朝庇荫下的一所著名的学术研究机构。它包括一座宏伟的图书馆，若干展览厅、讲演堂、餐厅和宿舍等建筑，以及可供科学研究的天文台和动植物园。博物馆分设文学、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等 4 个学科，并从事教学工作。该机构的首脑由国王任命，称为“主管”或“祭司”。应国王聘请，先后有上百名的学者从地中海四周许多地区到此著书立说，广收门徒。他们享有朝廷官员一样的优厚待遇，免除社会义务，还不时领到津贴、奖励和馈赠。公元前 3 世纪，学术活动最为活跃。托勒密王室权贵以及希腊、西亚、昔兰尼加等地的一些豪富人家的子弟纷纷来此求学，学生总数一度达到 14 000 人，仅数学家欧几里德一人就先后招收弟子逾千人。

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博物院的核心，按照雅典亚里士多德图书

馆的风格建造，富丽堂皇，宽敞的阅览大厅内矗立着太阳神阿波罗和艺术女神缪斯的大理石雕像。图书馆的藏书总数在40万册以上，囊括了大部分希腊文，以及古埃及文、腓尼基文和希伯来文著作。图书馆馆长由国王任命，通常都是王位继承人的老师。最初的几位馆长有芝诺多德斯、埃拉托色尼和卡利马库斯等，他们在图书目录学方面造诣颇深。卡利马库斯最早尝试编制图书目录，编写了120卷本的《希腊图书总目》，这是最早的图书目录学著作。在馆长们的带动下，图书馆建立起文献学和文本评论，编制出古典希腊作家的文学目录，每册书都有提要和评论。同时，翻译、整理、注释和校订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荷马史诗》的第一个校订本就出自芝诺多德斯馆长之手。图书馆组织人力将希伯来文的《旧约全书》翻译成希腊文。据说在公元前270年，70(一说72)位译者各居一室，互不联系，却在72天内完成了这部首尾一致的译著，故称《七十子希腊文本》。希腊文《旧约全书》的问世，为原始基督教在西方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

亚历山大城优越的学术环境，造就了一大批的文人雅士和科学家，涌现出许多流芳百世的作品和丰硕的科研成果。忒奥克里图斯的代表作《田园诗》成为后世拉丁文田园诗的典范之作。“力学之父”阿基米德发现了杠杆原理、比重原理、斜面定律和浮力定律等，他发明的阿基米德螺旋杆，直到现在埃及农村还用这种装置汲水。“地理学之父”埃拉托色尼计算出地球的周长与实际数值仅差300千米左右，而且是第一位提到中国的西方地理学家。数学家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直到19世纪还是欧洲一些学校的教科书。来自小亚的希罗菲鲁斯是“古代最伟大的解剖家”，他与“最伟大的生理学家”埃拉西斯特拉图斯共同发现了神经系统，区别出了

感觉神经与运动神经。因此，恩格斯指出："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他们为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亚历山大灯塔

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中，埃及独占两个。除金字塔外，还有亚历山大城的法罗斯灯塔。其实，法罗斯灯塔在当时的名声比金字塔更大，闻名遐迩。灯塔位于亚历山大港以北的法罗斯岛上，因而得名，进而成了灯塔的代名词，西方各大语种的"灯塔"一词均源于"法罗斯"。

灯塔建于托勒密二世统治初期，亚历山大城蒸蒸日上，逐渐成为东西方贸易最大的集散地和地中海最大的海港。为了适应日益繁荣的经济形势，促进海上贸易的发展，公元前282年，托勒密二世下令在法罗斯岛的东端的巨礁上建造灯塔，以便给过往的船只导航。亚历山大灯塔由出生于开俄斯的苏思特拉图斯设计，采用石灰石砌成，外表饰以白色大理石和青铜雕刻，雄伟壮丽，更多地体现出希腊式的建筑风格，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观。

公元前280年，灯塔竣工启用。从罗马古钱币上以及一些文献资料里，灯塔的模样依稀可辨。塔基呈正方形，塔身主要由立方体、八角形柱体、圆柱体和穹形圆顶四部分组成，自下而上逐渐缩小。塔高120米，加上塔基总高度是135米。塔身的第一部分高60米，共12层，像是逐层缩小"楼房"，有300多个房间，有供管理人员办公住宿和仓储等用途。"楼顶"四角分别竖立着"波赛东之子吹海螺"的巨大青铜铸像，既有装饰作用，有可用来确定方位和辨别风向。第二部分为八角形柱状建筑，高30米。第三部分为圆

柱形，高 15 米，上端是 8 根花岗岩石柱，共同支撑起一个高 8 米的穹窿状圆顶，即用于导航的灯室。后来，这种形状的建筑为穆斯林借鉴，并成为伊斯兰教清真寺顶部的造型。再往上是第四部分，耸立着一尊高约 7 米的海神波赛东的青铜塑像，为灯塔增添了神话色彩和艺术气息。

亚历山大灯塔不仅外部造型美观大方，而且内部结构亦十分严密。据记载，塔内较宽阔处，建有螺旋上升的石级，而狭窄处只有倾斜向上的台阶通往灯室。塔内正中间有一个相当于现代电梯的人工升降装置，用来运送燃料等物品。设计者还在灯室内安装了反光镜，效果奇佳。夜间它可反射火光，使整个灯室灯火通明，引人注目；白天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光芒万丈，可为 50 千米以外的船只导航。这种做法十分可取，沿用至今。

亚历山大灯塔自启用后，直到公元 642 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几乎从未间断过，连续使用近千年之久，这在古代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700 年，亚历山大城发生地震，灯室和波赛东神像坍塌，直到 880 年才修复。不幸的是，1100 年灯塔再次毁于强烈地震，仅存下面的“楼房”，修整后，在上面建了一座清真寺。后又经 1301 年和 1435 年的两次大地震，终化作一片废墟。1477 年，马木鲁克王朝苏丹卡特巴巡视亚历山大时，下令利用遍地散落的石料，在灯塔遗址上建起了防御土耳其人的城堡——卡特巴城堡，其地位仅次于萨拉丁城堡。从 1966 年起，城堡被布置成航海博物馆，向游人开放。

伊西斯神庙

如前所述，托勒密王朝在上埃及新建了一系列多功能神庙，其

中最著名的是阿斯旺附近的菲莱岛伊西斯神庙建筑群。

伊西斯女神是古埃及创世神话中的九大神之一，其神话故事最早可追溯到前王朝时代，在埃及家喻户晓，深受埃及人景仰和爱戴，是古埃及最重要的艺术题材之一。聪明美丽、坚强勇敢的伊西斯对丈夫奥西里斯忠贞不渝，她两次使身遭暗害的丈夫死而复生。最后，他们的儿子荷鲁斯替父报仇，战胜了叔父塞特，登上了王位。通过她的痛苦和欢乐，伊西斯在托勒密时代赢得了与地中海世界其他女神并列的崇高地位，成为光明和正义的化身，是所有人的庇护所和天堂。她是永恒的诺言，即使一切都败落了，她依旧存在；即使圣母玛利亚的威望，也未能动摇她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在埃及各地的神庙及墓室里，她那优美的造型随处可见：一位身材苗条的少妇，头戴一对牛角托着红色日轮的冠冕，有时怀抱幼子荷鲁斯，端庄秀丽。

相传，奥西里斯被安葬在与菲莱岛隔水相望的碧奇岛上。碧奇岛因而成为托勒密时期信奉伊西斯神一家和哈托尔女神（荷鲁斯神之妻）的圣地。伊西斯在菲莱岛上思念丈夫，当泪水滴落尼罗河后，河水就会上涨。菲莱岛上最大的伊西斯神庙建于托勒密三世时期，被誉为"埃及国王宝座上的明珠"。

菲莱岛上的伊西斯神庙雄伟壮观、雕刻生动，其建筑风格和平面形制符合传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伊西斯神殿是当年举行祭祀的地方，内有 14 根复合式柱头圆柱，上面雕刻着托勒密王朝诸王的业绩。主殿的前面耸立着第一塔门，前庭的西侧是伊西斯圣诞殿。前后庭之间的石砌建筑叫"产房"，寓意为是荷鲁斯的诞生地。石壁上雕刻着伊西斯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芦苇丛中，为初生的荷鲁斯哺乳的浮雕，既表现了伊西斯的刚毅坚贞，又流露出她的

温柔慈爱。

伊西斯神庙东面是规模较小的哈托尔神庙。希腊人认为哈托尔女神就是爱神阿芙罗狄忒。这些建筑的柱头明显受希腊影响，手法极为复杂，壁面按习惯雕刻着细致的浮雕。此外，岛上还有几座罗马时代的建筑，如奥古斯都时期的小型神庙以及后来成为菲莱岛标志的图拉真时代的亭子等。

由于尼罗河的泛滥以及自然风化，菲莱岛上的伊西斯神庙建筑群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损毁，尤其是阿斯旺大坝的建成后给它带来灭顶之灾。高坝落成后，菲莱岛被淹。为了保护文物，埃及政府环岛筑起一道钢板护墙，并抽干积水。1972～1977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协助下，采取了同阿布·辛拜勒岩窟庙一样的挽救措施。将神庙分割成4万块的巨石，然后按原貌复原，共耗资3 000万美元。在现代科技手段下，古老的神庙顺利地乔迁至距原址500米的阿基利卡岛。

罗塞塔石碑

从希腊化时代开始，埃及出现了多种语言文字并存的现象。希腊语、象形文字、祭祀体文字和世俗体文字等在不同领域发挥着作用。希腊语为官方语言；象形文字主要用来篆刻碑文；祭祀体文字主要用于抄写各类宗教文献；世俗体文字则是广泛流行的大众化语言文字。号称打开古埃及文明宝库“金钥匙”的罗塞塔石碑，就是这一时期多元文化的有力见证。

罗塞塔石碑的发现和破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798年7月，拿破仑远征埃及。他十分重视收集埃及的文物，随军开赴埃及的还有一个由167名学者艺术家组成的考察团。他们系统地考察研

究埃及的古代遗迹，编撰了第一部埃及学专著《埃及概论》。8月，一名叫布萨尔的法国工程兵军官，在尼罗河三角洲西部罗塞塔城(今拉希德)附近的一座旧城堡里，偶然发现了一块刻满字符的黑色石碑。拿破仑下令将石碑运到开罗，交给新建的民族研究所，并从法国召来两名专家研究考证。1801年，法国败于英国和土耳其联军。根据协议，法国须把在埃及发掘到的大部分文物转交给英国。翌年2月，罗塞塔石碑被运抵伦敦，在大英博物馆展出至今。

罗塞塔石碑为坚硬的黑色玄武岩制成，高约115厘米，宽73厘米，厚28厘米。顶部两端和右下角均有残损。自上而下依次刻有:14行象形文字，32行世俗体文字(缺损14行)，54行古希腊文(缺损24行)，分别记述同一内容。

1802年4月，斯蒂芬·韦斯顿首先把古希腊文译成英文，得知碑文的内容是:埃及祭司集团为庆祝托勒密五世加冕一周年而发布的一份歌功颂德的公告。碑文罗列了年仅9岁的托勒密五世的许多尊号，颂扬他一年来的卓越功勋，包括修葺庙宇、赏赐谷物、减免税收、释放囚犯、指挥作战等。祭司们无不感恩戴德，遂决定在全国各庙宇内竖立"救世主托勒密"的雕像，并镌刻此碑立于托勒密雕像前。这一进展大大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热情，他们试图彻底破译罗塞塔石碑。

第一位颇有建树的学者是瑞典驻巴黎的外交官阿克布拉德。他对石碑上的希腊文和世俗体文字进行对比研究，成功辨认出几个世俗体专有名词，如"神庙"、"希腊人"等，并断定古埃及语和科普特语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从而为破解象形文字之谜开辟了道路。

1816年，英国著名科学家托马斯·杨提出，世俗体文字不是拼

音文字,但世俗体文字和象形文字中都有大量的表音成分,不同符号可能表示同一发音。他还发现,碑文中椭圆形框内的象形文字代表国工或王后的名字。

与此同时,法国学者商博良通过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认为象形文字和世俗体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1813年后,商博良发现象形文字符号有表音的作用,并将罗塞塔石碑与埃及菲莱神庙方尖碑等文物上的象形文字进行对照研究。他以"托勒密"和"克列奥巴特拉"等词为突破口,分析其结构和字母发音,探索象形文字的奥秘。商博良的发现,结束了关于象形文字的本质的争议。他写道:"在同一段或同一句文字中,象形文字既有着它的图形上的意义,也有着含义和发音方面的意义,我几乎可以按照这些字把它念出来。"1822年,商博良成功地释读了上百个象形文字,可辨认出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埃及王名。商博良的成就得到了学者们的赞赏。尽管他英年早逝,但他的名字必将与象形文字同在。

罗塞塔石碑是释读象形文字的媒介,而象形文字的释读成功则使埃及文明大放异彩。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并因此出现了一门新兴的学科——埃及学。

二、基督教埃及

罗马元首的"私人领地"

公元前30年,屋大维征服埃及后,如获至宝,紧"握"在手,惟恐丢失。尽管在行政区划上埃及仍属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但其地位和作用明显高于其他行省。埃及以罗马皇帝的朝代纪年,而

不像其他行省那样，以执政官的任期纪年。罗马皇帝直接控制埃及，没有他的许可，任何罗马元老都不得进入埃及。埃及成了他的“私人领地”，埃及的全部收入都为其“私产”。因此，罗马统治初期，埃及社会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在行政上，罗马埃及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模式都发生较大变化。屋大维派一名相当于总督的最高长官常驻埃及，作为代理君主。最高长官以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推行军事统治制度，履行军事、行政、司法和财政等大权，实行专制主义统治。尽管最高长官的权力很大，但皇帝对他严加控制。第一任长官科内利乌斯·加卢斯就因满招损，被革职处死。长官之下设立由裁判官、卷宗官和采邑税务官等组成的政务会，协助长官处理日常事务。“亚历山大及全国的最高僧侣”负责埃及的宗教事务，但他并非僧侣，而是一名罗马行政官。

中央政权和地方行政机构之间还有一种名为埃底斯特拉提戈斯的官员，由罗马人充任，分别掌管底比斯、中埃及和三角洲的地方行政事务，有权任命地方官吏，但无军权和财权。州长可由希腊人担任，名义上还有皇家书吏和会计师辅佐之，其实是在监督他。

在各希腊化城市，屋大维将希腊人的“学院”改组成官方行政单位，逐渐演化为城市议会，负责管理市政，征收赋税。公元2世纪末，以城市议会为核心组成了元老院。

托勒密时代的领薪官员被罗马时代的受封爵位的官僚所取代，做官不领受薪金，纯属尽公民义务，从而形成了一个不同等级的强制公职体系。这种制度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罗马政府的财政负担，但行政开支却落在富裕的农民和市民身上。由于负担过重，给埃及造成人口锐减和中下层破产的恶果，甚至出现了官吏逃亡

的奇怪现象。

在军事上，屋大维剥夺各州长的军权，加强对埃及的控制。屋大维共有 28 个精锐军团，每个军团大约 6 000 人，仅向埃及就派驻了 3 个军团，后减至 2 个。此外，各大城市和要塞还有一定数量的罗马辅助部队驻守。

在司法上，主要实行罗马法律，同时也保留一些希腊和埃及的法律。取消托勒密王朝的巡回法庭制度，最高长官每年只到个别地区巡回一次，审理一些重大案件和纠纷。在法律上把全埃及居民分为两类：罗马人、希腊·马其顿人为享有特权阶层，免除各种税收；与之对立的埃及人，则必须缴纳人头税，这是罗马人引入的新税目，即使在公元 212 年埃及成年男子获得公民权后，也未能幸免此税。

在经济上，罗马统治者对埃及实行竭泽而渔的政策，大量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罗马。除王田外，庙田、赐田和屯田多被没收或拍卖。罗马帝国废弃了托勒密时代的国家专营和垄断政策，实行了一种更复杂、更有效的税收体制。据统计，罗马人在埃及征收的实物税有 50 种之多，货币税竟多达 450 余种，大大超过了托勒密时期。为了确保税收的顺利进行，从中央到地方，设立各级专门机构普查人口、保管和整理人口卷宗。每 14 年普查一次人口，挨家挨户登记注册，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苛刻的税收政策直接导致了埃及农民的赤贫化，3 世纪时，罗马帝国的“粮仓”已到了在一些村庄找不到一头牛羊的程度，令人发指。

物极必反，不堪负重的埃及人被逼上梁山。早在公元 1 世纪，埃及人就以逃亡方式进行抗争，一些人聚集在“布克里亚”，即尼罗河三角洲的沼泽地区，落草为寇。公元 172 年，终于爆发了由僧

侣伊西多尔领导的布克里人起义。起义军屡次打败罗马军团，进军亚历山大城。虽然起义军后来被叙利亚军团分化瓦解，但布克里人的反抗活动却从未中断，一直延续到拜占庭帝国时期。

当埃及人看到通过抗争，甚至流血牺牲仍无法改变残酷的现实时，他们困惑了，迷茫了，无奈只好寻求精神上的解脱，转而把希望寄托于宗教，渴望从上帝那里得到慰藉。于是，贫困破败的埃及为基督教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基督教传入埃及

埃及是基督教最早传入的地区之一，在基督教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据《圣经》记载，耶稣降世后为免遭迫害，全家从巴勒斯坦逃到埃及避难，最初就躲在今开罗艾布·萨尔加教堂下面的岩洞里。因此，这里成为基督教的一处圣地，来此朝拜的信徒络绎不绝。

据说最早赴埃及传播福音的是圣马可，可追溯到公元 43 年。马可在亚历山大城的犹太区建立了基督公社，即最早的教堂。他聚徒讲道，宣传平等，“爱人如己”，但却遭到罗马当局的迫害，不幸于 69 年殉教。

基督教的传入，在埃及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基督教逐渐与埃及的民族传统紧密结合，深深地扎根于埃及文明的沃土之中，从而使埃及历史迈入科普特时代。通常，我们把法老时代之后到伊斯兰教传入埃及之后这段时间称为科普特时代，或基督教时代。综观 9 个世纪的基督教时代，堪称是一个风云突变、东西方民族交往融合的时代，对于埃及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埃及史学家阿·苏·阿提亚教授在《基督教时代的

埃及》中指出，科普特时代是从古埃及"飞跃到"伊斯兰时代的"一座不大不小的桥梁"，"应该被认为是埃及民族历史上最光辉的时期之一"。

基督教之所以能在埃及迅速传播，并逐渐深入人心，这与基督教的思想学说以及埃及的社会历史背景紧密相关。

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全盘接受了犹太教经典，但它摈弃了犹太教中狭隘的民族性和保守的排外性，极大地发挥了救世主的思想。基督教不分民族阶级、贫富贵贱，只要信仰耶稣为救世主，即是教徒，便可得到上帝的拯救和恩惠。罗马统治时期，埃及人与犹太人同病相怜，命运多舛。普救众生的救世主观念，正好满足了埃及人力图摆脱罗马人奴役的愿望，成为那些无望改善自身物质状况、孤立无援的埃及人的精神寄托。

作为一种新的世界信仰，早期的基督教汲取了东西方的宗教文化和哲学思想，与任何别的宗教相比，表现出更多的兼容并蓄性。一方面，它吸收了东方神秘主义宗教中神为救助众生死而复活、赎罪献祭等学说。基督教宣扬死而复活和追求美好的来世生活的宗教思想，与埃及的传统宗教相吻合，非常贴近埃及民众的宗教生活。死而复活的思想在埃及神话奥西里斯的传说中可以找到，圣母圣子的故事与埃及的伊西斯和荷鲁斯的神话则如出一辙，而亚历山大城随处可见的犹太教会堂和《七十子希腊文本》更是为基督教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将埃及史和基督教史作一比较，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大量的信念转移。基督教是古埃及文化遗产的受益者，就连《圣经》的作者们也承认耶稣在埃及接受过教育。另一方面，基督教也接受了古希腊罗马哲学思想，譬如罗马哲学中斯多噶学派的天体神圣说、世界大同主义和人们皆兄弟

的思想，特别是宗教化了的希腊哲学。所有这一切，对于身处东西方文化荟萃之地的埃及人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埃及自然成了传播基督教最合适的土壤。

基督教在埃及传播之初，吸收了亚历山大学派斐洛的学说，逐步丰富完善教义。斐洛是一位伟大的犹太神学思想家，他力图在犹太神学和希腊哲学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提出在神与人之间存在着中介"逻各斯"，或称"道"。遗憾的是，"他所建立的这座桥梁没有被他为之建立的那些人所利用，反之，却被基督徒用来制定自己的教条"，基督徒将斐洛学说中的逻各斯与犹太教救世主观念结合起来，演化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斐洛也因此被誉为"基督教之父"。

亚历山大城的基督教派

公元135年，罗马皇帝哈德良将犹太人驱逐出巴勒斯坦后，大批犹太人涌人埃及，基督教在埃及再次兴盛，并形成以诺斯替派为主导的宗教思潮。"诺斯"即真知，诺斯替派认为，只有掌握诺斯，才能获得解脱。它提倡极端的神秘主义和苦行主义，相信纯真的宗教信仰纯粹是启示的产物，视物质为罪恶并加以蔑视。它与正统的基督教思想相去甚远，然而，在埃及却盛极一时。巴西利德斯、瓦兰替努斯和荷拉克里昂等在亚历山大城创办诺斯替学校，传播基督教。

公元180年前后，亚历山大城出现由教堂创办的教理学校，采取问答的形式传授基督教教义，自成一派——亚历山大教理学派。教理学校逐渐取代斯诺替学校的主导地位，埃及基督教进人教理学校时代。

亚历山大教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克雷芒、奥里根和狄奥尼亚，他们之间是师承关系，并先后任教理学校校长。克雷芒是一位正统的基督徒，在他身上无不体现出基督教与希腊文化的结合。奥里根是克雷芒的得意门生，其思想更多体现新柏拉图主义和新斯多噶派的影响。他经历了基督教由一个小宗派发展成希腊罗马世界的大宗教的转变，其最大贡献在于深入细致地研究基督教经典。他确定《新约全书》的可信文本，并注释《圣经》，将希伯来文的《旧约全书》与希腊文等 4 种文字分 6 行对照排列，编成《六栏圣经》，为基督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后来，奥里根因遭受迫害，从亚历山大城逃往西亚。他依照亚历山大模式在巴勒斯坦等地建立多所教理学校，将亚历山大学派的思想学说传播到了东方。

科普特教会

基督教在埃及流传的过程中，深受埃及传统文化的熏陶，二者相互融合，形成具有埃及特色的基督教及其组织——科普特教会，对基督教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早期基督教在政治思想方面旗帜鲜明，对现实强烈不满，具有战斗气息和反抗精神。基督徒不信奉罗马诸神，不崇拜皇帝，拒服兵役，因此普遍遭到罗马统治者的迫害和镇压。284 年 8 月 29 日，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即位，标志着“殉教者年代”的开始。为悼念戴克里先统治时期以身殉教的科普特教徒，科普特人以戴克里先的登基日为科普特历法的开端。

313 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性。这是基督教历史的转折点。基督教在埃及取得胜利、逐步

取代传统的多神教信仰,基督徒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近百位的科普特主教管理着数百间教堂和修道院。亚历山大城在基督教世界独占鳌头,成为地中海地区的基督教学术中心。亚历山大城主教阿里乌斯独树一帜,反对正统的三位一体说,否认基督的神性;反对教会上层享受特权,聚敛钱财。阿里乌斯的主张反映了基督教下层的思想,但却遭到罗马帝国的猛烈反对。323 年,君士坦丁在尼西亚主持召开宗教会议,制定"尼西亚信条",树立三位一体为正统,斥责阿里乌斯派,革除阿里乌斯教籍,并予以放逐。

451 年,基督教正统派与科普特派在卡尔西顿全基督教大会上公开决裂,科普特教会被拜占庭教会宣布为异端。科普特教会坚决反对卡尔西顿会议制定的关于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并存的教义,认为两性已完全结合为一性,即"基督一性论"。此后,科普特教会宣布"一性论"为其正统教义,宗教礼仪使用科普特语,故称"科普特教"。科普特语是用 24 个希腊字母和 7 个迪莫特基文字母拼写的古埃及语,大约形成于 3 世纪,其中吸收了不少希腊词汇。科普特语是古埃及语言文化延续和发展到今天的最后保留形式。

536 年,科普特教会与拜占庭教会分道扬镳,完全独立。科普特教会推选出常驻亚历山大城的教皇,负责管理教会事务,其权势可与世俗统治者抗衡。

在以后的两个世纪里,科普特教会恪守古老信条,过着具有埃及特色的宗教节日。它们的主要有圣诞节(1 月 7 日)、主显节(1 月 19 日)、耶稣全家到埃及节(6 月 1 日)、棕枝主日(复活节前的星期日)、复活节、耶稣升天节、圣灵降临节等。

修 道 院

修道院制度起源于埃及，到了4世纪时已相当普遍，并由科普特修士发展完善。

起初，一些科普特人遁入沙漠，与世隔绝，终生过着虔诚与苦修的生活，以自我折磨的极端行为来表示其宗教狂热。据记载，隐居于尼罗河与红海间旷野之中的安东尼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位修士。他苦行禁欲，甚少梳洗，以拯救灵魂脱离罪孽。安东尼享寿105岁，去世前(356年)，其周围已聚集了大批追随者。在宁静的气氛中，他们聆听着圣安东尼的谆谆教诲。他们遵循圣安东尼的修行准则，在圣安东尼隐居的洞穴的山下，建造了圣安东尼修道院，此乃世界上最早的修道院之一。

与此同时，在埃及西沙漠的奈特伦洼地(又称西特)，也涌现出了一群世界上最古老的修道院之一，其中引人注目的有圣巴拉摩斯修道院、圣比骚修道院和圣马可修道院等，成为早期基督教在埃及发展的有力见证。一位4世纪晚期的朝圣者是这样描写该地的：它"位于一片广袤的沙漠中，道路几不可见，没有路标，仅仅凭借星光指路和照明。几乎找不到水。但这里产生虔诚完美的人，因为在这样恐怖的地方，只有那些朴实无华的、有高度自制力的人才能生存"。因此，与其说早期的基督徒进入沙漠是为了避免罗马人的迫害，毋宁说是逃避尼罗河的物质享受，以拯救其灵魂。

后来，基督教教会提倡脱尘出世的隐修生活，仿效安东尼的信徒也越来越多，并普及到罗马帝国其他省份，盛行不已。当然，这种极端主义行为并不代表当时绝大多数基督徒，但在基督教史上，由此而产生的修道院却是埃及人的最大贡献，它完善了基督教的

组织机构,促进了基督教文明的发展。

位于尼罗河西岸不远处的升天修道院是一座享有盛名的科普特修道院。传说,这里是天使升天的最南端。据《马太福音》记载,约瑟夫在这里聆听天使的声音:"起来,带上孩子和他的母亲,去以色列地。"在天使逗留过的山洞上方,还有一座至少是 8 世纪的圣母玛利亚教堂。

440 年,圣塞努特在尼罗河西岸可耕地区边缘,背依沙漠高原之处,一个曾拥有 2000 名隐士的修道院的废墟上,建立了一座防御性的白色修道院教堂。大块的白色石灰石围墙向里倾斜,饰以白色大理石的凹弧饰飞檐,里面有一间巨大的长方形教堂,体现出科普特建筑风格与法老时代神庙建筑的完美结合。

在西奈半岛上,除圣安东尼修道院外,还有著名的圣·凯瑟琳修道院。这是一座具有典型的拜占庭建筑艺术风格的修道院。它位于西奈山下,依山势而建,雄伟壮丽,像一座坚不可摧的中世纪城堡,被誉为沙漠中的"瑰宝"。据说,337 年,君士坦丁大帝的母后圣海伦娜到摩西山朝圣时,亲自勘选圣址建主显圣容教堂。后来,扩建成玛利亚修道院,属于希腊东正教修道院,僧侣大都来自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6 世纪后,为纪念戴克里先时代殉难的女教徒凯瑟琳,改称圣·凯瑟琳修道院。修道院的主体建筑是主显圣容教堂,供奉着耶稣、玛利亚、约翰和圣凯瑟琳的圣像(现为 17 世纪克里特风格的作品)。其中右侧圣像屏帷的后面是圣骨箱,据说装有圣凯瑟琳的骸骨和左手。教堂的半圆形凹室里,有 6 世纪主显圣容像的镶嵌工艺品,是拜占庭艺术中的精品。取材于《马太福音》(17:1~3),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凹室上方窗户两侧

是摩西在燃烧的荆棘前，脱去鞋袜，接受“十诫”的情景。千百年来，西奈几经战火，而修道院却完好无损，这是得益于至今还珍藏在修道院的陈列室的穆罕默德的手谕。据说，625 年，修道院曾派专使去麦加，请求先知穆罕默德的庇护，穆罕默德特书此手谕。

罗马君主制时期的埃及

经历了“公元 3 世纪危机”之后，罗马帝国进入君主制时期。284 年，戴克里先称帝，废除元首制，建立君主制。为了加强对埃及的控制，他把埃及划分成三个省。原埃及最高长官只管辖最北面的省份，权力比其他两位省长稍大，后者要向他汇报。实行军政分离制，剥夺最高长官的军权，设督军掌管军队。地方行政的变化十分突出，废除了传统的地方行政单位诺姆，取而代之的是自治市区，由自治城市连同其周围的农村组成，归市政官即新设的税收强征人管理。自治市区之下又分出若干个行政区，称作帕古斯，由监察官治理。

在语言文化方面，戴克里先极力在埃及推行拉丁语以取代希腊语的主导地位，但以失败告终。语言混乱之际，科普特语的影响不断扩大，地位越来越高，最终促使科普特教会彻底放弃希腊语，只使用科普特语。

君士坦丁时期，随着基督教合法地位的取得，罗马帝国教会在埃及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埃及隶属于罗马东部主教管区，其形势和地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埃及的科普特教派与罗马正统派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甚至导致流血冲突。337 年君士坦丁一死，罗马帝国遂陷入危机，趋于瓦解。

萨瓦里石柱

萨瓦里石柱是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君主专制统治的象征，同时也是亚历山大城历史的真实写照。

"萨瓦里"阿拉伯语意为"桅杆"。亚历山大城有一座由400根石柱构成的柱廊，当年，阿拉伯人进占该城时，远远望见这个中间高两头低的庞然大物，形象地称之为帆船，而中间那根最高的石柱正好是桅杆，因而得名。

相传，萨瓦里石柱所在的位置是兴建亚历山大城的起点。托勒密三世曾在此建造了希腊人和埃及人共同信仰的塞拉比斯神神庙。神庙呈长方形，门口匍伏着两头狮身人面像，四周是巨大石柱构成的柱廊，神龛上供奉着精心雕刻的塞拉比斯神像，并附设一图书馆。这座雄伟壮观的神庙迅即成为全城的宗教与文化中心，名扬地中海世界。

罗马皇帝图拉真时代(98～117)，庙宇被犹太起义者摧毁，后重建于哈德良皇帝当政时(117～138)。戴克里先统治时期(284～305)，驻守亚历山大城的罗马大将艾赫里叛乱。戴克里先远征亚历山大城，围攻八个月，平息了叛乱。战后，城内一片狼藉，饿殍遍野，瘟疫流行。戴克里先遂发放粮食，赈济灾民，安抚人心。为了表达对戴克里先的感激和爱戴之情，297年，埃及执政长官、罗马人波思士莫斯在塞拉比斯神神庙的广场上竖立萨瓦里石柱。至今，柱基西侧的铭文仍清晰可见："为战无不胜的亚历山大城监护神、公正的戴克里先皇帝，波思士莫斯谨立此柱。"

石柱由来自阿斯旺的整块红色花岗岩雕凿而成，高26.85米，重约500吨。柱身大致呈圆柱形，下部直径2.7米，上部2.3米。

柱顶为古希腊科林斯式柱头,饰以爵床花图案。以如此高大挺立的石柱来为戴克里先歌功颂德,也许是受了方尖碑的影响,充分说明古埃及文明在罗马统治时代的价值。至少,竖立这跟摩天巨柱时所采用的方法与方尖碑如出一辙。

4世纪,庙宇遭基督教徒的蹂躏,衰败不堪。因此,当阿拉伯人进城时,最引人注目、印象至深的莫过于"桅杆",它鹤立鸡群,气宇轩昂。

12世纪时,历史学家提及柱顶呈穹形,当时十字军见此形状,误以为这是用来存放古罗马统帅庞培的骨灰罐的石柱,所以称之为"庞培柱",并沿用至今。1167年,为了抵御欧洲十字军从海上入侵,萨拉丁下令将萨瓦里石柱周围的石柱及残垣断壁抛入大海,加强海防。最后,就剩下萨瓦里石柱了,孤零零地矗立着,忠实地守卫着家园。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如今,萨瓦里石柱仍傲然屹立于地中海之滨,高耸入云,成为亚历山大城不屈的象征及其标志。

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埃及

395年,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埃及进入拜占庭统治时期,埃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应发生一些变化。到了6世纪,监督官治下的帕古斯已经消失,农村地区的财政大权由帕加克控制,他们向皇帝负责。查士丁尼统治时期,为了恢复罗马帝国昔日的辉煌,他不断加强对埃及的统治。539年,查士丁尼颁布第13号法令,废除戴克里先的行政区划,将埃及划分成平等的4个省,分别由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督军掌管。

经历了罗马帝国后期的社会动荡和拜占庭帝国的专制统治,

埃及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土地兼并现象严重,私有土地占据优势。据4世纪中叶的赫尔摩波里斯的注册簿关于土地面积的记载:2万多阿鲁拉的土地中,私有地大致占1.7万阿鲁拉,公有地约1 450阿鲁拉。在土地私有化的过程中,导致小土地所有者破产。破产农民被迫承租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逐渐沦为依附者。未破产者虽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但为了逃避罗马统治者的苛捐杂税、各种繁重的徭役和税吏的欺凌与盘剥等,纷纷投靠大土地所有者,将土地转给大地主并为其佃耕和服役,以换取大土地所有者的庇护。庇护制流行后,享有特权的教俗大土地所有者的势力日益强大,逐渐控制了埃及的政治经济生活,独霸一方。

6世纪末,国际局势风云突变,拜占庭帝国在内忧外患中挣扎,苟延残喘。拜占庭在埃及的统治亦是风雨飘摇。连绵不断的埃及人民大起义,特别是阿萨利亚领导的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拜占庭帝国在埃及的统治。埃及陷于混乱状态,统治者焦头烂额,疲于应付。616年,波斯军队乘虚而入,攻下埃及。经过几年的对峙和争夺,629年,拜占庭皇帝小赫拉克利乌斯收复埃及。这不过是落日余晖而已,朝气蓬勃的阿拉伯人正在崛起,伊斯兰时代即将来临。

第四章　古典伊斯兰时代的埃及

一、阿拉伯人的征服和统治

阿慕尔远征埃及

埃及是中东地区最大的“粮仓”之一，埃及的粮食足以缓解阿拉伯半岛的饥荒，同时，还与阿拉伯半岛有着传统的贸易往来，是阿拉伯人梦寐以求的“福地”。639年，阿拉伯大将阿慕尔·伊本·阿斯进军埃及，揭开了阿拉伯人征服埃及的序幕。

阿慕尔出身于古莱西部落倭马亚家族，他足智多谋，骁勇善战，早年外出经商曾多次到过埃及，深谙尼罗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早在638年，欧默尔哈里发巡视耶路撒冷时，阿慕尔就曾请求哈里发允许他率军进攻埃及。因叙利亚战争如火如荼，拜占庭的战舰不断从亚历山大港驶出，袭击叙利亚西部沿海地带，对穆斯林构成严重的威胁。为了从后方打击敌人，利用埃及现成的港湾和海军基地，建立一支阿拉伯人的海军舰队，阿慕尔试图说服哈里发，开辟埃及战场。但由于叙利亚战事紧迫，欧默尔只把进攻埃及看作是叙利亚战争的延伸。

639年，穆阿威叶出任叙利亚总督，阿慕尔不愿委曲求全，擅

自带领3 500余名骑兵远征埃及。640年1月,阿慕尔首战告捷,攻克埃及东部门户菲尔马仪(塞得港附近)。2月,夺取尼罗河东岸重镇比勒贝斯。随后,绕过有拜占庭重兵把守的巴比伦堡(即孟斐斯),进入法尤姆地区,伺机攻击拜占庭守军。不久,先知穆罕默德十大圣门弟子之一的祖拜尔·阿沃姆,奉欧默尔之命,率领12 000余人进军埃及,直逼巴比伦堡。阿慕尔率军返回尼罗河东岸,与祖拜尔会合,围攻巴比伦堡。双方僵持数月,遂遣使议和。被困在城内的埃及总督居鲁士接受交纳贡赋的议和条件,欲弃城投降。但是,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拒不批准,并以通敌的罪名放逐居鲁士。4月9日,阿慕尔下令发起最后的攻势,与拜占庭守军打了最关键的一场胜仗。阿慕尔率军乘胜追击,势如破竹,横扫三角洲地区,屯兵亚历山大城下。

埃及首府亚历山大城是仅次于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大都市,是帝国最重要海军基地之一。据说,有5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大军驻守。相形之下,阿拉伯军队处于劣势,因而久攻不克。直到希拉克略皇帝死后,君士坦斯二世重新启用居鲁士,才出现转机。居鲁士官复原位,却无心抗战,与641年11月在巴比伦堡与阿慕尔签订和约,向哈里发称臣纳贡,将埃及拱手让给阿拉伯人。642年9月,拜占庭皇帝君士坦斯二世批准和约,拜占庭军队从海上撤离埃及,从而结束对埃及的统治。

亚历山大城是阿拉伯人征服的最大城市,进驻该城后,他们为眼前的一切所震撼,无不为之倾倒。阿慕尔在向哈里发欧默尔报捷时声称:“此城内的豪富巨贾正是屈指难数,城内环境之优美,亦难以笔墨形容,我很荣幸地告诉你,城内有4 000座金碧辉煌的宫殿,400座公共澡堂和400座娱乐场所。”

四大哈里发时期的埃及

阿拉伯人统治埃及始于第二任哈里发欧默尔时期。欧默尔被誉为继先知穆罕默德之后伊斯兰国家的第二位创造者，他极力主张阿拉伯人应与伊斯兰教合而为一，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是哈里发国家的主要社会基础。作为征服者和统治着，阿拉伯穆斯林凌驾于被征服地区的土著人口之上，构成相对封闭的社会集团，他们对异族异教徒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在此前提下，埃及落人了阿拉伯人的神权统治之下。

哈里发国家在埃及设立行省，包括上下埃及，基本上延续拜占庭帝国时期的行政管理制度。阿慕尔担任哈里发国家的首任埃及总督。作为军事统帅，阿慕尔在长期的征战过程中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势力和政治威望。为了牵制阿慕尔，欧默尔委派阿卜杜拉·赛耳德为阿弥勒，掌管埃及的税收。其实，严格意义上的国家税收体系尚未形成。埃及向麦地那缴纳的岁人，只是根据《古兰经》规定而属于哈里发的份额，相当于全部战利品的1/5；其余收人皆由总督自行处理，分配给屯驻埃及的阿拉伯战士。阿慕尔大为不满，愤然弃职，向西挺进。

645年底，亚美尼亚血统的拜占庭将领曼努埃尔率战舰300艘攻占亚历山大和比勒贝斯诸城，形势危急。646年，阿慕尔再度出任埃及总督，驱逐拜占庭军队，平定埃及各地的叛乱，并且将亚历山大城坚固的城墙夷为平地。他在以前行军途中曾搭过帐篷的地方设立新总督府和清真寺，命名为弗斯塔特，阿拉伯语帐篷之意，这便是开罗的雏形。在以后的两个世纪里，弗斯塔特的地位直线上升，信仰伊斯兰教的埃及总督都以此为中心，代表大马士革和

巴格达的哈里发统治埃及。

阿慕尔在埃及的政绩颇可称道。鉴于驻守埃及的阿拉伯士兵大都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诸部落，663年，阿慕尔把北方阿拉伯士兵及其眷属12 000余众移入埃及，以平衡阿拉伯各股势力的冲突，并使埃及的阿拉伯人口上升到近4万。他严明军纪，禁止抢掠，善待埃及人。因为在征服埃及的过程中，埃及的基督徒正遭受拜占庭教会的迫害，他们纷纷向穆斯林伸出了援助之手，协助穆斯林攻城掠地。阿慕尔知恩图报，对于基督徒和犹太人等有经典之人——"迪米人"，采取保护政策，确保其信仰自由，免服兵役，但基督徒必须交纳人丁税、从业的土地税或商业税等。此外，阿慕尔还注重发展经济贸易，重新开凿尼罗河与红海间长达80千米的运河，直接连通埃及和阿拉伯半岛。该运河一直通航到723年，因遭流沙阻塞而废弃。

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在位期间(644～656)，加强对埃及，尤其是财政岁入的控制。奥斯曼任人唯亲，任命胞弟阿卜杜拉·阿比·萨尔赫为埃及总督，掌管尼罗河流域的军政大权。埃及上交的岁入显著增加。652年，阿卜杜拉把拜占庭舰队彻底赶出亚历山大港，并创建了一支阿拉伯海军。655年，埃及舰队与穆阿威叶的叙利亚海军组成阿拉伯联合舰队，在亚历山大港附近海域大战拜占庭海军，大获全胜，并以著名的"桅杆之役"载入史册。

656年，奥斯曼死后，埃及的穆斯林极力拥戴阿里出任第四任哈里发。阿里在麦地那即位时，麾下只有来自埃及的500余名战士。658年，备受穆阿威叶青睐的阿慕尔·阿斯击败阿里的支持者，攻占尼罗河流域，重新出任埃及总督，权倾一时。

倭马亚王朝统治埃及

661年,穆阿威叶出任哈里发,定都大马士革,开始了倭马亚王朝的统治。阿拉伯帝国的政治中心从希贾兹移至叙利亚。穆阿威叶在治理叙利亚和领导圣战的同时,将其他区域划分为9个行省,由大权在握的行省总督(埃米尔)治理,并与他们保持近乎合作的关系,避免诉诸武力。由于埃及行省靠近叙利亚,是叙利亚的天然屏障,故埃及的地位和作用尤为突出。埃及的穆斯林大多是倭马亚王朝的追随者,宣誓拥戴大马士革的新哈里发。倭马亚王朝的开国元勋、肱股重臣阿慕尔·阿斯继续担任埃及总督,直到663年去世。继阿慕尔·阿斯之后,麦斯拉玛·穆哈拉德于667~682年间出任埃及总督,他是穆阿威叶在位期间惟一一位官居行省总督要职的"辅士"。倭马亚时代,埃及先后经历了22任埃米尔的统治。

马立克(685~705)是继穆阿威叶之后的又一位强有力的哈里发,被誉为"列王之王"。穆斯林内战停息后,马立克遂着手调整和加强帝国内部的管理,维护帝国的统一。他改设5个行省,埃及乃其中之一。行省的权力主要包括3个方面:军政、财税和司法,在多数情况下,实行三权分立制,分别由埃米尔、阿米勒和卡迪掌管。倭马亚王朝在埃及建立了相当稳固的统治,埃及行省实际控制了阿拉伯帝国的西半壁河山,易弗里基叶行省长期隶属于埃及总督。行省的各级官吏大都出自倭马亚家族以及哈里发的亲信。

此外,马立克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也颇有建树。695年,设立中央造币局,铸造发行统一货币——金币第纳尔和银币第尔汗。货币改革大大地促进了阿拉伯统一市场的形成,从而使埃及的财富

源源不断地流入广阔的阿拉伯市场。马立克规定阿拉伯语是帝国惟一通用的语言，有力地推动了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化进程。

714 年以后，阿拉伯语在埃及取代了希腊语，成为惟一的官方语言。为了巩固阿拉伯伊斯兰政权，倭马亚王朝在科普特人中传播伊斯兰教，推行新纳税政策，鼓励他们皈以伊斯兰教。哈里发欧默尔二世(717～720)宣布：不论是阿拉伯穆斯林还是非阿拉伯穆斯林一律免除所有赋税。另一方面，对科普特人采取没收土地或课以重税等手段加以排挤、打击，迫使其改宗。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科普特人接受了伊斯兰教。

在帝国经济的恢复发展中，埃及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帝国经济的生力军。除了发展传统的农业经济外，随着交往的扩大埃及农业充满了新的活力。8 世纪初，甘蔗种植和制糖技术从西亚传人埃及。尼罗河谷的东部地区成为甘蔗种植中心，并建起了许多制糖厂，制糖业开始成为埃及的支柱产业之一。

阿拔斯王朝初期对埃及的统治

750 年，阿拔斯王朝建立，阿拉伯帝国的政治重心逐渐东移。762 年，新都巴格达建成，伊拉克则取代叙利亚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地位。由于埃及远离巴格达，其政治地位一落千丈。

阿拔斯王朝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古代西亚的政治传统，巴格达气势恢宏、金碧辉煌的绿顶圆宫象征着哈里发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阿布·阿拔斯在位期间，帝国划分为 12 个行省，埃及与马格里布合为一省。后来，为了确保哈里发的集权统治，行政区划逐渐缩小，行省数量增加一倍，并按地域将 24 个行省划分为东部省区和西部省区。埃及与马格里布分离。从巴格达向

西延伸，直通埃及弗斯塔特的驿道是哈里发控制埃及的有效途径，而且，在很多时候西部省区的最高长官则常驻埃及，代表哈里发监视西部各行省，并对拜占庭开展圣战。总督以及负责财政税收的阿米勒等要职均由哈里发直接任命。为了强化对埃及的控制，削弱埃及的离心势力，哈里发们频繁地更换埃及总督。阿拔斯王朝的前 90 年，先后任免了 54 位埃及总督，仅哈里发哈伦一人就任免过 22 位埃及总督。

在帝国经济生活中，埃及占有特殊的地位，是上缴岁入数额最大的省份之一。阿拔斯王朝初期，仅土地税就增加了一倍多。穆斯林征服初期，每加里布（相当于 1 592 平方米）的土地税仅为 1 第纳尔，而阿拔斯时代普遍超过 2 第纳尔，并不断上涨。据 868 年的纸草文书记载，每加里布的土地税竟高达 4 第纳尔。艾哈迈德·穆达比尔于 861 年出任埃及阿米勒后，横征暴敛，恢复从前的各种杂税，更是雪上加霜。这种竭泽而渔的政策使埃及财富外流，导致经济严重衰退，埃及人对此强烈不满。

9 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的集权政治日渐衰微，哈里发大权旁落，难以继续委派税吏直接从埃及征税，于是改行包税制，包税契约的期限是 4 年。埃及趁机脱离阿拔斯王朝的控制，建立了图伦王朝。

二、半独立的埃及

图 伦 王 朝

从图伦王朝（869～905）到伊赫什德王朝（935～969）的一个世

纪，是埃及从阿拉伯帝国的行省向独立的国家转变的过渡时期，处于半独立状态。

图伦王朝创始人艾哈迈德·伊本·图伦是祖居中亚费尔干纳的突厥人，父亲原为布哈拉省长的奴隶，817 年，被当作礼物献给哈里发马蒙，因才华出众而升任禁卫军统领。伊本·图伦生长于巴格达，很早就步入仕途。868 年，他以省长助理的身份赴埃及，不久升任省长。翌年，他将埃及税收长官艾哈迈德·穆达比尔逐往叙利亚，罢免驿政长官舒凯尔，并迫使属下宣誓效忠图伦家族，俨然成为埃及的君主。

伊本·图伦遵奉正统的伊斯兰教，承认巴格达哈里发的宗主权，仍采用埃米尔的称号。利用阿拔斯王朝的混乱局面，伊本·图伦不断壮大其实力。他招募 4 万黑人、突厥 2.4 万少年和 7000 雇佣兵，组成一只强大的禁卫军。877 年，伊本·图伦率军攻占大马士革和安条克，吞并叙利亚，进而向拜占庭发动圣战，声威大震。图伦王朝盛极一时，东接伊拉克，西至利比亚，北起小亚细亚，南抵努比亚，横跨亚非两大洲。

884 年，伊本·图伦死后，其子胡马拉维即位。哈里发穆瓦法克虽然多次出兵征讨，都没有降服图伦家族。886 年，双方订立和约：阿拔斯王朝承认图伦家族领有埃及和叙利亚的权力，期限为 30 年；图伦家族每年向阿拔斯王朝纳贡 30 万第纳尔。982 年，哈里发穆尔台迪德即位后，继续履行上述合约，并与图伦家族联姻，娶了胡马拉维女儿盖特尔·奈达。896 年，胡马拉维死后，图伦王朝衰微。899 年，阿拔斯王朝将埃及应缴纳的贡赋量增至 45 万第纳尔。905 年，穆罕默德·伊本·苏莱曼率领哈里发军队攻入弗斯塔特，捣毁新都格塔伊阿，图伦家族成员悉遭俘虏，被押往巴格达，

哈里发恢复了对埃及的统治。

图伦王朝统治的37年,是埃及历史上的复兴时代。伊本·图伦及其继承者较为注重经济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强国富民的措施。兴修水利,复兴农业,改进税制,增加收入,稳定市场,促使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出现短暂的繁荣局面。

在国库充裕基础上,伊本·图伦大兴土木,扩大弗斯塔特的建设规模,修建宫殿、清真寺、医院和浴室等公共设施。其中影响深远是,他在873年创建了埃及第一家公立医院;耗资12万第纳尔建造的伊本·图伦清真寺。伊本·图伦的邀请沙斐仪的弟子赖比耳·本·苏莱曼长期在伊本·图伦清真寺讲经说道,传播沙斐仪派学说。赖比耳享寿96岁,是各地圣训学家崇拜的偶像,向他求学者甚众,从而使伊本·图伦清真寺名声大噪,成为当时一场声势浩大的宗教学术活动的"动力源泉"。此外,伊本·图伦还借鉴伊拉克的建筑风格,在弗斯塔特郊外营建新都格塔伊阿,并于附近山崖上建筑宫堡,可俯瞰整个市区。

胡马纳维更是热衷于宫殿建筑,追求奢华生活,其宫殿的豪华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他用金箔贴成金厅,并饰以他本人及其妻子歌女们的浮雕像。奢侈之风日盛,导致国库空虚,民怨沸腾。当财富告罄时,图伦王朝的军事实力也消失殆尽。

伊赫什德王朝

905年,图伦王朝灭亡后,埃及重新归属阿拔斯王朝,外籍将领相继出任埃及总督。军人当政,兵连祸结,内忧外患,层出不穷。波斯血统的伊拉克人穆扎拉伊家族垄断了埃及和叙利亚的税收,条件是每年向哈里发缴纳100万第纳尔,并负担该地区的军费开

支。穆扎拉伊家族在埃及颇具权势，拥有私人武装，行使广泛的、超经济的统治，号令一方。哈里发亟需一位强有力的人物去收拾残局。祖籍中亚费尔干纳的突厥将领穆罕默德·图埃只，智勇双全，深受哈里发的赏识。935年，穆罕默德·图埃只出任埃及总督，全力打击穆扎拉伊家族的势力，剥夺其包税权，声名鹊起。939年，哈里发拉迪将古代波斯王侯的最高称号"伊赫什德"加封给穆罕默德·图埃只，伊赫什德王朝由此得名。穆罕默德·图埃只及其后裔在承认巴格达哈里发的宗主权的前提下，偏安一隅，成为埃及的实际统治者。

伊赫什德王朝时期，正值什叶派势力在伊斯兰世界空前发展的阶段，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激烈对抗，成了伊赫什德王朝盛极一时的契机。为了进一步巩固对埃及的统治，强化对内对外政策，穆罕默德·图埃只招募突厥人和苏丹人组建新军。这支队伍成为他捍卫正统的伊斯兰教、行使权力和扩大疆土的有力支柱。他扼据尼罗河流域，吞并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南部，并将希贾兹的两座圣城置于其保护之下，并有效地抵御来自叙利亚北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哈姆丹王朝和马格里布的法蒂玛王朝——两个什叶派政权的进攻，成为捍卫逊尼派及其传统的卫士。穆罕默德·图埃只显赫一时，就连正统穆斯林的宗教领袖巴格达哈里发也求助于他。944年，哈里发穆台基正式将埃及赐封给穆罕默德·图埃只，期限为30年。穆罕默德·图埃只甚至还劝说穆台基离开巴格达，迁都弗斯塔特。

然而，伊赫什德王朝也是昙花一现，在血统和传统上均未能落地生根。946年，穆罕默德·图埃只死后，形势急转直下。两位年幼无知的儿子乌努祖尔和阿里相继即位，由埃塞俄比亚籍太监阿

布·米斯克·卡夫尔辅政。伊赫什德王朝大权旁落。阿里死后，卡夫尔亲政，伊赫什德王朝名存实亡。卡夫尔死后，法蒂玛王朝一代名将昭海尔占领埃及，埃及并入法蒂玛王朝。

三、法蒂玛王朝

法蒂玛王朝的建立

法蒂玛王朝的统治是埃及历史上的转折点，埃及不仅摆脱了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赢得了独立，而且在叙利亚和阿拉伯奉行扩张政策，为后来的艾尤布王朝和马木鲁克王朝时期埃及的繁荣兴盛奠定了基础。

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教派对立和什叶派的分支易司马仪派在北非的宣传是法蒂玛王朝兴起的重要条件。易司马仪派传教师艾布·阿卜杜拉·侯赛因堪称是法蒂玛王朝的创始人，为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893年，艾布·阿卜杜拉·侯赛因离开故乡也门，前往马格里布传教。他向柏柏尔人宣传易司马仪派教义，宣称救世主将提早来到，摧毁现存的秩序，建立公正的社会。他的宣传在柏柏尔人中颇有影响，生活在卡比勒山区的库塔麦部落成为其忠实信徒。在北非站稳脚跟后，艾布·阿卜杜拉·侯赛因便写信邀请易司马仪派的首领赛义德·侯赛因。不久，赛义德·侯赛因离开位于叙利亚北部萨拉米亚的大本营，乔装商人前往易弗里基叶，但途中被阿格拉布王朝的埃米尔捕获入狱。

908年，追随易司马仪派的柏柏尔人在艾布·阿卜杜拉·侯赛

因的领导下发动起义。起义者首先攻占塔赫尔特，推翻哈瓦立及派政权鲁斯塔姆王朝，继而攻克凯鲁万，消灭正统伊斯兰教政权阿格拉布王朝。909年，获救的赛义德·侯赛因在凯鲁万附近的拉盖达被起义者拥立为哈里发(909~934)，尊号为"信士们的长官马赫迪"，定都拉盖尔。赛义德·侯赛因自许为先知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和哈里发阿里的后代，是全体穆斯林惟一合法的宗教领袖。新政权被称作法蒂玛王朝，因崇尚绿色，中国史书称之为"绿衣大食"。920年，法蒂玛王朝迁都马赫迪亚。

法蒂玛王朝的建立是什叶派的巨大胜利。法蒂玛王朝遵奉什叶派伊斯兰教，公开否认属于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巴格达哈里发的权力和地位，与阿拔斯王朝分庭抗礼。法蒂玛王朝与图伦王朝和伊赫什德王朝有所不同，它把宗教狂热与军事力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扩张势力，其宗旨是通过武力讨伐和神学宣传的方式推翻阿拔斯王朝，征服整个伊斯兰世界。由于法蒂玛王朝的矛头指向巴格达，埃及则成为其向东进攻的首要目标。914年，库塔麦部落首领哈巴萨率军东征埃及，但被穆尼斯率领的阿拔斯王朝的守军击退。919年，赛义德·侯赛因之子阿布·嘎西姆再次率军东征，亦被穆尼斯击溃。935年后，伊赫什德王朝成了阿拔斯王朝的西部屏障，法蒂玛王朝被迫终止了对埃及的进攻，转而向西侵略，占领了马格里布、西西里岛等地。

伊赫什德王朝中道衰落，为法蒂玛王朝的东扩提供契机。969年，法蒂玛王朝大将，基督徒出身的西西里人昭海尔率领十万大军东征埃及，一举成功，实现了多年的夙愿。伊赫什德王朝投降，所辖领土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西部尽属法蒂玛王朝。从此，埃及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法蒂玛王朝统治埃及

970年,昭海尔大军在弗斯塔特以北5千米处安营扎寨。柏柏尔人、阿拉伯人、突厥人、希腊人等纷至沓来,安家落户,遂扩展成曼苏尔城。973年,哈里发穆仪兹迁都曼苏尔城,并更名为嘎希赖,阿拉伯语"常胜"之意,威尼斯人误称为"开罗"。随着法蒂玛王朝统治中心的东移,开罗蒸蒸日上,繁荣昌盛,经久不衰。

为了宣传易司马仪派宗教学说,972年,海昭尔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建造爱资哈尔清真寺。这座新清真寺逐渐取代阿慕尔清真寺和伊本·图伦清真寺的地位,成为埃及伊斯兰教神学中心。爱资哈尔清真寺由当初单纯祈祷的场所,逐渐扩展为讲授教义的学堂,进而演变成世界上最早的大学。马木鲁克王朝历史学家麦格里齐在其名著《埃及志》里写道:"在爱资哈尔清真寺首次教授的教法是什叶派的教法。"直到990年,哈基木清真寺建成前,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每逢聚礼日都要在该寺发表演讲。但是,大多数埃及穆斯林并未接受易司马仪派教义,仍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

法蒂玛王朝的体制与阿拔斯王朝大致相同。哈里发既是穆斯林的宗教领袖,又拥有广泛的世俗权力。国家官吏除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外,雇佣了大量的科普特人和犹太人担任中下级官职。法蒂玛王朝的军队最初从柏柏尔人中招募,但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柏柏尔人的重要性逐渐丧失,突厥人和苏丹人则成为主力军。大部分土地由国家直接控制,国家雇佣农民耕种,或是出租给贵族经营,租期30年,缴纳实物地租。农民大都是科普特人,被固着在土地上,不得随意迁徙。

第5任哈里发阿齐兹(975~996)时,法蒂玛王朝的势力达到

顶峰，其版图远远超过阿拔斯王朝。每逢聚礼日，哈里发的美名不仅响彻北非各地，而且在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希贾兹等地的上空回荡。然而，雄心勃勃的阿齐兹仍觊觎着阿拔斯王朝巴格达哈里发和后倭马亚王朝科尔多瓦哈里发的职位。他甚至耗资200万第纳尔，在开罗建造了一座宫殿，准备用来安置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家族。但是，阿齐兹贪图享乐，挥霍无度，逐渐力不从心，而他招募突厥人和苏丹黑人雇佣军则后患无穷。

阿齐兹之后的几任哈里发大都软弱无能或是年幼无知，大权旁落。柏柏尔人、突厥人和苏丹人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兵连祸结，时局动荡。离奇的宗教思想，使得形势更加复杂恶化。最典型的是哈里发哈基木(996～1021)，他自命不凡，大搞个人崇拜，将自己奉若神明，声称是获得永生的"活主"。他是一个偏执的宗教狂，放弃了伊斯兰教宽容的美德，无端地迫害基督徒和犹太人，捣毁基督教堂和犹太教会堂，其中包括耶路撒冷著名的圣墓教堂。这种行为给十字军东征提供了口实。他甚至黑白颠倒，禁止店铺白天开业，只能在夜间营业，给社会生活造成极大混乱，民不聊生，国家政权几近瘫痪。马格里布、西西里岛、希贾兹等地先后脱离法蒂玛王朝的统治。

哈里发穆斯坦绥尔(1036～1094)时期，亚美尼亚籍将领白德尔·贾马利出任维齐尔和总埃米尔，统辖军政要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法蒂玛王朝的危机。白德尔·贾马利一度曾出兵东征，讨伐叙利亚和希贾兹，试图收复法蒂玛王朝的失地，但已乏回天之力。1067年，突厥雇佣军发动兵变，侵入王宫，劫走无数财宝和艺术珍品，仅书卷就拉走25驼车。1094年，穆斯坦绥尔一死，法蒂玛王朝急剧衰落，分崩离析。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相继独立，埃及境外的

易司马仪派也拒绝承认法蒂玛哈里发的合法性，断绝与开罗的宗教联系，哈里发徒有虚名。哈非兹(1130～1149)之后，法蒂玛哈里发的权力仅仅居限于宫廷之内。

1153年，十字军东侵占领阿斯克伦后，沿地中海向西进攻埃及。法蒂玛王朝陷于绝境，无力抵御十字军，只好向塞尔柱突厥人的赞吉王朝求援。赞吉王朝据有叙利亚北部和伊拉克北部。1164年，赞吉王朝苏丹努尔丁派库尔德族将领希尔库率军8 000人救援埃及，击退十字军。1169年，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哈迪德任命希尔库为维齐尔，统领军政要务。不久，希尔库身亡，其侄尤素福·伊本·阿尤布，即著名的阿拉伯英雄萨拉丁继任维齐尔。1171年，萨拉丁废除法蒂玛王朝的末代哈里发阿迪德，建立艾尤布王朝。

四、中古时期埃及的兴盛

艾尤布王朝

12世纪中叶以后，伊斯兰世界处于历史上最困窘的时期。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有名无实，自1055年后一直被突厥人控制。西班牙穆斯林群龙无首、支离破碎，在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的打击下，陆续退出安达卢西亚。惟有埃及的艾尤布王朝(1171～1250)一枝独秀，是东西方不可战胜的堡垒，谱写出古典伊斯兰历史上最雄浑壮美的乐章。开罗不仅是埃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还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中心。

萨拉丁苏丹(1174～1193)是艾尤布王朝的缔造者。1174年，赞吉王朝苏丹努尔丁去世，萨拉丁趁机宣布独立。萨拉丁以埃及

为中心，建立逊尼派的统治，承认巴格达哈里发，并恢复为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祈祷的宗教仪式。1175年，萨拉丁请求巴格达哈里发授予他苏丹称号，承认他在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希贾兹和马格里布的合法地位。1185年，萨拉丁攻占摩苏尔，进而控制了两河流域的北部地区。

艾尤布王朝依靠突厥军事贵族，由阿拉伯人等提供辅助军事力量，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常备军。艾尤布王朝将西亚的伊克塔制度引入埃及，从而使分封土地取代支付薪金成为供养军队的主要方式。伊克塔开始于倭马亚王朝初期，是哈里发以服兵役为条件分封给穆斯林的土地，最初仅供受封者本人享用，不得继承和转让，哈里发拥有更换和收回的权力，征税标准由国家规定。伊克塔是国有土地的基本占有形式，但后来随着穆斯林军事贵族势力的增强，伊克塔演化成世袭领地。

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艾尤布王朝与东侵的十字军展开圣战，所向披靡。1187年6月，萨拉丁率领6万穆斯林大军进入巴勒斯坦，在加利利湖西侧的哈丁，一举歼灭耶路撒冷国王库伊率领的2万大军和欧洲十字军主力。10月2日，他攻陷耶路撒冷，乘胜追击，连克地中海东岸多座城市和要塞，至1189年，仅剩安条克等三座城市没有拿下。

萨拉丁的威名震慑欧洲，德、英、法三国遂联合发动了规模最大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沿海城市阿克是双方争夺的焦点。经过长达两年的围攻，1191年，十字军终于攻陷阿克。然而，法王腓力二世打道回府，英王狮心理查无力再战，遂与萨拉丁缔约休战。和约规定，十字军保有从提尔到雅法的沿海地带，内地和耶路撒冷属于萨拉丁的辖区，基督徒享有朝拜耶路撒冷圣地的权利。

萨拉丁不仅是流芳百世的阿拉伯英雄，而且政绩卓著，清廉公正，深得人心，人们把他统治的时期称作“穆斯林团结复兴的时代”。他改善医疗条件，发展交通和工农业生产，并致力于伊斯兰教学术文化事业，保护伊斯兰文明。他招贤纳士，款待学者，奖励对教义学的研究，积极促进伊斯兰教的发展和传播，被誉为“伊斯兰教高等学校的建设者”。他不仅充实和发展爱资哈尔大学，而且在大马士革、希贾兹、耶路撒冷、开罗和亚历山大城等地的清真寺里开办学校。

1193年，萨拉丁死后，盛极一时的艾尤布王朝一落千丈，诸子争斗，国家分裂。1218年，十字军趁机占领贝鲁特和耶路撒冷，并于次年占领尼罗河入海口的重镇达米亚特，对埃及构成直接威胁。1221年，艾尤布王朝组织反击，收复达米亚特，迫使十字军撤离埃及。1242年，萨列哈苏丹即位后，派突厥将领拜伯尔斯率军进入巴勒斯坦，借助花剌子模突厥人的支持，于1244年再次收复耶路撒冷。

1249年，法王路易九世（“圣者”路易）率领第七次十字军进攻埃及。十字军攻占达米亚特，向开罗挺进。正值此时，萨列哈病故，其子突兰沙继任苏丹。突兰沙派军击败十字军，生俘路易九世，并将十字军赶出埃及。但是，突兰沙本人却在宫廷密谋中身亡，其继母，女仆出身的舍哲尔·杜尔自立为王。她的名字被铸在新的钱币上，穆斯林在聚礼中为她祝福。由于阿拔斯哈里发拒不承认妇女掌权，1250年，舍哲尔·杜尔与奴隶出身突厥将领艾伊贝克结婚。马木鲁克禁卫军各头领左右朝政，他们推举艾伊贝克（一说是其儿子）为苏丹，建立了“奴隶”王朝——马木鲁克王朝。

马木鲁克王朝

马木鲁克王朝(1250～1571)是由不同种族和国籍的“奴隶”在埃及建立的军事寡头政权。马木鲁克意为“被拥有者”,通常是指在艾尤布王朝苏丹宫廷和军队里服役的突厥人、库尔德人和蒙古人等,大多来自中亚、波斯和小亚细亚一带。就像罗马和巴格达一样,开罗的奴隶卫兵也摇身一变,成为一国之君。由于马木鲁克王朝缺乏明确的苏丹继承制度,父死子继者屈指可数。禁卫军将领弱肉强食,相互倾轧,轮流坐庄,苏丹更迭频繁。267年间,共有47位苏丹相继执政,平均在位时间不足6年。尽管如此,马木鲁克王朝仍不失为中古埃及的鼎盛时期。伯海里系马木鲁克和布尔吉系马木鲁克的“奴隶”苏丹们,先后统治着从幼发拉底河延伸至昔兰尼加的辽阔区域,威名远扬。

截至1390年,统治埃及的24位苏丹均出自伯海里系马木鲁克。伯海里系马木鲁克起源于艾尤布王朝苏丹萨列哈时期招募的禁卫军,以突厥人和蒙古人为主。因驻守在尼罗河中的劳德岛上而得名,伯海里意思是“河洲”。伯海里系马木鲁克约有4000人,是一个封闭的军事贵族集团,他们出任苏丹,垄断国家的军政要职,享有特权。

马木鲁克王朝建立后,经过了十年的较量,军功卓著的突厥奴隶拜伯尔斯(1260～1277)最终夺取政权。拜伯尔斯文治武功,堪称是马木鲁克王朝真正的奠基人。他恢复哈里发制度,建立严密的统治机构,精心制定一整套行政管理制度,在地方封建权力和中央集权之间实现均衡,以实现长治久安。

拜伯尔斯素以胜利抗击蒙古人和十字军而著称。1260年9

月，即位前夕，在耶路撒冷以北的艾因·扎卢特大战中，拜伯尔斯率军重创蒙古军，打死蒙古统帅却不的花，蒙古军全线崩溃。艾因·扎卢特战役后，拜伯尔斯杀死库图兹苏丹，僭取政权。即位后，他重组陆军和海军，增强军事实力，不仅解除了蒙古人对叙利亚和埃及的威胁，而且接连攻克卡拉克、凯撒里亚、雅法和安条克，大挫十字军的锐气。在其强大攻势下，蒙古人和欧洲人不得不就范，与他缔结一系列和约，从而确保马木鲁克王朝经济文化的发展。一位同时代的基督教编年史家记载说，在承平时，他"严厉、道德高尚，不仅对人民，甚至对信奉基督教的子民也宽大为怀。"

1279年，盖拉温（1279～1290）罢免拜伯尔斯之子，成为马木鲁克王朝又一位强有力的苏丹。他曾于1280年在霍姆斯大败蒙古军，继而战胜十字军，并先后攻克迈尔盖卜和特里波利，因而被誉为"胜利之王"。此外，他还设立翻译局，对普及阿拉伯语和繁荣学术起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他捐资100万第纳尔，在开罗建立的大医院，也足以使他名垂青史。他的儿子艾什赖弗苏丹（1290～1293）继续开展圣战，乘胜追击，战绩辉煌。1291年，接连攻取阿克、提尔、西顿和贝鲁特等重镇，彻底消灭十字军在东方的残余势力，最终收复被十字军占领的全部领土，拯救了穆斯林文明。

马木鲁克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是盖拉温的另一位儿子纳绥尔（1293～1340），他曾三次即位，两度被废。当政期间，社会安靖，经济繁荣。他组织10万劳工，开凿从亚历山大港到尼罗河的运河，修建学校、清真寺和浴室等公共设施，但从他身上几乎找不到先辈们驰骋天下的创业精神。他贪图安逸，生活奢华，挥霍无度。为给儿子设婚宴，他一次就宰杀了2万头牲畜，铺张浪费之极。他耗尽国力，入不敷出，马木鲁克王朝由盛转衰，逐渐倾颓。纳绥尔的继

承人更是一个比一个软弱，最后被塞加西亚人贝尔孤格所取代，从而结束了伯海里系的统治，开始了布尔吉系马木鲁克的统治。

布尔吉系原属伯海里系苏丹盖拉温在位期间招募的禁卫军，大都是来自高加索山以北的塞加西亚人，因驻守着开罗的城堡，故称布尔吉（意为"碉堡"）系马木鲁克。布尔吉系马木鲁克时期，家族世袭制废弛，群雄争霸，混战不已，苏丹的权力范围不断缩小。

贝尔孤格之后的苏丹大都专横跋扈、昏庸无能，他们的统治被看作是马木鲁克王朝最黑暗的时期。腐败统治和战乱造成的人祸，加上瘟疫流行和蝗灾肆虐等天灾，使埃及人口锐减，国力衰微。帖木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相继崛起，威逼埃及。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国际局势的风云突变，马木鲁克王朝趋于瓦解。1498年，绕行好望角新航路的开辟，则敲响了马木鲁克王朝灭亡的丧钟。葡萄牙人进人印度洋，封锁亚丁湾，屡败马木鲁克王朝的海军舰队，途经红海的传统商路急剧衰落。埃及逐渐丧失了在转口贸易中的支配地位，财源枯竭，山穷水尽，最终被奥斯曼帝国消灭。

恢复哈里发制度

众所周知，马木鲁克王朝的苏丹出身低微，为使其政权合法化，亟须获得哈里发的册封。然而，1258年，在蒙古铁蹄的践踏之下，巴格达哈里发已荡然无存。为此，马木鲁克王朝首先需要恢复哈里发制度，扶植一位新哈里发，为伊斯兰世界树立一面旗帜。

按照伊斯兰教法规，哈里发是安拉在大地上的影子、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必须出身于古莱希族。1260年，拜伯尔斯从蒙古大屠杀的幸存者中，找到一位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后裔阿布·嘎西

姆。1261年6月，拜伯尔斯为他在开罗举行登基典礼，尊奉为"信士的哈里发"，取封号"穆斯坦绥尔"，意为"求安拉赐胜利者"。

拜伯尔斯理所应当地得到了新哈里发穆斯坦绥尔的册封，获得统治埃及、叙利亚、两河流域和希贾兹的权力。接着，拜伯尔斯派哈里发率军收复巴格达，结果被蒙古人战败，哈里发阵亡。拜伯尔斯又立另一位后裔阿布·阿巴斯·阿赫默德为哈里发。

拜伯尔斯拥立哈里发的做法在穆斯林世界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因而为后世所效仿。穆斯坦绥尔之后共出现过15位哈里发，均徒有虚名，无权过问政治，主要职责是为新任苏丹举行授权仪式，即承认苏丹的合法性。哈里发珍藏着先知的遗物绿色斗篷和拐杖，身着象征尊严和高贵黑色服饰，是精神权威的象征。在铸造的钱币上和星期五聚礼的讲道中，哈里发和苏丹的名字总是同时出现。

活跃的伊斯兰教派

马木鲁克王朝时期，逊尼派的四大教法学派沙斐仪派（"中间派"）、哈奈斐派（"意见派"）、马立克派（"圣训派"）和罕伯里派均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其中，沙斐仪派在埃及的影响最大，因为该派的创始人穆罕默德·伊德里斯·沙斐仪（767～820）晚年定居弗斯塔特，在阿慕尔清真寺著书立说，死后葬于穆盖塔木山。1265年，拜伯尔斯在开罗建立四大法官制度，任何一派的法官都有权受理诉讼，并按照该派的原则作出司法判决。但是，由于苏丹的独裁专制，四大法官的权力相当有限，难以真正行使其宗教审判权。宗教裁决经常在"公众利益"需要的名义下掺杂有个人意愿和习惯法，伊斯兰教法和刑法未能付诸实施，例如，酒贩子只要纳税就能合法

存在，对通奸者处以石击和诅咒的惩罚也十分罕见。

此外，四大法官还要负责管理孤儿财产、无主财产和宗教基金，监督管理所属清真寺和学校。但是，开罗的官方大学只允许沙斐仪派和哈奈斐派法学家授课。

逊尼派中有少数人参加苏非派，信仰苏非主义。巴格达失陷前后，马格里布地区和伊拉克的一些苏非教徒来到埃及，找到了适合其滋长的土壤。一方面，马木鲁克王朝接连不断的战争和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现实的苦难使人们渴望得到精神解脱，祈求真主安拉赐福。另一方面，统治者自身也鼓励苏非派活动，目的是要人们盲目致志于宗教崇拜，安于现状，听天由命。因此，苏非主义在埃及盛极一时，数以万计的埃及人成为苏非派信徒，并掀起了研究苏非主义的热潮。

埃及的苏非派主要形成了三大教团。艾哈迈德·巴达维(1200～1276)在埃及坦塔城创立了巴达维教团，是苏非派在埃及最大的教团之一。1249年，该教团的数千名信徒曾参加抵抗十字军的战斗，战后创办苏非学校。主张信徒应坚守圣行、忍受苦难、断绝欲望，最终了解和认识真主。由杜苏吉(1255～1296)于亚历山大城创建的教团的特点是在提倡道德修炼和简朴生活的同时，以体察民情、争取和团结贫苦大众为主要活动，该教团曾上书苏丹要求实行社会公正。沙兹里(1193～1258)在突尼斯创建了沙兹里教团后，亲自赴埃及传播教义达14年之久。他认为苏非主义的苦行是要求心灵的绝对纯洁，虔敬热爱真主，寄托真主，这并不意味着要信徒过苦日子，抱残守缺。信徒不得以苦行和拜功为由无所事事，而应以合法的手段谋生，使生活过得更美好。

随着苏非教团活动的发展，开始出现崇拜圣徒、圣墓的现象，

于是,墓地和陵墓清真寺就成了马木鲁克时期的典型建筑。1258年,盖拉温在原法蒂玛王朝的西小宫遗址上建起了墓地,即“死人之城”。1474年,位于该墓地东区的盖贝伊墓竣工,成为开罗最著名的建筑之一。墓室宽阔高大,精美对称的穹顶外部,饰以精巧细腻,花样繁多浮雕,令人叹为观止。

由于马木鲁克王朝对苏非派的大力支持,从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逊尼派转而注重宗教仪式和道德修行,促使伊斯兰教在民间发展成纯宗教的信仰活动。

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

自法蒂玛王朝以来,埃及的社会经济形势持续好转,到马木鲁克王朝时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创造了古典伊斯兰时代的辉煌。因此,威尔·杜兰说:“开罗是印度河以西最富庶的城市。”

独立和统一的大好环境,为埃及水利灌溉农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从萨拉丁到马木鲁克苏丹,都非常重视尼罗河流域水利设施的建设,耕地面积不断扩大。随着阿拉伯人的到来,埃及对外交往的范围和力度迅速加大,水稻、高粱、棉花、蓼蓝、椰枣、柑橘、柠檬、甘蔗等作物传入埃及,使埃及人的生活大为改观。其中,椰枣树的种植最广泛,很快成为埃及人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据麦格里齐记载,蓼蓝在埃及长得很茂盛,每隔百日便可收割一次。

农业的发展,尤其是经济作物的广泛栽培,为手工业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埃及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是纺织业,其中亚麻纺织的规模最大。亚麻纺织业主要分布在亚历山大城、卡塔、穆恩亚、提尼斯、达比克、达米耶塔、法尤姆、巴赫纳萨和阿赫明等地,仅提尼斯就有

5 000台织机。科普特人采用传统工艺纺织的亚麻,技高一筹,有的精细轻薄近乎透明,有的质地厚重可作挂毯。从色泽上看,亚麻织物大致分为白色、彩色和绣金三种。"提尼西"(提尼斯出产)、"达米耶提"(达米耶塔出产)和"达比基"(达比克出产)等著名织物,闻名遐迩,行销伊斯兰世界各地。据麦格里齐记载,埃及生产的亚麻织物往往可与重量相同的白银等值。

玻璃制造业是埃及仅次于纺织业的手工业部门。埃及的玻璃制造业由来已久,亚历山大城、开罗和法尤姆地区是主要的玻璃产地,工艺精湛。

五、奥斯曼帝国的埃及行省

奥斯曼帝国的黑暗统治

1516年,素以严厉刚毅著称的奥斯曼帝国苏丹谢里姆一世从伊斯坦布尔出发,亲自率兵向东进军。8月,装备火器的土耳其军队在阿勒颇以北的达比克草原重创马木鲁克军队,顺利攻克阿勒颇。谢里姆一世在阿勒颇俘获了阿拔斯王朝的末代哈里发穆塔瓦基勒,并取而代之,僭取哈里发称号,成为穆斯林世界的宗教领袖。继之,谢里曼一世挥师南下,一路攻下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等重要城镇,并于1517年,攻陷开罗。马木鲁克王朝的末代苏丹图曼贝伊被俘身亡,埃及沦为奥斯曼帝国的行省,成为帝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通常,奥斯曼帝国对埃及的统治被看作是埃及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经过近3个世纪的残暴统治和掠夺,使富饶的埃及陷人

绝境。在最初的百年间,奥斯曼帝国以绝对优势一统上下埃及。像别的征服者一样,奥斯曼苏丹十分重视对埃及的统治,直接委派其亲信管理埃及。相当于行省总督的帕夏坐镇开罗,征收赋税,并依靠由马木鲁克组成的侍卫队维持治安。帕夏之下是贝伊,即县级军政地方长官,贝伊可由马木鲁克担任。

奥斯曼帝国时期,埃及基本上保留了马木鲁克王朝的土地所有制。名义上,土地归国家所有,但是,大多数直接经营土地的则是包税人,即穆尔塔济姆。包税人既从土耳其官吏和军官中委任,也可从当地阿拉伯伊斯兰教长老谢赫中产生,但马木鲁克居多。包税人免服兵役,以税代役。他们向农民征收实物和货币地租,一部分赋税交付开罗的帕夏,用来支付国家的贡赋;另一部分用于行省开支。这两部分的数额由帕夏制定,剩余部分则落入包税人的腰包。这样,埃及人身受双重盘剥,苦不堪言,因此,他们既反对土耳其人的民族压迫,又痛恨马木鲁克的剥削。

马木鲁克东山再起

17 世纪后,土耳其人在埃及的统治逐渐削弱,马木鲁克复出,再次登上历史舞台。

马木鲁克大致分为贝伊马木鲁克和普通马木鲁克两种。贝伊马木鲁克拥有由普通马木鲁克组成的兵团,其影响力就取决于民团的大小。一般民团有 150 ~ 200 个马木鲁克,个别大民团则逾千人。同时,马木鲁克因包税而发财致富,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政治地位也日益提高。显而易见,包税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权力的转移。贝伊马木鲁克打进了驻扎在埃及的奥斯曼近卫军和行政官吏阶层。到了 18 世纪,他们已占据了开罗贝伊和埃及朝

觐官等这些最有权势的官职。虽然从理论上讲,他们要受开罗帕夏支配,但必要时,他们就会联手废黜帕夏。1711年,马木鲁克粉碎了驻扎在埃及的新军,埃及处于半独立状态,只在名义上承认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1746~1757年,贝伊马木鲁克易卜拉欣当政期间,整编军队,埃及的综合国力有所提高。易卜拉欣死后,马木鲁克之间展开混战,争夺统治权。

1763年,贝伊马木鲁克阿里·卡比尔胜出。阿里贝伊一统上下埃及,征服希贾兹,控制红海贸易,并试图恢复昔日埃及在西亚的版图,而实现这一政治理想的契机则是俄土战争(1768~1774)。土耳其政府因忙于战争,无暇顾及埃及事务。阿里趁机进行了一场反对奥斯曼苏丹的战争,争取埃及独立。据说,阿里贝伊非常关切俄土战争的进展,因为这场战争直接关系着埃及的前途命运。

1768年11月,阿里贝伊中断与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关系,俘虏帕夏,驱逐土耳其官吏,停止纳贡。1770年,在俄国舰队歼灭土耳其海军之后,阿里宣布埃及独立。他自称"埃及和两海苏丹",向奥斯曼帝国开战,挺进西亚。1771年4月,阿里贝伊派大将阿布·扎哈布率领4万埃及大军从开罗出发开赴叙利亚,与盘踞在此的贝都因部落首领谢赫·扎希尔的武装力量会合,共同打击奥斯曼帝国。这样,一支大约6万人的联军挺进大马士革。奥斯曼守军被打得落花流水,帕夏们惊惶失措,纷纷逃离大马士革。阿布·扎哈尔轻而易举地占领大马士革。然而,十天后他却突然撤回开罗,与阿里贝伊展开"隐蔽的斗争"。

为了维护在埃及的统治,阿里决定向俄国寻求军事上的支持。12月2日,阿里派遣雅各布·艾尔玛尼去见驻在佩罗斯岛上的阿历克塞·奥尔洛夫伯爵,表示愿意与俄国结盟,向俄国舰队提供给

养、军队和金钱，以反对奥斯曼帝国。女皇叶卡婕琳娜二世早已认识到埃及的重要性，试图利用阿里牵制土耳其，配合作战。因此，她欣然应允，决定派海军支援阿里。但由于路途遥远，中间环节颇多，待好消息反馈回来时，已是来年的5月，阿里已被其对手阿布·扎哈尔赶出埃及。谢赫·扎希尔向阿里伸出援助之手，热情地接纳了阿里，并保证予以支持，帮助他恢复在埃及的职位。

在俄国分舰队的帮助下，阿里顺利打通了收复埃及的道路。1773年3月，阿里贝伊率领大约6 000人，其中包括扎希尔长子苏来比和女婿卡里姆·阿尤比指挥的扎希尔军队，抵达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第一个要塞萨利希亚。阿布·扎哈布招募了24 000人迎战。激战中，阿里贝伊的联军大败，苏来比阵亡，阿里他本人也不幸受伤被俘，最终在5月8日死于开罗。

俄土战争结束后，奥斯曼政府集中精力平定各地叛乱。1775年5月，苏丹指使阿布·扎哈布出征阿克，消灭扎希尔。当两败俱伤时，奥斯曼帝国坐收渔人之利，重新控制了埃及。

群雄逐鹿，兵荒马乱，民不聊生。1794~1795年，埃及爆发农民起义，城市手工业者、商人以及下层僧侣等纷纷响应。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大的社会变革正在酝酿之中。

六、埃及的古典伊斯兰文化

融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

古典伊斯兰时代，埃及经历了被征服—伊斯兰化—阿拉伯化的发展历程，尽管其难度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慢，但埃及最终还

是融入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

有学者认为，古埃及人与阿拉伯人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前已叙及，埃及与西亚的民族交往与融合，从法老时代起，许多埃及人的血管里就流淌着闪米特人的血液。在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之前，皮肤黝黑的土著埃及人早已消失殆尽，彼此间已相差无几。也许正是由于这种血缘关系，当阿拉伯人攻打亚历山大城时，痛恨拜占庭帝国统治的埃及人向阿拉伯人打开了城门，敞开了心扉。

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后，数以万计的阿拉伯人涌入富庶的尼罗河流域，埃及成为阿拉伯移民最多的地区之一。至750年，仅移民到埃及的阿拉伯盖斯族人就达3 000户。可以说，阿拉伯人的这种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希腊化时代的移民大都居住于大城市，由于种种因素民族融合十分有限。与此相反，阿拉伯人则分散于埃及各地，并开始适应新环境，逐渐演化成一个定居的、有文化的民族。

积极进取、热情豪爽、宽容开通的阿拉伯人非但没有歧视排斥科普特人，而且与之和平相处，从他们身上吸收埃及文化的精髓。因为在阿拉伯人的宗教观念里，科普特人与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基础。希提在《阿拉伯通史》对此有精辟的论述：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阿拉伯人"是第三种一神教的创造者，是另外两种一神教的受益者，是与西方分享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人们，是在整个中世纪时期高举文明火炬的人物"。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真主降世的经典也包括基督教的《圣经》。在《古兰经》中，犹太人、基督徒等被称作"有经典的人"，享有被伊斯兰国家保护的权利，但成年男子（神职人员除外）必须缴纳人丁税。就连以奉行宗教歧视和宗教迫害政策而著称的哈基木，也任命科普特人曼苏尔·

萨顿作维齐尔，聘用科普特人穆盖什尔为御医。因此，梅兹教授在《伊斯兰教的兴起》中说："中古时代，伊斯兰国家与基督教欧洲的区别在于：大批信奉伊斯兰教以外其他宗教的人生活在伊斯兰国家里，但穆斯林在欧洲却无法生存。"

在此情况下，埃及的伊斯兰化似乎进展得比较顺利和平静。然而，与之相随的阿拉伯化却受到相当大的阻力，进程较为缓慢。因为，被征服的民族宁愿在政治上臣服征服者，在宗教上改信伊斯兰教，也不愿放弃本民族的语言。因此，马立克在位期间，推行阿拉伯化政策，曾三次颁布法令，强制推广阿拉伯语。714年后，阿拉伯语成为埃及惟一的官方语言，科普特语中道衰落，科普特人的身份地位随之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尽管如此，科普特语并未湮灭，反而对阿拉伯语产生一定影响。阿拉伯语吸纳了一些科普特语的词汇，甚至在一些欧洲语言里也保留少量科普特语词汇。

9世纪，穆斯林在埃及已占据绝对优势，阿拉伯语成为埃及的主要语言。科普特人皈依伊斯兰教后，他们与阿拉伯人杂居通婚，共同生活，相互融合，逐渐消除彼此间的隔阂和差异。11世纪，阿拉伯语取代科普特语成为埃及人的日常生活语言。埃及终于实现了阿拉伯化，融入阿拉伯民族大家庭，迈进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

建筑艺术的奇葩

清真寺是埃及古典伊斯兰时代建筑艺术的典范。经过几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伊斯兰教在埃及取得了支配地位，清真寺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埃及人充分发挥其建筑艺术天才，建造了大量的无拘无束的清真寺。他们以复杂多样的钟乳石状图案为基调，饰

以华丽的阿拉伯式图案，向世人展现了埃及的富庶，凸现出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的形象和气魄。在开罗，清真寺比比皆是，素有“千塔之城”的美称，其中不乏像爱资哈尔清真寺这样古典伊斯兰时代的杰作，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埃及传统文化相互交融、完美结合的缩影。

阿慕尔清真寺是埃及最古老的清真寺，是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教在埃及生根兴起的标志。643 年，由征服埃及的阿拉伯将领阿慕尔·伊本·阿斯所建，并因此得名。建造初期，大寺长 25 米，宽 15 米，屋顶由泥巴和椰枣树枝遮盖，四周是铺有卵石的柱廊，相当简陋，且朝向不准，体现了早期伊斯兰时代朴实无华的建筑风格。直到 672 年，倭马亚王朝统治时期，才为寺院筑起砖墙，并把角竖立了 4 座宣礼塔。710 年，端正朝向，扩建大寺。827 年，再次扩建，修缮大殿及其周围的柱廊，院中央还设有沐浴池，占地面积增至 1.4 万平方米。改建后的大殿，朴实、素洁、肃穆，增设讲坛和用来指示礼拜朝向的凹壁（米哈拉卜），立柱顶端衔接呈拱形，沿用当时在埃及颇为盛行的希腊罗马式建筑风格。1172 年，萨拉丁执政时期，又将阿慕尔清真寺修葺一新。马木鲁克王朝时期，又修筑了宣礼塔和其他附属建筑物，其建筑风貌基本保留至今。

伊本·图伦清真寺始建于 876～879 年间，后不断整修扩建，占地面积达 2.62 万平方米，是伊斯兰世界最大的古寺之一。古寺坐落于开罗城南的亚什卡尔高地上，外形酷似碉堡，筑有高大的围墙，雄伟壮观，至今犹存。“碉堡”内庭院幽雅，多采用红色砖块建造，表面以白色石膏雕刻装饰，深受西亚文化的影响。图伦清真寺采用尖削的方形砖柱架托顶棚，与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和大马士革的倭马亚清真寺如出一辙。位于清真寺西端的宣礼塔与伊

拉克的萨马拉清真寺的宣礼塔极为相似，楼梯宽约 90 厘米，呈螺旋状上升，只是在楼梯外侧加了一道起围栏作用的矮墙。这是伊本·图伦早年在伊拉克萨马拉生活了 30 多年的写照，同时也是开罗迄今犹存的历史最悠久的宣礼塔。后来，该清真寺虽几经修葺，但基本保留了当年的风貌，中央的圆顶大殿重建于 1297 年。

爱资哈尔清真寺始建于 970 ~ 972 年，是一座设计独特，气势恢宏，异常坚固的石头建筑。一般认为，“爱资哈尔”意为“美丽”、“鲜艳”，是先知的女儿法蒂玛的外号扎哈拉的阳性词。从 975 年起，它不仅是穆斯林祈祷的地方，而且逐渐扩展为讲授教义的学堂。到 11 世纪法蒂玛王朝的鼎盛时期，发展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伊斯兰大学和伊斯兰学术研究中心，在埃及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享有极高的声望，被誉为伊斯兰的“明灯”。因此，爱资哈尔清真寺历来都受到重视，经过不断修复和扩建，它占地 1.2 平方米，大殿和庭院可同时容纳 5 万人礼拜。3 个巨大的圆顶和 5 座高耸人云的宣礼塔将伊斯兰建筑风格表现到极致，体现出各时代卓越的建筑艺术水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座建于 16 世纪的两头尖塔卡特巴，是爱资哈尔清真寺最大的宣礼塔和标志性建筑，堪称伊斯兰建筑艺术的瑰宝。

威尔·杜兰在其巨著《世界文明史》中总结道，马木鲁克王朝是“中世纪埃及式建筑达到历史上最灿烂的时代”。1356 年，哈桑·本·纳赛尔苏丹建成了以其名字命名的苏丹哈桑清真寺，体现了伊斯兰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最初在这里是要建造一所伊斯兰教学校，因此，作为学习场所的中心庭院就成了整座建筑的核心。庭院四周是雄伟的拱顶，巨大的正门呈钟乳石状，是典型的马木鲁克样式建筑。庭院后面的哈桑墓也很有名，是埃及最出类拔萃的伊斯

兰建筑之一。

总之，从清真寺建筑中不难看出，阿拉伯人在自觉提高精神生活的基础上，把发达的埃及文化融人到了他们的宗教热忱中，创造出光彩夺目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伊斯兰文化的“灯塔”

来自阿拉伯半岛沙漠里的阿拉伯人，当他们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已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埃及后，无不被光辉灿烂的埃及文明折服。所幸的是，作为帝国征服者，阿拉伯人并没有毁灭古老的埃及文明，而是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博采众长，充分吸纳融合埃及文化。这不仅有力促进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和完善，而且还形成以开罗为中心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发达区。开罗仿佛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灯塔”，照耀着整个伊斯兰世界。

973年，法蒂玛王朝迁都开罗后，“带来了一个伟大的学术繁荣”，“尤其是在理性学科及哲学方面”。10世纪后，伊斯兰世界大兴游学之风，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学者云集开罗，驻足于各大清真寺，讲经说道。如前所述，古典伊斯兰时期，清真寺的社会功能远远大于今天的清真寺。因此，开罗的地位扶摇直上，一跃成为伊斯兰宗教文化的发源地，就连后倭马亚王朝的科尔多瓦和阿拔斯王朝的巴格达也黯然失色。

哈里发阿齐兹积极发展教育事业，奖励学术研究，为埃及的文化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时间，开罗成了巨匠荟萃，学子莘莘的伊斯兰文化中心。爱资哈尔清真寺也从最初礼拜祈祷的场所，兼做起授业解惑的宗教学堂。建校初期，实行纯粹的古典寺院教学

制。哈里发为名誉校长，宗教长老主持教务，从各地聘请著名伊斯兰学者来此任教。国家提供固定的土地岁收作为教师的俸禄和日常开支，学生食宿和书籍等一律免费。大殿就是教室，学生围着老师席地而坐，学术气氛浓厚，师生关系融洽。

阿齐兹还在开罗建立了一座皇家图书馆，收藏着从东西方各地搜集来的20万册图书，涉及古典哲学、艺术、自然科学等多种学科。该馆的收藏中不乏珍本，其中包括古典伊斯兰时代"历史学权威、经注学权威和法律学权威"泰伯里(838～923)的手稿。

开罗良好宽松的学术环境，为伊斯兰学者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有利空间，于是人才辈出。犹太教学者叶耳孤卜·本·基利斯就是一个典型。他改奉伊斯兰教后，潜心学习《古兰经》、圣训和阿拉伯文学，成为伊斯兰教法权威。他把什叶派的宣传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得到阿齐兹信任和重用。他忠心耿耿，为法蒂玛王朝制定了"土地法"、"税收细则"等立国法规。他撰写的《伊斯兰教法》被视为国家的正式法典和一切法规的依据，是爱资哈尔大学的教材以及法官、教律学家的必读书。政府还专门设立奖项，鼓励穆斯林背诵《伊斯兰教法》。《伊斯兰教法》对后世影响深远，11～12世纪的埃及法学家、圣训学家、经注学家、历史学家的著作，无不以此为依据。

1005年，法蒂玛王朝在皇宫附近创办了"智慧(科学)之家"，内设图书馆和研究室，并备有学习用具，向公众开放。除开设语法学、圣训学、法律学、教义学、哲学外，还讲授天文学和医学，从而带动了自然科学的研究。伟大的天文学家阿里·伊本·优努斯编著的哈基木天文历表，并根据实际测算纠正了通行中的历法错误。

在爱资哈尔清真寺大门的拱顶上，记述着杰出的物理学家和

数学家伊本·海赛木的伟大业绩。他涉猎广泛，著述颇丰，其中《光学书》为光学的发展的基石，影响久远。

在开罗这座文化“灯塔”的指引下，伊斯兰世界学者趋之若鹜，云集开罗，他们在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天文、医学、数学、科技等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阿拉伯世界名列前茅，在此仅以《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为例。这部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集几乎汇集了整个西亚北非的文学精华，流传甚广，但最终还是落户于埃及，15 世纪在开罗定型。它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文学宝库，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五章　西方的冲击与埃及的欧化

一、法国远征埃及与阿里王朝的兴起

拿破仑的入侵

自13世纪末十字军最后一次东侵失败以后，西方势力在五百年里一直未能染指近东地区。从15世纪开始，欧洲连续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思想和文化的激烈变革以及商业革命和政治革命，一种全新的近代社会形式——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向外扩张。至18世纪末，欧洲人凭借坚船利炮的军事优势，差不多已经征服了这个星球的大部分地区。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落，他们的目光开始转向近东地区，埃及首当其冲，成为他们新的征服目标，特别是英法两国争夺的对象。

英国在18世纪不仅成为殖民大帝国，而且确立了海上霸权。此时，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通要冲和东西贸易必经之地的埃及对它来说，愈来愈显得重要。但是，17世纪末土耳其素丹严禁西方船只进入吉达港以北驶往埃及的敕令，阻遏着英国势力渗入埃及。然而，1769年埃及政局的变动为英国人带来契机。这年，阿

里贝伊宣布独立，英国商人乘机越过土耳其政府，直接与阿里贝伊谈判，于1775年签订了通商条约。根据双方协定，英国商船在缴纳一定关税后，可越过吉达港，直接开赴苏伊士港，和埃及通商，英商还有权任意采购和转销埃及产品。

法王路易十六早就觊觎埃及。为了考察武力占领埃及的可能性，他曾于1777年派人赴埃及探听虚实，只是苦于七年战争后法国兵力不济，未敢轻举妄动。1785年，法国政府还通过与埃及马木鲁克首领易卜拉欣和穆拉德签订商约，取得了较英国更为优越的通商地位。1789年大革命后，法国成为欧陆最强大的国家。为了彻底击败以英国为首的反法联盟并取得世界霸权，1797年11月督政府命令拿破仑跨海进攻英国。但拿破仑深知，法国海军力量远不是英国的对手，迟迟不予行动，而建议远征近东，以打击英国在地中海的势力与在印度的商业贸易，同时在近东建立一个法国殖民地。这一建议得到外交部长塔列朗的赞赏，法国驻埃及领事马加龙也极力撺掇政府发兵埃及，摘取这个已经熟透的果子——因为无论是衰朽的奥斯曼帝国还是内争不已马木鲁克贝伊们都不可能保护它。

1798年4月，法国督政府任命拿破仑为远征军总司令，其任务是占领埃及和苏伊士地峡，控制红海。5月19日，拿破仑率300艘各种船只和4万名法军从土伦港出发，于7月1日在亚历山大港附近登陆，随即攻占了这个仅有8000人口的城市。

当拿破仑军队突然出现在埃及领土上的时候，这个奥斯曼帝国行省的实际统治者们似乎并不惊慌，他们自信凭借其骁勇的骑兵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侵略军。穆拉德贝伊大言不惭地说："让法国人来吧，我们的战马将把他们踩得粉碎！"然而这种愚昧无知

和狂妄自大很快就付出了沉重代价。

7月3日，拿破仑分兵二路，水陆并进，直取开罗。十天后，其先头部队与穆拉德驻守在舒拉希特镇的3000骑兵和9000农军相遇。两军一交锋，穆拉德的骑兵就败下阵来，而穆拉德本人看到一艘马木鲁克战舰被法国战舰击中，船上大火四起，官兵血肉横飞，惊恐万状，立即丢下辎重火炮，逃离开罗。7月21日，法军与穆拉德的马木鲁克军在位于尼罗河西岸金字塔附近的因巴贝决战。一方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兵强将，另一方是只会死打硬拼的6000名骑兵和1万名手持刀枪棍棒的民军，其结果可想而知。剽悍的马木鲁克骑兵在法军方阵的排枪和大炮的密集火力下，纷纷落马。战斗进行不到一个小时，穆拉德的骑兵就损失近半，民军也伤亡惨重。穆拉德原指望驻守在尼罗河东岸的易卜拉欣增援，但后者初则按兵不动，后则收拾行装，率部撤离开罗，逃往叙利亚。穆拉德节节败退，逃至上埃及。7月24日，法军进入开罗，并完全占领了尼罗河三角洲地区。

埃及人民反对法军占领的斗争

在摧毁马木鲁军事力量的过程中，波拿巴希望通过吸引埃及土著领袖人物——伊斯兰教长老和社会贤达——的合作，来稳定他的占领。他用阿拉伯文先后发表了两个文告，宣称法军占领的目的是要摧毁否认埃及人权利的马木鲁克压迫者，而不是摧毁伊斯兰信仰；法国人认为，在上帝面前每个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法军到埃及来就是要把埃及人民从暴政下解放出来，以便由长老和贤达们组成政府，改善他们同胞的生活状况；“法国人始终是奥斯曼素丹真诚的朋友和他的敌人的敌人”。对埃及人来说，拿破仑提

出的组织土著人政府的思想是全新的，尽管拿破仑的政策带有宣传目的，但邀请沙伊赫、乌拉玛和社会贤达参加法国控制下的埃及政府，似乎仍然是对土著人领导地位的认同。通过与这些领袖人物谈判，拿破仑顺利地在开罗成立了名为“迪万”的政务会。政务会负责开罗的市政事务，但其权力不是最终的，而要服从于法国军事长官，法国当局保留了任命某些高级官员的权力。对政务会的另一限制是它的成员中必须有法国人。在开罗以外的其他地区，拿破仑也组织了类似的行政机构，并于1798年9月建立了由埃及各地代表组成的政务总会。总会的职责是审查和讨论三件事：宗教法庭和司法制度；土地所有制；继承法。为笼络人心，拿破仑还宣称他“皈依”伊斯兰教，敬畏安拉，并缠上头巾，穿上长袍，到清真寺做礼拜。

拿破仑在埃及建立的新秩序，确实使部分上层长老、富商大贾和地方显贵在政治上经济得到某些好处，一些逃亡在外的上层人物，在名利地位的诱惑下也返回开罗，成为法国殖民统治的工具。如爱资哈尔清真寺教长阿卜杜拉·舍尔哥威回到开罗后，担任了开罗政务会和政务总会的主席，号召埃及人民放下武器，停止抵抗。但是普通的埃及人所感受到的却是一种暴政代替另一种暴政：对抵抗者持续不断的血腥报复，对老百姓的严密监视，对贝都因人的牛羊马匹的肆意抢掠，对城镇居民的敲诈勒索，各种沉重的赋税杂费，等等，无一不令埃及人愤恨。

1798年10月21日，成千上万的开罗居民拿起武器，同法国占领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参加起义的主要是手工业者，爱资哈尔清真寺成了起义中心，著名宗教人士谢赫萨达特和谢赫夏卡威充当了起义的领导。起义者杀死开罗卫戍司令迪皮伊，攻占了许多

据点，筑起街垒，准备坚持长期战斗。正在外地视察的拿破仑闻讯，急忙调兵占领城内外制高点，从撒拉丁城堡和穆盖塔姆山两面炮轰爱资哈尔清真寺，法军同时在炮火掩护下围攻爱资哈尔区。22日晚，起义被镇压下去，在持续两天的战斗和随后法军的野蛮报复中，大约4000名开罗居民被杀害，但法军也付出了300余人的代价，其中包括3名高级军官。

在开罗起义的同时，外省的贝都因人和菲拉赫（农民）也开展了游击战。法军溯尼罗河向上埃及推进，一路纵火焚烧了许多抵抗的村庄，残酷镇压了反抗者，至1798年12月，完成了对埃及的占领。

1800年3月20日，开罗人民在贵族首领奥马尔·麦克莱姆领导下，再次举行驱逐法国占领军的起义。参加起义者达5万之众。起义群众吸取上次由于武器不足，特别是缺乏大炮而遭到失败的教训，一方面搜集了马木鲁克和土军的旧火炮，一方面建立了三座兵工厂，自制枪炮弹药。至3月27日，起义者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开罗。当时，上下埃及的杜姆亚特、米努夫、塞曼努特和坦塔等地也同时爆发了人民起义，进入埃及的土耳其军队和以易卜拉欣为首的马木鲁克也站在起义者一边。法军司令克勒贝尔考虑到法军无力同时对付各地起义者，遂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他先同盘踞在上埃及的穆拉德达成双方分治上下埃及的协议，取得穆拉德的兵力支援；在镇压了各地起义后，又诱使土军和易卜拉欣撤离开罗，退往叙利亚。孤立无援的开罗最终于4月21日重新落入法军之手。

法军撤出埃及

当法国舰队在土伦集结准备远征埃及时，英国就开始密切注意法军的动向。皮特首相以为法国舰队可能北上进攻爱尔兰，特令海军上将纳尔逊率一支舰队在直布罗陀海峡等候截击。得知法军真正意图后，纳尔逊舰队即尾追而来。1798 年 8 月 7 日，双方在亚历山大港附近的阿布基尔湾展开激战，法军大败，其运输舰只被全歼，从而断绝了法国本土的援军和补给。

9 月 2 日，在英国的煽动之下，土耳其素丹苏莱曼三世发布帝国诏书，宣布法国为奥斯曼帝国的敌人和反对伊斯兰教的无神论者，帝国实行总动员，并派遣两支军队，分别从罗得岛和叙利亚出发，进攻埃及的法军。拿破仑先发制人，于 1799 年 2 月率军进攻叙利亚，并且顺利地攻占了阿里什、加沙和雅法，但接下来在阿克要塞却遇到土军和该城居民的顽强抵抗。法军围攻两月有余，始终未能占领该城，拿破仑只好撤围回师埃及。

1799 年初，由英、俄、奥、土等国组成的第二次反法联盟成立，欧洲战事在对法国不利的局势下重新爆发。法军连连败北，意大利征服地几乎丧尽，督政府的无能引起国内普遍不满，一些有势力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密谋改变政治制度。拿破仑闻听国内政局不稳，于 8 月（一说 10 月）扔下自己在埃及的军队秘密返回法国，而把指挥权交给克勒贝尔将军。

此时，土耳其首相优素福率领的大军已开抵加沙，而英国舰队也完全控制了埃及沿海海域。克勒贝尔虽然取得了几次局部的胜利，但法军在埃及的处境却日益恶化。由于连续作战，法军大幅度减员，且武器弹药匮乏，而埃及人民的反抗斗争牵制着法军大量兵

力。克勒贝尔自知难以抵挡英、土军队的联合进攻，遂与土耳其单独谈判，于1800年1月21日签订阿里什和约。和约规定，法军在三个月内分阶段撤出埃及，埃及仍归土耳其所有。但英国坚持法军必须缴械投降，否则英国将禁止任何运载法军的船只通过地中海。在求和无望的情况下，克勒贝尔铤而走险，集中兵力，于3月20日在艾因舍姆斯向土军突然进攻，土军猝不及防，败退叙利亚。

1800年6月14日，克勒贝尔被一名叙利亚爱国志士刺死，梅努出任远征军总司令。他仿效拿破仑，宣称自己皈依伊斯兰教，易名阿卜杜拉·梅努，并娶一埃及女子为妻，同时宣布将埃及正式并入法国。

1801年3月，英土联军再次攻入埃及，梅努于8月31日宣布投降。10月，最后一批法军撤离埃及。至此，拿破仑在埃及的军事冒险以彻底失败告终。

法军远征埃及，前后总共只有短短三年多，但这一事件产生的影响是复杂而深远的。首先，它把埃及卷入了国际政治的旋涡，使之成为西方列强的一个角逐场。在好几百年里，埃及在世界事务中始终只起一个配角的作用，只是被当作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财源和作战基地。由于拿破仑的军事行动，它突然身价大增。一直习惯于绕好望角去远东和印度贸易的英国现在开始意识到控制这一东西方交通枢纽的重要性。根据1801年的法土和约和1802年的英法亚眠和约，埃及重归土耳其，但英国人不甘心放弃这块“肥肉”，要求保留在埃及的驻军权，只是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列强的压力下，英国才不得不把自己的军队撤出埃及。此后，英国又通过扶植傀儡，经济渗透来操纵埃及。而法国则不甘心在埃及的失败，千方百计卷土重来。由此引起一连串的反应，使埃及和近东成了欧

洲玩弄种种阴谋手段的中心之一。

其次，它使埃及第一次受到近代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在这方面，1797 年 8 月由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蒙日为代表的一批拿破仑的随军学者所组成的"埃及研究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个附有图书馆和实验室的科研机构不仅从事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广泛研究，还因军事和政治需要而开办工厂，开设医院，研究瘟疫的防治，以磋商与建议的形式参与赋税、法律、教育等政策的修订。另外，研究院利用拿破仑从梵蒂冈掠夺来的一部阿拉伯文印刷机办起了埃及第一座印刷厂；花费 17 年时间，编写了一部 37 卷的埃及百科全书《埃及志》；挖掘出许多法老时代的文物古迹，其中的罗塞塔石刻为解开埃及古代象形文字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上述科学文化的启动，使一向因循守旧、不求进步、也不关心外部世界文化的埃及人受到当头棒喝。当埃及的知识分子在法国人的实验室中看到那些神奇的化学反应时，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被激活了。总之，与西方文化的突然接触，使埃及人从中世纪的酣睡中惊醒过来，深深意识到了与西方的巨大差距，由此开始了他们追赶西方的漫长历程。

再次，它使埃及社会生活出现了某些有意义的变化。1798 年后，一些埃及穆斯林不再遵奉严格的传统道德，例如在公园、剧院和咖啡馆等公共场所，出现了男女交往的情况；穆斯林妇女与法国军人或其他法国人结婚，随之改宗基督的情况并非罕见；酒吧、饭馆和妓院为追求享受者提供了新的娱乐方式，而政府则乐于从此类场所征收娱乐税。当然，更多的埃及人反对这些变化，悲叹埃及精神的颓废。另外，从拿破仑统治埃及的方式中，埃及人也依稀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自己的世界：尊崇民主自由，秘密投票选举，

禁止非自愿的奴役，工人按月领取工资，等等。由此引发了一个持续一百多年争论不休的问题，即埃及要不要欧化？

二、穆罕默德·阿里的仿欧改革

阿里王朝的兴起

法军的撤出以及1802年3月亚眠和约签订后英军的撤离，给埃及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埃及昔日的统治者马木鲁克和土耳其人之间立即展开了一场权力争夺战。然而这两股腐朽势力已失去人心，尤其是在埃及社会有很大影响力的长老们和新兴商业资产阶级拒绝恢复旧秩序。结果，在权力角逐中，一名青年军官——穆罕默德·阿里成为“尼罗河谷的新主人”。

穆罕默德·阿里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是阿尔巴尼亚人，1769年出生于希腊马其顿，10岁时随父贩卖烟草，14岁时失去双亲，为谋生，未成年即参加了故乡卡瓦拉的城防军。1787年，他与一位富孀结婚，靠其妻资助，重操旧业。他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包括对他影响很大的法国驻卡瓦拉领事、商人利昂。1801，他应征入伍，随对法作战的土耳其大军来到埃及。这位体格健壮的青年人所表现出来的将帅才能，深得埃及总督、土军指挥官胡斯劳帕夏的青睐，很快晋升为阿尔巴尼亚军团的主要将领之一。

1803年春，由于胡斯劳拖欠军饷，引起阿尔巴尼亚军团士兵不满，该军团头领塔希尔率部哗变，赶走胡斯劳帕夏，自任代理总督。一月后，土耳其近卫军发动反政变，杀死塔希尔，但曾鼓动塔希尔哗变的穆罕默德·阿里却因这场互相残杀而升任阿尔巴尼亚

军团的头领。接着，他巧妙地利用马木鲁克和土耳其人之间的仇恨，暗中与前者结盟，消灭了近卫军，然后又借助开罗人民的支持，把马木鲁克部队驱赶到上埃及，从而控制了开罗地区。

考虑到埃及境内复杂的政治情况，为避免树大招风，穆罕默德·阿里没有立即执政，而是邀请亚历山大长官胡尔希德帕夏出任埃及省督。胡尔希德上任后，从叙利亚调来 3000 名土军加强自己的实力。这些土军在开罗飞扬跋扈，肆意掠夺民财，残害百姓，与纪律严明的阿尔巴尼亚军团形成鲜明对照，引起埃及人民的极大愤慨。1805 年 5 月，以奥马尔·麦克莱姆为首的长老立法会议要求，所有土军立即撤出埃及，今后未经立法会议许可不得征税。这两项要求被胡尔希德拒绝，长老们当即宣布废黜胡尔希德帕夏，拥立穆罕默德·阿里为埃及省督。土军几次征讨失败后，素丹塞利姆三世被迫于 1805 年 7 月 9 日接受了埃及人民的选择。

穆罕默德·阿里出任省督后，通过派兵征讨和设计诱杀的办法，基本上肃清了马木鲁克的势力，将其领地全部收归国有。同时，政府通过查验土地证件和丈量土地，又强行没收了大批没有证件证明或超过证件规定的宗教地产。这些被没收的土地名义上归国家所有，实际上为穆罕默德·阿里个人所独占，埃及旧的封建地主由此消失。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穆罕默德以王室领地、边缘地、村长地、酋长地、乌西叶地（包税人占有）等形式，把全国一半的土地分封给王亲国戚、政府官吏和地方豪绅——这些人构成了埃及的新地主；另一半分成小块租给农民耕种，农民承担缴租义务，不得将份地转让、抵押和租赁，亦不得世袭。

穆罕默德·阿里还改组了埃及的行政机构，并实行家族统治。他自己接受了帕夏的封号，名义上是土耳其素丹的总督，实际上却

拥有无限权力。他把埃及行政单位分为省、专区、区三级，各级长官均由他亲自任命，完全听命于他。他的儿子图松、易卜拉欣和伊斯梅尔掌握着陆军，小儿子赛义德则是海军司令；他的孙子阿巴斯担任开罗行政长官；其他家族成员也都充任重要的军事或行政职务。这样，穆罕默德·阿里就在埃及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封建王朝，这个王朝一直持续到1952年。

阿里王朝的出现，反映了埃及人反对两个压迫者——奥斯曼土耳其人和马木鲁克——的强烈愿望。它使埃及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标志着埃及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

阿里改革种种

阿里政权建立时，多年战火已经使富饶的三角洲变成了荒芜之地，新政权处在税收不足、无赋可征的窘境。在国际上，埃及的独立也受到西方列强和宗主国的严重威胁。现实要求埃及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变化，以维护独立和巩固政权。另外，穆罕默德·阿里虽是一个封建统治者，但却极有抱负。他十分羡慕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与文明，雄心勃勃地希望埃及能够成为像英、法那样的强国，甚至希望建立一个其他阿拉伯国家都臣服于他的大帝国。为此，他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是军事改革。在掌权的最初几年里，穆罕默德·阿里最关心的是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他希望建立一支拿破仑式的新军，取代自己那支战斗力不强的杂牌军。但守旧派军官和长老们强烈反对，他为此差点被刺杀。迟到1820年，他才在阿斯旺创办了第一所步兵学校以训练军官。该校校长是长期担任他的军事顾问的法国军官塞夫上校，教官也多是法国人，也有一些意大利人、西班

牙人和葡萄牙人。三年后，当300多名首届学员毕业时，穆罕默德·阿里以他们为骨干，尝试性地组建了六个营的新军。看到效果良好，他决定扩建兵营，加紧征兵。此后，阿里连年扩军，到30年代末，已拥有一支按欧式训练的23万人的正规陆军。

穆罕默德·阿里也大力发展海军。从1810年起至20年代中期，在另一个法国人、一个造船工程师的指导下，埃及建立了两支舰队——地中海舰队和红海舰队。船只除开罗造船厂自己建造外，大多从国外订购。不幸的是，在1827年的纳瓦诺里海战中，土耳其—埃及联合舰队被英、法、俄联合舰队队摧毁，埃及舰队主力丧失殆尽。由于与欧洲大国关系恶化，从国外购舰已不可能，穆罕默德·阿里当即决定在亚历山大修建一座8000人的造船厂，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埃及舰队。到1839年，埃及已拥有战舰32艘，海军1.5万人，成为东地中海最强大的海军国家。

其次是工业改革。穆罕默德·阿里上台时，正值工业革命在西欧兴起，而那时埃及的工业生产还处在行会阶段，只有部分工场手工业。行会组织的封闭性、排它性阻碍着工业的发展。有鉴于此，穆罕默德·阿里于1816年对工业品实行垄断，使得行会手工业很快衰落，小手工业者和行会会员不久成为国家企业中挣工资的劳工。同时，他鼓励发展工厂工业，以满足迅速扩大的军队的需要。1818年，通过引进欧洲的纺织机，第一批纺织厂创办起来，其产品既供应军队，也供应国内市场。到20年代，制糖、染料、造船、火药、榨油、军械、铸造、冶炼、机械等工厂相继建立，其中与国防有关的工业发展尤为迅速。在装备上，有些工厂并不亚于欧洲的工厂，其产品在埃及国内市场上可以与欧洲工厂进行竞争。

企业采用军事式的管理方法，工人被分成排、连、营，除从事繁

重的车间劳动外，下班后还要进行军训。与西欧国家相比，埃及由于实行绝对集中的垄断政策，物价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因而工人的工资能够保持稳定，但由于滥用行政干预，拖欠工资的事经常发生。

关于阿里时期埃及工业的发展情况，仅从工人人数即可见一斑：1840 年，埃及各工业中心共有工人 26 万，而在 1816 ~ 1850 年间，至少有 45 万埃及人当过工人。

第三是农业改革。在这一领域，穆罕默德·阿里首先改革了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即废除了租田制，把原封建主的世袭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同时取消了包税制，农民根据契约，直接向政府交税。这样既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增加了政府收入。其次是鼓励发展商品性农业。埃及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宜种植棉花，在法国专家朱梅尔的指导下，阿里于 1820 年从苏丹引进优质长绒棉，并不断扩大种植面积。到 1836 年，产量已达 1 万吨，不仅大大增加了出口收入，而且使埃及纺织厂空前发展起来。发展较快的其他商品作物还有稻米、甘蔗、蓝靛、小麦、蚕桑等。阿里还修复并扩建了水利设施，从 1820 年起，埃及有了终年不断的灌溉，实现了一年两熟。与此同时，耕地面积也由 19 世纪初的 200 万费丹（1 费丹≈0.42 公顷）增加到 1852 年的 410 万费丹。

第四，教育改革。穆罕默德·阿里虽然是个文盲，但对发展国民教育却非常重视。埃及教育过去一直由爱资哈尔管理，学校基本上都是古兰经学校和神学院，附属于清真寺。显然，这种学校根本不可能培养出军队、工业、灌溉工程以及新建立的国家机关所需要的人才。因此，阿里决定改革国民教育，设立了公共教育部，投入大量资金，在埃及创办欧式国家教育系统。1816 年，埃及有了

第一所工科学校；1827年，第一所医科学校建立。考虑到教育的现代性和世俗性，他提拔那些受过国家训练和欧洲影响的土著精英负责教育事务，这些人包括教师、技术人员、科学家和行政官员。阿里时代，埃及世俗教育得到了很大发展，国家创办了许多非宗教的小学、中学和专科学校，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医师、技师、农艺师、兽医、行政管理人员和翻译人员。阿里还派遣几批留学生赴欧深造。据文献记载，从1813年到他去世的1849年，总共有311名埃及学生被派往意、法、英、奥等国留学，国家开支经费27万多埃镑。学习的科目主要是埃及急需的军事、工程、医学、药学、艺术和工艺等。

整个说来，在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埃及的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人口由1800年的250万迅速增加到1847年的450万，特别是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城市人口增长更快。由于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引进和近代工业的发展，埃及成为奥斯曼帝国中最先进的部分。在30年代阿里王朝鼎盛时期，开罗甚至取代了伊斯坦布尔的经济文化中心地位。从表面上看，埃及已不再是严格的穆斯林的社会，而变成了伊斯兰—欧洲的混合社会。对于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取得的卓越成就，马克思曾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他是奥斯曼帝国中"惟一能用真正的头脑代替'讲究的头巾'的人"。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穆罕默德·阿里是19世纪的伟大统治者之一"，是"近代埃及的奠基者"。

然而，这场改革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改革是在保留封建农奴制的基础上进行的，作为改革政策核心的垄断制和集中化使穆罕默德·阿里个人成为全埃及最大的地主和惟一的"工业巨头"，而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工商资产阶级却受到压抑，这反过来又制

约着改革本身的广度和深度。尽管如此，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在埃及近代史上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对外扩张

在进行改革的同时，穆罕默德·阿里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冒险，极力扩张自己的势力。1811～1818年，他应土耳其素丹马哈茂德二世的请求，出兵阿拉伯半岛中部（内志），镇压了瓦哈比教派领导的独立运动，控制了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从而对穆斯林教徒有了潜在的巨大影响力，并削弱了素丹兼哈里发的最高宗教权威。

镇压了瓦哈比教派后，穆罕默德·阿里的视线转向苏丹。19世纪初，占据着苏丹这块辽阔土地的是一些小小的封建公国和部落联盟，它们分别隶属于两个较大的素丹国：东部的散纳尔和西部的达尔富尔。这两个素丹国虽然封建关系已经形成，但奴隶占有制仍然存在，蓄养和贩卖奴隶非常盛行。居民主要从事农牧业和手工业，商业也比较发达。穆罕默德·阿里为了发展埃及工业，早就想夺取苏丹的矿产资源，垄断苏丹的象牙和阿拉伯树胶等贸易。特别是苏丹众多奴隶人口，被阿里看作理想的兵源。1820年夏，他以征讨逃亡到苏丹的马木鲁克人为借口，遣其子伊斯梅尔率军进攻栋古拉和散纳尔。栋古拉的统治者未作任何抵抗，而散纳尔素丹巴迪六世亦在接连战败后投降。1821年6月14日埃及军队进入散纳尔城，随后沿青尼罗河而上，占领了法祖格列，并几乎到达北纬10度线。

1821年4月，穆罕默德·阿里又派出第二支军队出征苏丹，由其婿德弗特尔达尔指挥，目标是夺取科尔多凡和达尔富尔。9月，这支军队在巴腊城附近击溃科尔多凡总督穆萨利马的队伍，吞并

了苏丹中部的这块领土。但德弗特尔达尔没有继续进攻达尔富尔。

到1822年底，除达尔富尔和边远地区外，整个苏丹都被埃及人所占领。埃及人还在白尼罗河和青尼罗河交汇处建造了喀土穆城作为行政中心，1830年，苏丹的第一位埃及人统治者在此就职。

阿里的第三次军事冒险是与土耳其军队共同镇压希腊人争取独立的斗争。1821年3月，希腊爆发反土耳其起义，次年1月宣布独立，土耳其政府派大军征剿，但连遭败绩。素丹看到单凭自己的力量已不能把希腊起义镇压下去，便向自己最强大的藩臣穆罕默德·阿里求援，答应在起义平息后把克里特岛和叙利亚划给埃及。从1824年到1827年，由穆罕默德·阿里的长子易卜拉欣率领的埃及陆、海军先后攻占了克里特、摩里亚和雅典，几乎完全歼灭了起义军。但是，埃军在希腊的军事行动，引起欧洲列强的干涉。1827年7月6日，俄、英、法三国在伦敦签订了"希腊绥靖"公约。三强要求土耳其停止军事行动，从希腊撤走埃—土陆海军，在保留素丹名义统治的情况下，给希腊人以自治权。土耳其政府拒绝了这项建议，俄英法联合舰队便开赴希腊海岸。1827年10月20日，双方在纳瓦林海湾发生激战，结果，埃—土联合舰队完全覆没。在这场战争中，埃及损失了3万士兵和它的舰队。

在1828～1829年俄土战争时，素丹想再次利用埃及军队作战。但穆罕默德·阿里拒绝不执行命令，坚持要素丹兑现诺言，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交给他管辖。此时，6000多名埃及农民为躲避兵役和赋税逃亡到巴勒斯坦，在阿克帕夏阿卜杜勒的领地找到避难所。阿里要求阿卜杜勒把这些农民遣返埃及。后者宣称，他们作为素丹的臣民，可以在帝国的任何地方生活和居住。1831年

秋,阿里借口要惩治阿克帕夏,派遣易卜拉欣率军开进叙利亚和黎巴嫩,素丹对埃及的军事行动起初不知所措,后在次年4月宣布阿里为叛乱者,调集军队与之作战。但此时埃军已占领了加沙、雅法和海法,并围困了阿克城。1832年12月,土军在科尼亚城附近的会战中被彻底击溃,统帅土军的宰相大维齐被俘。埃军在安纳托利亚长驱直人,不久占领了布尔萨,伊斯坦布尔危在旦夕。惊惶失措的素丹急忙向欧洲列强求援,在俄英法等国的干预下,1833年5月,埃及与土耳其在曲塔雅签订协议。按照协议,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阿达纳转归埃及帕夏管辖,而穆罕默德·阿里则必须在形式上承认素丹的最高权力。

1833年至1839年,是穆罕默德政权的鼎盛时期,它控制的范围包括埃及、苏丹、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岛、基里基里亚和克里特,土耳其素丹手中实际上只剩下安纳托利亚、伊拉克和巴尔干半岛的某些地区。尽管名义上奥斯曼帝国对整个地区仍拥有主权,但没有穆罕默德·阿里的认可,素丹的任何法令都不适用于埃及或其他领地。穆罕默德·阿里现在有了自己的外交部,并接受各国派驻埃及的使节。但他仍不满足,他要为他的子孙取得埃及帕夏的世袭权。1837年,素丹向阿里建议,他的家族可以对埃及拥有世袭权,条件是他必须放弃迄今占领的其他领土。阿里拒绝了这一建议。接着在1839年发生了两件事:英国占领了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角的亚丁,在帕夏的阿拉伯领地和他的非洲属地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与此同时,英国首相帕麦斯顿主张在近东维持现状,即保持奥斯曼帝国的统一和独立。看到有英国支持,马哈茂德二世素丹决定重新对埃及开战。但在这年6月尼济普(叙利亚北部)附近的决战中,素丹的军队被击溃,土耳其舰队也归顺了埃及。就

在这时，马哈茂德二世去世，他的幼子阿卜杜勒—麦吉德继位。正当阿里准备乘胜夺取奥斯曼帝国政权时，欧洲列强出面干涉。

根据英国的倡议，1840 年 7 月 15 日俄、英、奥、普四国与土耳其在伦敦签订了关于集体援助素丹对付埃及帕夏的协定。该协定强调要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和独立，承诺保护博斯普鲁斯、达达尼尔两海峡和伊斯坦布尔，并要求阿里承认素丹的最高统治权。在阿里拒绝列强的最后通牒后，英、奥联合舰队即炮击贝鲁特和叙利亚其他港口，叙利亚也爆发了阿拉伯人反对阿里统治的总起义，迫使埃军退出叙利亚，11 月，当英国舰队以炮轰亚历山大相威胁时，阿里接受了列强的要求：承认自己是土耳其素丹的藩臣，只保留世袭领地埃及和苏丹，埃及军队由 20 多万缩减到 1 万 8 千人，并同意 1838 年英土贸易协定适用于埃及。

列强的武装干涉粉碎了穆罕默德·阿里建立强大的埃及帝国的梦想，同时也为以后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在埃及的经济扩张准备了条件。1841 年以后，表面上埃及对土耳其政府的依附性加强了，而实际上是土耳其政府失去了埃及，它整个地转到了英国势力影响之下。

三、伊斯梅尔的欧化改革与西方势力的侵入

阿里的不肖子孙

1849 年穆罕默德·阿里死后，他的孙子阿巴斯一世继承了埃及总督职位。新统治者是一个只知享乐不懂国政的纨绔子弟，他把全部时光都消磨在游宴和行猎上，消磨在与后宫妻妾的寻欢作

乐上。他认为他的祖父的改革并没有给埃及带来什么好处，只是招致了欧洲列强的干涉，因此应该摒弃改革方针，恢复向土耳其素丹纳贡称臣，求其庇护。他关闭了阿里时期创设的工厂、技校和普通中小学，仅保留了一所军校，并解雇了一批专家和顾问。他取消了义务兵役制，拆除了战舰和军工设备，把军队由 8 万人削减到 2 万 7 千人，但却为自己组织了一支由阿尔巴尼亚族士兵组成的卫队。他对发展农业漠不关心，中止了阿里时期开始的垦荒、筑堤、开渠等农业工程，同时残酷地掠夺农民。阿巴斯的倒行逆施引起一些具有穆罕默德·阿里传统的人士的不满。同时，阿巴斯上台后培植亲信，排斥异己的做法也招致开国功臣和王室成员的愤恨。1854 年 7 月 14 日，阿巴斯在宫中被他的侍卫杀死，他的叔父赛义德成为埃及统治者。

赛义德自幼受德国教师的培养，后又留学法国，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和亲西方的政治倾向。他鼓吹经济自由和门户开放政策，主张废除一切有碍于这一政策的制度和法令。上台第一年，他就改革了土地制度和田赋制度。有关法令规定，凡是登记入地籍簿的土地，包括王室领地和边缘地，长老地和酋长地，均须向国家缴纳货币地租；废除连坐制规定的全村集体纳税制，代之以个人纳税制。赛义德还完全废除了专卖制，允许农民自由种植和销售农产品，并取消了商品入市税。这些改革使私有制逐步确立，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某些先决条件，有利于调动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同时加速了农民的阶级分化。

但是赛义德希望借助西方力量发展埃及的经济和文化，他把许多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事业，如银行、铁路、运河、航运、水电、文化教育等交给外国人经办。从 1854 年到 1860 年，欧洲人纷纷来

埃及"淘金",一批外资企业很快建立起来。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英国人开办的埃及银行和莱姆勒电车公司、法国人开办的亚历山大自来水公司和埃及磨面公司。欧洲人通过开办企业,控制了埃及部分经济命脉,并在法律上取得了种种特权。

赛义德推行的经济自由和门户开放政策,固然对活跃埃及经济,促进对外贸易有一定作用,但是它在更大程度上迎合了欧洲列强对外扩张的需要,使埃及的主权遭到践踏。特别是他把苏伊士运河的开凿权租让给前法国领事、投机商人费迪南·莱塞普斯,为外国资本奴役埃及埋下了祸根。

苏伊士运河的开凿

早在法老时代,埃及人就曾经开凿运河,试图打通地中海与红海的航道。此后的波斯帝国、托勒密王朝、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也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到了近代,英、法两国出于经济扩张和争夺霸权的目的,都企盼能控制苏伊士地峡和开凿运河,也进行过一些实地考察和勘察测量。1854 年,莱塞普斯利用他过去与穆罕默德·阿里的交情,以甜言蜜语说服赛义德接受了他的开凿苏伊士运河的计划,双方于当年和 1856 年 1 月先后签订了两份租让合同。合同规定,埃及出让运河开凿权和管理权给莱塞普斯的运河公司,无偿提供工程所需土地和石料,以及 4/5 的劳动力,并负责开挖通达施工区的淡水渠;运河完工后,出租 99 年,租期内埃及每年可分享公司 15%的净利。

但运河公司筹措资金很不顺利。法国资本家不相信苏伊士运河能开成,而英国资本家则担心他们的法国对手在东方的势力增大,竭力破坏公司股票的发行。至 1858 年底,公司预定发行的 2

亿法郎股票,在巴黎交易所仅推销了56%,而且其中部分还是赛义德自己认购的。在这个租让企业面临垮台危险的情况下,塞莱普斯采取弄虚作假的办法,利用赛义德给他的已签名盖章的空白支票,替赛义德认购了剩余44%的股票,赛义德起初拒付这笔总数9000万法郎的钱款,但后来还是屈从了,不得不向伦敦和巴黎的银行家告贷。由于贷款条件苛刻,债款加上滚雪球似的利息,债台越筑越高。

1859年,运河工程正式开工。在动工的前两年里,公司采用自由招工的办法,但至第二年底,仅招到1700名劳工,工程因此进展缓慢。在法国政府的干预之下,赛义德被迫于1861年8月起强征埃及劳工6万名,实行月轮换制,每月投入劳工人数保证在2万人以上。赛义德还根据塞莱普斯的建议,把军队由6万人减至1万人,士兵一脱下军装,就被整队赶到运河工地去。由于苏伊士地峡地处酷热无水的沙漠地带,淡水渠久久未开通,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不少劳工因干渴而倒毙。工地的生活条件也十分恶劣,居住拥挤,伙食低劣,蚊蝇成群,伤寒、天花、霍乱和回归热等瘟疫盛行,死于饥饿疾病者为数甚多。到1869年运河工程竣工时,总共有12万人牺牲在这里。后来纳赛尔总统回顾运河历史时说:"这条运河是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血汗,我们的尸骨换来的。"

埃及不仅为开凿运河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而且背上了巨额债务。据统计,运河工程总共花费5亿法郎,其中埃及政府支付了4亿法郎,而欧洲股东的全部投资仅1亿法郎。但是,埃及在很长时间里并未从运河得到什么好处。它的对外贸易仍通过亚历山大港进行,它的国力更加衰竭乃至财政破产。更严重的是,西方列强之间为占有运河展开的激烈争夺,竟导致埃及全部领土被侵占,

国家遭受殖民奴役。

“欧 化”改 革

1863年赛义德去世，易卜拉欣之子伊斯梅尔继位。伊斯梅尔自幼留学法国，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他崇拜西方，醉心欧化，一心想把埃及建成一个欧式国家。他曾数典忘祖地对一位欧洲管理委员会成员说：“我的国家已不在非洲，而是在欧洲。”为了振兴埃及，恢复其祖父的伟业，进而脱离奥斯曼帝国而独立，他实施了一系列欧化的改革措施。

在国家政治生活方面，根据伊斯梅尔的法令，埃及于1866年成立了代议制议会，其职责是代表人民向帕夏表达公众愿望，但他们所通过的决议对伊斯梅尔毫无约束力。议会于同年11月25日举行第一次会议，至1879年解散。在议会存在的前十年里，由于没有法律上和制度上保障政治思想的自由讨论，其历次会议都是马虎草率的，完全是伊斯梅尔的御用工具。正如埃及学者艾哈迈德·沙菲克所说，伊斯梅尔建立代议制议会的真正目的是要在“表面上造成一种君主立宪制的样子，允许某些公众参与权力，避免被指责为独裁。”这位学者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议长要求代表们分成三个集团——亲政府的右翼、反对政府的左翼和温和的中间派——时，所有代表全都涌向右翼，并咕哝道：“我们怎么能反对政府呢?”就实质而言，伊斯梅尔的代议制议会并不是新东西，它和法国占领时期和穆罕默德·阿里时代的咨议会没有多大区别。因此在立法方面，它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没有真正的立法权。不过，它对埃及后来的立宪主义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法制建设方面，伊斯梅尔采用了法国式民法法典和刑法法

典，建立了非宗教法庭，而传统的穆斯林法庭只限于审理家庭和婚姻案件。

在军队建设方面，他派遣一批军官留学法国，按法军体制重组军队；聘用欧洲军官负责创办了数所军事院校，建立了有美国军官参加并任总参谋长的总参谋部；修复了亚历山大造船厂和部队的兵工厂，以便自造战舰和枪炮，还从国外购买了一批武器和战舰。至 1873 年，埃及已拥有陆军 12 万人，战舰 18 艘。伊斯梅尔利用这支军队帮助土耳其素丹先后镇压阿拉伯半岛和克里特岛的人民起义，并在 1876 ~ 1878 年卷入土俄战争，以换取埃及的自治权。与此同时，伊斯梅尔还多次出兵苏丹南部和西部以及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地区，企图在东非建立一个埃及帝国。埃及的扩张行动与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殖民计划相吻合，英国希望借埃及之手实现自己的计划，因而给以支持。通过十年的扩张，埃及的势力南达赤道附近，东抵亚丁湾沿岸。但在 1875 ~ 1876 年进攻埃塞俄比亚时，埃及军队遭到当地人民顽强抵抗，几乎全军覆没，死亡 8 000 人，耗资 300 万埃镑。这一惨败加速了伊斯梅尔政权的垮台。

在发展经济方面，伊斯梅尔利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棉价暴涨和西印度群岛发生种植园危机，蔗糖产量下降之机，大力种植棉花和甘蔗。为此，他征集全国农民轮流服徭役，耗资 1200 万埃镑，开渠 112 条，总长 13500 公里。其中易卜拉欣水渠为全国最长水渠，全长 267 公里，宽 14 米，动用 10 万民工，花了 6 年建成。此外还修筑水坝 426 座，进口了蒸汽排灌机，使耕地面积扩大了 20%。政府还投入很大资金，进口成套设备，聘请外国技师，以恢复和发展工业，主要是制糖业和军工业。到 1879 年，建成糖厂 64 座，投资总额 610 万埃镑；修复了几家火药厂和造船厂，扩建了亚历山大

兵工厂,新建了三座兵工厂。另外还修建了若干纺织厂、榨油坊、面包房、制砖厂、制帽厂、玻璃厂、造纸厂、印刷厂和制蜡厂。为方便棉花出口,伊斯梅尔大力改善交通和通讯设施,共修建铁路1 456公里,耗资133万埃镑,敷设电报电话线路4 000公里,设立了国家邮政总局,扩建了亚历山大港和苏伊士港,开办埃及轮船公司,经营亚历山大至地中海东部和苏伊士至红海地区的客货运输。

在教育方面,他恢复了阿里去世后中断了十多年的教育活动,创办了许多专业学校以培养律师、行政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语言学家和教师,还兴办了艺术、工艺、电讯、测绘、财会、农业等技术学校,新建了许多世俗中、小学。他任命一批富有才干和勇于献身的人如伊布拉希姆·阿德哈姆、阿里·穆巴拉克指导新校的建立,并聘任瑞士人多尔贝伊作顾问,为埃及教育的改进和发展出谋划策。他允许农民子弟进入国立学校上学,并开办女子学校两所,使一些上流社会的女子得以接受近代学校教育。除国家大力兴办学校外,私人、地方和外国社团办学也很活跃。伊斯梅尔上台前,埃及在校学生只有几千人,而到1875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0万名;学校数目由1862年初的185所增加到1879年的4 817所,而且这些学校大部分实行免费教育。

伊斯梅尔崇拜西方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完全模仿欧洲。在他的倡导下,埃及专业人员和政府公务人员也穿上了欧式服装。为使埃及有西方式的大都市,他还大兴土木,模仿巴黎扩建开罗和亚历山大城的街道、广场和市区,并建造了如阿比丁宫、尼罗河宫、库巴宫、吉萨宫、蒂恩角宫、侯赛因清真寺、皇家歌剧院和赫勒旺温泉池等数十座富丽堂皇的宫苑和游乐设施,开罗迅速成为一座拥有30余万人口的新型城市,亚历山大则成为权贵和富豪们的避暑

胜地。

伊斯梅尔的“欧化”改革，令埃及面貌焕然一新，呈现出一派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其经济水平不仅超过所有非洲国家，而且超过了其宗主国土耳其，并且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赶上了近代欧洲国家的发展步伐。然面这一切只是一场梦，很快就破灭了。由于改革完全脱离埃及国内实力，盲目建设，大举借债，最终导致财政破产，国家主权丧失。

双重监督和“欧洲内阁”

鉴于赛义德统治时期留下的1 600万埃镑债务已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伊斯梅尔初即位时在财政问题上比较谨慎，曾表示要“建立财政制度和厉行节约”，“固定自己的开支，决不超支”。然而伊斯梅尔急于通过“欧化”而强国的欲望很快就使他背弃了自己的诺言。随着改革措施接二连三地出台，举办种植园、敷设铁路、兴建企业、开挖河渠、扩建都市、发展军队、建造离宫等耗资巨大的工程项目一个接一个上马，加上宫廷豪华生活的糜费，对外战争和他本人大肆购置田产，国家预算日益膨胀。另外，伊斯梅尔为获得世袭“赫迪夫”的称号，从而取得独立的内政权，财务权和部分外交权，于1867年向土耳其朝廷行贿300万镑。尽管60年代后埃及国库收入因国际市场棉价上涨面大增，但每年也不过数百万镑，根本无法应付各项庞大开支。

1864年，伊斯梅尔以下埃及三个省的土地税作抵押借进第一笔外债，计570万镑。由此开始，埃及在债务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先通过发行公债借进短期贷款，然后再以政府收入或王室田产作抵押，举借长期贷款，来还清短期贷款，接着再发行公债借进短期

贷款，如此循环往复，终于使埃及债台越筑越高，无法偿还。到1876年，埃及总共积累外债9 400万镑，所有人工程都抵押给了欧洲贷款者。

伊斯梅尔天真地以为西方列强会帮助他实现“欧化”的目标，然而英法等国都是出于剥削和掠夺的目的才提供贷款的。各种贷款都附有极为苛刻的条件，不仅利息极高(通常高出列强国内贷款利率的3~5倍)，而且埃及还必须用国家的重要收入如土地税、关税、铁路收入作担保。更有甚者，英法等国还以提供贷款和认购公债为手段，攫取种种特权，为它们进行直接投资、开辟市场广开方便之门。伊斯梅尔每从这些国家获得一笔贷款，便授予它们一些建筑工程的承包权，而外国承包公司乘机大肆勒索埃及政府。例如，承包修建铁路的外国建筑公司向埃及索要1 300万镑的工程费，而实际费用只有300万镑。

1875年埃及财政恶化，为支付到期的一笔320万英镑的贷款，只得以不到400万镑的低廉价格把自己的苏伊士运河全部股票出售给英国，从此失去对运河的控制权。然而埃及政府并未因此摆脱困境，因为1876年的债务总额已达到1亿镑的天文数字。无奈，伊斯梅尔在这一年宣布财政破产，由英法两个债权国派出财政监督人员分别监督埃及的国家收入和支出。英法“双重监督”制的建立，意味着埃及财政大权的丧失，随之而来的是对埃及农民的横征暴敛和对埃及财富的残酷掠夺，以致国家收人的2/3以上都落人了欧洲银行家之手。

1878年，英法等西方列强指控伊斯梅尔治国无方，造成赤字累累，要求他放弃独裁统治，改变现行政治制度。伊斯梅尔被迫授权亲英法的努巴尔组阁，成立了有欧洲资本代理人参加的政府：英

国人威尔逊任财政大臣，法国人布里尼任公共工程大臣，两人对政府决议都拥有否决权；内阁由首相领导，与赫迪夫共同执政，但不向赫迪夫负责。埃及人讥讽地称这届内阁为“欧洲内阁”。它的成立，使埃及的行政权不再完整。实际上，此时埃及已经沦落为英法的半殖民地。

奥拉比运动

双重监督制和欧洲内阁的建立，不仅严重损害了埃及的主权和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也深深刺伤了埃及人的民族感情。1879年，埃及出现了一个政治组织——民族协会。它的领袖是开罗卫戍部队司令艾哈迈德·奥拉比上校，其主要成员是知识分子、埃及土著军官、青年学生和开明议员。协会主张国家独立，维护民族主权，实行宪政，反对欧洲内阁，决心“把国家从屈辱、贫困、痛苦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并鲜明地提出了“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的口号。民族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埃及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兴起。

1879年初，欧洲内阁首相努巴尔为了削减政府开支以偿还债务，根据财政大臣威尔逊的建议，决定把2500名土著军官转为后备役军官，薪饷减半，政府拖欠他们的军饷也一笔勾销。这些被解职的土著军官十分愤怒，他们聚集开罗，在财政部楼前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政府的决定。示威者逮捕了首相努巴尔和威尔逊，要求内阁辞职和采用立宪制度。伊斯梅尔觉得这是恢复他在国内权威的有利时机，于4月初解散了内阁，任命开明贵族地主谢里夫为首相，辞退两名欧洲大臣，并委托谢里夫起草宪法。

英、法、俄、德、意、奥等欧洲列强害怕赫迪夫与民族主义者结成同盟，纷纷向伊斯梅尔提出抗议。5月19日，英、法发出最后通

牒，要求伊斯梅尔下台，并许诺将保证他每年获得一笔年金和他的长子陶菲克的继承权；如果他拒绝服从，将被废黜和剥夺一切权利。伊斯梅尔向素丹求情，但素丹秉承英法旨意，于5月26日废黜了他，并把他驱逐出国，另立陶菲克为赫迪夫。

新赫迪夫性格懦弱，唯英法之命是从。在英法授意下，他拒绝谢里夫提出的宪法草案，把改良主义者贾迈勒丁逐出埃及，任命以崇洋媚外、反对宪政而蜚声官场的里亚德出任首相。里亚德恢复了双重监督制，继续裁减埃及土著军官，并解散了代议制议会，查封进步报刊，侦缉民族党人，流放进步人士。

陶菲克的反动政策，激起埃及人公开不满。以奥拉比为首的军官们首先发难，于1881年9月率开罗卫戍部队举行起义。起义者包围了赫迪夫王宫，要求解散反动政府，制定宪法和召开国会。国内政治情绪顿时高涨起来，群众到处举行集会，支持军队的要求。陶菲克被迫接受了起义者的全部要求。1881年12月召开了国会。次年2月，马哈姆德·萨米·巴鲁迪出任首相，组成以民族党人为主的政府，奥拉比担任陆军部长。

巴鲁迪内阁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令。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制定了新宪法，确立了内阁不向赫迪夫而向议会负责的原则，议会被赋予讨论、通过与国债和贡赋有关的全部国家预算权，实际上废除了双重监督制，并解雇外国官吏；二是决定让300名庸碌无能的军官(大多是土、契族军官)退役，晋升600名土著军人为中下级军官，授予奥拉比等数名土著军官以将军衔和帕夏称号，从而提高了土著军人在军队的地位。

英法看到无法继续通过赫迪夫和内阁控制埃及，便借口保护侨民安全，于1882年5月20日将舰队驶抵亚历山大港，并向埃及

提出联合备忘录，要求解散内阁和驱逐奥拉比出国。陶菲克俯首听命，同意巴鲁迪内阁辞职，并试图自己领导内阁，恢复独裁统治。但在愤怒的群众和军队的抗议下，陶菲克又恢复了奥拉比的陆军大臣职务，而内阁其余各部的职位却空着，这样奥拉比就成为政府的惟一大臣，把全部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

英军占领埃及

1883年6月11日，亚历山大一名英籍马耳他人租借当地居民一匹驴子游逛，但却不给租钱，引起争执，进而引起当地居民和外国侨民之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238人在冲突中死亡，其中埃及人163名，欧洲人75名，英国驻亚历山大领事科克森也被击伤。

事件发生后，英国即明确告知法国，它要对埃及实行军事占领。在埃及问题上，法国历来与英国有矛盾，但由于当时它在欧洲正面临德、奥反法同盟的威胁，不敢公开反对英国的计划，因而坚持主张召开国际会议来解决埃及问题。6月25日，英、法、德、奥、俄、意六国在伊斯坦布尔开会。埃及未受到邀请，埃及的宗主国土耳其则拒绝出席。素丹感到奥拉比运动为他恢复对埃及的控制提供了机会，并且已派人暗中鼓励奥拉比反对西方列强和废黜赫迪夫。会议初步达成两点协议：一是缔约国不得占领埃及任何部分和在埃及谋求任何特殊利益，二是在会议进行期间，各国不得对埃及单独采取行动，但在英国坚持下，又加上了一句——“不得已的情况下例外”。这就为英国自己破坏协议，入侵埃及埋下伏笔。

果然，不等会议结束，英国就破坏了协议。7月10日，法国因国内弗雷西内特政府倒台而将其舰队撤离亚历山大港。英国乘机向埃及挑衅，它的舰队司令西摩向埃及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24

小时内停止在亚历山大港修筑工事，因为这“威胁英法舰队”。奥拉比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7 月 11 日，英舰开炮轰击亚历山大，接着 25 000 名英军登陆，于 13 日占领了该城。

早在一个月之前就以避暑为名来到亚历山大的陶菲克，要求奥拉比不要抵抗占领者，遭到奥拉比坚决拒绝。埃军在埃及北部建立防线，顽强阻挡英军深入内地。17 日，陶菲克发表声明，声称英国炮轰亚历山大完全是由于奥拉比等人违抗旨意，修筑工事所致，勒令奥拉比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到亚历山大听候发落。奥拉比愤怒谴责了赫迪夫的卖国行经，并立即在开罗成立了由僧侣、部分议员和政府官员、贵族和民族党人军官组成的非常会议，以组织对英军侵略的抵抗。非常会议任命奥拉比为武装力量总司令，并授予他“埃及保卫者”的称号，同时宣布赫迪夫及其内阁的命令一概无效。这样，陶菲克实际上已被废黜，奥拉比成了全民族的领袖。

在奥拉比和非常会议的领导下，埃及军队进行了顽强抵抗，并数次击退英军进攻。但是，由于当时数万埃军仍驻扎在苏丹镇压马赫迪起义，部署在数百公里长的防线上的埃军仅有 1 万多名正规军和 4 万多名临时征募的新兵，兵力十分薄弱。奥拉比在军事指挥上也犯了错误：他以为英国人不会破坏运河中立协定，没有在运河地区设防，又把最重要的阵地交给无纪律的贝都因人部队，而英国人收买了他们的首领。结果，英国从印度调兵开入塞得港、伊斯梅利亚港、苏伊士港，迅速控制了运河区，从东西两个方向夹击埃军，于 9 月 13 日突破东部防线。奥拉比本打算退守开罗，但他发现开罗城防要塞仅剩下 1 000 名乡丁和 40 名骑兵，英军已兵临城下，想调遣西线军队增援已来不及。在这种情况下，奥拉比被迫

投降。9月14名，英军开进开罗。奥拉比以及2 900名爱国人士被捕，交付法庭审判，许多参加抗英斗争的人被处死。奥拉比亦被判处死刑，但后来又改判终身流放。赫迪夫陶菲克返回开罗，双重监督制重新恢复。埃及名义上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但赫迪夫及其各部大臣都是英国手中的傀儡，只是由于顾忌俄国和法国的反对，英国未敢公开吞并埃及。

至此，以反对赫迪夫和欧洲列强干涉埃及国内事务为宗旨的奥拉比运动以彻底失败告终。对于这一失败，尽管可以罗列种种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但根本原因则是埃及民族主义力量、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还不够成熟，不够强大，无法战胜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

四、19世纪的埃及文化

印刷与出版

直到18世纪末，埃及人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人民一样，过着自给自足、因循守旧的生活，他们不求自己进步，也不关心外界的发展。拿破仑入侵所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使他们开始与过去的自我封闭观念决裂。埃及近代著名启蒙学者、穆罕默德·阿里的朋友哈桑·艾塔尔在开罗与法国学者接触后，深感埃及的落后。他说："必须改变我国的现状，我们必须引进埃及尚不知道的新知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埃及文化出现一系列的新变化，其中最早出现的变化是它有了自己的印刷业和出版业。

拿破仑占领埃及后，把他从梵蒂冈掠夺来的一部阿拉伯文印

刷机带到开罗，用来印刷宣传品。穆罕默德·阿里统治埃及后，派尼科拉·马萨布基到米兰学习印刷技术。四年后，他回到国内在亚历山大里亚的阿森纳尔建立了第一个印刷所，该所于1822年迁到布拉克，成为著名的布拉克印刷局，同年出版了第一本出版物《意阿词典》。该局直到现在还是政府的印刷机关。由于穆罕默德·阿里当时关心的是国家法令的宣传和军队的建设，因之印刷局的主要业务就是印刷政府文件，包括总督颁布的命令、法律和各种规章，也为武装部队和新建学校提供教材和手册。最初的印刷机器、纸张、油墨等设备和材料来自意大利，不久油墨和纸张在埃及自造。印刷的文字包括阿拉伯文、意大利文和希腊文。第一批有关技术人员是叙利亚人、美国人和意大利人。伊斯梅尔时期，埃及出现了由穆罕默德·亚莱夫成立的以传播科学知识为目的的私人出版社——"知识会"，惜之未能存在下来。

随着印刷出版业的出现，翻译西方著作成为埃及人在许多领域获得知识的直接来源。穆罕默德·阿里制定了宏大的翻译计划，着力向公众介绍欧洲人主要是法国人的著作，不过在很长时间里，主要限于医药卫生、工程技术和其他实用科学方面。有趣的是，翻译和出版导致了阿拉伯语言和文化研究的复兴。因为大规模的翻译必然要求有阿—法词典、阿—意词典、阿—英词典之类的工具书，也要求用阿拉伯文来表述一些技术方面的词汇，以方便埃及学生学习科学技术课程。但是很显然，阿里时期的翻译和出版其努力方向是教育与科学，其服务对象很少超出世俗国立学校的范围，大众教育仍属传统的宗教机构的事情，而且事实上，许多爱资哈尔学校并没有被列人新的国家教育计划。

阿里时代翻译出版业的发展，使埃及出现了一代新型的知识

分子。他们对西方先进文化比传统的知识分子有更多的了解，并有可能取代爱资哈尔的沙伊赫们成为的近代埃及教育和文化的领导者。到了伊斯梅尔时代，这种可能已经变为事实。

新　　闻

1827年，埃及出现了第一份月报《赫迪夫报》，用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两种文字出版，最初发行量不到一百份，由帕夏的办公室分发给高级政府官员和各省省长。哈桑·艾塔尔任主编后，发行范围扩大到乌来玛、国立学校学生、武装部队和海外留学生，其消息仅限于政府法令和决定。严格地说，它还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报纸。1828年出版的官方报纸《埃及时事报》是一份更详细地报道全国事件、政府决定和规章的报纸，发行量扩大，亦用两种文字出版。不同的是，它起初不是日报，每周仅三期。1832年在亚历山大出现了第三种报纸《现代埃及》，为法文报，显然是外国侨民创办的。穆罕默德·阿里希望这份面向外国读者的报纸能成为捍卫他的政策的报纸，也可能是为了同土耳其当时对他有敌意的《现代奥托曼》对抗，因此给该报某些支持。但该报在1834年后停办。穆罕默德·阿里在三四十年代还出版过军队报纸和工商方面的杂志，但到他的继承人阿巴斯一世和赛义德时期却被中断了。

在阿里时代，出版社几乎都是国家创办的，仅限于出版官方报纸，没有人试图出版独立的报纸和杂志。1863年伊斯梅尔上台以后，一系列事件——1866年的代表大会，1876年混合法庭的建立，英法对埃及财政的双重监督以及1881～1882年的立宪运动——的发生，导致公众对国家政策和国际事务更加关心，同时伊斯梅尔出于推动他的欧化事业和对抗诋毁者的目的，给予新闻出版以鼓

励和资助，一批非官方的报刊涌现出来，使埃及出现文化复兴、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大和新闻业发展的局面。1886年，他资助了第一份政治性报纸《尼罗河谷报》，作为他的政策的喉舌。在教育和文化领域，他资助了最早一批由学者创办的学术性报刊，如医学杂志《医王报》(1865)、教育杂志《埃及回声报》(1870)。1874年，军队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埃及战斗报》。叙利亚移民塔克拉兄弟于1875年在亚历山大创办了著名报纸《金字塔报》，它是埃及第一份利用电报收集境外消息的报纸，作为独立的报纸，它也大量刊登广告以增加报社收入。

1871～1879年，宗教与政治鼓动家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在埃及的活动，进一步推动了非政府非官方报刊的出版。1877年，来自叙利亚的萨利姆·纳卡什创办了《埃及报》，反对欧洲控制埃及。1879年他又创办了《商报》，但被里亚德政府取缔。1880年，布迪布·伊沙克在巴黎出版了《开罗报》，攻击新赫迪夫陶非克。与此同时，也有大肆辱骂伊斯梅尔的《湖镜报》和使用方言的讽刺报《公正报》，这两份报的创办者都是贾科布·沙努亚，他被伊斯梅尔驱逐出国后，在巴黎继续出版他的讽刺报，直到1912年去世。1879年，萨利姆·安胡里创办了《东方镜报》，由阿富汗尼的信徒伊布拉赫姆·拉卡尼编辑。值得一提的报纸还有科普特人的报纸《祖国报》以及法文报纸《进步报》、《埃及报》和《亚历山大灯塔报》。

奥拉比运动后，新闻界政治分化加剧，出现了亲奥拉比、反奥拉比和亲赫迪夫的不同派别，不久又出现了亲英派和亲法派。其中支持奥拉比的有《埃及妇女报》、《被保护者报》和《功利报》。陶非克也办了自己的报纸《证言报》以对抗敌视他的报刊，由保守的沙伊赫哈姆扎·法萨拉赫主编。

英国占领埃及后，报纸成了批评英国政策的工具。但由于办报的政治环境改变，这一时期的报刊无论是国内办的还是流亡者办的，都是短命的，都很粗糙，也都是不定期的。而且，很难把它们的伊斯兰—奥斯曼定位同严格的埃及民族主义声音区分开来，如著名编辑阿迪布·伊沙克、萨利姆·纳卡什和阿卜杜拉·纳迪姆等人都坚持埃及与伊斯坦布尔的素丹—哈里发的联系。事实上，90年代报刊的宗教偏见成为最突出的特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是在1895年，新闻界出现明显分化，由叙利亚移民办的某些刊物，如《导报》和《金字塔报》、《文摘报》，认同英国在埃及的政策，部分原因是他们中的一些学者提出这样的思想：一个在先进的欧洲大国控制下的稳定的政府，是实现世俗化民族独立的最好途径。

新闻业的发展使受过欧式训练的国家官员、作家和文人学士们有机会公开表述某些观点，并逐渐对舆论的形成产生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有限的。报刊不仅是公众舆论的制造者，而且是现代书面阿拉伯语的学校，一些“死”语言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有力地影响着埃及文学和史学的发展。

文学与史学

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埃及自被土耳其人征服以后，包括文学和史学在内的各个文化部门长期处于停滞状态。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下半叶，随着教育、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文人中研究过去时代文化遗产的兴趣大增，埃及的文学和史学出现复兴的趋势。

在这方面最早做出贡献的是著名的启蒙学者里法亚·塔赫塔

维(1801～1873)。他曾在爱资哈尔大学受过传统教育,后来旅居法国六年,学习法语和世俗科学,亲眼目睹了1830年七月革命。回国后,他于1834年发表了散文体裁的《巴黎记事》,向阿拉伯人介绍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人权宣言和法国宪法。他放弃贝伊的僧侣称号,去主持炮兵学院翻译局,后来创办了国立外国语学校。他一生写了许多历史著作和教科书,担任过阿语报纸《埃及时事报》和第一家阿语教育杂志《校园》的主编,并和他的学生一起,把欧洲许多科学著作、中等和高等学校的教材、法律文件(包括法国民法典)、军事条令译成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

60年代,一批叙利亚移民来到埃及后,积极开展阿拉伯语古典文学和伊斯兰教历史的研究,使埃及人恢复了对于阿拉伯帝国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自豪。一批反映了阿拉伯文化成就的作品应时而生。其中最重要的有穆罕默德·穆尔塔德·扎比迪编写的大型阿拉伯语词典,贾巴迪的《编年史》和《一千零一夜》的埃及版本。也有持相反态度的作品,如1865年出版的沙伊赫沙卡威(他曾三次出任拿破仑建立的地方名人议会的主席)的《埃及历任长官和素丹史概览》一书,就集中批评了埃及国民的弱点。他哀叹埃及人文化素质太低,生性办事不认真,狡诈而不诚实,在逆境下既缺乏耐心又惧怕权威。

这一时期埃及的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没有严格的界限,前者大多充满浪漫主义色彩,而后者又常常采用历史故事的体裁。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是迁居埃及的两个黎巴嫩作家朱尔吉·泽丹和法拉赫·安通。泽丹除著有一部五卷本的《伊斯兰文明史》外,还利用他创办的《新月》月刊,编辑出版了大量阿拉伯—伊斯兰历史故事。这些作品情节曲折离奇,颇能吸引读者,在当时曾经促进爱国热情

的高涨。安通的长篇历史故事《新耶路撒冷》也具有上述特点，不同的是，该书反映了作者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第六章　英国占领下的埃及

一、英国在埃及的殖民统治

占领当局对埃及的重组与改革

英国占领埃及后，慑于埃及人民以及欧洲列强的反对，未敢直接吞并埃及和改变1840年条约所确认的埃及作为奥斯曼帝国一个行省的地位。占领期间，英国采用了它惯用的那套“间接”控制办法，即在形式上保留赫迪夫王朝，由埃及政府行使权力，但实际统治权却掌握在英国驻埃及的总领事手中。从1883年9月到1907年5月，担任这一类似于总督职务的是伊夫林·巴林。他独揽大权，管理埃及达24年之久，为英国统治这块特殊的殖民地立下“汗马功劳”，被授予伯爵称号，巴林亦因之改称克罗默伯爵。

克罗默毕业于皇家军事参谋学院，但一生却主要与财政打交道。1872年他任英国驻印度总督的私人秘书，1877年和1879年先后在埃及国债局和英法双重监督机构充任英国代表，1880年重返印度任财政大臣。他谙熟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方法，即在总督之下建立本地行政机构。来到埃及后，他希望按印度模式建立英国统治下的埃及秩序。然而埃及不同于印度，它受到欧洲列强

的牵制和国际条约的束缚，英国不可能为所欲为。据此，克罗默为英国在埃及的政策确立了下述方针："英国人不应吞并埃及，但应像吞并埃及那样为埃及谋福利；英国不应干涉赫迪夫政府的行动自由，但在实际上应坚持使赫迪夫及其大臣们俯首听命；英国人和其他列强在理论上享有同等权利，但事实上应发挥巨大影响。"按照这一方针，克罗默对埃及的行政、军事、财政、司法进行了一系列的重组与改革。

在行政方面，克罗默推行"忠告政策"，即英国人不参与具体的行政事务，而仅仅通过其占据政府各部顾问和各省监察官的重要职务向埃及政府提出"忠告"，而埃及各级官吏，包括赫迪夫在内，必须听从他们的"忠告"，采纳他们的意见，否则要被革职。关于这一点，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直言不讳，他说："埃及大臣和省长们应该明白，鉴于英国政府承担着重任，须坚持执行它认为合适的政策，诸位如不按这种政策办事必须离职。"事实上，埃及首相谢里夫就是因为不同意克罗默要埃及放弃苏丹的"忠告"而被迫辞职，由惟命是从的努巴尔、里亚德和法赫米先后继任。这样，在整个占领的前二十多年里，埃及的行政权表面上仍留在埃及人手中，也组建了政府各部，但政治控制权仍全部掌握在英国人之手。这种统治方式被形象地称为"英国的头脑，埃及的手"。

但是在军事方面，英国就不仅仅用自己的"头脑"，而是"手"、"脑"并用。从 1882 年到 1901 年，英国军官在埃及军队中的人数增加了 3 倍，占据陆军部副大臣、埃军总司令、军械总署主任和全部 14 个营的营长职务。1899 年，在 15 个将级军官中，英国人占了 10 个。埃及军队人数被压缩到 6 000 人，仅相当于土耳其素丹规定人数的 1/3。尽管这样，英国仍担心这支部队对它的占领构

成威胁，因而克罗默又以紧缩开支为名，进一步削弱埃及的军事力量：海军舰只由伊斯梅尔时期的18艘减少到6艘；10所军事院校被关闭了9所，留下的1所仅有100名学生；兵工厂和造船厂全部关闭，机器设备被变卖；埃及所需弹药全部从英国进口，并存放在开罗和喀土穆的城堡内，由英军看管；埃及军官几乎完全被排斥于军事首脑机关和情报部门。经过这样一番改造，埃军完全失去了它本应具有的战斗力。

对埃及的改革也意味着抑制其他欧洲列强在埃及的势力，尤其是在财政方面。英国占领前，埃及财政受到英法等欧洲列强的共同支配，列强通过国债局、双重监督制、“欧洲内阁”、“清算法”和混合法庭等机构和法令，强行干涉埃及财政事务，这在当时对英国势力渗入埃及是有利的，然而现在却成为英国独揽埃及财政的障碍。因此1883年1月，占领当局不顾法国的反对，授意陶菲克单方面宣布取消双重监督，而任命英国人科尔文为埃及财政顾问，负责编造政府预算，监督政府还债和履行其他国际义务。克罗默任总领事后，鉴于埃及财政濒于崩溃，认为英国要维持在埃及的统治，就必须避免埃及财政的破产，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取消或修改1880年“清算法”(该法规定，埃及政府必须把年收入的一半用于还债，非经土耳其和债权国许可，不得举借外债)。在英国倡议下，英、法、德、奥、俄、意、土七国在1885年伦敦会议上对清算法作了某些修改。根据会议达成的协议，埃及政府在保持年还款金额不变的情况下，可适当扩大固定开支；由除土耳其外的六国组成新的埃及国债局，并向埃及政府提供一笔款额为900万镑，利率为3%的保证贷款；埃及政府可向欧洲侨民征收房地产税、印花税和营业执照税，以增加收入。这一协议使岌岌可危的埃及财政勉

强能够维持。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后起的德国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引起英法两国的恐惧，两国决定言归于好，于 1904 年 4 月签订友好协定。法国放弃十多年反对英国占领埃及的立场，英国则承认摩洛哥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同年 11 月，两国进一步修改了清算法，取消把埃及财政预算分为开支和还债两部分的规定，不再用埃及的海关和铁路等收入，而用土地税收入抵债，把埃及国债局积累的 1 173 万镑储备金转交埃及政府，并取消国债局监督政府开支的权力。至此，埃及政府表面上获得了较大的财政自由，而实际上则是英国掌握了埃及财政大权。

简言之，通过上述改革，英国全面控制了埃及的行政、军事和财政，埃及的殖民化进一步加深。

英国对埃及的经济掠夺

英国在殖民地向来重视经济利益，在埃及也不例外，富有殖民统治经验的克罗默通过种种办法巧妙地把埃及经济的发展纳人英国的轨道。

19 世纪末，英国工业迅速发展，国内原棉的消耗量不断增加，出口逐年减少，致使英国面临原棉供不应求和纺织品市场变小的局面。为满足兰开夏纺织厂的大量需求，克罗默确定的英国对埃及政策“首先是要求埃及向英国出口棉花，然后再进口纺织品”。他向埃及政府“忠告”，埃及土地肥沃，河水充足，气候炎热，非常适宜棉花种植。在克罗默的鼓励下，埃及大力推行“农业经济专业化”，棉花种植面积由 1883 年占耕地面积 11.5%增长到 1913 年的 22.5%，而同期的棉花产量则增长了近 2 倍，由 2 700 万坎塔尔

增加到 7 700 万坎塔尔。结果把粮食作物挤掉了，昔日著名的“粮仓”现在反而要从拉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口粮食。埃及农民在棉花输出和粮食进口两方面都要受英国商人的盘剥。

占领期间，埃及初兴的民族工业受到严重压抑和摧残。克罗默以埃及缺乏燃料、技术和资金，不宜发展工业为由，要求埃及政府放弃工业发展，以保证农业的发展。埃及政府屈服于占领当局的压力，不仅不敢采取保护和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措施，反而廉价出售工厂设备，关闭厂房，纺织业和造纸业就遭受了如此命运。与此同时，埃及政府为外国商品大开绿灯，除个别几类产品外，一律实行 8%的低关税，而当时英法等工业大国都实行 30%的保护关税。正因为这样，各种洋货充斥埃及市场，民族工业奄奄一息。伊斯梅尔时期，全国有 64 家糖厂，蔗粮自给有余。英国占领后，在进口食糖冲击下，埃及本国糖厂不是合并于外国公司，就是破产关闭，到 1907 年，只剩下 5 家糖厂勉强维持生产，产量不足 2.5 万吨。埃及原来手工业生产比较发达，英国占领后，由于当局征收苛税和外国商品的挤压，大批手工业者破产，沦为城市贫民或农村佃户。

在英国占领下，埃及不仅成为西方国家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而且变成它们的重要投资场所。占领前，西欧各国投入埃及工业、公用事业、土地公司、运输业和银行信贷的资金并不多，1883 年约 640 万镑，加上运河公司投资，也不过 1 600 ~ 1 700 万镑；而到 1914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 10 798 万镑。外国资本，特别是英国资本，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埃及经济的一切部门，获得了巨额利润，但却依仗特权不向埃及缴纳分文，使埃及经济蒙受巨大损失。

不可否认，在克罗默管理埃及的二十四年中，埃及经济确实得

到一定的发展。据克罗默讲，埃及的收入由1883年的893万镑增加到1906年1 533万镑，支出由855万镑增至1 239万镑，国库盈余2 750万镑。但是这一“奇迹”是占领当局对埃及人民敲诈勒索、大肆搜刮的结果，普通埃及人特别是农民并未从中获得任何好处，相反变得更加贫穷。占领当局为增加收入，不断提高地税，而且地税分配不均，农民的海拉吉地税率是王室、长老和酋长的乌希尔地地税税率的3.8倍。占领当局实行的河水轮流灌溉制对买不起水泵，只能用桔槔和水车汲水的农民也十分不利。为了不贻误农时，他们不得不高价租用地主的水泵浇地。许多农民还受到洋人和大地主高利贷的盘剥，高达25%～40%的利息使其中不少人破产，走上变卖土地的道路。到1906年，占埃及人口1%的富人占有44.5%的土地，而占全国人口87%的穷人仅占有23.9%的土地，贫富差别有如天壤。克罗默本人曾亲笔描述过他治理下的埃及农村贫富悬殊情况：在一个乡村，农民住的房屋仅是一些没有窗户、出入必须俯伏的土墙，“犹如狗洞狐穴”，而地主的楼房“占地千米，门窗俱全，还有阳台玉柱，空气阳光非常充足，周围还有花圃林园”。总之，英国占领下的埃及，只有极少数上层分子发财致富，而广大人民日益贫困。

英埃共管苏丹

自19世纪20年代穆罕默德·阿里征服苏丹以来，这个非洲面积最大国家一直是埃及的属地。19世纪下半叶，英国对苏丹的兴趣越来越大。1869年，英国想借助埃及向非洲中部地区渗透，发起组织了一支军事探险队到苏丹南部地区。这支部队打的是埃及的旗号，由埃及政府提供经费，但却由英国人塞缪尔·贝克指挥。

1872年,英国外交部征得伊斯梅尔同意,委托贝克为新并入苏丹诸省的总督,两年后,这一职务由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刽子手戈登接替。1877~1879年,戈登担任赫迪夫在苏丹代理人的职务,成为苏丹总揽大权的统治者。

1881年马赫迪起义爆发后,英国十分希望借平息马赫迪起义之机独占苏丹,但苦于兵力不济和政治上的顾忌,最终决定暂时利用埃及的人力物力,保住喀土穆以北地区和红海沿岸各港,以保证埃及南部边境和大英帝国交通线的安全。1883年3月,由英国军官希克斯率领13 000名埃及援兵抵达喀土穆。但在这年11月的希卡战役中全军覆没,希克斯本人丧命。英国政府迫于形势,决定暂时放弃苏丹。

对埃及来说,放弃苏丹,意味着将丧失250万平方公里领土和大量财富。但在英国的压力下,埃及政府于1884年1月决定撤回全部埃及军队和官吏,并让戈登以总督身份到喀土穆组织撤离工作。而戈登根据英国政府的训令,打算在埃军撤离后,纠集苏丹地方势力,建立一个形式上独立、实际上屈从于英国的苏丹国家。他写信给马赫迪,授予马赫迪科尔多凡埃米尔称号,并赠送给他一批珍贵礼品。但马赫迪不入戈登的圈套,于1885年1月率兵攻陷喀土穆,打死了戈登。

英国不甘心失去苏丹。经过长期准备,1896年3月,英国政府派英籍埃军总司令基切纳率领1万多埃及士兵,以赫迪夫名义进攻苏丹。1898年9月,马赫迪国经过两年多顽强抵抗后沦亡。不久,英国外交部以英埃共同出兵为由,制定了一份"英埃共管苏丹"协议书,其中规定:除萨瓦金海港使用埃及国旗外,苏丹其他各地一律并列悬挂英埃两国国旗;苏丹军政大权由总督掌管;总督由

英国政府推荐，埃及赫迪夫任命；未经总督同意，不得在苏丹施行埃及法律，未经英国政府同意，各国不得向苏丹派驻领事或领事代表。

1899年1月19日，埃及内阁首相穆斯塔法·法赫米在多数大臣未看到协议文本的情况下，签署了这项协议。表面上看苏丹是由英埃共管，但由于握有实权的总督职务由英籍人士担任，埃及处于次要地位，苏丹实际上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

二、伊斯兰改革运动

西方文化对伊斯兰文化的冲击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15、16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呈现出空前繁荣和统一的局面，作为这种文明的政治和精神支柱的伊斯兰教，其神圣性亦达到极致。然而到17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受到来自新崛起的西方文明的挑战，日渐式微，同时伊斯兰传统的教义、教法也日益同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相脱节甚至相矛盾。这一切导致了伊斯兰世界日趋衰败。19世纪下半叶，伊斯兰世界更进一步沦为西方的殖民地而遭受到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侵略的压迫，以基督教伦理学为基础的西方人文科学和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也渗人伊斯兰世界，对伊斯兰传统文化产生强烈冲击。

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伊斯兰世界的思想家作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些保守的思想家把复兴伊斯兰教视为抵御西方文化人侵的关键，主张坚持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及其价值。他们

认为对真主的信仰和神圣法典是一切智慧的开始和终结，力主恢复伊斯兰体制，以抗拒西方文明和现代思想。一些激进的思想家为西方文明所倾倒，主张完全照搬西方，按西方模式组织社会生活，以图民族和国家的振兴。另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或影响的开明思想家，主张在不危及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文化传统和穆斯林世界统一的前提下，改革伊斯兰教，使之与现代科学、现代理念和现代生活相适应。

埃及是奥斯曼帝国最早遭受西方侵略的地区，也是东西方文化最早发生直接碰撞的地区。当拿破仑用坚船利炮叩开埃及大门时，埃及的知识分子为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感到震慑，另一方面，隐伏在这种军事力量背后的人文精神和生活方式则令他们眼界为之大开。在这一背景下，埃及产生了穆斯林世界最早的改革主义思想家法亚·塔赫塔维。这位埃及著名的启蒙学者、翻译家在同西方文化接触的过程中，深感西方思想理论之精妙、科学技术之发达与行政体制之先进，因而在 1831 年返回埃及后一方面把许多西方名著译成阿拉伯文，同时撰写了许多鼓吹改革的文章。他主张采用和借鉴现代西方科学实证思想，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以此谋求伊斯兰社会的发展。他认为教育是传授人类美德和知识的最佳办法，政府应该发展教育事业，对人民的心智进行启蒙，同时，为弥补与西方在技术上的差距，应促进同欧洲的相互关系和影响，鼓励欧洲人向埃及移民。他还主张对政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功能由更高的法律加以限制，政府运行时统治者必须同乌拉玛和科学家商议，并十分强调公众舆论的作用。塔赫塔维的主张虽未直接被统治者采纳，但对穆罕默德·阿里和伊斯梅尔的改革无疑产生了一定影响。不过，塔赫塔维的改革思想尚未触及伊斯兰厚重文化的宗

教基础。

70年代以后，一代新的思想家开始意识到伊斯兰文化和精神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需要更新，并且把改革方向调整到了这种文化和精神的源头——伊斯兰教，其代表人物是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布杜。

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改革

赛义德·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9年出生于阿富汗的阿萨尼德一个有势力的家庭（一说是波斯人，什叶派教徒）。他的父亲赛义德·萨夫德是著名学者、独立部落酋长，自信其家族是先知的后裔。阿富汗尼8岁入清真寺学习，后在喀布尔中学学习神学、数学和阿拉伯课。18岁时，他前往麦加朝圣，途中在印度停留了一年半，学习了英语，也目睹了英国镇压1857年印度大起义的暴行。在麦加，他同各国穆斯林领袖讨论了建立“伊斯兰大同盟”以反对西方列强侵略的问题。这次麦加之行，为他后来的伊斯兰改革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60年代他进入阿富汗政坛，担任枢密院顾问，并创办《喀布尔报》宣传爱国、平等和自由思想，由于卷入宫廷权力纷争，1868年被迫离开阿富汗，侨居印度，不久赴伊斯坦布尔宣传他的思想主张，但遭到正统派穆斯林的攻击，并于1870年被逐。1871年3月，阿富汗尼应伊斯梅尔的邀请来到埃及，在爱资哈尔大学讲学。他常在校内或咖啡馆发表演讲，他的住处则成为他与其他学者和弟子们共同探讨伊斯兰改革问题的场所。1879年8月，因反对陶菲克的独裁统治，他被逐出埃及。此后，阿富汗尼辗转于英、法、美、俄、伊朗和印度，继续宣传他的改革主张。1892年，他定居伊斯坦布尔，至1897年去世。

羁留埃及期间，阿富汗尼的改革活动得到官方的支持。当时，赫迪夫伊斯梅尔希望利用阿富汗尼在伊斯兰世界的声誉来提高自己的威望，与土耳其素丹较劲，给阿富汗尼以盛情款待。阿富汗尼也指望依靠赫迪夫的权势，实现他的改革主张。但在1876年后，他目睹埃及在"欧洲内阁"统治下，主权丧失殆尽，人民深受苦难，便毫不留情地对伊斯梅尔、陶菲克进行抨击，最终被驱逐出埃及。

阿富汗尼博学多才，熟谙宗教学、历史学、逻辑学和哲学，通晓多种语言，他摒弃爱资哈尔那种死记硬背、不求甚解的传统教学方法，而着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研究能力，因之他在埃及的讲学极受欢迎，一大批学生慕名前来拜他为师。他们中有后来成为著名人物的奥拉比、阿布杜、柴鲁尔(或译为扎格卢勒)等人。他的改革思想吸引了社会各界的仁人志士，如咨议会议长阿布杜·塞拉姆·穆韦利希、犹太族政论家雅各布·塞努阿、土著军官拉蒂夫·塞利姆、地主阶级改良派代表谢里夫等。

阿富汗尼向他的学生和追随者传授的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伊斯兰精神。他认为，"政治体制、社会理想和智力的表现形式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对《古兰经》亦应允许根据现代科学和理性的发展作出新的解释，摒弃有悖于伊斯兰教教义的迷信和异端，使其原则与穆斯林的生活环境相适应。为此，"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的改革需要使乌拉玛重新充满活力，重新打开"独立判断"的大门，并采取其他措施，使伊斯兰从传统主义和停滞状态中解放出来。

阿富汗尼希望伊斯兰世界正确对待西方文明和现代科学技术。他指出，欧洲的力量蕴藏于现代科学技术之中，处于衰弱状态的穆斯林要想拯救自己，必须首先了解西方和科技的价值，吸取那

些与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东西，不应消极对待现代科学知识以及政治和社会现象。他强调，现代科学知识与伊斯兰教并非不可调和，在伊斯兰教昌盛时代，有知识的人是受到鼓励的，《古兰经》也传播了科学知识。他号召穆斯林在保持伊斯兰教及其价值的前提下，努力猎取欧洲的科学技术，以增强自身力量，捍卫伊斯兰世界。

阿富汗尼的政治理想是泛伊斯兰主义。他认为，反对西方殖民侵略的惟一方法是全世界穆斯林消除内部的派别纷争，在《古兰经》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他甚至一度主张穆斯林在哈里发的旗帜下实行联合，建立统一的伊斯兰政府，抵御西方对穆斯林世界的侵略与威胁。他虽然在群众中宣传这一主张，但却把希望寄托于社会上层。在埃及期间，他多次与王储陶菲克会晤商谈，期待他早日掌权。然而陶菲克继位后，却把阿富汗尼视为潜在的危险，以建立秘密组织罪将他驱逐出境。后来他又把希望寄托于苏丹的马赫迪、伊朗国王纳希尔丁，亦未成功。最后，他希望土耳其素丹哈米德二世能担当这一重任，因为他认为当时奥斯曼帝国是伊斯兰世界最强大、最有能力反抗西方的政治实体。而哈米德二世也认为阿富汗尼所倡导的泛伊斯兰主义是反对西方殖民势力，维持其封建专制统治的最好武器，因而邀请他到伊斯坦布尔来。这样，他的改革运动也就被纳入了土耳其统治者的轨道。

阿富汗尼的改革思想是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他的政治纲领亦未触及伊斯兰国家腐朽的统治基础——封建制度。尽管如此，他的改革活动毕竟在沉闷的伊斯兰土地上播下了复兴的种子，特别是在埃及他培养了一代具有现代意识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包括思想家和政治家，对尔后埃及历史的发展产

生了深远影响。

阿布杜的伊斯兰社会改革

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是尼罗河三角洲一个农民的儿子,从小接受伊斯兰教育,1866年进入爱资哈尔学习宗教与语言,并对自然科学和历史有所涉猎,毕业后留校任教。1872年,他结识了阿富汗尼,深受其影响。1879年阿富汗尼被驱逐出埃及时,阿布杜亦因与阿富汗尼的合作以及他的政治观点而被解除教师职务。他被迫回到家乡,并被禁止从事任何政治活动。1881年,大概在谢里夫的推荐下,陶菲克召阿布杜到开罗,委任他为《埃及时事报》的编辑,阿布杜重新展开他在教育、语言和宗教方面的改革宣传活动。但在1882年,他又因支持奥拉比运动而被作为共谋犯流放叙利亚。1884年,阿布杜流亡巴黎,与他的老师阿富汗尼共同创办了泛伊斯兰主义报纸《永不分离》。该报出版18期后停办,阿布杜转赴贝鲁特,担任一所学校的校长。1889年阿布杜回到埃及,任初审法院法官,十年后,成为埃及的穆夫替——沙里亚(伊斯兰法)的最高解释者,由此开始他的改革实践活动,直至去世。

阿布杜通过注释《古兰经》和在他的《一神论》一书中的系统论述,力图建立一个能协调伊斯兰教与现代社会的伦理体系。他认为,伊斯兰教是理性宗教,理性是认主的惟一基础,应当依靠理智来解释《古兰经》;当法律的字面意义与理性发生矛盾时,应服从理性解释。按他的解释,穆斯林可以吃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宰杀的动物肉,可以穿西装,也可以在有息银行存款。他认为,伊斯兰教与科学是一致的,两者都揭示了自然的奥秘。他赞成达尔文的人

类起源和进化论学说，甚至在《古兰经》中找到了"生存斗争"的解释。他鼓励教徒为更好的世俗生活而奋斗，认为这是服务真主的一种方式。他也像阿富汗尼那样，坚持"伊智提哈德"（独立判断）原则，要求允许穆斯林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重新解释"神法"的条文，并论证说，穆斯林的法理学家、法官和乌拉玛必须接受现代教育，才能领导现代社会的信徒。

但是，阿布杜最终未能创立某种理论革新的伊斯兰教，其原因首先在于他所承担的这一任务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即宗教与科学难以协调。其次，他企图建立一个使《古兰经》和现代理性主义共生共存的社会哲学，必然要抛弃伊斯兰教的一些公认的信条，改变另一些信条，这不仅有理论上的困难，也有智力上的困难。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他的信徒后来分化成两派，一派走上现代主义、世俗的改革道路，另一些信徒则在拉什德·里达的领导下，走上回归严格正统教义的道路。

与不成功的伊斯兰教理论改革相比，阿布杜在司法和教育方面的改革取得了较大成就。作为具有国家职能的穆夫替，他运用手中的权力按照改革主义思想去解释神法和伊斯兰习惯法，去培训法官；他修改了法律条文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的需要；他要求法院在诉讼中要行使审判权，而不是仅仅适用法律文字。同样，他也运用他担任爱资哈尔最高管理委员会委员所拥有的权力，强行改革爱资哈尔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增加了代数、几何、工程、历史等现代课程。主要由于他的努力，政府于1895年创设了爱资哈尔行政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爱资哈尔的学术和行政监督，包括课程的设置、课本的选择、中心图书馆的建立、考试的进行、财政的组织、人员的委任以及学生纪律等等，都要受该委员会的监督，从而

把数世纪以来完全独立的教育部分地纳入国家教育体系。鉴于国立学校不能充分满足不断增多的学生人数,他和柴鲁尔等人一起于1892年创办了"穆斯林慈善会"。该会的宗旨是为穷人子弟建校,以此作为私人办学的试验。这些学校尽管强调穆斯林教养,但实际上意味着给学生一个现代教育。

同阿富汗尼的改革一样,阿布杜的改革也是伊斯兰世界对现代西方文明挑战的一种反应。所不同的是,前者的目的是要通过学习西方复兴伊斯兰社会,以便同西方抗衡,即所谓"师夷之长以制夷";后者的目的则在于用西方的先进理念改造伊斯兰社会,以适应世界的发展。从表现形式看,前者比较激进,且带有强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色彩和政治革命的特点;而后者则具有温和的改良特点,也不大强调民族主义,这也是阿布杜改革能够得到英国占领当局和埃及统治集团容许的原因。

三、世俗民族主义运动

世俗民族主义运动的滥觞

如果说在英国占领的前二十年,埃及民族运动中占主流地位的是阿富汗尼和阿布杜师徒领导的伊斯兰改革运动的话,那么在后二十年占主流地位的则是以卡迈勒和优素福为代表的世俗民族主义运动。虽然两者都是埃及社会对西方文明的反应,且后者受到前者的深刻影响,但两者的手段和目标却迥然不同。伊斯兰改革运动基本上是一场宗教革新运动(虽然也涉及社会改革),其目的在于复兴整个伊斯兰世界,因而强调所有穆斯林群众和国家的

团结。而世俗民族主义运动鼓吹埃及社会改革，目的是埃及民族的独立和发展。

埃及世俗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与伊斯兰改革运动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有直接关系。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尽管激进，但他把团结阿拉伯民族、抵御西方殖民侵略这一历史伟业的实现寄托于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阿布杜改革思想中的内在矛盾决定了他不可能建立一套新的伊斯兰理论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一代的埃及知识分子不得不寻找新的救国道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伊斯兰运动造成了埃及穆斯林与科普特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紧张。科普特人主要分布于埃及的农村地区，大部分集中于上埃及，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其人口大约 700 万。除了宗教信仰不同之外，他们与自己的穆斯林同胞几乎没有任何区别。由于与伊斯兰文化的长期融合，他们的生活方式、语言和习惯，如女子蒙面、男女割礼、婚丧嫁娶和继承制度等，也与穆斯林毫无二致。科普特人起初是反对英国占领的，但伊斯兰运动却把他们看作异己者，歧视他们。因此，科普特人不仅经常在自己的报刊上批评泛伊斯兰主义，而且希望英国当局保护他们的利益，这显然不利于反英斗争。早在 19 世纪 90 年代，青年政论家卡迈勒就意识到伊斯兰运动的这一严重缺陷，不断撰文和发表演讲，宣传“穆斯林和科普特人是被共同的爱国主义精神、风俗习惯、道德品质和生活环境联系在一起的一国人民”，必须互敬互爱，团结奋斗。

世俗民族主义运动起初是十分温和的，运动的参加者主要限于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埃及问题的实质不是英国占领，而是埃及民族的落后和分裂”，因而反对奥拉比式的暴力斗争，而主张诉

诸公众舆论，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他们号召人民发展民族产业，特别鼓励埃及商人奋发图强，敢于同外商竞争，以保护民族市场，振兴民族经济；政治上他们主张制定一部宪法，建立真正的代议制民主制和由爱国人士组成的民族政府。这些主张主要通过报刊进行宣传，其中以长卡迈勒的《旗帜报》和优素福《埃及人报》最为著名。他们还募集资金兴办民族学，以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学生，如卡迈勒于1899年创办了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学，把热爱祖国、热爱团结、热爱联合作为学校宗旨，还倡议筹办了埃及第一所世俗大学——开罗大学。不过，在1906年之前，世俗民族主义运动仅限于知识界，还没有形成民众运动。

丹沙微事件

英国占领当局镇压了奥拉比运动以后，通过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取消一些苛捐杂税和废除徭役制度，改善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从而使埃及长期处于政治平静状态。英国人认为，他们已经成了"穿蓝袍的人（指埃及农民）的朋友"。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平静并不意味着埃及人民甘愿忍受英国的占领制度。到20世纪初，由于国内民族主义者的推动以及俄国1905年革命和青年土耳其运动的影响，一个偶发事件终于点燃了埃及人民的反英怒火。

1906年6月13日，一支英军巡逻队在由开罗去亚历山大途中经过米努夫省的丹沙微村时，5名军官心血来潮，不顾村民劝阻，肆无忌惮向落在打谷场上啄食的鸽子开枪射击取乐，结果引燃麦秸，焚烧了打谷场，并击伤当地伊玛目（伊斯兰教教会的主祷者）的妻子。当村民围住他们争论时，他们又开枪打伤了3个村民。

村民们怒不可遏，用土块、棍棒还击，夺走了这些歹徒的武器，扣押了3名军官。另两名军官仓皇逃跑，其中一名在途中因中暑倒毙。英国占领当局对丹沙微的村民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判处村民四人绞刑，2人终身苦役，7人7～15年苦役，3人监禁1年，5人鞭笞50皮鞭。6月28日，绞刑在该村执行，在场村民无不悲愤交集，失声恸哭。

英国人残酷迫害埃及农民的暴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各地纷纷举行民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为事件震怒的埃及世俗民族主义者也开始改变对工农群众的态度。过去他们从未把工农群众看作民族运动的积极力量，甚至反对工农群众用暴力对抗占领当局，害怕工农群众参加民族运动。现在，虽然他们仍坚持以和平方式实现英国撤军，但是开始关注和同情人民群众的斗争，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在报上无情揭露英国占领军在埃及犯下的罪行，痛斥克罗默的独裁统治，强烈要求取消特别法庭，建立代议制政府。

克罗默的恐怖政策也引起英国国内舆论的谴责。在野党利用丹沙微事件攻击执政的自由党，自由党内部因此分歧加深。为了巩固在埃及的统治，英国当局试图改变统治手段，先是允许一些持温和立场的埃及民族主义者担任某些政府职务，继而于1907年4月撤换了被埃及人民称之为"东方暴君"的克罗默，由埃尔登·戈斯特出任总领事。戈斯特是个"埃及通"，曾任埃及内政部顾问和财政部顾问，并与赫迪夫阿巴斯二世私交甚深。他深知克罗默的公开镇压政策不得人心，打算通过幕后操纵赫迪夫的办法来实现英国对埃及的统治。为此，他让阿巴斯二世分享一点权力，对其占据宗教田产和卖官鬻爵的行为亦听之任之，希望得到阿巴斯二世的"通力合作"。

阿巴斯二世最关心的就是他个人的权力地位。不过,在一段时间里,许多民族主义者却把他看作民族利益的代表,把埃及独立的希望寄托于他。1892 年阿巴斯二世即位后,由于克罗默没有满足他分享权力的欲望,于是他玩弄权术,以同情者姿态接近民族运动的领袖们。1904 年英法协约签订后,英国对埃及的占领进一步巩固,克罗默要求阿巴斯二世必须与民族运动脱离,否则将废黜他。阿巴斯二世为保住他的地位,只得依从。丹沙微事件后,看到民族运动重新高涨,他再次摆出运动同情者的姿态,于 1906 年接见了卡迈勒和法里德,允诺将资助他们创办英文版和法文版的《旗帜报》。然而戈斯特的新政策一出台,他便迅速改变立场,无耻地称颂"英国占领比其他国家占领要好",攻击卡迈勒等人不是用合法手段来改革国家,而是从事蛊惑人心的活动。

英国统治埃及手法的改变和阿巴斯二世真实面目的暴露,引起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们在实现埃及独立的方法、埃英关系以及埃及是否已具备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基础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并导致这一运动迅速分化。至 1907 年正式形成三个不同的政党:人民党、祖国党和立宪改革党。

人 民 党

埃及政坛上出现的第一政党是 1907 年 3~4 月间成立的人民党。其缔造者中最著名的是马哈茂德·苏莱曼帕夏和哈桑·阿布德·拉泽克。两人长期担任农业省份的领导人,前者还曾担任过亲奥拉比运动的议长。但是在 1914 年之前,人民党的实际领导人是艾哈茂德·卢特菲·赛义德。他从人民党成立起担任该党党报《杰里丹报》的主编,一直到 1915 年初该报停刊,因之成为党的智囊和

良心,理论家和宣传家。

卢特菲最重要的工作是鼓吹世俗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他认为,无论从地域上看还是从历史上看,都存在一个埃及民族,它是独立于伊斯兰社会的。在他看来,世纪之交埃及民众之所以在政治上平静沉寂,那主要是因为他们缺乏教育,削弱了他们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意识的落后,是一代一代积累起来的,只能通过现代教育加以改变。按照卢特菲的看法,现代教育能够培养个人独立和个人向社会负责的精神。这两种品质对民族性的加强是必不可少的。可悲的是,埃及人正好缺乏这两种品质,他们崇拜权威,缺乏自尊,屈服于独裁统治。纠正的办法在于通过教育,即反复向他们灌输公民道德原则以及个人和社会的责任,逐步转变,而不是政治革命。

从自由主义原则出发,卢特菲反对英国占领,主张埃及独立,因为只有独立的民族才有可能获得政治自由。但仅仅独立是不够的,还必须制订一部限制政府权力、赋予人民自由权利的宪法,因为惟有立宪制度能够保证政治自由。那么,如何实现民族独立和建立立宪制度呢?卢特菲认为,埃及只能走改革图强之路实现独立;当埃及在经济上政治上强大起来以后,英国人的占领制度就难以维持下去。因此,他反对政治家向群众呼吁革命,认为这会使英国对埃及的民族要求趋于强硬。至于立宪制度,他认为它必须建立在个人自由之上,而个人自由的获得则要通过基于现代欧洲文明原则的国民教育来实现。但是他反对国家控制教育系统,而主张教育由公民个人负责。

卢特菲的上述思想构成了人民党意识形态的核心。但是,这些思想无论是作为报纸的观点还是作为人民党的观点,在埃及民

族主义者中间都从未被普遍接受。其原因首先是，卢特菲给埃及人争取进步提出的任务要拿出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其次，他设想不仅欧洲文化是最先进的，而且欧洲人也愿意拯救颓废的伊斯兰社会，这显然与英国占领埃及的事实不符；第三，对于普通埃及民众来说，他提出的过于理性的、功利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是难以领悟的。因此，尽管卢特菲作为一名教师和作家，对现代埃及的知识分子和社会风气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但作为政治家却是一个失败者，他未能对埃及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同样，以卢特菲思想为理论基础的人民党对埃及民众根本没有任何吸引力。它的主要成员及其追随者均来自埃及社会的上层，包括知识分子、地主、官员和企业主。这些人虽然也反对英国人和赫迪夫的独裁统治，以埃及独立作为党的目标，但认为，仅仅攻击英国人和赫迪夫并不能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实现民族自立的最稳妥的道路是通过理性的改革和理性的政治行动逐步积蓄力量，才能最终摆脱英国占领，而这种力量只能来自于教育，来自于每个埃及人介入公共生活。因此，他们反对激烈的革命行动，也反对民族运动中的伊斯兰倾向，对英国占领当局采取了合作的、调和的态度。克罗默把这些人称为“埃及的吉伦特派”，而埃及民众则把他们视为英国人的工具。

尽管如此，人民党的活动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的纲领完全排除了泛伊斯兰主义，从而确立了严格的埃及民族意识。在1907～1914年，它的领导成员的著作和活动，为1922年埃及独立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并为独立后的埃及提供了某些重要思想和一批政府官员。

祖 国 党

人民党的成立以及《杰里丹报》宣传的温和民族主义观点，立即引起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反应。1907 年 10 月 22 日，他们在亚历山大成立了自己的政党——祖国党（一译民族党）。出席祖国党成立大会的 6 000 余名代表主要由市民构成，其中学生占了很大比例，他们都是穆斯塔法·卡迈勒最热烈的追随者，卡迈勒自然成为党的领袖。

在祖国党成立之前，卡迈勒把主要精力倾注于争取法国、土耳其素丹、赫迪夫阿巴斯二世的同情和支持上。他以为法国在埃及有巨大利益，不会容许英国独占埃及，而且误认为法国是美国、意大利、比利时、希腊的"解放者"，是现代文明世界的"中心"，一定会援助埃及，因之对法国寄予很大希望。1904 年英法协定签订后，他不再对法国抱有幻想。他承认土耳其对埃及的宗主权，多次晋见素丹，争取其帮助；素丹也想借用他的力量，赶走英国人，曾赐给他一些珍贵的礼物，并授予"贝伊"和"帕夏"的称号。他还把奥拉比失败的原因归之于与赫迪夫决裂，强调支持赫迪夫是保持民族团结，反对英国占领的重要保证。丹沙微事件后，他到处发表演讲，要求英军立即撤出埃及，得到大批学生、市民和农民群众的支持。

但直到此时，卡迈勒还没有成立政党的打算，只是在人民党的刺激下，他才建立了自己的祖国党。他为祖国党制订的纲领基本上也仿效了人民党，并且接受了人民党的几个重要原则，即埃及的独立只能通过埃及人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教育是救国之本。但是他不接受人民党的下述主张：先与英国进行策略性合作，最后再

就埃及的未来与英国谈判。祖国党坚决要求英国立即撤军，让埃及独立。

实际上，两党的差别主要还是在斗争方式上。人民党侧重于从事合法的政府和议会活动，完全排除暴力行动；而祖国党着眼于群众运动，如有必要，甚至诉诸暴力手段。祖国党的成功也正在于此，它动员了千百万普通埃及人起来为独立而斗争，使奥拉比运动失败后那些对独立绝望的民众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这一点，即使卡迈勒的反对者和诋毁者也不否认。

但是卡迈勒 1908 年 2 月英年早逝，刚刚成立数月的祖国党很快黯然失色。党的新领袖穆罕默德·法里德缺乏他的前任那种热情和人格魅力，又长期在热那亚流浪，不可能实施有效的领导。因此，卡迈勒去世后，祖国党实际上控制在以党的《旗帜报》主编阿布德·阿奇兹·贾维什为首的一批激进分子手中。他们经常在报上攻击政府中的英国顾问，鼓动学生示威，导致政府在 1909 年 3 月恢复了 1881 年出版法，并通过了严格禁止学生从事政治活动，包括密谋行动的立法。由于政府的严厉镇压，祖国党的活动日益困难。到 1914 年，该党已不再是埃及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而到 1918 年，该党便完全失去了政治影响。

立宪改革党

祖国党成立一个月之后，即 1907 年 11 月 22 日，阿里·优素福的立宪改革党宣告成立。该党首先反映了优素福在《埃及人》报上表达的观点：既反对祖国党的激进民族主义立场，也不赞同人民党提出的温和而世俗的改革纲领以及不排除与英国占领当局合作的做法。其次，它谋求捍卫赫迪夫及其宫廷官僚的利益。当时赫迪

夫阿巴斯二世撤消了对卡迈勒的支持，并与新的英国总领事和解，人民党正谋求通过实行代议制度削弱他的权力与权威，自然希望有人出来维护他的地位，保护他的利益。优素福的党正是出于赫迪夫的需要而产生的。优素福的爱国精神无可指责，但他建党的目的是要建立他本人与赫迪夫之间的政治联盟，以便在维护赫迪夫权威的同时，推行自己的主张。他赞同卡迈勒主张的英军撤退原则和人民党关于代议制的要求，但宁愿在赫迪夫领导下实现这两个目标。该党名称中的"立宪"一词表明对卡迈勒的激进方式的不满，而"改革"一词则是企图抵消人民党的影响，并使英国人满意。然而该党仅仅是优素福一个人创建的党，除了赫迪夫及其宫廷官员非正式的、时断时续的支持外，它在埃及没有真正追随者。因此，当优素福在1913年去世后，该党很快就解体了。

四、华夫脱运动与埃及的独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埃及

1914年8月5日，即英国对德宣战后的第二天，埃及侯赛因·鲁什迪政府宣布，承认战时英国在埃及的特殊地位，并禁止埃及人与英国敌国国民的一切经济往来。这使得埃及的棉花突然不能自由出口，而要由英国控制，一些必需品的进口也将由英国保证。由于战时黄金和货币进入埃及不安全，一切商业贷款只得暂停，这给经营棉花贸易的商人造成困难，加之海上交通受阻，棉花出口锐减，棉价急剧下降。据估计，战争头两年，埃及在棉花生意中损失了2000万镑。

战时，埃及立法议会被无限期推迟举行。同时，政府禁止五人以上的公众集会。俄土战争爆发后，驻埃英军总指挥约翰·马克斯维尔当即于 11 月 1 日宣布在埃及实行军事管制法。六天后，他又通知埃及首相，埃及政府的政策现在要由英国军事当局监督和控制。

1914 年 12 月 18 日，英国单方面宣布埃及为它的保护国，从而改变了埃及的法律地位，埃及由此永远地脱离了土耳其。

战争爆发时，阿巴斯二世正在伊斯坦布尔旅游。鲁什迪建议他立即返回埃及，但他拖延了归期。英国早就对这位亲土的赫迪夫感到恼火，乘机在宣布保护制度的第二天废黜了他，由他的叔父侯赛因·卡迈勒继任，但其头衔不再是赫迪夫，而是素丹。他是自 1517 年土耳其人征服埃及以来第一个非奥斯曼帝国任命的埃及统治者。埃及政府亦随之中断了与土耳其的一切联系。

1914 年底，德土联军从巴勒斯坦向苏伊士运河发起攻势，战火烧到埃及门口，埃及逐渐成为英、奥和其他英帝国军队的巨大的集结地，埃及民众因此承担起了英军在近东军需的重担，包括为军队提供住房，安装通讯线路，修筑道路、工事，购买和提供牲畜与饲料。到战争结束时，共有 150 万以上的埃及人进过劳工团。

由于实行军事管制，战前二十年积极鼓吹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停止他们的宣传鼓动活动。激进民族主义者的《旗帜报》不必说，就是比较温和的人民党的《杰里丹报》也在 1915 年停止发行。

战争期间，埃及本地工业开始迅速发展。先前从欧洲进口的纺织品、毡帽、食糖、香烟，现在自己生产。战时不断扩大的运输需求，使铁路工人、码头工人数量增加，开罗、亚历山大、伊斯梅尔港、

苏伊士港和塞得港开始发展为工业劳动力的中心。

1917年10月9日，长期患病的素丹侯赛因去世，其弟艾哈迈德·福阿德继位。福阿德有很大的政治抱负，他和鲁什迪首相向英国施加压力，要求重新考虑1840年的投降条约，进行宪政改革。他们希望英国作出政治让步，以便维持他们在民族主义领袖和群众中的威望。作为一种姿态，英国于1917年12月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研究埃及素丹和政府的要求，并规定在1918年11月前完成宪政改革工作。该委员会由英国在埃及政府中的司法顾问威廉·布隆尼亚特领导。但是委员会的工作毫无成果：关于投降条约，由于无法召开原来签约的英、俄、奥、普、土五国国际会议，仅英、俄双边谈判是不可能解决的；关于宪政改革，委员会提出了正式建议，但埃及人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不现实的。

战时埃及的政治和经济状况表明，英埃矛盾进一步加深，战后埃及必将出现民族运动的高潮。一方面，英国强加给埃及的保护制度，不可避免地引起埃及民族主义者与保护国之间在战后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军事管制法的实施妨碍了现代埃及改革家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继续公开对话，使得前者只能求助于民众力量去实现自己的要求。另外，战时中东其他地方的变化（如由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领导的阿拉伯起义）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威尔逊总统强调一切附属民族自决权的十四点和平纲领的发表，也进一步鼓励了埃及民族主义者的独立要求。

华夫脱党的建立

1917年12月威廉·布隆尼亚特委员会成立后，埃及各派政治势力即开始考虑就埃及政治前途问题同英国当局打交道的策略和

计划。鲁什迪首相渴望由政府出面与英国谈判，不愿与任何民族主义团体——无论是温和还是激进的——联系；但是，他不仅是为英国保护国利益服务的战时政府首脑，而且是亲近素丹及其宫廷的人，人们对他的政治立场普遍怀疑。以王子奥马尔·图松为首的宫廷小集团，也谋求在与英国谈判中取得主动，然而这些贵族显贵们根本得不到社会支持。祖国党在英国撤军问题上一直坚持不妥协的立场，在学生和市民中也拥有一批追随者，但是党的领袖法里德和许多骨干流亡瑞士，留在埃及的那些党员缺乏领导品质，没有能力单独与保护国谈判埃及的政治地位。已经死亡的立法议会的一批议员也行动起来，他们选举萨阿德·柴鲁尔为发言人，期待组成"民族代表团"向英国当局提出埃及的要求。

相比而言，在争夺民族独立运动领导权的角逐中，柴鲁尔及其立法议会的同事们最具实力。他们一般都和人民党有联系，不仅代表了现代行政官员、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中的新精英，而且也代表了一批在种植棉花中获利、与城市工商业和金融业相联系的新地主。在社会上，他们属于来自埃及本土各省的上层分子，不同于那些来自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的贵族。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实业报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认为没有经济实力，立法和社会改革不可能导致政治进步。这些人都是作为温和改革主义者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涯的，在战前的十多年里，作为行政官员，也都有亲英的记录。但是现在，这样的记录反而成了他们的优势：他们被认为比其他人能更好地同英国谈判，同时他们最接近英国政府和政界的想法。

柴鲁尔集团不仅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而且拥有广泛的社会联系。由于长期从事行政、司法和议会工作，他们与各省议会、市政当局和地方乡村的统治者关系密切，在1918年，他比其他团体

有更好的机会去组织全国支持。与激进民族主义或泛伊斯兰团体相比，他们也更能为科普特少数民族所接受，更有能力在埃及实现不同种族、不同教派之间的团结。事实上，上埃及富有的科普特地主和工商界人士在战争结束时都加入了这一集团，其中一些人如维萨·瓦塞费、乔治·凯加特和马克拉姆·欧拜德等为华夫脱党和该党执政时的内阁的主要成员。另外，卢特菲论述的教育观点和柴鲁尔任教育大臣时所做的发展教育的努力，使这个集团也能够吸引学生、教师和知识分子。而卡西姆·阿明的女权主义观点也让埃及妇女把柴鲁尔集团看作改善她们地位的惟一希望，所以在整个1919年的反英示威和后来的女权运动中，妇女都紧密地与华夫脱结成同盟。

由于有这些优势和潜在的支持力量，柴鲁尔与阿布杜勒·阿奇兹·法赫米和阿里·谢阿拉维三位立法议会的议员组成特别代表团，要求同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温盖特会谈。1918年11月11日，即战争结束的当天，他们通过首相呈递了要求。两天后，温盖特会见了他们。在谈话中，他们表示希望尽快取消军管法和保护国制度，让埃及独立，并认为埃及应该旁听巴黎和会。温盖特明确指出，这次会见只是朋友之间的闲聊，而不是埃英政府之间的正式谈判；并且在事后对埃及首相说，他不认为他所会见的柴鲁尔代表团有任何正式资格。

柴鲁尔认识到，如果他和他的集团要领导和控制与英国的谈判，就必须组织能获得人民支持的正式代表团。这是防止政府和宫廷集团与英国谈判的惟一途径，这样可以迫使英国政府承认他的代表团是埃及民族的惟一代表。同一天，柴鲁尔即着手组织可以代表民族讲话的代表团。

11月23日，"埃及代表团"正式组成，阿拉伯语称作"华夫脱"（Waft）。它的最初14名成员主要是原立法议会的议员，只有一、二个例外。华夫脱的章程明确宣布，它的目的是"通过一切合法的、和平的手段，即通过同英国谈判谋求埃及完全独立。"出于争取广泛支持的考虑，章程规定，代表团将根据民族利益的需要增加它的成员。

华夫脱成立后，立即展开在《委托书》上征集签名活动，以造成这样的效果：华夫脱是埃及民族惟一负责和有权解决其政治前途的正式代表。《委托书》上面写着："国民委托华夫脱（由某些专业人士组成）按照大英帝国及其盟国宣扬的正义与自由原则以和平与合法手段谋求埃及完全独立。"但是，当华夫脱把印好的证书分发到全国各地的各种组织时，英国军事当局要求内务部制止证书的流传。对此柴鲁尔向政府提出抗议，鲁什迪解释，当局完全是按照军管法行动，他个人并不负责。虽然征集签名没有成功，但柴鲁尔获得了策略上的胜利：祖国党的两名成员和一些科普特名人参加了代表团，这增加了华夫脱的代表性和影响力。

11月下旬，柴鲁尔为代表团去伦敦同英国政府接触，几次向英国军事当局提出旅游申请，都被温盖特坚决拒绝。于是他们向驻埃及的外国代表展开宣传，说明华夫脱的目的和要求，希望以此间接地向专员施加压力。他们还直接向威尔逊总统呼吁，恳请他支持华夫脱出席和会。鲁什迪首相由于战时与英国合作的不光彩的记录，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考虑，也请求温盖特允许柴鲁尔和华夫脱其他成员去伦敦。但直到1918年底，英国政府一直竭力阻挠华夫脱或其他任何代表团去伦敦或巴黎。

1919年1月12日，华夫脱得知刚刚摆脱土耳其统治的叙利

亚被允许派团参加巴黎和会，感到十分愤慨。他们认为，土耳其人对埃及的宗主权早已取消，埃及完全有资格同叙利亚一样出席和会。因此，他们给各国首脑和英国下院发电，陈述自己的要求，但是没有任何人愿意倾听华夫脱的声音。

巴黎和会开幕后，华夫脱活动更加活跃，埃及陷入无政府状态，英国政府决定改变不与任何埃及代表团谈判的政策，邀请首相鲁什迪组团来英。然而鲁什迪坚持他接受邀请的条件是，英国应允许申请到欧洲旅行的任何埃及人到伦敦去。这个条件自然是专员署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意味着柴鲁尔的华夫脱将出现在伦敦和巴黎。于是鲁什迪提出辞职。

英国政府现在认为，华夫脱的行动对埃及的公共安全构成危胁。3 月 6 日，驻埃英军司令瓦特森将军召见柴鲁尔和华夫脱成员，警告他们，如继续活动将受到军事管制法的制裁。华夫脱发电给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对这一压力表示抗议。3 月 8 日，军事当局逮捕了柴鲁尔、伊斯梅尔·西德基和哈马德·巴西尔，将其流放马耳他。这一暴行，当即在埃及激起大规模的群众反英浪潮。

埃及的独立

放逐柴鲁尔等人的直接后果是开罗、亚历山大和其他城市发生了接连不断的抗议示威。工人罢工、学生罢课遍及全国，破坏铁路和电讯线路的事件层出不穷，从开罗通往南北方向的交通和通讯一度中断。英国军事人员也成为攻击的目标。3 月 18 日，8 名乘火车去开罗的英军军官在途中被杀。由于鲁什迪辞职后政府阙如，华夫脱便成为埃及人惟一的代表和代言人。

3 月下旬，艾伦比将军接替温盖特成为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

同时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在下院声明，称英国不反对在伦敦接见一个由鲁什迪和阿德里·亚昆组成的代表团，但不能接见没有正式身份的柴鲁尔和华夫脱。寇松并且暗示，英国对保护制度的态度未变。这一声明引起埃及人进一步不满，接踵而来的是更多的罢工和示威，最严重的是国家雇员的三天罢工。不过，此时英国政府已经确信，在和会上盟国将承认英国对埃及的保护，即使埃及人到伦敦和巴黎陈述他们的要求，也不会对英国在埃及的地位构成威胁，因而于4月7日释放了柴鲁尔等人。四天后，华夫脱的代表启程前往巴黎。

英国政府的估计很快得到证实。4月22日，威尔逊总统正式承认英国对埃及的保护关系。5月，和会大会作出了同样的决定，并明确写入了6月份正式通过的凡尔赛和约。在巴黎的遭遇令华夫脱感到沮丧，但国内人民的反英斗争并未因此而停息。相反，持续不断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和公务人员罢业的活动，使得任何埃及政府，如果不承认华夫脱为埃及民族要求的正式代表，便难于执政。

1919年底，英国政府派遣以米尔纳勋爵为首的调查团到达埃及。调查团的正式使命是查明三月事件的原因，而实际则是试探与民族主义者达成协议的可能。埃及人民以全面抵制和反英示威来对待米尔纳调查团。这使调查团意识到，没有华夫脱的参加，任何谈判都没有希望成功。事实上，在调查团回到伦敦以后，便邀请柴鲁尔加人谈判。1920年8月，调查团提出了一份关于英埃关系的备忘录，基本要点是：英国放弃在埃及的保护制度，承认埃及是一个有代议制机构的君主立宪国；埃及可以有自己的外交代表，但其政策要和英国保持一致；英国在埃及有权驻军，有权派驻司法顾

问和财政顾问。由于备忘录的规定实际上保留了英国对埃及的占领制度，柴鲁尔没有接受备忘录。首次谈判破裂。

1921年3月，阿德里·亚昆组织了新政府，邀请柴鲁尔再次参加对英谈判。柴鲁尔提出，他参加的条件是先废除军管法，终止保护制度。这使阿德里十分为难，他知道，没有柴鲁尔参加，政府不可能获得人民的广泛支持，谈判注定会失败；另一方面，他无法改变英国的顽固态度，满足柴鲁尔提出的条件。华夫脱内部一些人感到妥协是必要的，主张放弃参加谈判的先决条件，但是以柴鲁尔为首的多数华夫脱成员坚持不能让步。

1921年5月，阿德里宣布代表团正式组成。7月1日阿德里代表团赴伦敦，柴鲁尔留在国内继续从事反英活动。12月，埃及示威风潮又起，英国当局再次逮捕了柴鲁尔和他的几名战友，把他们流放到印度洋南部的塞舌尔群岛，试图以此保证伦敦谈判的成功。

但是伦敦谈判还是破裂了，阿德里辞职。副首相阿布代尔·卡里克·萨尔瓦特同意组阁，条件是英国承认埃及独立。艾伦比向英国政府建议接受这个条件，由英国发表一个单方面的声明，宣布埃及独立。但伦敦政府不愿这样做，它认为柴鲁尔现在已不再碍事，完全可以按英方的条件与埃及政府谈判。然而此时，放逐柴鲁尔的后果已经显现出来，埃及全国各地又恢复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和破坏交通活动。据艾伦比在10月25日给伦敦的报告，他在开罗逮捕了近百人，在亚历山大逮捕了900人，但"所有对大英帝国至关重要的交通线"仍面临"柴鲁尔和华夫脱所领导的大规模革命的威胁"。由于英国政府仍然不同意埃及独立，艾伦比不得不亲赴伦敦，陈说埃及的严峻局势　艾伦比返回开罗后，于1922年2月

28日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终止保护制度，承认埃及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但声明同时提出，英国在四个问题上保留处置权，以待将来进一步达成协议。这四个问题是：英国在埃及的交通安全；埃及对外来入侵的防卫；在埃及的外国人和少数民族权益的保护；苏丹问题。至此，埃及终于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在名义上成为独立国家，但要实现真正的独立，埃及人民还需进一步努力。

1923年，英国允许被流放的华夫脱领袖返回埃及，宣布解除戒严，准许实行宪政。这时，华夫脱由一个成员有限的政治组织改组为正式的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华夫脱党大获全胜，组成政府，柴鲁尔出任政府首脑。

第七章　立宪政治的失败

一、二三十年代的护宪运动

1923 年宪法

1922 年 3 月 15 日，埃及正式宣布独立，素丹福阿德因之改称“埃及国王福阿德一世”。与此同时，萨尔瓦特政府委任了一个以前首相侯赛因·鲁什迪为主席的委员会起草宪法。委员会由 32 名成员组成，他们来自埃及各政治团体，包括地主、商人、律师、法官、宗教领袖和知识分子等，基本上是 1913 年立法会议的再现。但是，祖国党和华夫脱党坚决反对这一由政府委任的制宪机构，认为惟有经国民选举产生的议会能够合法地制定国家的根本大法，他们拒绝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1922 年 10 月，委员会向政府提交了它的宪法草案，并希望尽快颁布宪法。但国王对宪法草案中给他划定的角色深为不满，迟迟不愿批准。同时，草案中的一项条款还引起了英国的强烈反对。这项条款把埃及君主称作“埃及和苏丹的国王”。英国政府认为这与它 1922 年 2 月的声明相抵触，坚持苏丹问题连同声明中提出的其他保留事项，都要留待将来英埃双方谈判来决定。另外，鉴于华

夫脱党鼓励群众反对政府的宪法制定工作，萨尔瓦特政府重新流放了柴鲁尔和其他华夫脱党领袖，恢复了严厉的1881年和1909年的新闻法，封闭了某些报刊，禁止反对派政治集会，这使它更加不得人心。这样，在国王、反对派和英国人的三面夹击之下，萨尔瓦特内外交困，只好于11月29日辞职。

继任首相穆罕默德·陶菲克·纳西姆被认为是亲国王的人，他劝说立宪主义者承认国王的利益，同时解除了对华夫脱党的禁令，使国内的紧张气氛得到缓和。在苏丹问题上，他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办法，但没有成功。国王同意把“埃及和苏丹的国王”的头衔从草案文本中去掉，但坚持认为，这一提法的修改不应影响埃及在苏丹的权利。英国高级专员迅速作出强烈反应，导致纳西姆于1923年3月5日辞职。柴鲁尔从流放地发电，对纳西姆的辞职表示敬意，认为这是爱国之举。艾伦比则下令逮捕了更多的华夫脱党人，查封了该党的总部。在这一个多月里，埃及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1923年3月15日，新政府突然建立，首脑是著名法官、宫廷大臣亚西亚·易卜拉欣。两周后，柴鲁尔获释，其他政治犯也由军事当局释放，危机结束。1923年4月19日，国王颁布了埃及新宪法。

严格说，这部宪法并不是宪法委员会提交的那份草案。在形式上，它主要仿效1831年的比利时宪法，但有关权力的条文则更接近1876年的奥斯曼宪法模式。宪法规定，埃及是君主立宪制的自由独立国家，立法权由国王和议会分享。议会分上下两院，上院议员任期10年，下院议院任期5年。与现代欧洲议会民主制或立宪君立制相比，国王被赋予过大的权力：他有权选择和任命首相；

有权解散内阁和议会；可以延长议会的任期；根据内阁推荐可委任参议院主席和 1/5 的参议员；即使政府得到下院多数支持，国王仍可解散内阁；议会所有法案均须得到国王的同意，国王可以把提案退回议会重新审议。宪法还规定，非埃及人不得担任埃及政府官员，但因条约和习惯而得到的外国既得利益不受宪法影响，这意味着英国军队和许多英国顾问可以继续留在埃及。

埃及宪法是各方妥协的产物。其妥协性主要表现在君权过大和未废除英国人的特权两个方面。当时，以阿布德·阿奇兹·法赫米为代表的立宪主义者就对篡改原宪法草案表示了强烈抗议。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它为国王破坏议会生活和英国干预埃及内政留下了无穷后患。尽管如此，这部法律文献仍不失其历史进步意义。它确认了自英国占领以来埃及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成果，标志着非洲现代史上第一个民族独立国家的诞生；它也是 19 世纪中期以来埃及无数进步人士苦苦追求立宪政体的成果，标志着埃及走上了宪政道路。

第一届华夫脱党政府

1924 年 1 月 12 日，埃及举行首次议会选举，华夫脱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在总共 214 个议席中占据了 195 个议席。1 月 28 日，华夫脱党组成新宪法实施后的第一届政府，柴鲁尔出任首相兼内政大臣。

此次选举表明，柴鲁尔在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中享有巨大声望，他们把他看作惟一能代表埃及民族利益的领袖和不妥协的民族英雄，期待他和他的政府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同英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实现民族的完全独立。柴鲁尔深知这一点，因之自然把

处理英埃关系作为他的政府的头等大事。其时,曾多次对埃及民族主义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的英国工党上台执政,并表示愿同埃及谈判缔结新的条约,这似乎也为最终解决英埃及关系问题带来了希望。

1924 年 9 月,柴鲁尔赴伦敦与英国首相麦克唐纳谈判,以"人民授权"的国家领导人身份向英方提出下列要求:英国撤回它在埃及的驻军以及财政和司法顾问人员;放弃在埃及的一切特权,包括领事裁判权、对苏伊士运河的保护权和对埃及外交的监督权;埃及不再承担驻苏丹的英军费用。英国政府拒绝这些要求,谈判破裂。

柴鲁尔非常失望,回国后,对英国的态度趋于激烈。他以埃及议会的名义,要求英国政府交出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又以政府首脑身份照会英国政府,要求撤走英国驻埃及的高级专员,代之以两国互派使节;同时声明,埃及将履行独立主权国家的权利,坚决排除外国干涉。英国人的顽固立场也使埃及人民的反英情绪迅速升温,各界群众纷纷举行集会,要求彻底结束英国的占领制度,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

11 月 19 日,驻埃英军总司令兼苏丹总督李·斯塔克在开罗被刺。英国迅即作出严厉反应。高级专员艾伦比在给埃及政府的最后通牒中,要求柴鲁尔政府向英国道歉,禁止一切群众性政治示威,撤出所有在苏丹的埃及部队。艾伦比还通知埃及政府,英国计划在苏丹扩大灌溉面积 30 万费丹。柴鲁尔拒绝接受通牒要求,英军便占领了亚历山大海关,并包围了议会和政府大厦。11 月 23 日,柴鲁尔被迫辞职。随后成立的新政府无条件接受了英国的最后通牒。一些民族主义者被英国军事当局作为恐怖分子逮捕,所有埃及军队撤出苏丹,英国人随之建立了一支独立于埃及军队的

苏丹国防军。

虽然华夫脱党政府未能解决埃及完全独立的基本问题，但在内政方面还是有所成就的，如实行埃及政府民族化，把两级选举制改为直接选举制，发行新币，制定教育发展计划，政府给合作社贷款，出售贵族领地给小农，等等。为了限制王权，它同国王在参议员的任命和宗教教育的管理等问题上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国王的反议会政变和护宪运动的兴起

华夫脱政府的下台给渴望扩大君权的国王提供了有利时机。他任命独立人士、第一任参议院主席艾哈迈德·齐瓦尔为新首相，接着解散了议会。为避免再次出现华夫脱党在议会占多数的局面，国王恢复了两级选举程序，重新划分了选区，又组成以亚西亚·易卜拉欣为首的宫廷政党——联盟党。但在 1925 年 3 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华夫脱仍赢得了 214 席中 116 席的多数，柴鲁尔并且当选议长。看到华夫脱党仍旧控制着议会，国王于 3 月 23 日再次解散了议会，并迟迟不举行新的选举，致使埃及在此后长达 14 个月里没有议会。这是国王针对宪法和主张限制君权和议会政党发动的第一次政变。

议会空缺期间，在国王支持下，齐瓦尔政府再次着手修改选举法，目的是要确保华夫脱党不能重新掌权。与此同时，国王利用自由立宪党（成立于 1923 年）在这年发表的一本政治—宗教性小册子，挑起内阁危机，迫使该党退出政府，从而使内阁成为清一色的王党内阁。12 月，政府颁布新选举法，该法对选民和候选人都规定了财产资格。

国王破坏宪法的行为引起反对派政党的强烈反对。1925 年

11月25日，主要来自华夫脱党和立宪自由党的134名下院议院、56名上院议员秘密在大陆饭店集会，宣誓捍卫宪法，并以议会名议通过对齐瓦尔政府的不信任案。由此开始了埃及现代史上的护宪运动，议会和国王之间围绕国家权力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反复较量。

1926年1月，各政党组织了一个共同委员会来协调彼此的选举政策。它们首先决定联合抵制间接选举，代之以举行国民代表大会。新任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劳埃德为了稳定埃及局势，也劝埃及政府废除有关财产资格限制的选举法。在内外压力下，政府恢复了1924年选举法。选举于1926年5月举行，华夫脱党再次获得多数(165席)，但柴鲁尔不愿出任首相，因这将使他再次直接面对棘手的英埃关系问题。他同意与自由党人组织联合政府，由该党领袖阿德里·亚昆出任首相。议会复会后，柴鲁尔再次当选议长。本届议会的第一次会议就废除了1924年12月以后无议会期间所颁布的一切立法，并通过大赦法案，释放了这期间拘捕的所有政治犯。

1928年7月，国王再次解散议会，并宣布议会选举延期三年。现在，国家由王家法令来治理。这是国王发动的第二次反议会政变，华夫脱党再次展开捍卫宪法的斗争。

1929年8月，英国工党政府提出了一项解决两国间突出问题的一揽子计划，要求同埃及的马哈茂德政府谈判。华夫脱党反对这项计划，坚持在埃及新的选举和宪法生活恢复之前，不进行任何谈判或者缔结条约。英国政府赞成把恢复宪法作为谈判的前提，它希望这是最后的谈判。这样，非民选的马哈茂德政府只好辞职，国王也只得于1929年10月21日正式恢复宪法。选举于12月进

行，华夫脱党在235个议席中获得212个议席，随之组成以穆斯塔法·纳哈斯为首的新政府。

纳哈斯政府愿意与英国合作，对最终解决英埃关系也充满信心。但是，1930年3月31日～5月8日的英埃谈判仍以失败告终。谈判破裂的原因是，纳哈斯政府无法接受英国在尼罗河流域的驻军权和对苏丹的领有权要求。

像以前那样，英埃谈判的破裂为宫廷集团和反华夫脱的政客们提供了机会。5月底，自由立宪党人请求国王解散内阁。国王本人由于别的原因，也很想把华夫脱政府赶下台。其中一个原因是纳哈斯政府提出一项保证宪法尊严的法案，引起国王的恐惧；另一个原因是在参议员任命上国王与政府发生争执。这年6月，国王利用纳哈斯与一欧洲妇女通奸的丑闻，解散了华夫脱政府，并中止了议会活动，实现了反对宪法和议会的第三次政变。护宪运动由此进入更加激烈的阶段。

宪政的恢复

新首相伊斯梅尔·西德基一上台就中止了议会活动，并采用强有力的措施压制一切反政府的宣传和抗议活动。他先是请国王下令解散了各省议会，接着取消了1923年宪法，而另外起草了一部宪法连同新的选举法。这部新宪法加强了君主权力，把大臣对议会负责改为向国王负责，而且国王可动议立法并有权否决议会通过的立法。新选举法规定，实行两级选举制，并把选民与选举人的比例由30:1提高到50:1，下院议员人数由235人减至150人，以减少华夫脱党获得压倒性胜利的机会。它还引入了对选民财产和教育的资格限制，目的是要把80%以上的埃及人口排除在选民之

外，同时规定，居住在开罗以外的自由职业者不能当选议员，但村长却有这种资格，因为政府可以容易地控制他们。最后，西德基成立了他自己的党——人民党参加竞选。

华夫脱党和自由立宪党强烈抗议西德基破坏宪法的行为。1931 年 3 月两党签署《国民公约》，组成护宪统一战线，并要求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审议它们提出的纲领。但政府阻止大会召开。

6 月，在暴力与流血的伴随下，按照新选举法进行了议会选举。华夫脱党和自由立宪党抵制了这次选举，但还是组成了亲西德基议会。这年下半年和整个 1932 年，激烈的反政府活动遍及全国。政府同时面临可怕的经济危机。棉价降至空前低的程度，由每坎塔尔 26 里亚斯降到 10 里亚斯。这导致所有农产品价格低落，农民债台高筑。

在国内政治和经济危机的重压下，西德基渴望在英埃关系上取得突破。但由于英国政府坚持谈判应遵循 1929 年和 1930 年他们确定的原则，因而 1932 年 9 月西德基与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相反，鉴于埃及国内恶化的安全状况，英国高级专员曾试探由华夫脱党和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只是由于华夫脱反对联合政府的主张而未如愿。

西德基滥用警察镇压群众，导致暴力事件日益增多，福阿德国王对此感到忧虑，阿里·马赫和阿布德·法塔赫·亚希亚两位宫廷人士也因此于 1933 年 1 月退出西德基政府。9 月，国王解除了西德基的首相职务，由亚希亚组织了清一色的宫廷内阁。这届政府不久又被以独立人士陶菲克·纳西姆为首的另一届委任政府所取代。国王还颁布敕令撤消了西德基宪法，解散了 1931 年 6 月选举的议会，但没有恢复 1923 年宪法，相反，他打算在期限不明的过渡时期

掌握一切权力。

然而在1935年，各种因素的结合促成了1923年宪法的恢复。一个是英国希望同一个符合宪法的民选政府缔结一项新条约；另一个是来自华夫脱党和其他政治团体的压力，第三个是国王委任的宫廷政府未能有效地处理国内安全问题和英埃关系问题；最重要的是第四个因素，即国际形势的变化。

这年10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同时在埃及和中东地区加强了反英宣传，埃及国内出现亲轴心国势力。英国深感它在埃及的地位受到威胁，更加迫切地需要同埃及签订一项新条约来确定这种战略地位。然而十分明显，如果不是华夫脱执政，埃及就不会有稳定的政局，即使签订了新的条约也难保不脱离英国的轨道。因此，当1935年12月华夫脱和另外两个在野党的领袖联合上书国王，要求恢复1923年宪法时，英国也表示了支持。两天后，国王下诏，恢复1923年宪法和直接选举。4月28日，福阿德去世，其年幼的儿子法鲁克继位。选举于5月举行，华夫脱再次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纳哈斯组织了他的第三届政府。至此，埃及宪法重新恢复，护宪运动取得最后胜利。

二、华夫脱党的衰落和激进组织的兴起

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

由于宪政的恢复和选举的胜利，纳哈斯政府对执政前景充满信心，因此推动议会通过了许多带有改革色彩的社会经济立法，如削减农业贷款还款的20%，赦免自1930年取消宪法以来的所有

政治犯，撤消公务人员免于起诉的西德基法，为产业工人制订了第一个事故赔偿法。不过，纳哈斯政府取得的最大成就还是在1936年8月26日签订的英埃同盟条约。

该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对埃及的和解姿态，同时对英国来说，考虑到轴心国对欧洲、中东和东非的威胁，条约又是紧迫而必须的。条约主要处理了1922年声明中的四项保留事项，但实际上，四项中只有一项明确作了有利于埃及的安排，即规定把保护外国人和埃及少数民族的权利转归埃及政府。对其他三项，条约规定如下：(1)英埃缔结军事同盟，据此，英国终止对埃及的军事占领，埃及向英国空军开放领空，亚历山大在8年内仍留作英国军港，英国政府有义务为埃及武装部队提供装备和技术指导；(2)英国可在运河区驻军1万人，以保护帝国交通安全；(3)恢复1899年《英埃共管苏丹协定》，允许埃及军队重新开入苏丹，埃及可向苏丹移民，但苏丹人有权选择自己究竟是建立主权国家，还是效忠于共管协定的某一方。

条约还包括其他一些重要内容，如埃及可以自由处理外交事务；英国高级专员改称驻埃及大使；实施某些埃及化措施(英国法律顾问和财政顾问撤出)，使埃及内政逐渐走向独立；英国军事人员撤出埃及，但埃及军队总检查员之职应待现任英国军官1941年退休后，再交给埃及人担任。条约期限为二十年。

英埃同盟条约签订后，埃及的国际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条约签订的结果，1937年4－5月的蒙特勒会议决定，取消埃及的投降条约。这真是对协约国支配的国际社会的莫大讽刺：1922年以后，奥斯曼帝国的前属地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巴勒斯坦和外约旦都已取消了投降条约，土耳其本身也在1923年用洛桑条约

取代了它，却毫无道理地不让早已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的埃及从这个枷锁中解脱出来。蒙特勒会议同时宣布废除在埃及的治外法权，并在12年过渡期后，即1949年10月后关闭埃及的混合法庭。1937年5月，埃及加入国联，成为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

条约也为埃及带来明显的经济利益。根据埃及与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协定，埃及政府至少可向公司董事会指派两名埃及人，公司的租借费提高到每年30万埃镑，公司同意在其雇员中埃及人应占到35%，并承担修建苏伊士至塞得港铁路的义务。更重要的是，埃及人现在是自己国家的主人。而在此之前，外国人享有包括免税在内的各种特权，埃及人似乎是二等公民，埃及企业家只有同外国人合伙才能站住脚。这一巨大变化正如英国史学家约翰·马洛所描述的："1936年后，情况迅速改变，外国人突然觉得有埃及人作股东是有利的，于是有更多的在埃及经营商业的股份有限公司在那里注册。从法老时代以来，埃及的国籍第一次不是下等人的标志。"

然而条约毕竟是双方妥协的产物，埃及人并没有得到他们所希望的完全独立。英军仍呆在埃及国土上，而埃及军队甚至无权进入运河区；埃及在外交上的自主权仍然是有限的，它被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实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埃及议会审议和批准条约时，有不少议员对政府的妥协表示不满。总之，条约并没有使埃及获得彻底的民族独立，斗争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华夫脱党的衰落

1936年英埃条约签订后，英埃关系问题暂时退居背后，而国王与华夫脱党之间的权力斗争更加尖锐。同时，后者由于内部矛

盾和分裂，政治影响力大为下降。相反，极端主义的激进组织势力迅速增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这一切使得埃及政治更加错综复杂，立宪政治受到严峻考验。

1937年7月，摄政委员会期限结束，新国王法鲁克正式亲政。同老国王福阿德一样，他也渴望把国家全部权力抓在自己手中，并且总是把华夫脱党看作他的主要的权力竞争对手。法鲁克重用两个亲信，一个是老国王的宠臣、宫廷大臣阿里·马赫尔，此人与华夫脱势不两立，现在被重新任命为宫廷大臣。另一个是青年国王的老师、顾问和秘书长艾哈迈德·哈桑奈因。他作为法鲁克的监护人，处处维护国王的权益和特权，但其策略与前者不同，他希望尽可能与华夫脱搞好关系，达到控制政府的目的。二战期间，他的影响达到顶点。

1937年8月，纳哈斯组成他的第四届华夫脱政府。他希望尽可能长久地执政，至少能保持正常的议会生活。由于选举的胜利和英埃关系的改善，他对此踌躇满志。也许由于过分自信，他竟毫不犹豫地在1937年9月至12月先后把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党的主要领导成员马哈茂德·努克拉什和艾哈迈德·马赫尔驱逐出党。这两人随即另建了萨亚德人党，从而造成华夫脱党的分裂。后来在1942年，另一名被逐出党的主要领导人克拉姆·奥贝伊德又建立了集团党，再次削弱了华夫脱党的力量。不过在1937年，纳哈斯政府仍信心十足地推行了埃及化政策，建立了军官参谋学院、航空学校和其他军事学校。为了同国王以及其他政党角逐权力，华夫脱党建立了自己的青年组织“青年联盟”，甚至仿效极端主义组织的做法，成立了半军事性的“蓝衫队”，以动员党的追随者和人民群众，并对反对派实施恫吓和恐怖。

纳哈斯政府和国王之间的冲突，最早发生在法鲁克的加冕仪式问题上。国王坚持必须在城堡的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由爱资哈尔的沙伊赫主持进行传统的伊斯兰忠诚宣誓仪式——“巴亚”。纳哈斯认为，国王必须按 1923 年宪法规定举行拥护宪法的宣誓，因为他是世俗的君主立宪制的元首，在这种制度下，没有巴亚的位置。当然，华夫脱反对在公开场合举行仪式，主要是因为这将吸引传统的群众，使年轻国王从他们中获得声望。法鲁克登基仅两个月后，就在参议员的委任、宗教学校的管理、国家预算的制定以及军官任命等一系列问题上同华夫脱政府公开争吵起来。法鲁克之所以敢于强硬地同华夫脱政府对抗，是因为他有权指定和解散政府。华夫脱党人原以为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和利用年轻而无经验的国王，现在才认识到法鲁克并不好对付。为避免被动，华夫脱政府在立法和行政上十分谨慎，力戒仓促行动。但华夫脱党并非无懈可击：作为民族主义的旗手，它有着不光彩的妥协记录；它的队伍是分裂的；它与少数派政党的关系不稳定，甚至不友好。国王抓住华夫脱党的这些弱点，充分利用他所掌握的权力，把宗教势力、宫廷集团、小党的政客们以及军队联合起来对抗华夫脱党。他还极力亲近和拉拢正在不断扩大的埃及军官团。1937 年 10 月底，宫廷设法挑起爱资哈尔神学院学生和其他一些大学生的反政府示威，而组织学生运动本是华夫脱党进行民族独立斗争和护宪运动的重要手段之一。11 月，一名“青年埃及协会”的成员企图刺杀纳哈斯。12 月 21 日，一次颇有声势的群众集会在阿丁宫外举行，与会者呼喊着亲国王、反华夫脱的口号，纳哈斯政府处境维艰。12 月 30 日，国王解散了政府。

华夫脱党不仅失去了政权，也失去了人心。在 4 月举行的选

举中，华夫脱党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在总共264个议席中，仅得22席。华夫脱党是埃及君主立宪制度的支柱，它的失败意味着议会制度的失败。

华夫脱党的急剧衰落，主要要从它自身找原因。自埃及独立以来，该党领袖们越来越醉心于自己的权力地位。他们上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人升官晋级，增加薪水。党内腐败日益增长，党的领袖多次卷入贪污丑闻。为了获得政府权力，他们往往放弃原则，不惜妥协。在1930~1935年失去政权的五年中，华夫脱为返回统治地位，甚至一度寄希望于英国向国王施加压力，后来又同英国签订了妥协性的同盟条约，使得许多追随者疏远了它。

华夫脱党也未能根据国内经济和社会情况的变化提出适当的政治纲领。1921、1926和1931年，埃及先后三次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埃及农民生活水平每况愈下，人均年收入从1913年的12.4埃镑降至30年代初的8.2埃镑，然而数次执政的华夫脱党却从未进行过土地改革。

华夫脱的领导精英由律师、官僚、地主和工业家组成，其追随者包括大量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受欧式教育影响的知识分子、大中学生、省地官员、村长和拥有土地的农民。这些成分大多与土地利益相联系，因而党的经济纲领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30年代后，由于国家实施关税保护，埃及工业有了较大发展，工业家集团在党的成分中比重增大，随之要求改变党的纲领。但党内代表土地所有者利益的领袖们拒绝调整党的政策，依然满足于发展农业特别是棉花的政策，而在制定有利于更快发展工业的政策上过分谨慎，从而引起工业家集团的不满，并最终导致党的分裂。代表新工业家集团利益的萨亚德人党的出现，就是这种分

裂的结果。

总之，英埃同盟条约签订后，埃及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腐败僵化的华夫脱党不能适应这种变化，致使它的社会基础日益狭窄薄弱，队伍日益萎缩，已不再能主宰国内政治。

穆斯林兄弟会和青年埃及协会

与华夫脱衰落适成对照的是激进组织的兴起。当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对西欧民主制度发起挑战时，埃及也迅速出现了反对立宪民主制的新的社会和政治团体。尽管它们有不同的领导人，思想倾向形形色色，但都认为民主制度救不了埃及，并且都接受了这样的思想：解决社会和政治冲突，使用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些极端激进的政治组织中，影响最大的是穆斯林兄弟会和青年埃及协会。

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极端的宗教政治运动，由沙伊赫哈桑·班纳在 1928 年建立。它起初是一个温和的世俗穆斯林的宗教协会，其活动限于对信徒进行宗教教育，30 年代开始向暴力政治运动演变。班纳自封为"最高指导"，预言将来某一天他要领导一个完全摈除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念的纯穆斯林国家。他的马赫迪主义方式，感染了大批追随者。该组织相信，在最高指导的严格领导下，穆斯林可以通过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净化而得救，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信仰则是净化之道；一切欧洲文化和价值，无论是表现在立宪制度中还是表现在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中，都应受到蔑视和怀疑，并从埃及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予以根除。该组织把神秘主义的传统方式和现代组织方法结合起来，迅速将其势力渗透到整个阿拉伯世界。

青年埃及协会成立于1933年,创始人是律师艾哈迈德·侯赛因。这是一个主要由大城市的中学生组成的社团。这些人被组织成半军事性的"绿衫队",进行反对欧洲文化和价值的示威活动。该组织主张对埃及社会和政治进行彻底的辛迪加化和军国化,宣传埃及光荣的过去,希望埃及有一个同样辉煌的未来。1938年,青年埃及协会改组为正式的政党。次年1月,它在自己的报纸《埃及妇女报》上公布了党的纲领和基本原则。纲领宣称,"埃及的战士"应该是新的一代,他们应创建包括埃及与苏丹的埃及帝国,与阿拉伯国家结盟,并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纲领还要求取消外国人在埃及的特权,把外国公司收归国有;在国家的保护和支持下发展民族经济;实行初等教育免费,以便让更多的穷人子弟入学;坚持伊斯兰教义及其派生的精神,严禁其党员和追随者饮酒、卖淫和从事其他形式的腐败活动。青年埃及要求其信徒把信仰与行动结合起来,为了强大的埃及帝国,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他们的箴言是"真主、祖国和国王"。它要使所有的埃及人相信,青年埃及的战士将获得国家权力和世界威望。

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形形色色,包括思想极端保守的教授、学生,一无所有的城市贫民,以及贫苦的农民群众。其组织内部等级森严,强调对领袖的绝对服从原则。崇尚暴力,宗教狂热,反欧排外,反对现存的立宪制和议会制,是他们政治上的突出特点。但是两个组织追求的目标并不完全相同:青年埃及强调祖国,主张君权和国家开展净化运动,排除外国势力,把恢复埃及昔日的光荣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兄弟会则是更大范围的伊斯兰运动,具有超国家方向和主张,它不仅限于埃及,在叙利亚、约旦也有追随者和地方组织,其目的在于复兴伊斯兰社会。

三、宪政的幻灭与旧秩序的崩溃

二战中埃及的尴尬处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埃及由独立人士和萨亚德人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执政，首相是自 1935 年以来任宫廷大臣的阿里·马赫尔。出于对英国人昔日占领埃及的仇恨和对 1936 年英埃同盟条约的不满，公众普遍同情轴心国，国王和政府则庇护这些轴心国的同情者。但是受 1936 年英埃条约的约束，阿里·马赫尔政府不得不与纳粹德国断交，并采取了一些适应战时紧急状态的措施，如颁布军事法，实行书报检查制度，加强刑法典的某些条款，限制进出口贸易，控制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同时政府于 1939 年 9 月建立了一支本土军。

当大战在欧洲大陆进行的时候，虽然埃及受到一定影响，但仍保持着表面的中立。然而 1940 年 6 月意大利参战后，埃及再也无法继续置身战争之外。现在，意大利军队出现在埃及西面的利比亚和埃及南面、东南面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对英国在中东的地位和交通安全构成巨大的威胁。两个轴心国家还通过电台展开强大的反英宣传，并且在埃及产生了某些效果。埃及本土的亲轴心国分子也散布谣言，说英国将重复一战期间它在埃及的政策，即强征劳工、粮食和军需品，在公众中制造对英国的不满和敌对气氛。埃及议会于 6 月 12 日决定与意大利断交，但埃意断交后，正在罗马访问的内阁大臣穆拉德·赛义德·艾哈迈德拒绝返回埃及。英国情报局怀疑首相阿里·马赫尔与这位大臣事先有约，同时怀疑首相

任命的警察司令穆罕默德·塔希尔帕夏亲轴心国，因此英国政府进一步对埃及政府施加压力。

在埃及内政外交受到英国严重制约的情况下，国王于 1940 年 6 月 22 日召集各党领袖开会商讨对付时局的办法。马赫尔提出建立民族政府，遭到华夫脱党的反对，于是辞职。此后，政府虽数次更迭，但由于各党对是否要对轴心国宣战，并与英国更密切合作这一重大问题主张分歧，始终未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1941 年 5 月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进入北非，推进到埃及西部边境。与此同时，伊拉克发生亲轴心国的军事政变，威胁到英军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地位。而叙利亚和黎巴嫩仍掌握在维希法军手中。在北非盟军处境危急时刻，已退休的埃军前总参谋长阿奇兹·阿里·马斯里将军与几名军官试图前往西部沙漠的轴心国前线投敌，行动失败后被捕，受到军事法庭审判，但判刑很轻，英国极为不满。另外，由于轴心国对埃及扩大了空袭，埃及经济形势恶化，食品供应紧张，出现争相贮藏食品现象。这一切，使埃及政府内外交困，处境艰难。

二 月 事 件

更糟糕的是，当隆美尔再次向埃及推进时，1942 年 2 月 2 日，开罗竟出现欢迎德军进入埃及的群众示威。示威者高喊："前进隆美尔，隆美尔万岁"。当时的西尔里政府无法控制局面，只得辞职。

埃及政局的动荡和部分民众的亲轴心国倾向，令英国政府深为忧虑，遂决定干预埃及内政。英国大使通过宫廷大臣告知国王，应该组织以华夫脱党领导人纳哈斯为首的政府。2 月 3 日，国王请纳哈斯组织民族政府，但后者反对与其他政党合作，而宁愿单独

组阁。英国大使再次要求国王组织华夫脱党政府。2 月 4 日下午,国王召集各党和其他方面的政治领袖在宫廷举行紧急会议,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正在此时,英国大使向国王发出最后通牒,宣称"除非在下午 6 点前我听到纳哈斯已经组阁,国王法鲁克陛下必须承担后果"。与会政治家们决定,用他们全体签名的抗议书对英国大使作出答复。抗议书指出:"英国的最后通牒不仅是对埃及独立的进攻和对埃及内政的干预,而且是对英埃同盟条约的亵渎。因此,接受这些危害国家独立的条件超出了国家的权限……"英国大使拒绝接受这一复照,并通知宫廷大臣,他将在晚上拜访法鲁克国王。装备着坦克和大炮的一支英国部队随之包围了阿布丁宫。这天晚上,英国大使在驻埃英军总指挥官斯通将军和一队武装士兵的陪同下来到王宫。在面临退位的威胁下,国王别无选择,只得立即请纳哈斯组织华夫脱党政府。

二月事件使华夫脱得到了权力,却失去了人心。一个主张民族主义和立宪民主制的政党,为了上台执政,竟甘愿接受外国的刺刀保护,这无异于政治自杀。尽管纳哈斯在次日给英国大使的信中说,他出任首相并不意味他和他的党默认英国对埃及事务的任何干预,无法否认的是,他的上台仅仅是英国武力干涉的结果。因此,二月事件后,华夫脱党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这种状况在 1950 年到 1951 年表现得更加明显。

二月事件的影响不只是华夫脱党威信降低,它还使埃及政治发生质的变化,即由 30 年代的权力角逐开始走向冤冤相报。华夫脱上台后,极力打击 1937 年以来所有那些阻碍他们掌权的人;在事件中蒙羞的国王现在和华夫脱势不两立,他和宫廷集团时刻都在窥测摧毁这个政权的机会;兄弟会和青年埃及等激进组织积极

扩充实力,准备战后与华夫脱算账。这一切,预示着立宪制度在埃及已经走到它的尽头,其死亡只是早晚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事件激发了一种新的政治力量,这就是军队的青年军官。他们对阿布丁宫政变义愤填膺,认为这是埃及民族的奇耻大辱。当时,一批年轻军官就打算对英国实施报复,只是为谨慎起见才没有立即行动,但他们已经把英国人看作埃及民族不共戴天的敌人,把怯懦的国王和政客们以及卑鄙的华夫脱党看作埃及的祸害,发誓要"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捍卫(民族的)尊严","用鲜血捍卫国家的荣誉"。七年后,正是这批军官发动了著名的"七·二三"革命。

华夫脱党的蜕变与再次分裂

纳哈斯政府组成后,为了改变党和政府的亲英形象,促使议会通过了几项重要法案,包括设立总检查局,对公共基金实行审计和财政监督;初等教育免费;在所有商业活动中一律使用阿拉伯文;确认司法独立,取消非法任命的法官;降低小麦税收,以减轻农民负担;颁布工会法、市政法、新合社法,并提出一项改进乡村卫生设备与服务的计划。但同时,华夫脱政府最大限度地利用军事法授予政府的紧急权力,严厉打击它的政治对手。前任首相阿里·马赫尔遭到软禁,前国防部长萨利赫·哈布将军被流放国外,本土军司令阿布德·拉赫曼·阿扎姆被解除职务,工会领袖、王子阿巴斯·哈利姆被逮捕,体育俱乐部联合会主席也被捕,他们的罪名完全一样,即同情轴心国。

但纳哈斯政府并非坚定地站在英国一边。1942 年 5 月,隆美尔的非洲军团沿地中海南岸推进到阿拉曼一线,逼近埃及三角洲

的门口，埃及国内人心惶惶，外国侨民和犹太人纷纷逃离埃及。此时纳哈斯政府为防止轴心国万一取胜可能带来的后果，给隆美尔写了一封密信，信中保证埃及人的真正同情在轴心国一边，只是由于环境所迫才与英国人合作。此信没有送到隆美尔手中，原因是送信人亚历山大的长官阿布代尔·卡里克·哈苏纳不想拿他的生命去冒险。

尽管战时埃及处境困难，但华夫脱党仍未忘记利用权力为自己捞取好处。一批行政人员或退休或被解职，由华夫脱党人取代，华夫脱党的国家官员迅速增加了薪水。但是这一次，纳哈斯遇到他的财政大臣，同时也是党的总书记的马克拉姆·奥贝伊德的强烈反对。国王及时抓住机会，挑拨离间。他在纳哈斯不知情的情况下，多次邀请马克拉姆商量如新票据设计之类的各种琐事，使得纳哈斯对他的财政大臣更加猜忌。后来当马克拉姆拒绝批准纳哈斯的亲戚关于进口特许证和其他政府特许权的申请时，二人关系完全破裂。纳哈斯向国王递交了他的政府的辞呈，他知道英国人不会支持其他任何政府。国王请他组织新的政府，但在新政府中已没有了马克拉姆。1942 年 7 月，马克拉姆组织自己的新党——“独立华夫脱集团”，成为反对派。马克拉姆并不就此罢手，1943 年初，他出版了他的著名的《黑书》。该书披露了华夫脱党执政中或政治活动中的种种腐败行为，其政治效果是促使所有反对党和团体结成反华夫脱党政府的统一战线。纳哈斯则操纵议会剥夺了马克拉姆下院议员席位。

1943 年 11 月，反对派民族阵线向在开罗开会的盟国领导人（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递交了一个关于埃及权利的信件，实际上是对华夫脱党政府的间接攻击。1944 年 2 月，该组织又向全国

散发了一份声明，指责华夫脱政府助纣为虐，把埃及变为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5月，另一份文件罗列了华夫脱党过去两年里对政治对手所采取的种种镇压措施。国王法鲁克在4月份也试探英国大使，是否要撤换纳哈斯。由于轴心国对埃及的威胁完全解除，英国对开罗是否是华夫脱党政府已不再感兴趣。1944年10月8日，国王解散了纳哈斯政府。那天，英国大使碰巧不在开罗。

萨亚德人党的领袖艾哈迈德·马赫尔组织了新政府。鉴于反法西斯盟国规定，凡希望加入联合国的国家必须在1945年3月1日前对轴心国宣战，艾哈迈德·马赫尔力促议会批准政府采取这一行动，但被狂热的亲德分子在议会大厦刺杀身亡。他的老搭档、萨亚德人党的缔造者之一马哈茂德·法赫尔·努克拉什接任首相，新首相于1945年2月26日对轴心国正式宣战。

埃及政治的激进化

当战争临近结束时，埃及政治激进化已露端倪，其标志是出现了如"科学研究中心"、"现代教育和文化传播委员会"等文化界和知识界的新团体。它们感兴趣的已不再是议会政治和西方式民主，而要求把民族解放的纲领（英军撤出埃及）和"解放遭受资本主义少数人剥削的群众"结合起来。1945年秋以后，又出现了一批激进的学生和工人组织，如全国性的"民族解放工人委员会"、开罗和亚历山大的"学生和工人民族委员会"、"埃及工会联合会"等等。这些组织大多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早在1922年就成立的埃及共产党一直默默无闻，现在也很活跃，它的一些党员作为新建的人民大学的教师，为工人办夜校。还出现了一些自称为共产主义的秘密组织，其中以1945年5月成立的"民族解放与民主运动"影响

最大。

华夫脱党也变得激进起来。它的左翼分子如阿布杜尔·法塔赫、穆罕默德·曼杜尔等人开始脱离“官方的上层社会”,向都市无产者靠拢,要求限制土地所有权,实行国家干预。他们认为,那些与埃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相隔绝的知识界名流们已经是“过时的人”,现在应该关注的是社会公正、经济平等和政治自由。

同样,兄弟会也把广泛的社会福利计划引进他们的活动,如组织工人保险,成立医疗卫生机构等。他们的报纸主要面向下层劳动群众和学生,发行量很大,其影响超过左翼组织。青年埃及协会则更名为埃及社会党,主张激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

但是,努克拉什的萨亚德人党政府似乎没有察觉埃及政治的这一变化,仍在与它的老对手华夫脱党较劲。战争一结束,政府就动议重开英埃谈判,希望通过此举把民族运动的领导权从华夫脱党手中夺过去,同时冲淡兄弟会等极端组织的政治影响。

1945 年 12 月,埃及政府正式请求英国工党政府派代表谈判,修改 1936 年条约。英国政府于 1946 年 1 月 25 日作出了含糊其词的答复,表示它打算调查初步谈判的可能性。为了在国内造成舆论,埃及政府把双方来往照会在报刊上公之与众,报纸同时号召埃及人民为废除 1936 年条约去战斗、去牺牲。新的民族运动迅速掀起,工人罢工,学生示威活动从 1946 年初开始持续不断。

2 月 9 日,数千名开罗大学的学生从学校出发前往阿布丁宫,向国王请愿,请求他在英埃关系问题上加快政府的努力。令努克拉什政府意外的是,示威者由于不满政府给英国照会中的宽容语调,而把矛头对准了政府。反对派团体也为政府垮台推波助澜。2 月 14 日,四名独立华夫脱集团的大臣辞职,努克拉什弄巧成拙,只

得于次日辞职。国王要求政治"强人"伊斯梅尔·西德基于17日组织新的政府，参加政府的有独立人士和自由党人。

西德基对示威者最初采取安抚政策，力图平息事态。不料，学生和工人组织把1946年2月21日定为"英军撤退日"，举行总罢工，数千名示威者和驻伊斯梅利亚的英军发生冲突，数名示威者被打死。当月，亚历山大、曼苏拉、拉卡泽克、艾斯尤特等城市也发生了示威。这些流血事件虽然很快结束，但上述组织又宣布3月4日为"殉难日"，再次举行全国总罢工。这天在亚历山大，学生与一支英国军队交火，28名学生在冲突中被打死。西德基转而进行严厉镇压，政府逮捕了250名左翼人士，共产党的协会以及怀疑传播共产主义知识的团体被解散，包括华夫脱左派的《民族之声》在内的一批左翼报刊被查禁，议会还通过了加强刑法的立法。

1946年4月，埃及政府的谈判代表团组成，其成员包括除华夫脱党、祖国党和独立人士之外的各党领袖。5月7日，英方发表了预备性谈判公报，指出如果在运河基地的使用上能达成一致，英军愿撤离基地。正式谈判于5月9日开始，但在7月份破裂。10月，西德基亲赴伦敦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举行新一轮谈判，最后达成一个条约草案，其中规定，成立联合防务委员会，推迟解决苏丹问题。但早些时候成立的埃及代表团部分成员不接受这个草案，西德基便强硬地解散了代表团，然而这却成了他倒台的原因。不仅各政党对西德基的独裁作风强烈不满，人民群众也举行示威抗议西德基—贝文谈判结果。1946年11月，大学生组织的尼罗河学生民族阵线走上街头，推翻汽车，放火焚烧，还焚烧英文书籍，警察进行干预，学生用轻武器和手榴弹进行回击，又一次造成流血，许多兄弟会成员被捕。而英国的苏丹总督此时又宣称，他的政府

打算让苏丹独立，使事态更加恶化。西德基政府被迫辞职。

1946年12月9日，努克拉什再次出任首相，当月即再次与英国谈判，但同样遭到失败。1947年8月，努克拉什政府把英埃关系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但安理会无法作出裁决。原因是英国坚持1936年条约只能通过双边谈判来修改，并振振有词地指出，自1946年7月以来，英国已向埃及作出了巨大让步，撤走了驻开罗和亚历山大军事基地的军队，放弃了海勒尔和海里奥波利斯的机场，把阿里西亚、卡斯尔的营房交给了埃及，只是由于埃及方面立场僵硬，才造成难以解决的争端。在这种情况下，努克拉什很难争取到其他大国对埃及的支持。另一方面，华夫脱党给安理会发出照会，宣称努克拉什代表团并不代表埃及国家，没有资格在联合国辩论有关埃及的提案，这进一步损害了努克拉什在联合国的行动。

兄弟会的恐怖活动

1945年以来，穆斯林兄弟会制造了一连串的恐怖事件，为埃及的政治激进化火上浇油。这一年，首相艾哈迈德第一个成为兄弟会恐怖活动的牺牲品。但纳哈斯侥幸逃过劫难，当时他乘坐的汽车遭到了炸弹的袭击。1946年1月，著名的亲英人士阿明·奥斯曼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恐怖分子杀死在开罗大街上。在整个1946年和1947年，兄弟会和其他极端组织在开罗和亚历山大还多次用手榴弹和炸药袭击公共场所，其中1947年5月6日在米特罗电影院发生的爆炸案，有数人被炸死。更严重的是，恐怖分子还用暗杀和炸弹对司法人员进行恫吓，1948年5月，开罗上诉法院秘书就是因为两年前审讯过兄弟会的“爆破手”而遭暗杀。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作为阿拉伯国家联盟缔约国之一，埃及代表团对此项决议投了反对票，埃及政府也为阿盟集体采取行动阻止分治决议承担了义务。兄弟会当即举行抗议分治决议的群众示威，号召人们进行一场阿拉伯—伊斯兰反对异教徒的圣战。1948年5月15日，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军队进入巴勒斯坦，以武力阻止以色列建国。第一次阿以战争爆发。恐怖活动的矛头也开始直接指向了所有外国人和犹太人的商贸机构。这年夏天，赛卡莱尔大商店、戴维·阿迪斯高级商店先后被炸，其他受到攻击的还有本泽昂商店，加蒂戈诺商店，以及英国人的米迪·兰德公司总部。开罗犹太人街区的一次爆炸案，有数十居民被炸死。年底，开罗警长萨利姆·扎基的汽车被炸毁。

努克拉什于12月8日下令取缔兄弟会，没收其基金和财产，警察随之对兄弟会的总部和分部展开广泛的攻击行动。结果发现，兄弟会实力之强大令人震惊：它掌握大量的资金，它的统一战线和其他活动从学校、机关到工会、医院、商业企业无所不在，它拥有一个阿拉伯矿业公司，一个出版社，一个阿拉伯广告公司，一个纺织公司和几个保险公司。更危险的是，它还拥有半军事化的训练中心和军火库，它的警卫人员在使用小型武器和爆炸性器材方面都训练有素。

对政府解散其组织的行动，兄弟会在20天后进行报复——一名装扮成警官的恐怖分子暗杀了首相努克拉什，当时后者正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以阿布德·哈迪为首相的新政府加强了对恐怖组织的镇压，但破坏和暗杀活动仍在继续。1949年2月2日，兄弟会最高指导哈

桑·班纳不知被谁暗杀，兄弟会怀疑是政府所为，5月5日，它的成员对首相进行报复，但暗杀未遂。

埃及政局的失控

在国家权威和权力受到蔑视，君主威望扫地的情况下，宫廷再次谋求建立民族政府，共渡难关。过去一直坚持不参加民族政府的华夫脱党这次改变了态度，因为它对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暴力感到害怕。1949年7月26日，以独立人士侯赛因·西尔里为首相，包括所有主要政党代表的民族政府终于建立。新政府希望通过恢复常态的办法缓和国内紧张局势。它释放了大多数政治犯，许诺取消军事法。但未等到政局走上正轨，各党就急不可耐地要通过议会选举重新分配权力。选举于1950年1月3日举行，华夫脱党重新获得议会多数，纳哈斯组织了它的第七届也是最后一届政府。

华夫脱党执政后，一如既往，再次进行行政官员大换班，为自己的党员晋职提薪，政府为此花费了数百万镑。在人民面前，政府许诺着手解决突出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如生活费用、住房、工资和土地改革等，还提出了使所有中等教育和技术教育免费的计划。随后，直接涉及工农阶级福利的社会经济立法陆续出台，包括“集体劳动合同法”、“疾病补偿法”和“生活费用补贴法”。1951年5月的一项法案还授权政府为无地农民分配100万费丹的土地。但是由于财政问题没有解决，这些立法大多停留在纸面上。

当华夫脱党再次接触英埃关系问题时，更严重的困难出现了。根据埃及政府的要求，英埃从1950年3月起恢复谈判。由于英国工党政府顽固坚持1936年条约，持续19个月的谈判毫无进展。

最后在 1951 年 10 月 8 日，埃及单方面宣布废除 1936 年条约和 1899 年英埃共管苏丹协定。但此举带来的后果是政府始料未及的。

对各种激进组织来说，埃及单方面废除了 1936 年条约，意味着英国在埃及的军事存在是非法的，它们现在可以用武力进攻它，反英示威不久在伊斯梅利亚和塞得港掀起，并与英军巡逻部队发生冲突。英军立即占领了连接三角洲和西奈的交通要道以及苏伊士海关大楼，用一道警戒线把整个运河区圈起来，切断了该地区与国家其他部分的所有交通，驻西奈的埃及军队与其在运河以西的总部被隔离开来。埃及游击小组迅速组成，其成员有学生、农民（特别是运河区的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也有数名军官。他们大多是兄弟会征募的。在 1950 年 10 月以后的三个月里，这些游击小组和英国军队不断发生冲突，偶尔也进行激烈的阵地战。

面对这种局面，华夫脱党政府不知所措，事实上它也没有能力控制这些由非正规军队从事的游击战。结果，政府除了召回埃及驻英大使外，什么事也没有做——既没有给这些游击武装以组织和支持，也没有设法阻止游击队的反英行动。反对派团体认为，政府不准备冒与英军武装对抗的风险，因此，从 1952 年 1 月起，反对政府和国王的示威浪潮再次掀起，一些示威者公开亮出他们的武器与警察进行街头战斗。而在此时，英军追击扫荡游击队的行动已把他们的实际控制区空前扩大了，并显示出将向首都挺进之势。

1 月 25 日，驻伊斯梅利亚的英军司令要求该城所有埃及武装人员，包括警察和宪兵交出武器，腾出司令部和营房，然后撤离。当地埃及警察司令根据内务部的命令，拒绝了英军要求，英军便用大炮和装甲车摧毁了军营，50 多名警察和宪兵被杀。次日，开罗

一批狂热的极端分子为发泄对政府无能的不满情绪,竟纵火焚烧开罗,750多个机构被毁,至少30余人丧生,数百人受伤。同时,在一些地主和王室的庄园里,农民掀起暴动,焚烧粮仓,抗捐抗税,秩序完全被破坏,第二天,国王解散了纳哈斯政府。

此时至7月份,政府三次更迭,但均未解决已经恶化的英埃关系和国内秩序混乱问题。法鲁克预感到王朝岌岌可危,悄悄地拟定了一份伴随他亡命国外的人员名单,开始用专机把国库中的黄金转移到日内瓦。当国家权威荡然无存,既有统治集团——政党、政府和国王——无力挽救危局之时,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勇敢地承担起了拯救国家与民族的历史责任。

第八章 纳赛尔革命与社会主义实验

一、1952年革命

纳赛尔与自由军官团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1918年生于亚历山大，祖籍上埃及艾斯尤特市郊的贝尼莫尔村。按照埃及农村标准衡量，纳赛尔的家境还算殷实，但并不富裕。纳赛尔自认为，他属于下层中产阶级。1930～1936年，纳赛先后在亚历山大和开罗上中学。其时正是护宪运动蓬勃开展时期，许多中学生也卷入了这场运动，纳赛尔曾因参加游行被警察拘留，他的前额也永久地留下了警察子弹划过的伤痕。读中学的最后一年，他担任开罗学生执委会主席，几乎把全部时间投入了政治活动。这期间，他大量阅读了拿破仑、亚历山大大帝、凯撒、甘地、卢梭和伏尔泰等伟人的传记，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家深邃的理性主义思想和不妥协精神尤令他钦佩不已，并在校刊上发表了题为《伏尔泰——自由的斗士》的文章。他也阅读过早期穆斯林反帝改革家阿卜杜勒·拉赫米·卡瓦基比的《乡村之母》和《王朝的特征》、埃及小说家陶菲克·哈基姆的著名现实主义小说《复活》，这些作品引起他对埃及民族命运的关注。中学时

代，纳赛尔曾加入青年埃及协会，但两年后退出。

1937年初，纳赛尔经多方活动进入了陆军军官学校。次年夏，因部队急需军官，他提前毕业，被分配到曼卡巴德兵营服役。在军校和兵营，他与阿卜杜勒·哈基姆·阿米尔、扎克里亚·毛希丁和安瓦尔·萨达特等青年军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通过他们，又结识了更多的军校同学和青年军官，这为他日后发动革命准备了骨干力量。

二月事件后，纳赛尔与他的军官朋友们频繁交换看法，尽管他们都要求把英国人赶出埃及，都认为华夫脱党已堕落为英国人的帮凶，但并没有形成共同的政治主张。他们中的一些人曾参与前陆军参谋长马斯里组织的亲轴心国活动，一些人受穆斯林兄弟会和青年埃及协会的影响很深，甚或就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少数人持左翼观点，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有不少军官对国王抱有幻想，试图与国王联合起来，驱逐英国人，实现民族独立。

1943年春，已晋升上尉的纳赛尔担任了军校教官，开始秘密筹划革命组织，他新结交的朋友阿卜杜·拉乌夫成了他的得力助手。此人长于社交，又胆略过人。通过他的介绍，纳赛尔认识了卡迈勒丁·侯赛因、哈立德·毛希丁和哈桑·易卜拉欣等爱国军官。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他们都认为，“如果要拯救我们祖国的前途，那么政治暗杀就是我们不得不采取的‘积极行动’”，打算暗杀法鲁克国王及其侍臣，并拟定了行动计划。

在1948～1949年的巴勒斯坦战争中，埃及军队屡屡受挫，实际上打了败仗。但战争结束后，国王却举行阅兵式，欢迎“凯旋”归来的军队。纳赛尔作为前线指挥官深知这场战争的真相，对国王掩饰战败事实，愚弄百姓的行为十分气愤，并坚持认为，埃及战败

的根源在于以国王为首的统治集团的腐败。事实上，国王的确接受过100万埃镑的贿赂而购买了大批法国过时的武器，其他政府官员和军队领导人也有类似的受贿劣迹。纳赛尔和他的战友们发誓要推翻这腐败的政权。

1949年12月，纳赛尔和他的最亲密的军官朋友们决定成立一个秘密组织，取名"自由军官组织"，其领导机构为执行委员会，由9人组成。他们是：纳赛尔中校、阿米尔少校、萨达特中校、萨拉赫·萨利姆上校、卡迈勒丁·侯赛因少校、哈立德·毛希丁少校、加麦尔·萨利姆空军中校、哈迪·易卡拉欣空军少校、阿布德·拉蒂夫·波格达迪空军中校。后来，侯赛因·沙菲少校和扎克里亚·毛希丁中校也参加了执委会。在1950、1951、1952年三次选举中，纳赛尔均当选主席。1952年革命前，自由军官人数约为200人，除1人外，均为穆斯林，且均为30年代第一批军校学员。执委会初步拟定于1954年发动政变，推翻法鲁克王朝。但由于随后的国内形势急转直下，举事日期提前了两年。

"七·二三"武装政变

1950年1月华夫脱党重新执政，为改变它在公众中的亲英和妥协形象，于1951年10月单方面宣布废除1936年英埃条约。自由军官组织赞赏政府的举措，并对运河区出现的反英游击武装给予积极支持。但为保存实力，它并没有直接参与。当时，自由军官们更关心另外一件事——开罗军官俱乐部选举问题。

选举定于1952年1月27日进行。自由军官推举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和他们自己的成员为候选人，以抵制那些亲国王的资深军官。国王闻讯，命令推迟选举，但自由军官们说服与会的俱乐

部成员如期进行选举,结果纳吉布当选俱乐部主席,自由军官组织推举的其他候选人也悉数当选委员。国王恼羞成怒,不承认选举结果,强行任命其亲信侯赛因·苏里少将为俱乐部主席。纳赛尔等人被国王的独断专行所激怒,亲自行刺侯赛因·苏里,后者被重伤,但未毙命。事后,纳赛尔甚为后悔,他意识到暗杀某个人并不能改变旧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命运,决心摈弃恐怖活动,以革命手段推翻现存制度。此时国王已经怀疑军队中存在密谋集团,进一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开罗纵火事件发生后,埃及国内秩序大乱,自由军官组织决定提前行动。为统一思想,它制定了六项原则,作为自由军官运动的宗旨,即:消灭殖民主义;消灭封建主义;消灭垄断;结束资本对政权的控制;建立社会公正;建立一支强大的爱国军队;建立健全的民主生活。

1952年7月出任首相的侯赛因·西尔里为弥合军队与国王之间的裂痕,请求国王任命纳吉布为国防大臣。纳吉布是一位有正义感的爱国将领,在巴勒斯坦战争中他作为炮兵师长,身先士卒,三次负伤。战后,他化名"一士兵"在报刊上披露武器丑闻,指责当局犯下渎职罪,因此在军队中颇得人心。自由军官推举他为自己的候选人,也是考虑到他的名望。然而国王不仅拒绝了西尔里的建议,还下令解散了军官俱乐部,并最终任命他的内弟伊斯梅尔·谢林任国防部长。

国王解散俱乐部和任命谢林为国防部长,使自由军官们怀疑他们可能已被国王察觉。7月16日,即在国王解散俱乐部的第二天,自由军官组织执委会决定先发制人,于7月21日午夜发动政变,后因准备工作延误,政变推迟了24小时举行。纳吉布没有出

席这次会议，其原因可能是他已经受到警察严密监视，不便积极行动，也可能是自由军官们只是借重他的名望，并不把他看作实际上的领袖。

1952年7月22日11时，大约200名自由军官和3 000名士兵按预先计划开始分头行动。阿米尔率一支部队迅速包围了陆军总司令部，逮捕了总参谋长和部分高级军官。其他部队随后占据了机场、火车站、电台、电讯局、大桥和某些政府部门，数小时后，整个开罗为政变部队控制。

纳吉布在23日凌晨得到政变第一阶段成功的消息，他被护送到政变者占领的总司令部，并被任命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早晨7点钟，萨达特以纳吉布的名义发表声明，声称为了整顿军队，清除"卖国贼和无能之辈"，以纳吉布为首的军官们已经采取行动。

由于担心法鲁克可能会在英国人帮助下进行反扑，政变者决定立即废黜国王。此时国王正在亚历山大避暑。7月25日，纳吉布同执委会部分成员抵达亚历山大，扎克里亚·毛希丁则率领一支坦克部队向亚历山大挺进，于次日上午包围了国王下榻的蒂恩角宫。纳吉布通过新首相马海尔向国王提交了一个最后通牒，勒令他于当日中午传位于王储艾哈迈德·福阿德，6点前离开埃及。法鲁克见大势已去，只得在退位诏书上签字画押。下午6时整，法鲁克携带家眷乘一艘游艇离开埃及，前往他的流亡地——意大利的那波利城。至此，政变取得完全成功。

共和国的成立

政变成功后，自由军官组织的执行委员会易名为革命指导委员会，成员亦由9人扩大为14人。纳吉布不仅是武装部队总司

令，而且被推选为革命指导委员会主席，纳赛尔任副主席。但委员会所有决定均须经多数委员同意方能生效，因而这个最高权力机构的实际领袖是纳赛尔。与此同时，年幼的福阿德被立为国王，由临时摄政委员会辅弼执政。

1952 年 7 月 31 日，革命指导委员会要求各政党"自我清党"，即清除腐败分子，使之成为廉洁奉公的政党，然后公布政纲，参加拟于 1953 年 2 月进行的大选。同时委员会着手进行土地改革。大多数政党对清党置之不理或阳奉阴违，其政纲对土改讳莫如深，避而不提。首相马海尔更带头反对清党和土改，9 月 7 日被解除职务，由纳吉布取代。鉴于反对势力过去强大，委员会逮捕了大约 90 名宫廷官员和政党领袖，指控他们进行反革命宣传，阴谋颠覆新政权。不过两个月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又被释放。接着，革命委员会对高级文官队伍进行了清洗，并让大约 450 名军官退役。

9 月 9 日，革命指导委员会正式颁布政党组织法。该法要求各政党须将其章程、创始人名单、收入来源呈报内政大臣，重新进行登记。至 9 月底，有 25 个政党参加了登记。然而主要政党在重新登记后不仅继续攻击土改法，而且给政府制造新的麻烦：穆斯林兄弟会要求分享政权，华夫脱党要求一部新宪法，尽快恢复议会政府。革命指导委员会无法同时对付这两大组织，被迫作出某些让步：释放了所有政治犯，吸收某些文官入阁，原青年埃及协会和祖国党的几名成员也参加了政府。

到 12 月初，革命指导委员会已决心放弃同政党合作以及在 1953 年 2 月之前举行选举的想法。它认为，选举仅仅意味着旧制度的复辟，华夫脱党人和穆斯林兄弟会一旦控制议会，势必要求自由军官交出在军队中掌握的权力。因此，纳吉布将军在 12 月 9 日

宣布废除1923年宪法,并将选举推迟三年进行。

1953年1月16日,纳吉布以武装部队总司令和政府首脑名义宣布,解散所有政党并没收其财产,只有穆斯林兄弟会作为一个社会和宗教组织可以继续存在。1月23日,纳吉布又宣布,埃及进入三年过渡期。在过渡时期,革命指导委员会代行议会职权;内阁由军官和文官混合组成,享有立法权和行政权;国家总政策由革命委员会和内阁联席会议制定;将成立一个新的政治组织——"解放大会"取代各个政党。

6月17日,革命指导委员会下令废除君主制。次日,埃及共和国宣告成立,纳吉布出任共和国总统兼政府总理,纳赛尔任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内阁由5名军官和10名文官组成。穆罕默德·阿里王朝近一个半世纪统治至此结束。

纳吉布下台

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意味着自由军官们的政权已经巩固,它还面临着强大的穆斯林兄弟会的威胁。后者拥有2 000个支部200万成员,已经渗透到埃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阶层,特别是学生人群和城市贫民,甚至渗透到军队之中。作为1952年革命的支持者,兄弟会非常希望对新政权施加自己的影响,对自己仅被允许存在而被排斥于政权之外非常不满,并确信自己有能力向新政权挑战。1954年1月12日,兄弟会发动它的学生追随者进行反对军人政权的示威,结果与解放大会的学生们发生冲突,数名学生受伤。政府很快予以反击,取缔了兄弟会组织。兄弟会转入地下,继续对新政权构成严重威胁。

新政权受到的威胁还来自它内部的分裂。纳吉布本是自由军

官为号召群众而推出的名义上的革命领袖，真正的领袖是纳赛尔。在对革命目标和方法的理解上，他与革命指导委员会之间显然有差异。在纳吉布看来，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之后，革命即告完成，军人应回到兵营，议会生活应尽快恢复，建立文人政府。而自由军官们的理想是在埃及建立公正民主的社会，不仅要消灭封建主义，而且要消灭资本主义。由于纳吉布并非自由军官的志同道合者，因而对革命指导委员会确定的政策自然不满意。他反对打击旧政党和穆斯林兄弟会，反对自由军官在政府中任职，对于阿米尔取代他出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更是怒火中烧。

政治分歧逐渐演变为权力斗争。纳吉布日益不满足于扮演挂名首脑的角色，他要求对内阁、革命指导委员会和总司令的决定拥有否决权，并抱怨自由军官们经常瞒着他召开秘密会议作出各种决策。自由军官们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志，则设法限制纳吉布的权力，他们不仅坚持集体决策制度，有时还有意识地把他排除在决策圈之外。为削弱纳吉布在公众中的影响，他们还在报刊上尽量少登或不登他的讲话和照片，而突出宣传纳赛尔，称纳赛尔为革命的"中流砥柱"。但是由于纳吉布一年半以来一直担任革命指导委员会主席、总统、总理等职务，加之他举止文雅温和，因而在民众中甚得人心。纳吉布正是凭借这一优势，向握有实权的纳赛尔的权威发起挑战。

1954年2月兄弟会的反政府示威被镇压后，纳吉布突然于2月23日向革命指导委员会提出辞呈，声称他无法履行他的职责，以此要挟革命指导委员会，并且估计后者会向他让步。不料革命委员会接受了他的辞呈，任命纳赛尔为委员会主席和政府总理，但总统职务暂时空缺。接着军队包围了纳吉布的住所，把他软禁起

来。此举立即引发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华夫脱党、穆斯林兄弟会和社会党鼓动之下，开罗爆发支持纳吉布的示威游行。更严重的是，2月26日，开罗骑兵部队在兵营举行集会，要求立即恢复纳吉布的职务。作为革命指导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哈立德·毛希丁，也当面指责纳赛尔独断专行，擅自解除纳吉布的职务。亚历山大的部分军官也发表了拥护纳吉布的声明。支持纳赛尔的自由军官们迅速组织反击，第二天炮兵部队包围了骑兵兵营，而空军军官则驾机在营地上空盘旋。革命指导委员会为避免军队内部发生火并，从而毁灭革命，被迫作出一系列让步：纳吉布官复原职，纳赛尔改任副总理；定于1954年7月举行立法会议选举，届时革命指导委员会自行解散，由立法会议制定新宪法，选举新总统；恢复政党活动。

局势的骤然变化完全出乎纳赛尔的预料，他一时不知所措，感到十分悲观。危急关头，军队和工人群众挺身而出。3月27日，支持纳赛尔的军官们举行会议，明确表示他们决不允许旧制度复辟，要求革命指导委员会撤消三月决议。在解放大会的组织下，拥有百万之众的交通工会连续两天举行罢工，其他行业工会起而响应，一些农民也前来声援，"打倒纳吉布"、"革命万岁"的口号响彻开罗上空。

在形势明显逆转的情况下，3月29日，革命指导委员会宣布，推迟三月决议的执行，直至1956年1月过渡时期结束。随后，委员会进一步采取了强硬措施，包括清除各省、市政务会和新闻机构中的所谓不良分子；剥夺在1942年以后至1952年革命前担任过大臣职务者为期十年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改组记者联合会执委会，其委员由政府委派；对图谋推翻政府的16名政客由革命法

庭进行审判。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纳吉布于4月27日辞去总理职务，并被排挤出革命指导委员会，仅保留总统职务。纳赛尔接任总理，他改组了内阁，更多的自由军官出任部长。1月26日，因兄弟会成员试图刺杀纳赛尔，政府再次宣布其为非法，并逮捕了该组织2 943名成员，其中1 121人交付"人民法庭"审判。由于在审讯过程中发现纳吉布与兄弟会勾结，颠覆政府，委员会于11月14日宣布解除纳吉布的一切职务。纳吉布的下台不只是他个人在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而且是埃及旧的政治力量的彻底失败。

二、向西方挑战

埃及放弃苏丹与英军撤出运河区

结束英国对运河区的军事占领，实现埃及的完全独立，是新政权主要目标之一。但由于埃及与英国在苏丹地位问题上的分歧，两国关系紧张，英军撤出运河区的问题无从谈起。1952年革命后，埃及人又一次萌发了实现尼罗河统一的希望，而苏丹人在英国的鼓励下，则谋求使苏丹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显然，如果埃及仍坚持建立尼罗河联邦，势必遭到苏丹民族主义者的反对。因此，埃及新政府明智地做出抉择，放弃了一个世纪以来埃及所坚持的所谓"苏丹是埃及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主张，决定承认苏丹的自决权，即苏丹可以选择独立，而不必同埃及结成联盟。1953年2月，埃及与英国就此达成协议，规定苏丹在经过三年过渡期后，由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决定是脱离埃及独立，还是与埃及联合。之后，英埃两国立即撤军，结束对苏丹的"共管"。后来在

1956年，苏丹正式宣布独立。

苏丹问题的解决在埃英之间创造了和解气氛，纳赛尔趁机提出了英国撤出运河区的问题。1953年4月，两国在开罗举行谈判。埃方表示，愿意允许一定数量的英国技术人员留在苏伊士运河基地，以保证基地在战时重新启用，但前提是英国不要以此作为占领埃及的借口。英方要求在埃及保留7 000名穿军装的技术人员，对基地继续保留军事指挥权。这意味着英军实际上仍保持对运河区的军事占领，因之埃及方面于5月6日中断了会谈。谈判破裂后，埃及政府为向英国施加压力，把原来分散的反英游击队组成统一的"民族解放民兵组织"，指派1 200名军官对他们进行强化训练，并提供大量武器。美国为取代英国，也力促英国撤军。

1954年1月，埃英再次会谈。埃及同意，一旦土耳其受到攻击，运河基地可以重新启用，这是迄今为止埃及一直拒绝的条件。但是，尽管埃方做出了重大让步，英方仍迟迟不愿接受全面撤军原则。于是"全国解放民兵组织"便对运河区的英国发动了武装进攻。这年夏季，英国终于被迫同意从埃及撤出所有武装人员，并以英国公司同埃及签约的形式留下文职人员以维持对基地的使用。10月19日，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与纳赛尔正式签订撤军协定。协定规定，废除1936年条约，英军在此后20个月内分阶段从埃及全部撤出；运河基地现存设施交由埃及控制，但要由1200名英国文职技术人员维持使用；协定有效期为7年，此期间，如出现对埃及、阿拉伯共同防御条约国家[1] 或土耳其的武装进攻，英军

---

① 条约于1950年签订，至1953年，参加条约的国家有埃及、沙特阿拉伯、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也门和利比亚8国。

可重返运河基地;同时,埃及应信守1888年关于运河自由航行的君士坦丁堡公约。

1956年6月13日,最后一批英国士兵撤离埃及,英国对苏伊士运河区长达74年的军事占领宣告结束。6月18日,纳赛尔眼含热泪升起了架设在塞得海军大楼上的埃及国旗。

阿斯旺高坝贷款问题和苏伊士运河国有化

"七·二三"革命后不久,埃及政府为改变国家的经济落后状况,决定在上埃及阿斯旺附近的尼罗河峡谷间修筑一座高坝。大坝长约4公里,高约110米,围成一个约550公里长的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这项巨大的工程预计将耗资13亿美元,工期将超过10年,完工后将扩大灌溉面积6 000万公亩,每年发电100亿度,使埃及国民收入增加1/4。

实现这一宏伟计划的最大困难是资金来源问题。自1953年起,埃及政府就开始与世界银行讨论国际资金援助问题,同时争取美、英等国的资助。世行以埃及政治不稳定为由不愿考虑贷款问题,而美英则未予理会。1955年9月,埃及与捷克斯洛伐克(实际是与苏联)签订一笔价值8 000万美元的武器购买协定。接着苏联又表示它愿意向埃及提供1亿英镑的贷款,并为建造大坝提供材料和技术人员。这使美英政府深感不安。为了防止埃及倒向苏联一边,1955年12月,两国表示,在大坝工程第一阶段,愿向埃及赠款7 000万美元,其中美国5 600万,英国1 400万,以后适当时候还将提供1.3亿美元的贷款。世界银行也提出向埃及提供2亿美元贷款,但这笔贷款附有若干条件,其中之一是世行贷款以美英两国履行其承诺的赠款义务为前提。

1955年11月，约旦在土耳其推动下表示准备参加《巴格达条约》组织，一直希望扩大这一军事组织的英国为之欣喜。埃及政府通过"阿拉伯之声"电台激烈批评约旦背叛阿拉伯事业，并劝说其他阿拉伯国家不要加入该条约，以免受到"变相的外来统治"。在埃及的忠告下，阿拉伯国家除伊拉克外都没有参加，约旦也改变了立场。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由此得出结论，"这个'埃及独裁者'必须铲除"。此后，埃及的几项外交活动又深深地刺痛了美国：1956年5月30日，纳赛尔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6月，苏联外长谢皮洛夫访问埃及，表示要给埃及以各方面援助，纳赛尔则宣布将同苏联全面合作。美国断定埃及已倒向共产主义集团，于7月19日宣布撤消对埃及的赠款，其借口是，埃及没有与有关国家就尼罗河水量分配达成协议，也没有建造大坝的经济实力。第二天，英国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以美英赠款为前提的世界银行的2亿美元贷款也随之取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估计，美英和世行的行动将是对埃及一个严厉的教训。

但是，纳赛尔和埃及人民没有为西方大国的压力所屈服，而是作出了有力的反击。7月23日，埃及政府正式决定，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用公司的收入来支付高坝工程的费用。纳赛尔愤怒地谴责了美国的卑劣行径，他说："如果华盛顿无视国际关系准则，无耻而毫无根据地想让世人怀疑埃及的经济能力，那么我要对它说：'你们去气死吧，因为你们将永远无法对我们指手画脚，也无法主宰我们的生活。'"三天后，在亚历山大举行的纪念革命4周年群众大会上，纳赛尔发表了长达2小时40分钟的长篇演讲。他详尽讲述了有关高坝贷款谈判的过程，断定西方大国和世界银行提出的贷款条件是"一个要控制我们经济独立的阴谋"，撤回贷款援助意

在“惩罚埃及，因为埃及拒绝支持军事集团”，强调埃及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不会仰人鼻息。”回顾埃及人民开凿苏伊士运河的血泪史以及运河开通后埃及人民遭受的灾难和屈辱，他坚定地表示，历史不容“背信弃义和欺诈蒙骗”重演，埃及将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用运河收入自己建造高坝。最后，纳赛尔宣读了运河公司国有化法令。当晚，埃及正式接管了运河公司。

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充分表明了埃及政府维护民族独立的坚定意志，是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一次有力的公开挑战。埃及公众满腔热情地拥护政府这一决定，载歌载舞地欢庆这一历史性时刻。

苏伊士运河战争

埃及政府的决定令西方各国大为震惊。英、法、美三国首先向埃及提出抗议，称埃及收回运河为“非法”，随之冻结了埃及在三国的存款和资产。8月2日，三国外长在伦敦开会，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不顾历史事实，硬说运河公司是一家“始终具有国际性质”的国际机构，埃及无权将它收归国有，要求建立一个在“国际监督”之下的管理机构，来保障运河航行自由，并建议在伦敦召开君士坦丁堡公约缔约国和使用国会议来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埃及政府据理批判了三国声明，拒绝参加伦敦会议。8月16日，美英法三国单方面召开22国伦敦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杜勒斯提出的建立“苏伊士运河委员会”的计划。会后，投赞成票的18国代表赴开罗兜售该计划，结果碰壁。9月23日，英法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再次要求对运河实施“国际管制”，但安理会否决了英法提案。在一系列外交活动失败后，英、法两国便与以色列合谋用武力实现自己的

要求。

1949年巴勒斯坦战争结束后，埃及与以色列仍处于战争状态，埃及据此对以色列实行海上封锁，不准其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埃及政府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后，以色列认为苏伊士运河问题除了军事解决别无选择，即着手制定“西奈战役”作战计划。1956年9月1日，当法国要它参加对埃及作战时，以色列欣然允诺。10月24日，英、法、以三国在未告知美国的情况下，在巴黎附近的塞夫勒达成联合侵略埃及的决定。

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突然不宣而战，以4.5万人的兵力分数路向埃及的西奈半岛发起全面进攻。第二天，英法向埃以两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交战双方停火，并从运河两岸各后撤10英里，由英法军队进驻运河。通牒限定在12小时内作出答复，以色列表示接受。纳赛尔认为这个通牒显然是要打击遭受侵略的埃及，而偏袒侵略者以色列，他断然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

10月31日下午6时，英、法出动240多架飞机对埃及的机场、兵营以及开罗、亚历山大等城市的重要经济和交通设施轮番轰炸。埃及飞机大多来不及起飞就被炸毁，电台的发射塔也被炸毁，全国广播一度中断。埃及领导人自知难以抵挡英法两个军事大国的进攻，但他们决不愿向侵略者屈膝，矢志抗战到底。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踊跃报名参战，报效祖国。为防止敌舰队像1882年那样沿运河长驱直入，政府下令炸沉47条船只，堵塞了运河。

11月5日，1 500名英法伞兵在塞得港和法得港登陆。6日，一支由一百多艘战舰、7艘航空母舰、数百艘登陆艇和约80艘商船组成的庞大舰队，运载着7.5万名英法联军的官兵，抵达塞得港，在数百架飞机掩护下实施登陆。塞得港数十万军民殊死奋战，

2 000名官兵和1 000市民英勇献身，使敌军未能实现其48小时内占领整个运河区的速战速决计划。

英、法、以悍然入侵埃及，激起全世界的公愤，国际舆论一片谴责之声。亚、非、拉许多国家的人民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声援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国政府决定向埃及捐赠2 000万瑞士法郎和大批物资。阿拉伯各国更是表现出空前的团结：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与英、法断交，约旦与法国断交，三国都宣布总动员，准备出兵参战；沙特停止向英法供应石油，叙利亚和约旦则切断了境内的油管，使其不能从伊拉克向欧洲输送原油；利比亚虽与英国结盟，但不准英国把它作为进攻埃及的基地；作为巴格达条约成员国的伊拉克迫于国内人民的压力，也不得不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要求英、法撤军。英、法两国政府在国内的日子也不好过。在英国，公众的抗议和在野党的弹劾引起执政的保守党内部分歧，一些人退党，外交大臣辞职。在法国，执政的社会党成为众矢之的，摩勒威信大降。

在联合国，英法处境空前孤立。美国对英法入侵埃及的做法感到意外和恼火，担心英法的行动会把阿拉伯国家推入急于在中东扩大影响的苏联的怀抱，破坏它的中东战略，因而一反常态地站在英法的对立面。11月2日，杜勒斯提出一项提案，要求立即停止战争，外国军队立即撤出埃及。次日，联大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美国的提案。11月3日联大又通过两项决议，限定各方在12小时内停火，在48小时内建立一支6 000人的联合国紧急部队去维持和平。此时，苏联刚刚平息了匈牙利事件，立刻把注意力转向中东，它警告英法必须立即撤出埃及，否则它将向埃及派出志愿军，甚至对英法使用导弹。

面对埃及人民的顽强抗击和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加之国内经济困难和政策分歧，英、法被迫于 11 月 6 日宣布停火，并于 12 月 22 日将其军队全部撤出埃及。1957 年 3 月 8 日，以色列军队撤回到停火线后，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埃及边界。

苏伊士运河战争又称第二次中东战争，是战后世界发展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它对国际政治格局和中东地区主要力量之间的对比产生了深刻影响。英、法两国在中东舞台上退居次要地位，美苏两国由于站在了主持正义的世界进步力量一边而在政治上获益甚多，它们在中东地区的影响迅速上升，同时也为中东增添了新的矛盾。以色列基本达到了它发动战争的目的，在美国支持下，它获得了从亚喀巴湾经蒂朗海峡的通航权，在埃以之间建立了一条由联合国维和部队驻扎的缓冲地带。但在政治上，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所暴露出来的侵略性使它声名扫地，世界舆论再次转向同情巴勒斯坦难民和遭受侵略的阿拉伯国家。

在这场战争中，埃及作为被侵略国，尽管遭受了严重的军事失败和巨大的人员、物质损失，但它毕竟赢得了政治上和精神上的胜利。它完全收回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进一步巩固了民族独立；在世界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人民中树立了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形象，大大提高了它的国际地位，开罗从此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中心，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源泉，纳赛尔则被誉为“当代萨拉丁”。

三、纳赛尔社会主义指导下的埃及经济与政治

纳赛尔的社会主义

1952年革命前，自由军官组织曾制定出六项原则作为革命的基本纲领。革命后，新政权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经济形势，突出的问题是：农业发展缓慢，很难适应人口迅速增长的需要；工业基础薄弱，经济结构单一，过分依赖西方市场；社会两极分化，分配严重不公。显然，仅有六项原则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作为新政权的主要领导人，纳赛尔深感埃及远远落后于世界，"若不以最快速度前进，势必将成为历史上最凶恶的殖民主义的猎获物"。从1952年起，纳赛尔就开始探索埃及的发展道路。

纳赛尔最初的探索反映在1954年出版的他的《革命哲学》一书之中。书中指出，"实现经济自由的政治自由"是埃及摆脱民族危机的必由之路；埃及注定要经历两种革命，即争取民族自由的政治革命和实现社会公正的社会革命；当军队作为先锋队已经完成了政治革命之后，应该建立一个"自由"的一党政体率领人民完成剩余的任务，因为原有政党和政治家们似乎只关心自己的私欲，彼此攻讦或炫耀自我。这里纳赛尔所说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含义不明，只是一些抽象概念，没有触及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根本问题，因之很难说有什么理论指导意义。不过，纳赛尔明确否定了政党议会制，表明他并不想照搬欧美先进国家的发展模式。

1955年5月，纳赛尔从万隆回国后在一次讲话中首次提到"社会主义"一词。此后，他越来越明确地把社会主义作为埃及的

发展道路，并且不断地对社会主义的含义作出解释。1957年的“民族联盟”（即原解放大会）章程规定，该组织的目标是建立“民主合作的社会主义”。这里的社会主义是“解放所有人，使之免受剥削”，民主意味着“让每一个人参与政权”，合作指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地进行劳动、建设国家和提高生产”。

1962年制定的《民族宪章》标志着纳赛尔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定型。这一纲领性文献指出，阿拉伯革命有三个目标：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社会主义是“一个富足和正义的社会，一个劳动和机会均等的社会，一个生产的社会和一个福利的社会”。埃及之所以要选择社会主义，是因为埃及的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发展资本主义将导致埃及独立的丧失，因之选择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纳赛尔特别强调，社会主义与伊斯兰教并不矛盾，因为真主的使命就在于恢复人的尊严和幸福。纳赛尔的社会主义理论可以概括如下：

（1）由人民控制所有生产资料，但并不废除私有制。（2）承认埃及社会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但主张利用国家机器调和矛盾，限制斗争，最终“融合阶级差别”。（3）认为埃及国家利益与阿拉伯世界不可分割，但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统一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方能实现。（4）声称“社会主义源于伊斯兰教”，但同时坚持政教分离，不容许宗教干预政治。纳赛尔的社会主义理论是1952年革命后埃及国家生活的惟一指导思想，它在埃及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土改、垦荒与合作社

到1952年，埃及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的最大问

题是土地高度集中,不改变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埃及经济便难有大的发展。1922 年独立以来,一些远见卓识之士曾多次提出土地改革方案,但均被大地主占多数的议会所否定。自由军官掌权后,革命指导委员会不顾文官内阁的抗议,于 1952 年 9 月颁布了土地改革法。

九月法令规定,农业土地占有者其占有量不得超过 200 费丹,有子女者最多不超过 300 费丹,超过限额部分在 5 年内或由地主本人分成小块自行出售,或由政府按市价之一半以国债券偿付形式征购,然后把征购土地按征购价加上 15%的附加费出售给占地 5 费丹以下者;购地者在 30 年内分期偿还所有费用,外加 3%的利息。由于土地占有限额规定过高,这次土改所涉及的对象仅 1789 人,但仍然引起轩然大波:内阁首相阿里·马海尔辞职,一些旧政党大唱反调,个别大地主策划骚乱。这些风波平息后,大地主又利用土改法的漏洞,百般阻挠土改法的实施。他们或伪造地契,或假托馈赠妻儿藏匿田产,或形式上售予他人(如仆人和雇工),实际上仍保留土地所有权。结果,政府仅征得 36 万费丹土地,只及应征土地约 55%,而且其中近 18 万费丹是被没收的王室田产。

1961 年,政府颁布第二次土地法,规定每户占地不得超过 100 费丹,其子女可保留 50 费丹,征地方式不变。这次土改涉及约 5000 人,征地约 10 万费丹。1964 年,政府宣布根据土改法征得的全部土地国家所有,不予赔偿,自当年起停止兑换国债券。

1969 年的第三次土改法规定,每户占地不超过 50 费丹,全家不得超过 100 费丹。由于遭到许多社会名流和上层分子的反对,加之纳赛尔病故后新任总统萨达特改弦易辙,这一法令基本没有实施。

三次土改，政府共分配土地约82万费丹(其中10万费丹为新开地)，受益者34万户，约170万人，占1970年农村人口的9%。

在土改的同时，政府不惜花费巨额资金，大力开垦荒地。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垦荒的地点不是在尼罗河流域，而是在西部沙漠的解放省。计划改良沙漠25.5万费丹，由于水源不足，收效甚微，从1952年至1959年仅垦荒8万费丹。1960年阿斯旺高坝工程正式开工后，水利条件逐步改善，垦荒工作也以更大规模展开。至1970年高坝竣工时，共开垦荒地和整治沙漠80.5万费丹，其中65万费丹直接受益于高坝提供的灌溉，创造了埃及垦荒史上的奇迹。

与土地改革紧密相连的还有合作社运动。合作社在埃及并不是新事物，早在20世纪初，在奥马尔·卢特菲的倡导下，就已经出现了第一批合作社，其职能主要是组织供销活动和维护农民权益。埃及独立后，政府在农业部下设立了合作社局，负责促进和指导农业合作社，其具体措施包括向合作社提供低息贷款和种子、化肥、农机等生产资料。到1952年，全国共有合作社1 727个，社员45万人。自由军官集团在制定第一次土改法时，预计到土改后土地分散，不利于采取先进的生产方式，因而明文规定，土改受益者必须加入土改合作社。至1968年，全国共建立了650个土改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比革命前的信贷合作社拥有更多的职能，不仅向银行贷款和赊购生产资料，还协助社员进行生产，为社员代销农产品，因而是一种半消费、半生产性的合作社。

纳赛尔时期埃及政府推行的上述农业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地主自觉不自觉地在自己的地产上组织资本主义农场，封建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基本上被消灭，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埃及开始占据支配地位。土地分配严重不合

理的状况得到一定改善，占地100费丹以上的大地主基本绝迹。由于土改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政府增加了农业投入，又修筑了高坝，扩大了农田灌溉，广泛推行三圃制以及农业技术的改进和农机的使用，农业产量成倍提高，农产值由1952年的4亿埃镑增至1970年的10亿埃镑，农民生活水平相应有所提高。但是改革者确定的"社会公正"目标并未实现，到1970年仍有127.9万户赤贫者，占农民总数的33%，他们大多是无力购买土地的长期工、季节工或流动工。

国有化与五年计划

通过工业化实现国家现代化，使埃及进入强国之列，是自由军官组织梦寐以求的理想。新政权初期，基本上沿袭了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些鼓励外国和私人投资的立法，但是这些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外国资本家不愿对埃及这样的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大量投资，他们提供经济援助附有种种新政权不能接受的政治条件。埃及大资产阶级对新政权半信半疑，不愿大力投资。地主阶级是新政权的反对者，更不愿配合政府向工业投资。1952～1956年，私人投资总额仅4.3亿埃镑，比1947～1951年的6.5亿埃镑减少了1/3。

苏伊士战争后，纳赛尔政权大幅度调整了经济政策。在国内，政府决心推行国家计划加强对经济控制；在国际上，埃及开始脱离西方，倾向于与苏联、东欧以及某些亚非国家密切经济与政治关系。经济政策的这一重大变化最早表现是没收外国企业。1956年11月，英、法两国在埃及开办的所有银行和公司（总计15000家）全部被政府接管。

1957年初，最高计划会议和全国计划委员会宣告成立。这年夏季，政府制订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工业全面发展计划。该计划拟在五年内投资3.3亿埃镑，新建502个项目，预计工业年增长率达到16%。政府希望该计划的实施将打破苏伊士战争后西方国家对埃及的经济封锁，逐步摆脱对外国制造业产品的依赖。但是，大资产阶级因政府拒绝出售所没收的英法企业的股票，不愿积极向计划项目投资，因而到1960年，政府便承担起所有资本构成的责任，所有投资都处于政府监控之下。一个由中央政府控制的指令性经济成为必然趋势，自由企业由此开始消失。

60年代初，国有化的规模进一步加大，其重点由外资企业转向埃及企业。1960年2月，埃及银行和国民银行被收归国有。5月，出版业被收归国有，开罗的交通业也归市有。1961年6月至7月，政府颁布法令，接管整个进口贸易和大部分出口贸易，以及地方的保险业和贸易机构。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惩罚性措施：埃及最富有的600个家族的财产被扣押，其中一些家族的成员被拘捕；148家大企业因违反政府关于个人持股不得超过1万镑的规定，其大部分股票被收归国有。1963～1964年，政府把所有合营企业和被监管的财产收归国有，并对另外128家工商业实行国有化。到1964年底，所有大企业和部分中型企业都被收归国有。1966年，公营企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64%。私人资本虽未取消，但其活动范围和投资方向受到限制。

在大规模国有化运动展开之前，国家计划委员会拟定了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1960～1965)。计划要求五年内国民收入年均增长7%，工业年均增长14%。但实际执行情况不尽如人意。工业发展头两年较快，增长率分别为12%和10%，以后逐年

下降,1964 年只有 4.5%,远低于计划要求,这主要由于外汇匮乏,无力进口生产资料所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 6%,也低于计划规定。不过总的来说,无论是工业还是国民收人,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而且解决了 130 万人的就业问题。特别是作为计划主干项目的阿斯旺高坝工程进展顺利,在苏联的援助下,1964 年 5 月完成了第一期工程。

从 1965 年起,埃及政府开始执行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计划,打算在 7 年内(1965 ~ 1972)使国民收入翻一番。这个计划的实施一开始就不顺利。先是美国在 1966 年决定中止对埃及的粮食援助,政府被迫削减项目,另外制订了一个三年补充计划(1967 ~ 1970)。接着又发生了 1967 年的"六·五"战争,占全国石油产量 60%的西奈油田被以色列占领,苏伊士运河中断,旅游业一蹶不振,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急剧减少。为收复失地,政府被迫大幅度增加了国防开支而减少了基建投资。尽管 1967 年以后阿拉伯国家和苏联东欧提供巨大援助(每年平均 4.26 亿美元)足以使埃及经济渡过难关,但埃及人对纳赛尔政权已丧失信心,埃及经济无可挽回地进人衰退时期。1967 ~ 1970 年,工业年均增长仅 3.2%,1968 年呈负增长之势。面对国内外压力,纳赛尔悄悄地停止了"社会主义革命":释放政治犯,取消监管法,中止国有化进程,放宽对私营企业限制,鼓励外国投资,同时通过媒体,试探建立"开放社会"的可能性。

总统、军人与一党制

1952 ~ 1970 年,埃及的政权机构和政治组织虽几经演变,但政治体制的基本模式始终未改,这种模式就是:军人执政,总统集

权,一党独行。

“七·二三”革命后,自由军官废除了1923年宪法,解散了议会,接着宣布进入三年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禁止政党活动,由革命指导委员会代行议会职权,实行军事统治。尽管纳赛尔和新政权的其他领导人一再表白,他们期待民主,无意长期搞军人执政,但在他们的心目中,新政权惟一可依靠的力量就是军队,尤其以自由军官为核心的中下级爱国军官,更是被视为埃及革命的“忠实监护人”和“群众的先锋队”。

三年过渡期满后,1957年7月,埃及举行革命后的第一次立法机关即国民议会的选举。按规定,一旦国民议会产生,体现军人统治的最高权力机构革命指导委员会即自行解散。为了保证自由军官控制国民议会,革命指导委员会在它行将解散之前做了精心安排:以扎克里亚·毛希丁为首的一个九人秘密小组对2508名候选人进行了资格审查,结果不但其中1188名候选人被刷掉,而且变相地指定了43个选区的候选人;由于军人不能竞选议员,当局便指示59名军官和警官脱去军装,进入了议会。如此产生的议会自然不可能发挥立法机关的作用。事实上,在它存在的8个月(1957年7月~1958年3月)里,议员们仅仅是恭顺地听取总统和部长们讲话的听众。1958年埃及与叙利亚合并后成立的第二届国民议会(1960年6月~1961年9月)则根本没有经过选举,400名埃及议员都是由总统任命的。

纳赛尔时代历届政府的组成也体现出军人掌权的特点。在1953~1970年的16届内阁中,共有131人入阁,其中军人44人,文人84人。军人的任期平均5年,文人3年。总理职务更非军人莫属,纳赛尔兼任12届内阁总理,其余4届总理也全都是军人,分

别是纳吉布、萨布里、毛希丁和苏莱曼。内阁的重要部门如陆军部、内政部、情报部、军工部、城乡事务部始终由自由军官主持。只有几个专业性很强的部，包括外交部、工业部、财政部、商业部、司法部等由技术官僚负责，但这些官员的权力有限，不仅要受总统、副总统的领导，而且受到其助手和下属的制约。

政治体制的另一特点是总统高度集权。自纳吉布下台后，总统一职一直由纳赛尔担任。在他主政期间，先后颁布了三部宪法，包括 1956 年宪法、1958 年宪法和 1964 年宪法。这些宪法是参照美国宪法制定的，它们规定埃及实行总统制和三权分立原则，但它赋予总统的权力要比美国总统的权力更大。其表现是：总统任期 6 年，可连选连任；有权解散国民议会，有权建议、否决法律（考虑到国民议会未发挥真正的议会作用，此条规定使得总统享有事实上的立法权）；在非常时期，受国民议会之托，有权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鉴于总统权力过大可能导致个人独裁，根据 1962 年《民族宪章》的要求，专门设立了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总统委员会，作为恢复集体领导的一个步骤。但委员会成员的构成由总统一人定夺，因之总统权力并未受太大的影响。

纳赛尔时代埃及政治体制的第三个特点是一党制。尽管纳赛尔一再声称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党制度，无论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但为了拓宽他的政治基础，在取缔了原有政党后，他又先后建立了三个政治组织——解放大会（1953）、民族联盟（1957）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1962）。三个组织都有比较完备的组织系统，包括中央的最高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省、市、县、乡的各级办事机构；也有明确的政治纲领，那就是自由军官组织的基本原则以及纳赛尔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三个组织的最高领导人，除纳吉布

短暂地担任过解放大会主席之外，一直由纳赛尔担任。就其作用而言，它们实际上充当了纳赛尔政权的工具，是惟一合法的政党。后来，鉴于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包括了农民、工人、士兵、知识分子和民族资本家等几乎所有社会阶级和阶层，有可能失去其鲜明的政治性，纳赛尔于 1963 年 6 月还指示其心腹阿里·萨布里和侯赛因·海卡尔等人在社盟内部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先锋队”组织，以加强对社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该组织仅有几千人，但都是纳赛尔政权的骨干人物。它在秘密存在了数年之后，到 1966 年 8 月才予以公开。

毋庸置疑，纳赛尔时代的这种以军人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式政治体制对于巩固自由军官建立的新型政权，稳定政局，团结人民实现民族革命和经济发展的目标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政权初创时期也可以说是完全必要的。但它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使权力过分集中于纳赛尔个人和极少数人手中，使议会流于形式；它压制了社会上的不同声音和反对派意见，严重损害了政治民主原则；它使政权机关逐渐官僚化，官员惟上命是从，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办事拖沓，互相推诿，效率低下，同时也为滋生腐败提供了土壤。这些消极作用越到后来越加明显，纳赛尔政权亦越来越脱离人民，失去人心。

四、纳赛尔民族主义指导下的埃及外交

积极中立政策

当自由军官夺得政权的时候，国际上东西方之间的冷战正在

进行之中，但此时自由军官们更关心的是政权的巩固和英埃争端的解决。况且，无论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还是在民族感情上，他们都不可能让埃及加入西方国家集团。同样，他们也不可能把埃及与苏联集团连在一起，因为他们不赞同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中立与不结盟就成为他们的惟一选择。不过，由于当时西方似乎是埃及经济援助的惟一来源，为了取得必不可少的外援，埃及的中立政策又不得不稍微向西方倾斜。

但是，1954 年以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包括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武器援助、巴格达条约组织的成立、高坝贷款努力的失败以及苏伊士运河战争等，彻底粉碎了纳赛尔政权对西方仅存的一点幻想，迫使它重新思考埃及的对外政策。

埃及外交政策调整的最初迹象出现在万隆会议之后。这是纳赛尔在国际舞台上首次露面。亚非各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切齿痛恨，引起纳赛尔的共鸣，会议所体现的团结反帝精神使他看到了亚非国家广阔的政治前景。纳赛尔也把会议当作谴责以色列的一个论坛，并成功地促使会议通过决议，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和支持也门关于对南阿拉伯半岛拥有保护权的立场。在这次会议上，纳赛尔还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建立了个人关系，并通过后者开始和苏联、东欧国家接触。在此之前，他已结识了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万隆的经历开阔了纳赛尔的视野，也扩大了埃及的国际影响。回国不久，即 1955 年 5 月，纳赛尔便宣布，埃及将坚持积极的中立政策。苏伊士战争后，他重申了这一政策。所谓"积极中立"，就是不回避世界矛盾，通过参与国际事务，谋求国际进步与正义之实现，同时不与任何国家集团结盟。在 50 年代后期和整个 60 年代，埃及基本上恪守了这一外交原则。

1956年7月，纳赛尔与铁托、尼赫鲁在南斯拉夫的布里俄尼岛会晤，筹划开展不结盟运动问题。在这三国首脑的积极倡导和组织下，1961年9月，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在贝尔格莱德召开，此后，不结盟运动成为世界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纳赛尔作为这一运动的先驱者和创始人之一，也赢得了第三世界各国的普遍赞誉。

纳赛尔政权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深恶痛绝，把支持世界各地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反帝反殖斗争视为己任。1957年1月，美国为"填补中东地区的真空"，以经援和军援为诱饵，笼络中东国家组成亲美反苏集团。对此，埃及坚决予以拒绝和谴责，并规劝阿拉国家领导人不要接受这种政治束缚，以造成事实上同西方结盟。1958年，当美、英分别向黎巴嫩和约旦派兵保护亲西方的夏蒙总统和侯赛因国王时，埃及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对伊拉克革命后建立的民族主义政权给予承认，并提供军事援助。同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临时政府在开罗宣告成立，埃及率先予以承认。1962年，埃及出兵支持也门革命，同时向南也门的反英斗争提供援助。自1954年起，埃及政府就开设了"非洲之声"电台，用英语、法语以及数种非洲土著语进行广播，声援非洲人民的反殖斗争。许多非洲民族运动的领导人云集开罗，开展革命活动，将近二十个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组织相继在开罗开设了办事处，埃及军事院校还为这些组织培训军事指挥人员，通过各种渠道运送武器。

积极中立政策使埃及成了阿拉伯国家的中心、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基地和不结盟运动的中坚力量，赢得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尊重，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但是纳赛尔在推行这一政策中也出现过

一些严重失误。这方面最大的教训就是统一叙利亚和出兵也门。

埃、叙的合与分

大约从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时起，纳赛尔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埃及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在抵御外来侵略方面休戚与共、命运相连，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消除它们面临的种种危险。1955年4月，他第一次提到"阿拉伯民族主义"。1956年的临时宪法确认"埃及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苏伊士战争期间，阿拉伯人民显示出空前团结和巨大力量，纳赛尔更加相信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统一。此后，他便承担起了推行"阿拉伯革命"和统一"阿拉伯民族"的义务。

叙利亚自1946年独立以来，国内政局动荡，军事政变频仍。1956年叙利亚成立"国民联合政府"，奉行中立和不结盟政策。苏伊士战争后，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企图取代英国控制中东，积极在中东拼凑亲美集团，在沙特、约旦、黎巴嫩等国倒向美国后，叙利亚便成为美国争夺的另一个目标。1957年8月13日，叙利亚政府驱逐了三名被指控阴谋颠覆当地政府的美国人。美国政府迅速与土耳其、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等国磋商，拟定了一个武力干涉叙利亚，推翻"国民联合政府"的计划。由此造成1957年8~10月间的叙利亚危机。美国的军事干涉计划最终没有实施，原因是它的三个阿拉伯盟友畏葸不前，苏联向土耳其提出了警告，埃及也派出5000士兵开抵叙土边界，以防土军入侵。这场危机使叙利亚进一步向埃及靠拢。

在叙利亚国内，其意识形态与纳赛尔的阿拉伯革命思想十分接近的复兴党过去就主张与埃及组成统一的联邦国家，现在则更

加迫切地要求两国尽快合并。10月，复兴党人成为叙利亚议会议长，不久便推动两国议会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呼吁建立联邦。纳赛尔不反对埃叙联合，但坚持不要匆忙行事，至少应有5年的准备。但在叙军总参谋长比兹里将军和叙外长、复兴党人萨拉赫丁·比塔尔极力说服下，纳赛尔终于同意两国立即联合。1958年2月1日，纳赛尔与叙利亚总统库特利签署了关于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协议。3月6日，首届内阁组成。4名副总统埃、叙各占2名，34名部长中埃及人占20名，叙利亚人占14名，其中国防、外交、内政、工业等重要部门均为埃及人掌管。另外，为方便行政工作，在阿联南部地区（埃及）和北部地区（叙利亚）各成立一个由本地部长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作为中央政府的执行机构。但在1959年10月，纳赛尔又任命阿米尔为北部地区的总统代表，全权处理该地区的事务。叙利亚人对这种权力分配非常不满，复兴党人尤为强烈。他们自以为有功于两国统一，理应掌握大权，但首届内阁中他们仅有二人任职，后来虽然又增加了二人，但都不是重要角色，因而深感不快。种种努力失败后，复兴党阁员于1959年12月31日集体辞职，以示抗议。然而纳赛尔不但没有寻求缓和的良策，反而下令拘捕复兴党人，致使原本积极推动统一的政治力量成为统一的坚决反对者。

1961年7月，纳赛尔未经两地议员组成的国民议会的讨论和批准，颁布了“社会主义法令”，随之在阿联南北两地展开大规模国有化。叙利亚工商业者对此大为不满，共产党人则批评这种做法是要“完全消灭和吞并叙利亚的经济”。纳赛尔觉察叙利亚局势不稳，于1961年8月撤消了两地执委会，成立单一内阁，此举引起叙利亚人更大不满。1961年9月28日，大马士革驻军发动政变，阿

联副总统、陆军元帅阿米尔被政变者软禁。纳赛尔闻讯十分震惊，急忙派出海军、舰载陆军和空降部队前往镇压，但为时已晚。9月29日，叙利亚脱离埃及。12月，埃及宣布废除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叙联邦正式结束。

远征也门

1962年9月26日，以阿卜杜·萨拉勒为首的一群青年军官在萨那发动政变，夺取了也门政权，宣布用共和国取代伊玛姆的神权君主国。被推翻的伊玛姆巴德尔逃到北部山区，在忠于他的宰德派（什叶派支派）部落中招募军队，并从沙特阿拉伯获得金钱和武器，准备打回萨那，也门内战爆发。政变者请求埃及给予援助，纳赛尔当即答应，从10月6日起陆续派出数批埃及军队远赴也门援助政变者。

到1963年初，也门战争的格局基本形成。政府军和当时已在也门的埃及军队控制着西部沿海平原，巴德尔的王党部队控制着北部山区和东部沙漠、草原地带；共和派能够通过重要港口荷达台至萨那之间的交通线得到埃及的军队与物资援助，而王党分子则保持着与沙特的交通线，能够得到沙特和约旦的各种援助；埃及军队能够利用飞机、坦克、火箭等现代武器向王党军队发动决定性进攻，而装备低劣的王党部队则剽悍骁勇，熟悉地形，善于翻山越岭，采取游击战法牢牢控制着山区。战争进行得十分惨烈：王党分子常常残杀俘虏，对被怀疑投靠共和派的村庄进行残忍的报复，埃及军队也残忍地用飞机轰炸王党分子的村庄，甚至使用毒气弹。

在美国和联合国斡旋下，双方在1963年6月达成一项协议，规定：沙特停止帮助王党分子，埃及撤出在也门的军队；双方立即

停火;由联合国安理会派观察团监督协议的执行。由于双方缺乏诚意,都想在正式停火前多占些地盘,加之协议本身未明确规定撤军时间,因而埃及和沙特都没有停止援助。此后双方打打谈谈,几次达成协议,又几次破裂。在和平无望的情况下,纳赛尔一方面向也门增派更多的军队(1965 年达到 5 万人以上),一方面加强了对也门共和国内部事务的干预。

1967 年 6 月,埃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惨败,无力继续支撑也门战争。8 月,纳赛尔与沙特王储费萨尔在喀土穆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达成协议:埃及立即撤军,沙特停止援助王党分子,成立由埃及、沙特和苏丹组成的三国委员会监督协议的执行。10 月 3 日,集结在荷达台的埃军宣布撤军。萨拉勒把喀土穆协议斥为埃及对也门的出卖,市内爆发大规模反埃游行,上百名埃及士兵当场被打死。12 月 8 日,最后一批埃军撤出也门。埃军撤出后,也门内战继续进行,直到 1970 年 7 月沙特承认也门共和国,方告结束。

也门内战持续时间之长,是任何人都未曾料到的,它给参与这场战争的埃及带来巨大损失。据学者估计,死于这场战争的埃及官兵大约 1 万人;1962~1967 年埃及军费开支总计 10 亿英镑,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消耗在也门战场。此外,埃军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也与埃军同时在两个战场作战有很大关系。而埃及政府对也门内政的干预则受到国际社会和埃及国内广泛的批评。

五、1967 年战争及战后埃及的困境

埃及对以色列政策的演变

苏伊士运河战争后，埃及对以色列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此前，纳赛尔一直认为“战争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惟一办法”。两次中东战争使他深刻地体验到巴勒斯坦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并对阿以力量对比有了较为清醒的估量。他认识到，在美国支持以色列和阿拉伯国步调不一的情况下，要战胜以色列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他不再期待通过一场战争夺回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但也不急于同以色列实现永久和平，除非以色列做出重大让步。但是，作为阿拉伯联盟的主要成员国，埃及的外交政策不能不受它的盟友的制约。

1959 年，伊拉克的卡西姆将军提出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实体”，即拥有流亡政府和志愿军队的巴勒斯坦独立共和国，以促进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斗争。纳赛尔对此持反对态度，但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却给予热烈支持，纳赛尔非常孤立。同年，亚西尔·阿拉法特在科威特成立“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简称“法塔赫”），主张用武装斗争推翻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建立巴勒斯坦国。阿拉法特在其主办的《我们的巴勒斯坦》月刊上强烈批评纳赛尔只会高谈阔论，而不付诸行动，还讥讽他胆小如鼠。叙利亚看到叙以边界冲突不断，而埃以边境却相安无事，也指责埃及奉行对以投降政策。

面对叙利亚、伊拉克和阿拉法特的挑战，纳赛尔一方面坚持自

己的既定方针，通过埃及报界宣称，埃及决不采取冒险行动而使自己陷入单独同以色列人的战争之中，除非所有阿拉伯国家已经团结起来。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采取措施，维护他作为阿拉伯世界领袖的地位。1963年12月23日，纳赛尔呼吁召开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制定共同的对以政策。1964年1月，首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在开罗举行。会上，纳赛尔接受了建立"巴勒斯坦实体"的建议，同意尽快建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1964年6月，"巴解"组织成立后，实际上只有叙利亚和埃及给予很大的物质和政治支持，但两国动机不同。纳赛尔把巴解组织看作疏导巴勒斯坦人民族情绪的工具，试图通过它来约束针对以色列的游击战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避免引起埃及目前所不愿看到的阿以战争。而叙利亚却希望巴解组织成为一支打击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的支持下，1964年12月13日，"法塔赫"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

1965年，西方媒体披露了以色列秘密建造核反应堆之后，纳赛尔发表声明，强调"必须在以色列能够正式生产核武器之前对它发动一场防御战争"。叙利亚立刻嘲笑说："所谓'防御战'只不过是纳赛尔欺骗阿拉伯世界的又一个妥协方案"，并攻击纳赛尔软弱无能，不配当阿拉伯世界的发言人。为对付叙利亚越来越尖锐的批评，纳赛尔不得不作出对以色列的强硬姿态。1966年春，他开始支持巴解组织从事恐怖活动。11月4日，他同意与叙利亚建立新的防御同盟。

1967年4月7日，叙、以两国因中立区土地问题发生空前规模的冲突，双方均动用了坦克、大炮和飞机，有几架以色列飞机甚至飞到大马士革附近向叙利亚示威。作为叙利亚的盟国，埃及不

能不有所表示。4月10日,纳赛尔把他的空军司令派驻大马士革,与叙军方人士进行了为期12天的讨论。埃及总理苏莱曼也访问了叙利亚,双方互相保证对以色列可能的入侵采取联合行动。

5月中旬,危机进一步加剧。以军参谋长拉宾声称,只有推翻大马士革政权,才能结束叙利亚人对以色列的袭击。恰在此时,纳赛尔收到了来自叙利亚、苏联以及埃及情报机构的报告:以色列正在其北部边境大规模集结兵力,可能要对叙利亚发动进攻。纳赛尔随即采取了紧急措施。5月14日,埃及向西奈增兵两个师;5月18日,它要求3 400名联合国紧急部队撤离西奈;5月22日,埃及封锁蒂朗海峡。

至此,在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埃及对以色列政策完全改变,而阿以之间新的战争也更加迫近。

"六 日 战 争"

埃及宣布封锁蒂朗海峡后,以色列即于次日宣布总动员。在国内民众的强烈要求下,西奈战争的英雄摩西·达扬出任以色列国防部长。此时纳赛尔虽然已确信战争百分之百地不可避免,但在美苏两国的劝告和压力下,他一再保证,埃及"决不打第一枪"。然而以色列却没有接受美苏的劝告,它认为每耽误一天时间,就意味着以色列人在一场已不可避免的战争中增加一份伤亡。以军参谋部迅速制定了主动进攻,重点打击埃及的战略方针。数天后,这一战略方针付诸实施,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

1967年6月5日上午8时45分(开罗时间),以色列空军倾巢出动,向上下埃及的17个机场实施突然袭击。经过近三个小时的空袭,埃及空军几乎损失殆尽。在能够使用的340架飞机中,有

286 架被摧毁，其中包括埃及所有的中程轰炸机。以色列空袭成功的原因，不仅在于它使用了各种躲避雷达监视和防空导弹的战术，而且还由于它战前就破译了埃及的军事密码，掌握了埃军最高指挥人员的动态，因而能够选择最佳的首轮攻击时机。这天上午9 时，埃军总参谋长阿米尔和空军司令马哈茂德以及其他一些高级官员一同乘飞机从开罗飞往西奈半岛一个机场。战争开始时，这一行人正好在空中。在至关重要的最初 90 分钟里，他们和部队脱离了联系，无法下达命令，而西奈驻军的高级指挥官们也因去机场迎接阿米尔而离开了各自的指挥岗位，未能及时组织反击。更可悲的是，阿米尔和空军指挥官为掩饰错误，一再谎报军情，发出一份份"捷报"，致使最高统帅纳赛尔在长达七个小时里一直以为他仍拥有一支空军。

以色列军队在空袭发起半小时之后，分三路向西奈半岛全面推进。驻西奈和加沙的埃及军队(计 7 个师 10 万人)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无奈缺少空中支援，难以抵挡敌军飞机和坦克的猛烈攻击。至次日早晨，指挥部所在地阿里什和战略要地阿布奥格拉相继失守，通往塞得港和西奈腹地的大门洞开。6 时许，阿米尔发布了从西奈半岛全线撤退到运河西岸的命令。纳赛尔认为没有必要仓促撤退，他否决了这道命令。正奉命撤退的第四装甲师被要求重新返回西奈。但是阿米尔又重新下达了立即全线撤退的命令。统帅部命令的反复无常，加大了部队有秩序地撤退的困难。结果，撤退变成了向西奈山隘无组织的赛跑，各部队一齐涌向公路，争先恐后地奔向运河西岸，致使交通堵塞，大批坦克、大炮和军车丢弃在路旁，在以军的空袭下伤亡惨重。8 日，以军占领整个西奈，埃军全线崩溃。

这场战争名义是上埃、叙、约三国联合与以色列作战，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像样的联合行动。以色列入侵后，阿米尔敦请叙、约两国迅速出击，以便迫使以军两线作战，减轻西奈埃军压力，但两国仅派出数架飞机对以色列进行了骚扰性的攻击，根本没有起到开辟另一个战场的效果。结果，三国迅速地被以色列一一击败。从6月7日至9日，约旦、埃及和叙利亚先后接受了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双方无条件停火的决议。6月10日，停火决议生效，战争结束。

在为期六天的阿以战争中，三个阿拉伯国家丧师失地，损失惨重。整个西奈半岛、加沙地带、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被以色列占领，41万阿拉伯人沦为难民，军队损失包括伤亡、被俘和失踪达2万人，损失坦克1 000辆，飞机近450架。其中埃及损失最大。据纳赛尔讲，埃军80%的军事装备被毁，1万名士兵和1 500名军官阵亡，5 000名士兵和500名军官被俘。而以色列仅损失5 000余官兵，394辆坦克和40架飞机，却得到68 500平方公里的新占领土，比其战前所占领土面积扩大了2倍。

战败，谁之过?

号称阿拉伯第一大国的埃及竟被区区200万人口的以色列打败，而且败得如此之惨，这不能不令普通的埃及民众感到震惊、愕然和悲愤，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埃及军队这么快就被以色列打败了。6月9日晚，纳赛尔自开战以来第一次在电视中露面。他神情沮丧，面容憔悴，以颤抖的声音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宣布他对这次"挫折"承担全部责任，决定辞去他在政府的全部职务。然而埃及人民原谅了他的错误，他们真诚地恳请这位曾经给埃及带来进步、独立和福祉的民族领袖继续带领他们前进。纳赛尔经过反复

思量，决定顺乎民意，收回辞呈，继续担任共和国总统。

尽管埃及人民对纳赛尔出乎预料的忠诚，但他们无法接受战败的痛苦现实，要求追究战败责任的呼声很高，军队首当其冲，成为舆论讨伐的对象。纳赛尔亦对军队的现状十分不满，认为正是军事指挥的混乱和某些将领的渎职使国家蒙受战败的屈辱。他和公众一起批评了军队，并公开承认在"军人阶层"和官僚队伍中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而以陆军元帅阿米尔为首的一批军官则批评纳赛尔拒绝首先发动进攻，从而使以色列凭借先发制人而获得了优势。由此引发了纳赛尔与阿米尔之间一场激烈的冲突。

阿米尔是纳赛尔的同窗好友，自由军官组织的主要缔造者和"七·二三"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之一，革命后一直任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但他才疏学浅，缺乏统帅全军的能力，并因占据显赫地位而变得利欲熏心，喜欢提拔亲故，培植个人势力。纳赛尔曾于 1956 年和 1962 年两次试图解除其总司令职权，均因其权势过大而未成功。六日战争后，阿米尔不得不效法纳赛尔提出辞呈。但当纳赛尔在公众要求下收回辞呈后，一批高级军官也要求纳赛尔恢复阿米尔对军队的指挥权。为了实现这一要求，他们还把 6 辆装甲车开至纳赛尔官邸，以武力相威胁。纳赛尔深感自己处境危险，但他坚决表示，不可能允许阿米尔官复原职。他当即任命穆罕默德·法齐为武装部队总司令，解除了 4 名寻衅滋事的中将的职务，并成立以总统为首的特别委员会来审查那些渎职的将领。一些渎职军官为逃避审查，藏匿到阿米尔家中，当宪兵奉命逮捕他们时，阿米尔竟开枪阻拦。

8 月下旬，纳赛尔从军事情报局获悉，阿米尔一伙正在策划兵变，遂软禁了阿米尔，并拘捕了前国防部长巴德朗、前内务部长阿

巴斯·拉德万、前情报局长萨拉赫·纳赛尔等总共536名兵变策划者和参与者。阿米尔知道阴谋败露，于9月13日服毒自杀。一个特别法庭对首要分子进行了持续三个月的审讯，于1968年1月作出最后判决，其中5人被判处终生服苦役，2人被判处15年苦役，30人被判监禁。

1968年2月发生了学生骚乱。学生们公开抗议法庭对被告判决过于宽大，这是1954年以来发生的首次反对当局的示威游行。作为对公众不满呼声的回应，纳赛尔于3月3日发表了"变革令"，宣布他将清洗他的政权中的腐败的"权力中心"，并将奋力工作，重建健康的政治秩序和强大的国防。接着，他改组了内阁，自任国家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政府总理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秘书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从而巩固了他的地位。

消耗战与罗杰斯计划

在巩固了他的权力地位后，纳赛尔决心重建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报仇雪耻，收复失地。为此，他调整了军队指挥人员，使一批年轻军官进入了高级指挥机构，并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军队的文化素质，加强军队的实战演练。为防备以军的空中袭击，埃军修建了有防护掩体的新机场和导弹发射井，并拓宽了开罗至亚历山大的公路，以备紧急时作临时机场之用。此时埃及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更加依赖苏联，苏联也希望借此把自己的势力进一步渗入中东，因而派出大批顾问和技术人员帮助埃军重新训练和重新装备。到1967年10月底，埃及的飞机数量已达到战前水平，坦克增至700辆，运河防线因增加了一批大炮而加强。

按照纳赛尔的战略构想，埃及军队首先要经过一个纯粹防御

的阶段，然后过渡到积极防御阶段，最后才能进入解放被占领土阶段。1967 年 11 月，在埃及已停留了五个月之久的苏军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元帅告诉纳赛尔：埃及防线已经稳固，能抵挡住以军任何进攻。纳赛尔于是宣布埃军转入积极防御阶段。此后，埃军主动袭击敌人的次数明显增多，运河两岸炮声隆隆，以军伤亡甚多。但以色列凭借空中优势，随心所欲地轰炸运河西岸埃军营地，并深入埃及腹地狂轰滥炸。纳赛尔亲赴莫斯科，请求苏联提供可与敌机相匹敌的新式战斗机和轰炸机，但勃列日涅夫未满足他这一要求。苦于无法对付强大的以色列空军，埃军被迫于 1968 年 9 月停止炮击。

1969 年 3 月，埃军总参谋长里亚德在运河前线视察时被以军打死，埃及举国上下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当局恢复军事行动。一些阿拉伯国家如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早就主张对以开战，现在更加希望打破阿以之间“不战不和”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纳赛尔决心利用埃及人力资源的优势，打一场消耗敌人力量的持久战。他希望通过消耗战，使以色列在遭受重大损失后，被迫从运河东岸撤退，或者不得不根据阿方要求进行政治解决。

消耗战最初不过是双方在运河区展开炮战，但不久就上升为空中打击，以色列空军再次显示了优势。埃及在运河区的驻军营地和尼罗河沿岸的军事基地、工业中心都遭到轰炸，物质和人员损失巨大，仅在运河区埃及军民就至少有 4 000 人丧生。直到 1970 年 4 月，在埃及的一再要求甚至威胁要投靠美国的情况下，苏联把萨姆Ⅲ型导弹和 4 架米格 25 型飞机安置在埃及重要据点之后，以色列空军受到威慑，才不再闯入埃及腹地，交战限于运河区。

这场消耗战中，埃及不仅人员和物质损失惨重，在政治上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由于一味依赖苏联，埃及的主权受损，行动受掣，它作为不结盟运动发起国的形象和声誉也受到影响。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消耗战也起了积极作用，这就是，它引起了国际舆论对阿以问题的关注，促使国际社会更积极地寻求政治解决办法。

1967年11月22日，安理会一致通过英国提出的242号决议。这项决议强调了不承认用战争方式获得的领土，必须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联合国成员国必须恪守彼此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基本原则，并提出了解决阿以冲突的具体措施，包括以军撤出所占领土，结束战争状态，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并保证其安全等。埃以双方都接受了这项决议。但是当联合国秘书长指派他的特使瑞典人冈纳·雅林赴中东落实这项决议时，却碰到了种种困难。例如，以军究竟应撤退至何处？雅林究竟是调解人还是谈判的召集人？阿以是间接谈判还是直接谈判？在这些问题上，双方理解很不一致。结果，雅林一年半的努力竟毫无成果。

1970年6月，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提出一项新的和平计划。该计划建议交战双方首先停火90天，埃、约承认以色列主权，以色列则撤出被占领土，并就通过雅林进行和谈达成协议。纳赛尔没有马上表态，他再次访问苏联，为获得苏联承诺的电子武器作最后尝试，访问的结果使纳赛尔对苏联人不再抱任何希望，遂于7月23日正式宣布接受罗杰斯计划。以色列梅厄夫人政府也于7月底接受了计划。

8月8日，埃以双方宣布停火90天。但在停火正式生效前数小时，埃及悄悄把萨姆Ⅲ型导弹运人运河区，以增强其防空力量。以色列坚持要埃及撤回导弹，否则将中断和联合国秘书长的代表

雅林的联系，埃及拒绝了以方的要求。结果罗杰斯计划中途夭折，但停火协议继续生效。

纳赛尔去世

六日战争后，纳赛尔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心情十分郁闷，不久就患上了糖尿病。但战败给埃及造成的种种棘手问题都需要他亲自处理，他不得不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以上，致使病情日重，并引起小腿动脉硬化，有时几乎无法正常行走。1968 年夏天，纳赛尔专程赴苏联接受矿泉治疗，病情稍有好转，即重新投入工作。然而在内政、外交和军事领域，令他不顺心的事接踵而来。

1968 年 11 月 7 日，亚历山大、曼苏拉和艾斯尤特等城市爆发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活动，艾斯尤特有 4 名学生在骚乱中丧生，而在亚历山大则有 491 人被捕。造成这场骚乱的主要原因是埃及青年人对现实不满，要求政治自由，特别是言论和出版自由，呼吁用一个“新社会”取代现存社会。纳赛尔指责这场骚乱是“反革命分子”煽动的，司法部门随之开始了新一轮的间谍和叛国罪审判。这件事给纳赛尔心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1969 年 9 月 9 日，一支以军小分队乘坐在六日战争中缴获的埃及坦克和装甲车，在埃及东部沿海登陆，攻占了一个埃及哨所，击毙了红海省省长，击毁了一辆载有 40 余名乘客的公共汽车。驻守该地的埃及军队竟毫无觉察，当以军坦克驶过时，一些士兵还以为是友军到来，鼓掌欢迎。纳赛尔万万没有料到，他呕心沥血重建的军队竟如此懈怠和无能，不由得怒火中烧。他承受不了这一令他蒙羞的事件的打击，终于卧床不起。

埃及接受罗杰斯计划的消息在阿拉伯国家激起轩然大波。叙

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纷纷指责他投靠美国，出卖阿拉伯事业。设在黎巴嫩和约旦的巴勒斯坦电台还把他称为“叛徒”、“杀人犯”和“吸血鬼”。面对这些谩骂和诽谤，纳赛尔备感痛心。但他忍辱负重，继续谋求阿以问题的政治解决。

1970年9月，在约旦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因反对约旦政府接受罗杰斯计划，而与约旦部队发生剧烈的流血冲突，数千名巴勒斯坦战士和平民在冲突中被杀。这场阿拉伯人的自相残杀使正在病中的纳赛尔十分震惊。考虑到事件的发生与埃及、约旦接受罗杰斯计划有关，纳赛尔不顾自己虚弱的病体，邀请阿拉伯国家首脑于9月22日在开罗举行会议，共商解决约、巴冲突的办法。经过他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努力，阿拉法特与侯赛因国王于9月27日达成立即停火和巴解游击队撤离城镇的协议。长达六天的谈判和持续的精神紧张使纳赛尔身心交瘁，但在9月28日，他仍支撑着虚弱的身躯，到机场一一送别与会的首脑们。当最后一位客人科威特埃米尔的座机起飞时，纳赛尔的心脏病突然发作。三个小时后，他在家中溘然长逝。

第九章　埃及的全方位转型

一、权力的转换

萨达特上台

纳赛尔去世后，总统继任人选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政见分歧，一场权力斗争不可避免。争夺总统职位有三个人：副总统、前总理和社盟总书记阿里·萨布里，前副总统扎克里亚·毛希丁，现任副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他们代表着埃及领导层中的三种势力。萨布里自称是“纳赛尔的人”，有责任维护纳赛尔的政治路线，有权利继承纳赛尔的政权。毛希丁反对纳赛尔的社会主义，主张推行西方的资本主义，自诩具有长期执政的能力和丰富的经验。萨达特的立场介于二者之间，他主张向西方开放，发展私营经济，但不赞成取消公营经济及完全废弃纳赛尔的路线和政策。三人中以萨布里势力最大，其支持者控制着社盟领导机构，军队上层和政府重要部门也掌握在他们手中。毛希丁的主要支持者在工商界和知识界，在领导层中为数寥寥。萨达特的支持者也不多，但作为副总统，他仍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因此，权力斗争主要在萨达特与萨布里之间展开。

当医生确认纳赛尔已经身亡之后，当时守候在纳赛尔病榻前的数名国家领导人即举行会议，安排下一步骤。会议气氛紧张，与会者个个表情严肃，一言不发。只是在萨达特询问下，民族指导部部长穆罕默德·哈桑·海卡尔才说出自己的意见：应该执行宪法。1964年临时宪法规定，在共和国总统去世之际，副总统代任总统60天，然后进行公民投票，选出继承人。据此，此时应由萨达特暂任代总统。

几天后，原革命指导委员会几名委员向萨达特联名上书，建议恢复1956年之前的领导形式，由该委员会重新执政，为期一年，萨达特以副总统身份主持委员会，直至总统大选为止。建议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不让萨达特主政和利用代总统的有利地位取得总统职位。萨达特拒绝了这一建议。

为阻止他人谋取总统职位，也为了尽早结束全国动荡、观望态度，萨达特决定立即举行总统选举。对于萨达特的这一决定，萨布里集团未直接表示反对，但表示，他们担心匆忙选举总统，会使人感到好像特意要选举某个人似的，社盟最高执行委员会在提名总统候选人时也可能会出现分裂。萨布里集团所以采取这种比较和缓的态度，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萨达特向来极少发表独立意见，是个随波逐流的无能之辈，他们可以左右萨达特。但萨达特依然坚决地宣布了他的决定，并表示，只有人民才能决定谁当总统，对于背离宪法的阴谋活动，他将果断地予以回击，必要时将动用武力。1970年10月15日，萨达特以90.04%的选票正式当选埃及总统。

与其前任相比，新总统在个人风格上大不相同。纳赛尔是30年代典型的都市埃及的产物，萨达特则基本上是一个乡下人，他出

生于下埃及米努夫省一个农民家庭，母亲为黑人奴隶的后裔，虽然后来全家迁至开罗，但与家乡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纳赛尔喜欢沉思，深藏不露，萨达特则是一个性格直爽，情绪外露的人。纳赛尔一生生活简朴，几乎过的是清教徒式的生活；而萨达特则喜欢物质享受和悠闲散漫。纳赛尔没有什么社会阅历；革命前一直在军队工作，萨达特的阅历则十分丰富。二战期间他多次参与埃及军官的联德反英活动，被逮捕监禁，革除军职，后越狱逃脱，隐姓埋名，四处漂泊；战后，他又和学生恐怖组织合作，先后对华夫脱党的领袖、埃及首相纳哈斯和内政大臣阿明·奥斯曼行刺，并再次被捕，因法院未找到必要的证据，在关押了二年半之后获释，经过多方努力，1950年重返军队，旋在纳赛尔引荐下成为自由军官组织创建委员会委员；"七·二三"革命后，他先后担任政府机关报《共和国》报主编、国务部长、伊斯兰大会秘书长、民族联盟总书记，国民议会副议长、议长和副总统等职。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两人都是实用主义者，但对待伊斯兰教，萨达特比纳赛尔更为虔诚。

更重要的是，作为总统，两人在上任之初面临的局面大不相同。纳赛尔要对付的主要是封建残余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人民衷心拥戴他，领导层的所有成员和他齐心协力。而萨达特上台时，埃及经济衰退，国土沦丧，人民对国家当局怨怒日甚，统治集团内部政见分歧，派系林立，要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绝非易事。因此对萨达特来说，他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清除"权力中心"

萨达特上台时一再强调，他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继续走纳赛尔的道路，但他内心深处早已认定这条路不能再走下去，必须改弦

易辙，为埃及的发展重新定向。由于纳赛尔派即萨布里集团势力强大，控制着社盟中央委员会和最高执委会，内阁中也有不少是他们的人，萨达特要想通过集体决定来调整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能越过这些权力机构，实行总统独断。萨达特的第一个独断行动是未经中央委员会推荐，于10月20日直接任命马哈茂德·法齐为总理。12月28日，萨达特未经任何集体讨论，个人决定取消国家对私人财产的监管。[①] 鉴于自1970年8月以来联合国主持下的埃以和谈陷入僵局，萨达特于1971年2月4日在议会上提出三点倡议：延长停火至3月7日，以色列从运河东岸部分撤军，埃及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这一倡议同样未经任何形式的集体讨论。

对萨达特一次又一次无视社盟中央这个权力中心的存在和个人独断的做法，萨布里集团非常恼火，扬言要造他的反。1971年4月17日，埃及、叙利亚和利比亚三国元首签订建立“阿拉伯共和国联邦”的协议，萨布里集团担心联邦建立后势必要改组机构，重新分配权力，他们的地位会被削弱，因之在社盟最高执委会激烈攻击三国联邦是重蹈埃叙合并的覆辙，并指责萨达特越权行事，滥用总统职权。萨达特确实也想借此机会排斥异己，他坚持总统有权决定，无需他们批准，同时强调他是继续纳赛尔的未竟事业。双方各执己见，言词激烈。由于萨布里集团在执委会占多数，协议被否决。萨达特旋即要求把问题提交社盟中央委员会讨论。在4月25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双方争吵更加激烈，会场秩序混

① 监管制始于1961年，监管的对象为法鲁克时代上流社会头面人物的私人财产，其人数约为600~700人。

乱，以致不得不宣布休会。此时萨布里集团觉察到萨达特在考虑解散中央委员会，为保住他们的这个阵地，于是决定暂且退让。4天后，当中央委员会再次开会时，他们改变了对抗立场，只是对三国联邦协议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协议因之获得通过。当天，议会和内阁也批准了该协议。

这一回合的公开较量，使萨达特信心大增，他决心和萨布里集团最后摊牌，铲除这个权力中心。考虑到萨布里集团不仅控制着社盟和议会，而且控制着军队、治安部队和总统府卫队，萨达特没有贸然行动，而是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准备。他除了在社盟和议会中活动外，还利用职务之便，以视察部队为名，多次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劝说一些将领改变立场，成功地争取到总统府卫队司令莱顿·纳西弗和埃军总参谋长穆罕默德·萨迪克的支持。萨布里集团也在积极策划对萨达特的反击。他们窃听总统电话，刺探总统动向，四处散发传单和声明，煽动群众造反，甚至试图暗杀萨达特。

“五一”劳动节这天，萨达特发表讲话，公开向萨布里集团宣战。他指出：“任何个人或集团，不管他们是什么人，均无权自称拥有超越人民的能力和力量，也无权……组织一些对人民实行监护的权力中心。”次日，萨达特决定免去萨布里副总统和总统空军事务助理的职务，并于当晚通过广播通告全国。5月11日，内务部监听总统电话的事实泄露，萨布里集团陷于被动。

萨布里集团决定集体辞职，以造成政府瘫痪、“宪法崩溃”的局面，届时，人民群众便会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迫使萨达特屈服。萨达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们的辞职，并下令将所有辞职人员全部软禁起来，他们是议长、国防部长、新闻部长、总统事务部长、电力部长、住房部长和交通部长，以及社盟最高执委会和中央委员会

的若干委员。同萨布里集团的主观臆测相反，他们的辞职没有造成任何危机：军队非常平静，也无人举行示威游行。

次日，萨达特宣布，将以阴谋颠覆政权罪对萨布里集团进行审判。接着，他全面改组了内阁、社盟、议会和省政府，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体系。5月15日，萨达特向议会发表讲话，把粉碎萨布里集团说成是民主的胜利，人民的胜利，并建议把国民议会改称"人民议会"。他还认为，铲除"权力中心"是由他领导的、自"七·二三"革命以来一场新的革命，此后每年的5月15日都要举行纪念活动。萨达特的这些说法显然夸大了这场斗争的意义，也抹杀了权力斗争的因素。但他的胜利无疑与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分不开，而群众之所以支持他，仅仅是由于他们希望改变纳赛尔时期的过"左"和过于僵硬的政策。

1971 年宪法

5月15日之后，萨达特成为真正的总统，他将按照自己的意志领导埃及走上一条新的道路，同时他的政权的合法性也需要得到确认。出于这两种考虑，萨达特于1971年9月颁布了一部新宪法。与纳赛尔时期颁布的三部临时宪法不同，这是一部永久性的宪法。

1971年宪法肯定了自"七·二三"革命以来的埃及权力结构，即总统独大，议会弱小。宪法规定：总统执掌和行使行政权，有权任命副总统和内阁成员；总统与内阁共同制定，并负责实施国家的总政策；总统主持各种国家专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协助总统制订政策。内阁名义上是国家最高执行和行政机构，实际上只是总统的办事机构，总理并无实权，仅相当于首席部长。总统担任武装部

队最高统帅、国家防务委员会主席和警察部队最高指挥官，有权宣布紧急状态。总统不是向人民议会负责，而是直接向几千万人民直接负责。宪法也没有规定任何机构监督总统。

关于议会的权限，宪法规定："人民议会执掌立法权，批准国家的总政策、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的公共财政，监督行政机关工作。"但实际上，总统可通过各种手段，直接或间接地掌握立法权。例如，"总统可就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在特殊情况下和必要时，总统根据人民议会2/3多数议员的授权，可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总统令；有权否决议会通过的法律；有权提前解散议会。这些规定意味着总统享有超越议会的立法权。另外，总统还可任命10名议员，间接地影响议会立法。事实上，人民议会只是隶属于总统的立法工具，而不是独立的立法机构。

新宪法确认了司法相对独立原则。它规定："法律主权是国家的统治基础"，"法律主权和司法独立与司法豁免权是维护权利和自由的两大根本保障"，"在司法活动中，法官只接受法律的权威，任何机构不得干预案件(的审判)或司法事务"，最高宪法法院行使司法监督权，捍卫宪法。从后来的实践看，司法机构在反对党派的建立过程中，在维护选举公正和维护公民权利上，的确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新宪法强调新闻自由。它规定："保障新闻自由、印刷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媒介自由，禁止以行政手段管制、警告、中止和取消报刊，除非宣布紧急状态或处于战争时期……"，取消了对报刊的管制后，埃及进入了新闻自由时代，即允许独立办报，批评政府的政策，就各种社会政治和外交问题发展意见，使人民可以听到不同于官方传媒的另一种声音。但是这种自由还是有限的，因为国有

报刊有国家强大的财力支持，发行量很大，政府又垄断了所有的视听传媒（电台和电视台）和信息来源，几乎淹没了反对派的声音。

新宪法还规定，埃及为“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实行国家、合作社和私人三种所有制，禁止对私人财产没收和国有化。

这部宪法为萨达特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改革开放没有立即开始，因为还有更紧迫的问题，即收复失地问题需要解决。

二、收复失地与寻求和平

十月战争

萨达特执政后，一再表示要消除以色列的侵略后果，解放被占领土。考虑到埃以力量对比的现实，他在加强战备的同时，打算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埃以争端。1971 年初，在会见美国《新闻周刊》编辑时，他第一次提出他准备承认以色列，同它和平相处。2 月 15 日，埃及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秘书长的中东特使雅林递交备忘录，表示愿意同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并提出了具体条件。但是萨达特的和平政策没有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积极响应。

在和平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萨达特决心诉诸战争。经过与苏联反复交涉，并以驱逐苏联军事专家相威胁，埃及于 1973 年 5 月终于得到一批它所急需的苏联“飞毛腿”地对地导弹。9 月，萨达特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开罗签署协定，落实了两国联合作战的计划，并定于 10 月 6 日开战。

这天是犹太教的赎罪日，以色列全国停止一切活动，犹太人都

在教堂或家中斋戒和祷告，军官也在休假，戒备松懈。下午2时整，埃及200架战机首先出动，对运河以东的以军指挥系统、机场和导弹发射架发起空袭。接着2 000多门大炮齐鸣，把无数炮弹倾泻在以军阵地上，由4 000名士兵组成的埃军先头部队乘坐橡皮艇，高喊着“真主伟大”的口号，争先强渡运河。与埃军进攻西奈以军的同时，叙利亚军队也向戈兰高地的以军阵地发动猛攻。以色列猝不及防，处处被动。战争开始后六个小时，以军自吹的“坚不可摧”的巴列夫防线即被摧毁，驻守这道防线的3个装甲旅和1个步兵旅几乎被全歼，300辆坦克被击毁。凭借进攻的突然性，埃军取得初战的重大胜利。

从7日起，以色列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前线，鉴于北线叙利亚军队的攻势对以色列本土造成直接威胁，以军决定集中兵力，首先对付北线，至10日收复了自6日以来丢失的阵地。随后继续进攻，13日推进到距大马士革处34公里处。叙利亚战局逆转，急请埃及采取行动以减轻北线压力。

为支援叙利亚，埃军集中了1000辆坦克于14日拂晓时分分四路向以军发起攻势。以军已准备好900辆坦克迎战。埃军由于空军力量不足，遭到以军猛烈的空中打击，至中午，损失坦克250辆，铩羽而归。以军乘埃及第2军和第3军结合部疏于布防和西岸兵力单薄之机，于15日晚从这一结合部发动进攻，顺利渡过运河，接着兵分两路向南北两个方向同时推进，威胁到苏伊士和伊斯梅利亚等重要城市，埃军形势恶化。

战争爆发后，美苏两国一面竞相援助各自的盟友，一方面积极安排停火。22日，安理会通过美苏关于就地停火的联合提案，即338号决议，埃、以双方当天宣布接受决议。但以军继续在西岸进

攻，直至切断埃及第3军与外部的联系并包围苏伊士城。因此，安理会在23日又通过339号决议，督促双方立即停火。24日，埃、叙、以三方接受停火决议，十月战争结束。

至双方停火时，埃军控制了运河东岸3 000平方公里的地区，以军在西岸占据了1 600平方公里的土地。埃军伤亡和被俘25 031人，以军为12 146人。埃及损失坦克1 100辆，飞机223架，以军损失坦克840辆，飞机103架。尽管埃及在这场战争中先胜后败，付出了两倍于以色列的代价，但它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大长了埃及人和其他阿拉伯人的志气，恢复了他们的自信心和荣誉感。战争也打破美苏两国在中东极力维持的"不战不和"局面。

萨达特耶路撒冷之行

十月战争后，经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反复斡旋，埃及与以色列先后于1974年1月和1975年9月达成两个军事脱离协议。根据这两个协议，以军撤至运河以东42～44千米处，联合国部队进驻该地带把埃军和以军隔离开来；同时以军把米特拉和吉迪两山口和阿·鲁迪斯油田交还埃及，埃及允诺重开运河并解除蒂朗海峡的封锁。由此，埃以在军事上的紧张对峙状况得到缓和。但由于最终和约迟迟不能签订，两国依然处于交战状态。这种局面不仅迫使埃及不得不继续维持庞大的军事开支，外国投资者也望而却步，经济发展严重受阻。由于经济困难，从1975年初开始工人就不断罢工，1977年初更爆发了1952年以来的最大动乱。萨达特深感经济问题不解决，将影响政权的稳定，而要发展经济，必须实现和平。他决定亲赴耶路撒冷，当面向以色列人表明埃及谋求和平的诚意

和决心。1977年11月9日，萨达特在议会宣布：为了寻求和平，他“准备去天涯海角，准备到以色列议会去”。

实际上，在萨达特作出这一决定之前，以色列已通过各种渠道向他表示和谈愿望。1977年8月，贝京访问罗马尼亚时，就曾请齐奥塞斯库向萨达特转达他愿与之直接谈判的信息。另外，以色列外长达扬也通过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向萨达特传递了同样的愿望。

萨达特打算访问以色列的决定，引起叙利亚、约旦、沙特等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埃及外长法赫米和外交事务国务部长里亚德愤而辞职。但是埃及总理、国防部长、议会、总工会和科普特大主教都发表公报，支持萨达特的倡议。正在美国访问的爱资哈尔大教长阿卜德·哈利姆·马哈茂德也向萨达特发出支持电。

11月17日，萨达特从美国驻埃及大使手中接到贝京的正式邀请。11月19日，萨达特开始了他那举世瞩目的耶路撒冷之行。这天晚上，以色列总统、总理、外长、前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和高层人士齐集本—古里安机场，以极其盛大和正式的礼仪迎接这位来自敌国的贵宾。从机场到耶市，萨达特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2 000多名各国记者云集以色列，专为报道这一重大事件。11月20日，萨达特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说。他表示这次访问是诚心诚意地寻求和平，希望双方一起拆除互相怀疑和互不信任的心理障碍，并指出，“以色列是一个全世界承认的既成事实”。当他讲到欢迎以色列“安全地和平地生活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收看电视直播的许多以色列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萨达特也坦率和严肃地提出了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的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和建国权，按照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宗旨处理相

互关系，结束战争状态。讲演结束时，他诚挚地说："祝你们和平！"议员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萨达特与贝京举行了会谈。双方商定，贝京将访问埃及，并将召开有巴勒斯坦人代表参加的日内瓦和平会议。

21日，萨达特回到开罗，受到百万群众的热烈欢迎。议会的360位议员也几乎一致赞同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但阿拉伯国家对萨达特之行反应不一。叙利亚等五国和巴解组织认为，萨达特的行动等于承认了以色列，破坏了阿拉伯国家团结。它们成立了"拒绝阵线"，发表宣言谴责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是对埃及和阿拉伯民族的"背叛"，宣布冻结同埃及的外交和政治关系。叙利亚甚至宣布萨达特到达以色列的日子为全国的"哀悼日"。摩洛哥、阿曼、约旦和苏丹等国对萨达特的行动表示理解和支持。其他阿拉伯国家态度不明朗。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和欧共体宣布支持萨达特的主动行动，称其为中东走向和平迈出了勇敢的一步。塔斯社则指责这是一种"投降主义政策"。

戴维营协议

萨达特回国后，为保持和平势头，于12月中旬邀请有关各方在开罗举行会议，为日内瓦会议做准备，但只有埃及、以色列和美国出席，叙利亚、黎巴嫩、巴解组织和苏联拒绝与会，会议未取得成果。12月下旬，萨达特和贝京在伊斯梅利亚单独会谈，亦未达成原则性协议，双方仅同意成立政治和军事两个部长级委员会，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和以军撤出所占领土问题。

1978年9月5日至17日，受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萨达特、贝京和卡特在戴维营举行首脑会议，讨论中东实现和平问题。由

于埃以立场对立，会谈进展艰难。谈判多次濒于破裂，双方都曾扬言要退出会议。美国极力斡旋，甚至对双方进行威胁和施加压力，迫使双方放弃强硬立场，最终签署了《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埃以和约的纲要》两份文件，统称“戴维营协议”。

戴维营协议规定：1．以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为基础，寻求一项公正、全面和持久的解决中东冲突的办法；2．尊重该地区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在安全和公认的边境内和平生活的权利；3．西岸和加沙最终地位确定之前，作为过渡，先实行为期5年的自治。自治期间，以军撤出该两地，只在指定地点驻军，同时埃及、以色列、约旦和巴勒斯坦代表不迟于第三年开始就两地的最终地位举行谈判；4．埃以在本协议签字后三个月内缔结和约，在此之后以色列分阶段撤出西奈驻军，埃及在西奈行使充分的主权；5．以色列船只有权在苏伊士运河、蒂朗海峡和亚喀巴湾通过；6．埃以签订和约和以军完成在西奈第一阶段撤军后，双方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戴维营协议还附有9封公开发表的说明信，其中由萨达特签署的3封，贝京签署的2封，卡特签署的4封。这些信件表明，在耶路撒冷的地位、冻结犹太人在西岸和加沙建造居民点，以及承认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建国等问题上，埃及与以色列完全相左。

埃以和约

按照戴维营协议有关规定，埃以于1978年10月12日在华盛顿就签订埃以和约问题开始会谈。由于戴维营协议未就冻结以色列在西岸和加沙建造定居点的期限作出安排，亦未明确缔约谈判是否和西岸、加沙自治进程相联系，而谈判开始后又出现许多新的

分歧，例如以色列撤出西奈的时间，双方交换大使的时间，西岸和加沙大选和自治的时间，以军撤出西岸和加沙的时间，西奈的石油开采问题等，加之双方态度强硬，谈判非常艰苦，曾两次中断。

为打破僵局，1978 年 3 月 8 日，卡特带着美国提出的一个新的埃以和约文本开始他的中东之行。他先到埃及同萨达特会谈，事情竟意外地顺利，一个小时内就"解决了几个月来悬而未决的所有问题。"然而他同贝京会谈两天，虽软硬兼施，却毫无结果。卡特十分失望，决定启程回国，但就在他准备离开特拉维夫去机场时，贝京忽然表示他愿意接受该和约。各国通讯社对此大为惊异，称之为"最后一分钟的奇迹"。实际上，贝京接受美国建议，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了顽固僵硬的态度，主要是害怕失去以色列在国际上这个惟一的支持者。3 月 26 日，埃以和约在华盛顿最终签署。在签字仪式上，萨达特引用《圣经》中弥塞亚的话说："让我们携手工作，直到化剑为犁、折矛作镰的那天到来吧！"这句话充分表达了埃及人民真诚地祈盼和平的心情。10 月 27 日，萨达特和贝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埃以和约及其附件以戴维营协议为基础，其主要内容有：双方结束战争状态，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取消经济制裁，互相尊重对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色列在三年内分两阶段撤出西奈半岛，西奈实行非军事化，并在双方边境建立联合国军队驻扎的缓冲区；以色列船只可在苏伊士运河和蒂朗峡自由通行；如根据本条约所承担的义务同其他义务发生冲突时，则本条约的义务将具有约束力；和约生效后十个月内开始就巴勒斯坦自治问题举行谈判。

和约签订后，以色列从 1979 年 5 月开始从西奈撤军。1980 年 1 月 25 日，以色列完成第一阶段撤军，第二天，埃以正式建交。

同年3月21日，埃以签订协议，规定埃及每年向以色列出售200万吨石油。至1982年4月，除主权有争议的塔巴外，以军已按期撤离西奈全部领土。但是，自1979年5月开始的关于西岸和加沙自治问题的谈判，因约旦和巴勒斯坦代表拒绝参加，埃以双方在诸如自治机构的权限、东耶路撒冷的地位和犹太人定居点等问题上立场悬殊，没有取得进展。

埃以和约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第一个和平条约。它基本上解决了埃以之间的重大争端，结束了双方持续三十多年的战争状态。条约签订后，埃及收回了西奈半岛，同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埃及由此取得了它迫切需要的和平环境，可以致力于经济建设，这无疑符合埃及的根本利益。但埃及也做出了重大让步，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根据和约，埃及在西奈的军事部署受到限制，意味着主权受损，埃及同意为和约承担的义务高于所有其他义务，意味着它的外交行动，尤其是它为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承担的义务受到约束。正因如此，和约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强烈震动，并导致阿拉伯阵营内部严重分裂。在和约签订后的第二天，18个阿拉伯国家的外长和财长即在巴格达举行会议（埃及、苏丹和阿曼没有参加），其中17个国家（除索马里外）决定：撤回驻开罗的大使，同埃及断绝一切政治和外交关系；停止对埃及的所有援助，并实行石油禁运；中止埃及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资格，将阿盟总部从开罗迁往突尼斯。巴解组织也关闭了在开罗的办事处。同年5月，在摩洛哥举行的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又通过决议，中止埃及参加该会议的资格。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空前孤立。

埃苏、埃美关系大转变

萨达特上任之初，表面上继续维持着纳赛尔时代的亲苏政策。1971年5月埃苏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似乎进一步巩固了埃苏亲密关系。但实际上，双方的猜疑不仅没有消除，反而逐渐加深。因苏联不愿满足埃及的武器援助要求，有意维持中东不战不和局面，萨达特多次与苏联领导人发生龃龉，甚至在1972年7月愤而决定驱逐苏联军事专家。只是由于埃及当时无法从其他渠道获得必需的武器，他才勉强维持同苏联这种貌合神离的关系。就苏联而言，援助埃及仅仅是它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目的在于使苏联在中东有一个可同美国抗衡的立足点，并非真的希望埃及强大到足以战胜以色列。另外，萨达特同与苏联关系密切的萨布里集团的斗争，也使苏联疑虑重重。但是为了防止埃及倒向美国，苏联又不得不向埃及提供有限的军事援助。

个月战争后，美国开始积极在埃以之间斡旋，一手包办埃以之间的和谈活动。萨达特早就把解决中东问题的希望寄托于美国，对美国的这种态度正求之不得，于是埃美迅速靠拢，不让苏联过问和谈活动。苏联大为恼火，不愿再向埃及供应武器，并公开指责萨达特"偏离纳赛尔的社会主义政策"。后经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和保加利亚国务委员会主席日夫科夫的调解，苏联部分地恢复对埃及的武器交运和经济援助。

1975年埃以达成第二个脱离接触协议后，埃及收复了西奈，埃以关系趋向缓和，埃美关系大大改善，萨达特的对苏态度亦趋于强硬。他多次发表讲话，谴责苏联明目张胆地煽动一些阿拉伯国家反对埃及，企图分裂阿拉伯世界，并攻击苏联在关键时刻没有履

行义务。双方关系急剧恶化。

1975年下半年，双方还就埃及偿还苏联军事债务争吵不休。埃及要求给予它10年宽限期，在30年到40年还清为数约40亿美元的债务，被苏联拒绝。萨达特随即作出强烈反应。1976年3月14日，他在议会上指责苏联背弃《埃苏友好合作条约》，宣布"埃苏关系已完全陷于僵局"。根据他的提议，埃及议会决定废除该条约。同时，埃及取消了在亚历山大等港口向苏联海军提供方便的协定，限令在那里的苏联人一个月之内离开。

埃及废约后，两国虽仍维持着一定的正常关系，但分歧愈来愈多，裂痕愈来愈深。1977年1月，埃及因政府提高食品价格引起全国性骚动，萨达特除把这一事件归罪于埃及左派和共产党人外，还指责苏联插手挑起"动乱和流血"。对于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签订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约，苏联都予以强烈反对，并支持反对萨达特政策的阿拉伯拒绝阵线和在巴格达召开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的决议。埃及则关闭了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埃及的领事馆和文化中心。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埃及激烈批评苏联奉行"帝国主义"政策，宣布它将训练阿富汗人推翻苏联在阿富汗的傀儡政权；苏联则指责萨达特奉行"投降政策，同美国在中近东的反动政策相一致"。1980年1月28日，萨达特宣布驱逐仍在埃及工作的1 000多名苏联军事专家，将埃、苏驻对方使馆的外交人员各减为7人。1981年1月，埃及以间谍罪逮捕了3名苏联外交官，并将其驱逐出境。9月，又宣布苏联大使和6名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境。苏联当即采取报复行动，驱逐埃及武官和9名其他人员（当时埃及已有两年未向苏联派遣大使）。两国关系降至冰点。

在同苏联日益疏远的同时，埃及同美国的关系飞速发展。十月战争后，美国积极斡旋中东和平，埃美很快正式复交。1974年6月尼克松访问埃及，埃及举国欢迎，双方决定加强双边关系，在科技、经济和文化领域进行合作。1975年萨达特访美期间，要求美国提供军援和经援，美当即答应给予7.5亿美元的项目援助，但未同意提供军援。埃及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后，美国同意向埃及出售6架军用运输机，以鼓励萨达特的"温和"政策。这是二十多年来美国向埃及提供的第一批军事装备。接着美财政部宣布在下两个财政年度将向埃及提供18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埃以和谈开始后，美参议院经激烈辩论，同意向埃及出售50架F-5E战斗机。1979年3月埃以和约签订后，埃及更加向美国靠拢，而美国也不适时机地宣布给这两个中东国家提供48亿美元的经援和军援，其中给埃及18亿美元。美国还同意从1980年起5年内给埃及军援共计35亿美元。1980年1月，埃及国防部长阿里宣布，美国已经成为埃及最大的武器供应国，埃及同意向美国海、陆、空军过境提供方便。1981年9月，萨达特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国是埃及最友好的国家。

萨达特时期埃苏、埃美关系大换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美国的财大气粗，苏联不愿倾力援助埃及，以及萨达特本人的意识形态起了决定性作用。

三、自由化改革

《十 月 文 件》

萨达特上任之初曾一再保证，他将继续沿着纳赛尔开创的道路前进，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实际上对纳赛尔的遗产非常不满。他指责纳赛尔“非常愚蠢地搬用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60年代我们进行的所谓社会主义实践是百分之百的失败”，决心为埃及社会的发展重新定向。另一方面，由于政权受到经济困难的严重挑战，他也不得不摈弃其前任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寻找新的出路。

但是萨达特的当务之急是准备对以色列开战，消除1967年战败的耻辱，无暇顾及国内改革。同时他的政治合法性还有待进一步证明，纳赛尔主义的幽灵还禁锢着许多人的头脑。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制订一个明确的全面改变方向的改革纲领。

十月战争后，萨达特把工作重心转向国内改革。1974年4月18日，他向议会和社盟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他当政后的第一个行动纲领，题为《十月文件》。纲领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把埃及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和社会”，使埃及人在一个“科学和信仰”的社会里得到光明和幸福。文件内容广泛，强调要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各个领域进行改革和调整。

改革的基本方针是全面开放，即经济开放和政治开放。在经济领域，文件提出，要努力利用外资，鼓励国内私人投资，扩大私营企业，同时调整和巩固公营企业。在政治领域，要“实现法律主权，建立机构国家，保证公民今天和明天的安全”；“在强调社会自由的

同时强调政治自由”;取消新闻监督,使新闻能够“表达劳动人民力量的各种利益”;既反对多党制,也拒绝一党理论,将保留社盟,并容许“各联盟力量在联盟内表达其合法利益和意见”。在外交领域,主要是调整埃苏、埃美关系。《十月文件》的提出,吹响了埃及全面改革的号角。

经济开放

埃及的经济开放政策正式开始于1974年6月,其标志是政府颁布的《关于阿拉伯与外国投资和自由区》的第43号法。法令规定:外国资本可向工业、矿业、能源、建筑、交通、旅游、银行、水力资源、垦殖荒地和沙漠、投资公司和技术咨询等领域投资;保证对外资不实行非法冻结、查封和强行监护,不没收,不国有化;若出现争端,应根据有关协定通过共同协商妥善处理;外资企业所需设备和原料进口免税,企业投产后5至8年免税,其产品可在埃及国内市场销售;企业可转出或转让资本,并在转出资本与利润时按最高汇率折算等等。

法令还规定,在塞得港、苏伊士、开罗和亚历山大设立特别经济区,其中塞得港全港为自由区,其他三个分别在城市专辟一块地方作为特区。特区的经济活动不受政府或国营企业组织法的限制。

政府同时对内进行了经济改革。首先是鼓励发展私营企业。1974年11月,政府把私营公司承包国家项目的最高金额由每年10万埃镑提高到50万埃镑。为向私营企业提供更多的贷款,1975年把工商银行的资金由200万埃镑增加到1 000万埃镑。不久,政府又恢复了股票和证券交易所,以便使私营企业加快资金周

转，同时放宽外汇管理，允许私商用自备外汇进口商品，从而打破了公营部门对外贸的垄断。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私营企业快速发展。1974～1982年，仅工业部批准新建私营工业企业即达6 700个，私人投资也由数千万埃镑增加到10亿埃镑，私营企业产值在工业部所属企业总产值中占到30.6%。其次是调整公营企业。1975年5月萨达特颁布法令，规定公营企业可发行股票筹资，本企业职工享有优先购买权。1975年7月，议会通过法律，取消了工业部对公营企业的统一管理，代之以各主管部门分口管理。1976年1月，政府又取消了35个经济管理组织，代之以只有咨询职能的22个委员会，并规定公营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1977年，一批"不称职"的经理被解职。政府还制定了新银行法，允许企业自由同银行进行外汇交易。

开放政策显著地促进了埃及经济的发展。由于吸收了115亿美元的私人和外国投资，加之同以色列媾和后可以把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发展经济，使得这一时期成为埃及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1975～1981年，埃及经济年均增长达8.4%，大大超过1961～1973年4.3%的年均增长率。国内收入由1973年的30.6亿埃镑增长到1981/82年度的157.4亿埃镑，同期固定资产由4.6亿埃镑增加到43.2亿埃镑。1974年以后，一批新的工业企业建立起来，原有的企业得到扩建和更新，工业产值由1973年的17.2亿埃镑增至1980/81年度的96.7亿埃镑。农业和第三产业也有较大发展，8年中，前者收入由9.6亿埃镑增长到30.2亿埃镑，后者由13.5亿埃镑增长到69.8亿埃镑。长期以来，埃及外汇收入主要靠棉花出口，每年仅数亿埃镑。1974年以后，劳务输出、运河航运、石油业和旅游业成为四大外汇支柱，1980/81年度仅这四项

的外汇收入即达到70亿美元,大大改善了埃及的国际收支状况。

萨达特的开放政策在埃及发展史上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它标志着埃及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从近乎封闭的国家计划型转向开放的自由市场型,从公营独占变为公营、私营和合营经济齐头并进。从经济发展角度看,新的经济模式符合埃及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也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

埃及开放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有一些重大失误。例如,投资项目多,投产项目少,投入非生产性行业多,投入生产性项目少,产品内销多,外销少;投资银行不仅非法同埃及银行争夺私人存款,而且所吸收的埃及人存款主要不是用于在埃及投资,而是汇往国外;盲目进口外国消费品,既浪费了宝贵的外汇,又打击了民族工业,等等。但就其社会影响而言,最大的失误有两个。一是非法经济活动加剧,腐败之风盛行。各种政策放宽后,相应措施没有跟上,给不法之徒以可乘之机。一些人为牟取暴利,不择手段地进行黑市买卖、走私贩毒、贪赃枉法,败坏了社会风气。萨达特去世后不久,司法部门审理了几桩此类大案,其中特别是埃斯麦特案,引起举国震动。案犯埃斯麦特原是个汽车司机,他借开放之机,利用自己是总统之弟的社会关系,依仗权势、金钱和关系网,结交权贵和金融家,通过行贿、徇私、贪污公款、伪造官方文件、威胁欺诈、黑市交易和偷逃税款等不正当手段,迅速成为拥有1.5亿美元的大富翁。此案涉及国家高级官员之多,令人吃惊,仅在判决书中被指名道姓的就有三位现任部长以及国务秘书、前部长、前检察长、前市长、电讯局董事长等,公众由此对政府当局和开放政策产生怀疑。二是社会分配不均,贫富差别扩大。按照1980年国家银行公布的数字,国民收入的21.5%流向5%的人口,而在社会等级的另

一端，20%居民靠5%的国民收入生活。社会两极化的加剧，成为70年代中期以后埃及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政 治 开 放

政治开放与经济开放并行，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主要措施是改革政党制度和取消新闻监督。

萨达特起初并不想从根本上改变埃及现存政党制度，只是打算对社盟作些改革。1974年8月9日，萨达特以社盟主席的名义提出了《发展社盟方案》，建议社盟向左、中、右各派开放，任何人只要尊重“七·二三”革命的基本原则，均可加入社盟，经有组织的自由讨论后依多数意见作出的社盟决议，社盟成员个人必须服从。方案还规定，社盟今后不再握有政治权力，其任务只是“忠实地表达民意”。

1975年8月，社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社盟内部设立基于“共同利益”的论坛。很快，40多个论坛相继成立。论坛数量之多，政治背景之复杂，令当局感到不安，萨达特也十分担心政治失控，于是在1976年3月向议会建议在社盟内成立左、中、右三个固定论坛，几天后又宣布将三个论坛改为三个组织。不久，议会和社盟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建立三个组织，即中派的“埃及阿拉伯社会主义组织”，右派的“自由社会主义者组织”和左派的“民族进步统一联盟”。

同年10月，三个组织积极投入议会选举。它们的竞选纲领迥然相异：中派组织支持萨达特的开放政策；右派组织主张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取消进出口管制，允许私人开办银行，改革货币制度；左派反对破坏纳赛尔时代的“社会主义成果”，反对取消公营部门。

由于中派组织的参加者包括300名议员、100名社盟中央委员、政府总理、部分部长和省长，基本上是一个官方组织，因之其他两个组织无法与之匹敌。选举结果，在总共342个议席中，中派获得280席，右派12席，左派仅2席，独立人士48席。

鉴于三个组织在竞选中事实上与三个政党无异，而且中派完全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于是萨达特在1976年11月又宣布把三个组织改为三个独立的政党，但社盟仍将存在，其职责限于监督政党活动和控制政党收入。他宣称："我们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民主历程"，即进入了多党制阶段。但多党制刚开始，就因发生了1977年1月的全国性骚乱而受到限制。1977年6月，萨达特颁布政党组织法。该法规定，政党的原则、目标或纲领不得违背伊斯兰教法、"七·二三"革命原则和"五·一五"革命原则；拟建立的政党其纲领、政策须明显不同于其他政党；不得在阶级、阶层、集团、地域和宗教基础上建立政党，禁止重建1953年27号法所解散的政党，换言之，对埃及共产党，华夫脱党等政党的禁令仍然有效；由社盟第一书记，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等人组成政党委员会，负责审议建党申请；任何政党如果不履行该法令或其领导人犯有危害"全国团结"和"社会治安"罪者，政党委员会有权予以解散。上述规定，不仅为政党建立设置了障碍，而且使执政党掌握了反对党的生杀大权。更有甚者，该法案的临时条款还规定，在本届议会期满前(即1980年10月以前)各政党的创始人中至少要有20名议员。这一条款无异于将现有反对党完全扼杀，因为它们没有一个在议会内拥有20个议席。

1977年8月23日，在纪念柴鲁尔逝世50周年的大会上，前华夫脱党总书记福阿德·萨拉吉丁宣布，华夫脱党将恢复活动。为

了获得当局的批准，该党首先易名为新华夫脱党，接着提出了一部令当局无可挑剔的政纲，并从独立人士、执政党和自由党中争取到22名议员作为创始人。1978年2月，当局不得不批准新华夫脱党的建立。新华夫脱党成立后，党员人数迅速发展到近百万人，使反对党的声势大增，同现政权和执政党的斗争随之加剧。1978年4月，联盟党、自由党和新华夫脱党三党同时批评政府腐败，气势咄咄逼人。反对党的攻势使萨达特大为震惊，他一方面极力为他的政权辩护，一方面指责反对党煽动“怀疑运动”，“败坏政治生活”，“已经违反了‘社会安宁’原则”，并宣布将制订新的法律进一步限制政党活动。

1978年6月1日，议会通过《保护国内战线和社会安宁法》，根据该法，包括海卡尔等在内的150多人受到审查和审讯。在当局的压力下，新华夫脱党于第二天被迫自行解散。联盟党的一些党员被捕入狱，该党主席被指控犯有“诽谤”政府罪，也于6月4日被迫中止政治活动。

1978年7月下旬，萨达特提出新的政治方案，决定终止社盟的作用，确立“完全的多党民主制”，随后成立了以他为主席的新党——民族民主党，大批原执政党议员和部分自由党议员纷纷加入。同年10月，自由党同民族民主党联合。在这种情况下，多党制在形式上已经徒有其名。

戴维营协议和埃及和约签署后，由联盟党带头，反对党再次发起对萨达特政权的攻击。萨达特非常恼火，于1980年5月颁布所谓《耻辱法》，压制反对派的批评，继则禁止反对党的报刊出版发行，逮捕大批反对党领导人，使反对党再度陷于瘫痪或瓦解，多党制名存实亡。

萨达特政治开放的另一个内容是宣布新闻自由，允许媒体对国内外政策发表不同意见，批评政府工作。1971年"五·一五"纠偏运动后，埃及记者首次获准成立记者协会，自由选举协会领导班子，以后又允许反对党办报，取消新闻检查。记者们原以为埃及从此进入"新闻自由"时代，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自由是十分有限的，一旦他们触犯当局重大利益，自由便立即被剥夺。1972年学生们举行集会和游行反对萨达特的对以政策，记者们予以支持，结果协会领导机构的半数委员和其他记者约100人被开除，记协被迫中止活动。1977年1月动乱后，一些著名记者被捕。三个反对党的党报经常被禁止发行，其中两家最终被查封。萨达特还以法律形式限制新闻自由，1978年的《保护国内战线和社会安宁法》和1980年的《耻辱法》均含有严格限制新闻自由的条款。

尽管萨达特的政治开放并没有造成一个政治民主的埃及，他的多党制仍带有纳赛尔时代个人专制的印记，他的新闻自由也很难称得上名实相符。但总体看，在萨达特时代，个人无疑享有较纳赛尔时代更多的自由，政治气氛相对宽松，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四、埃及的社会动荡

一 月 事 件

自70年代初起，埃及工人和学生经常因经济问题或外交政策问题而举行罢工、游行等抗议活动，但尚未对政权的合法性造成重大伤害。真正造成萨达特政权"内伤"的是1977年的一月事件或称"一月起义"。事件发生的导火线是，埃及政府为得到西方的贷

款，屈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政府和美国银行的压力，不顾国内严重通货膨胀和社会贫富扩大的现实，于1977年1月18日宣布取消或大幅度减少对大米、面粉、食糖和茶叶等基本食品的政府补贴，并大幅度提高其价格。消息传出，早已对政府政治腐败和高压统治不满的开罗、亚历山大等9个省的大中城市的人民群众愤然而起，走上街头，举行抗议示威，并很快发展为全国性骚乱，其规模之大，来势之猛，是1919年反英起义以来所仅见。示威者高呼："反对剥削人民的政府"，"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迫使物价下降"等口号，到处冲击警察局、执政党总部和报社、高级官员的住宅、富人们的娱乐场所。当局出动大批保安部队弹压，甚至下令开枪射击，仍无法控制局面。萨达特被迫暂时取消涨价措施，同时亲赴阿斯旺，调动军队强行恢复秩序。据官方统计，在持续两天的冲突中，至少有80多人死亡，200人受伤，财产损失约10亿埃镑。外电则估计有300多人死亡，1 000人受伤。骚乱平息后，当局继续进行镇压，共逮捕了1 200多人。

一月事件为萨达特政权的人民性或合法性蒙上了一层阴影。自1952年革命以来，政治合法性最终来自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而一月事件恰恰是人民反抗政府，政府用军队镇压人民。从此，萨达特政权更加依靠强力机关维持统治，埃及社会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政治动荡之中。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

1952年革命后，新政权下令禁止政党活动并将各政党解散，但穆斯林兄弟会因支持自由军官反对法鲁克王朝不受此禁令限制。然而由于二者之间毕竟利害关系不同，兄弟会很快成为新政

权的反对者，并于1954年10月和1965年8月先后两次策划暗杀纳赛尔等领导人。政府予以严厉镇压，逮捕了数千人，兄弟会和伊斯兰教势力大为削弱。

萨达特执政初期，在同萨布里集团和左派的斗争中，深感自己势孤力单。为扩大自己的支持力量，他以过去对兄弟会处理不当、定罪缺乏证据为由，宣布对仍被关押的兄弟会分子特赦，以后又允许兄弟会办报，兄弟会力量迅速得到恢复。不仅如此，他还大力倡导伊斯兰教，将其变成官方的意识形态。他宣称，"科学和宗教信仰"是国家的两大支柱，将在埃及建立一个"基于宗教信仰和科学的新社会"。1971年宪法第二条规定："伊斯兰教法原则是立法的主要渊源之一"。1980年宪法修正案改为"伊斯兰教法原则是立法的主要渊源"，进一步突出了伊斯兰教在立法方面的突出地位。在国家生活中，伊斯兰教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大学和工厂的社盟青年组织被伊斯兰协会取代；电台增加了播放《古兰经》节目时间；电台和电视台每天准时中断节目5次，召唤人们进行祷告，议会也得暂时休会，以便议员叩头祷告；萨达特每次讲话，均引用一段经文作为结束语。

在政府倡导和扶植下，伊斯兰势力迅速壮大。1970年前埃及共有26 000座清真寺，70年代激增到46 000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纳赛尔时期受到镇压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现在重新复活，并且出现了许多新的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极端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有"伊斯兰解放组织"（又称军事技术集团或穆罕默德青年团）、"伊斯兰集团"、"赎罪与迁徙组织"和"圣战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大多是从兄弟会中分裂出来的极端分子。

随着开放政策的推行和对以色列政策的变化，伊斯兰势力与

萨达特政权逐渐疏远，并不断发生冲突和对抗。1977 年萨达特出访以色列后，伊斯兰势力与萨达特政权彻底决裂，公然与政府分庭抗礼。1979 年初，“伊斯兰集团”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支持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抗议政府接受伊朗前国王巴列维的政治避难要求。与此同时，“圣战组织”在开罗、沿海省份和上埃及等地展开圣战运动，着手建立伊斯兰国家。即使萨达特一手扶植的大学伊斯兰协会也同政府离心离德。萨达特感到伊斯兰协会愈来愈难以驾驭，于 1979 年 7 月下令解散所有由伊斯兰协会掌握的学生会，但为时已晚。它们继续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反对政府的内外政策。政府不得不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将其骨干分子逮捕监禁或开除学籍。伊斯兰协会在大学的活动受阻后，便走向社会，在工厂、街道、政府机关和私人企业中建立组织，许多人成为极端宗教组织的成员。

伊斯兰势力的兴起还引起穆斯林与科普特两个教派之间的严重对立。1981 年 6 月，科普特人在开罗扎维亚·哈姆拉区修建教堂，受到穆斯林的阻挠，双方由个人殴斗发展到群众性武装袭击，造成 17 人死亡，112 人受伤。

萨达特打开潘多拉盒子，放出妖魔，再也无法收回。

九月大逮捕与萨达特被刺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埃及社会日趋动荡。经济自由化扩大了贫富差别，广大劳动群众生活艰难，怨声载道，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连绵不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和反对党猛烈攻击政府的内外政策和高压统治，甚至公开要求萨达特下台。面对濒临失控的政局，萨达特又一次举起铁拳。

1981年9月2日，萨达特突然下令大逮捕。一夜之间，“凡是曾经和萨达特发生过激烈争论的人全部被捕。”被捕者中既有左翼分子、纳赛尔分子，也有右翼分子、华夫脱党人、宗教极端分子，包括社会各界的许多名人，如前新华夫脱党主席萨拉吉丁、穆斯林兄弟会总训导师秦尔姆萨尼、社会工党总书记穆拉德、联盟党领导成员胡利和哈姆、前《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前政府部长拉德旺和哈桑、纳赛尔主义者艾哈迈德议员，等等。据萨达特讲，总共逮捕了1 536人，包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和穆斯林兄弟会成员804人，科普特教领导人107人，煽动教派冲突者259人，参与教派冲突者337人，政党人士26人，其他人士3人。但也有人称，被捕文职人员5 000人，军官约50名，而遭软禁者更达4万人之多。

紧接着萨达特宣布：解散13个“威胁国家统一”的宗教团体；停止科普特大主教职务，并将其幽禁于修道院内；撤消7种报刊的发行许可证；调整一批新闻工作者和大学教授的工作；将民办清真寺收归国家宗教基金部管辖。

大逮捕使全国顿时陷入恐怖气氛之中，政治自由化和多党制成为画饼。萨达特此举也极大地损害了他企望树立的民主形象，有人把他比作古代埃及的法老，也有人说他搞政治自由化仅仅是捕杀反对派的诱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对他更是恨之入骨，认定他是不执行真主意志的统治者，声言“必须放这种统治者的血”。一个刺杀萨达特总统的罪恶计划很快制订出来。

1981年10月6日，是十月战争胜利八周年纪念日，开罗胜利广场举行例行的阅兵典礼。萨达特身穿崭新的最高统帅服，肩挎绶带，同其他领导人一起坐在检阅台上，兴致勃勃地观看各军兵种一队队地通过广场。中午12时40分，阅兵进入最后阶段，炮兵部

队正通过广场。突然,一辆大炮牵引车离开车队,在检阅台前 40 码处停下。坐在司机旁边的炮团中尉哈立德·伊斯兰布里迅速跳下车,直奔检阅台。萨达特以为他是前来致敬的,便站起身来准备还礼。然而这位中尉并没有向他致敬,而是向检阅台投出了一颗手榴弹。几乎在同一秒钟,牵引车上另一名炮兵站起来向萨达特射击。由于情况突如其来,以致足足 30 秒钟后卫队才开枪回击,但为时已晚。此时哈立德和一名杀手已冲到主席台近距离射击,另有两名杀手跃进到主席台两侧作压制性扫射。整个过程仅持续了 45 秒钟。萨达特身中数弹,被用直升飞机送往医院,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去。事后,政府逮捕了 2 500 人,收缴武器 12 500 件。1982 年 3 月,军事法庭判处哈立德等 5 人死刑,5 人无期徒刑,12 人有期徒刑。

萨达特遇刺身亡,引起举世震惊。许多国家领导人纷纷谴责这一恐怖活动,多数阿拉伯国家也指出这种暗杀活动有悖于伊斯兰教义。但埃及国内外也有人对此大加赞扬,称这些凶手为"民族英雄",他们刺杀萨达特"象征着清除了本地区一切形式的变节行为"。海卡尔则称此举是"埃及人民第一次奋起杀掉了法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向往社会公正,反对贫富悬殊和社会分配不公,的确反映了埃及社会下层人民群众的愿望,也因此得到许多人的同情和支持。但是,他们企图把当代社会拉回到古老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社会,显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而他们所采用的恐怖手段更是不可取的。萨达特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扶植纵容和利用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却低估他们可能造成的威胁,结果养虎贻患,招致杀身之祸,亦令人可悲可叹。

第十章　走向现代化的埃及

一、谋求稳定与扩大民主

穆巴拉克的治国纲领

萨达特去世后，副总统穆巴拉克成为埃及第三任总统。

胡斯尼·穆巴拉克，1928年出生于曼努菲亚省一个农民家庭，1949年毕业于埃及军事学院，因埃及加强空军建设的需要，旋被抽调到空军学院，接受了11个月的严格的飞行训练，1950年被分配到西奈半岛一个机场工作，开始军事生涯。作为一名战斗轰炸机驾驶员，他于1959～1961年在前苏联受训二年。之后，他历任轰炸机旅旅长、空军基地司令、空军学院院长、空军参谋长、空军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1975年任副总统。十月战争中，穆巴拉克作为空军司令，他在制定和实施作战计划方面表现出的卓越才能，解决问题的魄力和勇挑重担的精神，以及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冷静和智慧，都给萨达特留下了深刻印象。萨达特也十分欣赏他的廉洁、正直的为人，因此选择他担任副总统。

当穆巴拉克登上埃及政治舞台中心时，埃及国内外的人们最关心的是新总统将奉行什么路线，执行什么政策。在记者招待会

上，一位外国记者直截了当地问他："总统先生，你是穿新鞋的萨达特呢，还是穿新鞋的纳赛尔？"穆巴拉克深知，必须尽快让公众知道他的政治主张，因之在当选总统的当天，他就发表电视讲话，首先就国内政治这道难题给出了他的答案。

穆巴拉克认为，埃及当前最迫切需要的是保持国家的团结统一。他说："宗教教义和我们过去成功的经验告诉我，只有队伍统一，心地纯洁善良和清正廉洁、目标正确和意志坚强，才能使国家求得发展。现在，我就要求每个埃及公民都要摈弃分歧，埋葬仇恨，求同存异。谁要是闹分裂，搞破坏，必将受到严惩……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派，我们都是一个驼队，这个驼队必须前进。"他强调埃及必须保持国家安定，并决心用法律来维护安全与稳定。他提倡廉洁奉公，反对追逐名利和腐化堕落，要求埃及青年一代，要养成奉献和牺牲精神，树立忠于祖国，忠于民族的观念，以友爱、希望和工作来建设埃及。他主张民主与法制，反对专横与不平等，主张真理与正义，反对一切邪恶。

穆巴拉克的这篇讲话，实际上就是他在内政方面的施政纲领，其基本目标是在保持国内稳定的基础上扩大民主。讲话中所提到的民主与法制、安定与统一、真理与正义以及爱国与奉献等原则表明，穆巴拉克的治国道路不同于萨达特，也不同于纳赛尔，而是自己的独特道路。

短暂的稳定

穆巴拉克上任后，安全部门迅速逮捕了350名伊斯兰好斗分子，其中包括新圣战组织的所有领导人和刺杀萨达特的凶手。经过军事法庭审讯，圣战组织的领袖法尔吉和4名凶手被判处死刑。

同时,根据对凶手的审讯结果,大约30~40名军官以及一百多名士兵被清除出武装部队,他们都是1974年以后特别是1977年1月粮食骚乱后渗入军队的宗教极端分子。1982年9月,圣战组织策划劫狱和劫机。政府继续镇压,先后两次搜捕该组织的成员。1983年11月,又逮捕了"赎罪与迁徙"组织35名嫌疑犯。这些镇压措施虽然没有彻底根除宗教极端势力,但有效地遏制了他们的暴力活动,使他们在80年代前期相对沉寂。

在严厉打击极端组织的同时,穆巴拉克实行了政治解禁。1981年12月,他释放了九月大逮捕中抓捕的所有囚犯,并在总统府接见刚获释的反对派领导人,向他们表达他的各党合作、共同推进政治民主的愿望。之后,一百多名反对党议员进入了人民议会,一些新的政党被允许建立,使反对党的数目由4个增加到13个。穆巴拉克还经常会见反对党领袖,同他们就经济改革,民主进程,外交关系问题广泛交换意见。

在穆巴拉克统治下,新闻有了更多的自由。他上台不久,停刊的两个反对党的机关报《民报》和《国民报》复刊,被捕的记者重新回到报社。复刊后的反对党报纸不再遮掩它们的观点和立场,而是公开批评政府的政策,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当局通常采取容忍态度,并未因此查封一家报纸或者逮捕它的主编。穆巴拉克与反对派的历史性和解,不仅大大缓和了埃及的政治紧张气氛,总统本人也在国际上树立了"民主总统"的形象。

从1981年底至1983年初,埃及司法部门审理了民愤极大的三大经济案,与案件有牵连的一名副总理和三位现任部长被解职。虽然法院对案犯的判决过于宽大,一些涉案的部长大员未受到法律惩处,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民怨。1982年初,穆巴拉克任

命了一届新政府，科普特人费克里·马克拉姆任副总理，另一名科普特人任国家移民部部长，这也有利于消除科普特人对他们所处的无中央参政权的不满情绪。80年代前半期，埃及社会呈现出很久未有的政治安定局面。

政治暴力的回潮

80年代中后期，埃及经济陷入严重危机，蛰伏了数年的宗教极端势力乘机兴风作浪，政治暴力迅速回潮。

1986年1月，开罗发生住房倒塌事件，22人罹难，引起群众和反对党对政府的激烈批评。接着在2月25～26日，中央保安部队哗变，打破了国内和平，威胁到国家安全。在这支28万人的部队中，士兵大多是文盲，他们主要负责城市安全工作，包括警卫公共建筑、大使馆、政府机关、银行、道路和桥梁，每月工资6埃镑。谣传政府计划把他们的服役期由三年延长到四年，他们便在佩拉米兹附近的军营中举行暴动，破坏旅馆、俱乐部，砸毁汽车。他们还冲进开罗近郊的米迪监狱，释放囚犯。在工业城市赫勒万、开罗东北的舒布拉和赫利奥坡里斯，也发生了其他部队的暴动。当局不得不出动军队镇压。在持续七天的流血冲突中，有60人死亡，约300人受伤，5座饭店和2 000辆汽车遭到破坏。

士兵哗变平息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成为政治暴力的主角。在此后十年里，他们打着改变"丑恶的社会"的旗号，采用破坏、暗杀乃至武力对抗等手段公然向政府当局和世俗社会发起挑战。1986年，在明亚、艾斯尤特和阿斯旺等地，极端组织把抢占的清真寺作为据点，大肆进行破坏圣陵、焚烧酒吧和基督教教堂，抢劫科普特人首饰店等活动。1987年，"救出火狱集团"三次策划暗杀两

任前内政部长和一名报刊主编。这一年还发生了纳赛尔派地下组织“埃及革命”的成员枪杀美国外交官和袭击开罗国际工业交易会以色列展馆的事件。1988年,政治暴力继续升级,直接的暴力对抗事件从1987年6起增加到11起,导致人民议会通过一项议案,把自萨达特遇刺以来实行的国家紧急状态延长到1991年。

进入90年代后,伊斯兰极端组织与当局的对抗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从游击战和民众暴力发展为半内战。主战场有两个,一个是上埃及的艾斯尤特,一个是大开罗的城市边缘地区。为粉碎艾斯尤特省的“迪鲁特伊斯兰共和国”和吉萨省的“因巴拜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动用了包括轰炸机在内的所有作战武器。1993年,政府仅在大开罗地区就发动了34次清剿作战。据有关资料统计,1993~1996年,双方对抗中共造成2 610人死亡,政府逮捕宗教极端分子33 235人。

伊斯兰极端组织不仅同政府军队公开对抗,还策划谋杀国家要员,如新闻部长、内政部长、总理、中央军区司令员甚至总统,埃及第二号人物、议长拉法阿特·曼海朱卜和国家安全局负责宗教事务的头号人物拉乌夫·希拉特将军先后被暗杀。

90年代前半期埃及政治暴力的突然升级与1991年国家开始实施“私有化”计划有关。计划宣布后,工人担心国有企业私有化后会被解雇,或者工资降低,因而举行罢工、静坐或游行示威向政府施加压力。劳工骚动为宗教极端势力制造暴力事件制造了环境。

随着经济改革的稳步推进,到90年代中后期,埃及经济恢复元气,摆脱了近十年之久的经济衰退,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暴力战略越来越失去支持者和同情者。极端组织内部也出现了分裂,部分

温和派主张放弃暴力战略，改而采用和平方式同当局继续较量，并于1999年开始筹建政党，如前“赎罪与迁徙集团”的成员加麦尔·苏尔坦筹建“改革党”，前圣战组织成员曼姆杜赫·伊斯梅尔筹建“沙里亚党”。从1997年起，政治暴力开始退潮，1999年仅发生2起政治暴力事件，以致《金字塔报》的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在其《1999年阿拉伯战略报告》中宣布，“宗教暴力落下帷幕”。

多元政治体制的完善

名义上说，由于1971年宪法的颁布和1976年多党制的实行，埃及已形成多元民主的政治体制。然而在萨达特时代，埃及民主制只不过徒具虚名而已。穆巴拉克上台后，迅速与反对党和解，为埃及真正实现多元民主政治带来了希望。

在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里，1984年埃及举行了议会选举。选举是在比例代表制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总共488个议席中，执政的民主党获得391席，新华夫脱党获得57席，但其他政党包括联盟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和自由党没有赢得1个议席。原因是选举法规定，一个政党需获得总选票8%以上的选票，才能获得议会席位，而这三个政党的获票率分别为7%、6%和4.2%。虽然选举法的这一规定显然不利于反对党，但普遍认为，选举是自由的，埃及人在近35年里第一次参加了相对公开的、无约束的竞选；人民议会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辨认的反对派——新华夫脱党，它获得了15.47%的选票。

新闻自由恢复后，埃及报纸上第一次出现与总统唱反调的文章，《不，总统阁下》这样的标题也赫然出现在报端。一些过去在纳赛尔时代受过政治迫害的人士开始对纳赛尔口诛笔伐。一些人甚

至对已故的法鲁克国王产生了兴趣,撰文追念他在位最后 8 年(1944 - 1952)的仁慈统治。反对派还攻击政府处理经济不当,声称 1986 年 2 月的安全部队哗变是政府无能造成的。对于这些有损于当局的言论,当局都予以容忍。政党数目也由 1981 年的 4 个增加到 2001 年的 16 个。

穆巴拉克时代的多党制仍是有限的,不仅政党法、选举法为反对党设置了许多障碍,而且执政的民族民主党能够得到政府机构的有力支持,从而造成执政党一党独大,反对党脆弱不堪的局面。另外,议会选举中屡屡发生的暴力事件和贿选丑闻,也表明它与真正的议会民主制仍有很大距离。

如果说穆巴拉克治下的多党制议会制尚不完善的话,那么司法相对立则可称之为当代埃及政治生活的闪光点。在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司法权被置于行政权之下,政府可随意撤换检察官。1984 年的 35 号法重建了由最高法院院长担任主席的最高司法委员会,以保护检察官,非经该委员会同意,司法部长不得任命、晋升、调动检察官。该法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司法独立。在埃及的政治生活中,司法机构也较充分地发挥了它的维护社会公正,捍卫人权的独特作用。当代埃及的大多数反对党都是在政党委员会拒绝其建党申请后,政党创始人不得不诉诸司法程序,经法院判决而获准成立的。最典型的是纳赛尔党。该党于 1983 年 7 月向政党委员会提出建党申请一再遭到拒绝,直到 1992 年 4 月才由最高行政法院作出判决得以正式建立。最高宪法法院还连续两次判决 1983 年和 1986 年的两个选举法违宪,根据两法选出的 1984 年和 1987 年两届议会无效,穆巴拉克总统不得不下令解散人民议会,修订选举法重新进行选举。1995 年,行政法院又一次裁决 109 个

选区的第一轮选举结果无效。在 1987 年火车司机罢工案中，国家最高安全法庭判决所有 38 名被告无罪，维护了工人的罢工权。司法机构所作的诸如此类判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政部门和执政党违反民主、滥用权势的行为，保障了多元民主政治体制的运行。

当然，迄今为止，埃及的多元民主制还是一个蹒跚而行、不太稳定、不够完善的体制。对这一体制的生存构成威胁的不仅有原教旨主义的挑战，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还有国家首脑即共和国总统事实上的终身制，这在埃及这样一个有着专制传统的国家会助长领袖崇拜。但只要多元民主制存在，埃及人就有机会参与政治。在经过几人的努力之后，埃及必将进人真正的民主时代。

二、在改革中求发展

"生产性开放"

70 年代萨达特实行经济开放，吸引了大批外资。但政府对外资投资项目不加过问，结果虽然埃及的城市面貌大大改观，出现了高楼大厦、豪华商店和许多游乐设施，市场充斥着五花八门的奢侈品，但本国的生产率增长依然缓慢，依赖外援程度加深，埃及经济发展的几个长期障碍，包括人口迅速增长带来的巨额粮食进口、16%以上的通货膨胀率、国家对某些必需的食品和燃料的高补贴，以及社会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等问题依然存在。

针对这些问题，穆巴拉克在坚持开放政策的同时，强调必须用"生产性开放"取代 70 年代的"消费性开放"。在 1982 ~ 1987 年的

五年计划中,政府把对工农业和技术的直接投资作为投资重点,努力拓宽经济基础,降低国家对进口的依赖。扩大电力供应与发展钢、铁、铝等重工业一起被给予优先发展的地位,将分给更多的发展基金。对汽车工业拟实施进口替代计划,包括建立一个汽车制造厂和充实现有车辆装配厂,为国内汽车销售市场每年提供40%的产品。另一个重点投资领域是国家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通讯和污水处理系统。

根据"生产性开放"原则,政府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1983年8月穆巴拉克签署新的国营企业法,扩大了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同时政府拨款55亿埃镑,用于全国237个国营企业更新生产方式。政府还鼓励对私营企业的投资,给投资者以免税和其他优惠待遇,对向边远地区投资的给予更长的免税期限。在农业方面,政府继续鼓励开荒,给开垦者低息贷款;同时和苏丹搞经济一体化,利用苏丹土地辽阔的有利条件,共同发展粮食生产,以满足两国粮食的需求。

在投资重心向生产性行业倾斜的同时,政府在其他方面也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例如,针对国内石油消费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影响到石油出口这一重要外汇来源的情况,国家投资15亿美元,继续在苏伊士湾、红海、西奈和地中海近海进行勘探,来自苏伊士湾西岸、三角洲地区和西部沙漠地区的天然气也用于满足国内能源的需要。为改变旅游业的下降趋势,政府设想对红海胜地综合企业的发展、国内旅游业和对宗教遗址的朝圣旅游投入巨额资金。为缓解高补贴带来的财政压力,从1983年起,政府实行新的物价补贴政策,即按个人收入高低享受不同的补贴,年收入高于2000埃镑者不再享受物价补贴。

穆巴拉克的新经济政策在最初几年里，取得了一些成效，促进了埃及的经济建设步伐。1982～1984年，埃及经济增长率为7%～7.5%，财政赤字下降50%。但80年代中期后，由于出现经济危机和政治骚动，一五计划陷于停顿。

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

80年代初，世界石油价格大幅下跌，埃及外汇收入受到严重影响，但政府继续执行扩张型财政政策，造成外债剧增和财政赤字扩大。1986年，埃及外债由1981年的212亿美元增加到360亿美元，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23.1%。政府试图通过海外融资和银行融资弥补巨额财政赤字，导致通货膨胀率在1986年升至23.9%。

在危机已经爆发的情况下，政府开始实施穆巴拉克时代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87～1992）。为获得计划实施所需要的资金，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谈判，希望得到3～4亿美元的结构调整贷款。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埃及自由化改革不力为由，拒绝给予贷款。埃及经济继续恶化。到1990年，埃及的外贸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都比80年代中期上升了20%以上，外债进一步增加到461亿美元，通货膨胀率仍在20%左右徘徊，人均国民收入下降了10%。

在经济危机日趋严重，已到了山穷水尽、非改不可的地步时，埃及政府终于痛下改革决心。1991年，埃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了“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计划”协议，与世界银行签订了“结构调整贷款”协议。据此，埃及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目标是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为了鼓励埃及政府

推进改革，由西方债权国组成的巴黎俱乐部同意在 1994 年 6 月前分三期减免埃及 50% 的债务，总额达 202 亿美元。

第一阶段改革的核心是实施稳定计划，旨在通过紧缩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消除宏观经济的失衡。稳定计划得到成功的实施，到 1993 年第一阶段各项改革目标基本实现。

第二阶段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结构调整，全面推进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为即将到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建立制度框架和市场运行机制。结构调整计划包括开放外贸、税制改革、金融和资本市场改革、私有化等。这是一个制度上的破旧立新，比实施稳定计划要复杂得多，艰难得多。作为结构调整的核心，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尤其如此。

1992 年，在苏联和东欧剧变的影响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敦促下，埃及正式启动私有化进程。根据有关法令，国有企业被组成 27 家控股公司，与国家财政脱钩，并使出售国有企业成为可能。为了缓和工人阶级对私有化的抵触和反对，政府积极引导工人参与私有化，分享私有化的利益。1992 年颁布的资本市场法规定：凡资本在 5 000 万埃镑以上、工人在 50 人以上的公司，工人可组成持股会，以低于向公众和金融机构售价 20% 的优惠价购买股票，10 年内分期付款，不计利息。

在改革初期，私有化的步伐比较缓慢，为的是让有关方面能有适应这一变化的时间和空间。同时，政府采取优惠政策，妥善安置因私有化而失业的人员。例如，鼓励提前退休，凡志愿提前退休者，可领取与退休时工资等额的养老金；安排失业人员到其他企业试用、就业；提供小额贷款，鼓励他们自主创业；开展转岗培训，使失业人员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通过这些办法，较好地化解了

工人对私有化的抵触情绪。1996年以后,老百姓从改革中得到实惠,社会动荡平息,私有化进程开始加快,并进入金融和保险领域。目前,埃及私有化仍存在种种障碍,如相关法律不健全,证券市场不规范,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敏感性等等。这意味埃及私有化将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

从1994年起,各项经济指标大为好转。1994~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年增长率为3.9%,财政赤字率为1.4%,通货膨胀率为8.0%,人均国民收入由90年代初的637美元提高到717美元。埃及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时期。

面向新世纪的发展计划

由于地理环境、历史和现实政治原因,埃及各地的经济发展历来极不平衡,发达地区仅限于下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和地中海沿岸城市,而上埃及和广大农村地区则一直是穷山恶水的贫困之乡。这种状况不仅严重制约着埃及经济的发展,也是埃及社会屡屡发生动乱的主要根源之一。而且,农村贫困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又对城市的发展造成极大压力。以首都开罗为例,这个全国最大城市1994年人口为683万,而90年代末竟激增到1500万,几乎到了人口爆炸的程度。改革初见成效后,埃及政府着手解决经济发展失衡问题,雄心勃勃地推出了三大长期发展计划。

1.南埃及国家开发计划。南埃及地区包括阿斯旺、基纳、索哈杰、艾斯尤特、新河谷省和红海省,面积超过埃及国土的一半。据1996年的统计,该地区人口为1 000万,占全国人口的17%,贫困人口660万,占全国人口的48.5%。政府计划在1997~2017年的20年中投资3 049亿埃镑开发南埃及地区,其中国家将投入

750亿埃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余依靠私有部门和外国投资。预计827亿埃镑投入工业,529亿埃镑投入农业,942亿埃镑投入城乡建设和住房建设。该计划的总目标是:提高该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更好的文教卫生服务。到计划完成时,预计将创造280万个就业机会,开垦耕地130万费丹,使该地区的耕地面积增加1倍,并建设若干新的工业园区。该计划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投资和发展的平衡,抑制从上埃及诸省向其他富裕地区尤其是开罗和亚历山大的移民潮。

2.乡村一体化国家开发计划,又名"日出计划"。该计划不局限于上埃及,它覆盖全国农村地区,目的在于改变农村的贫困面貌,并通过就地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生活水平,减缓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日出计划"于1994年开始实施,分四个阶段,到2017年完成。计划总投资2 670亿埃镑,其中33%为政府拨款,42%由民间投入,25%为贷款。其长远目标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经济发展和机构发展等方面全方位推进乡村建设,使埃及农村逐步转向可持续的自主发展,成为繁荣与福利之乡,消灭城乡差别,把贫穷落后的农村人口融入到全国大社会之中。

3.新河谷运河计划。埃及国土面积虽不算小,但96%是寸草不生的沙漠,埃及人仅靠一条尼罗河生存,人口密布于尼罗河两岸。数十年来,尽管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控制人口增长,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人口压力依然越来越大。穆巴拉克上台时,埃及人口已达到4 400万,而到20世纪末,又进一步膨胀到7 000万。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土地狭小与人口增多的矛盾,埃及政府决定再造一条人工的尼罗河,穆巴拉克总统称之为"新河谷运河"。计划设想从位于新河谷省的纳赛尔湖引流至西部沙漠的巴里斯绿洲,从而新

辟耕地100万英亩，吸引700万多人到那里生活。这条运河设计底部宽30米，上部宽53米，深6米，总长320公里，估计需20多亿美元。工程于1997年1月开始，预计到2017年完成。该计划的更长远规划是打算进一步把运河延伸到哈里耶。许多埃及人把这项工程看作是穆巴拉克总统的金字塔和纪念碑。

上述三大宏伟计划如果完成，埃及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将完全改观。但从目前情况看，这些计划的实施决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首先，三大计划中前两项的提出，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是对政治暴力泛滥的反应。随着政治暴力的退潮，继续推进计划的政治动力随之减弱；其次，在埃及社会居主导地位的大城市既得利益集团为保护自身利益，千方百计地阻挠计划的实施；第三，埃及经济严重依赖外援，外援资金能否到位，远非开罗所能左右。可以说，三大计划的实施既是对埃及综合国力的严峻考验，也是对埃及政府能力的巨大挑战。

三、推行全方位外交

走出孤立困境

萨达特执政后期，为实现中东和平而投靠美国，亲近西欧，却冷落和抛弃了苏联；与以色列媾和，却疏远了同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和不结盟运动的关系，埃及在第三世界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十分孤立。萨达特之死使穆巴拉克深切地感到必须改变这种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因为埃及属于阿拉伯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它不能离开这个根基。

但是，外交方针的这种调整必须是逐步而谨慎的，匆忙行事则可能刺激美国和以色列，造成对埃及不利的后果。事实上，美、以两国十分关注萨达特之后埃及的外交走向，甚至抱有很大的戒心。为消除美、以的疑虑，穆巴拉克在他任总统的前半年里一再申明，和平不取决于某一个人的生命，与以色列的和平条约不仅对埃及利益至关重要，而且仍旧是该地区更广泛和平的主要希望。在会见以色列总理贝京时，穆巴拉克保证："埃及将完全信守萨达特总统承诺的一切决定，履行他承担的全部义务。"得到这一保证，以色列如期撤出西奈半岛，埃及得以实现领土统一。

国内局势稍事安定后，穆巴拉克就以请求苏联技术人员支援埃及某些工业计划的方式向苏联做出和解姿态。同时，他也向阿拉伯国家发出和解声音，公开宣布埃及支持巴勒斯坦自治。1982年1月及这年夏天，他在阿斯旺和开罗两次会见苏丹总统尼迈里，就加强两国关系和解决苏丹国内教派冲突问题进行磋商。12月，他接见了伊拉克军事代表团，后者是来寻求埃及在两伊战争提供军事援助的。1983初，由于利比亚在乍得支持反政府武装，苏丹的安全受到威胁，穆巴拉克又同尼迈里进行几次会谈，针对利比亚，两国加强了联合。3月初，埃及明确表示，希望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并对约旦的接近态度做出积极回应。

到1983年底，埃及的外交新方针已经十分明确，这就是独立自主、和平友好，既不与任何国家为敌，也不与任何国家结盟。阿拉伯国家不再把穆巴拉克政权看作萨达特式的亲美政权，埃阿关系在逐步恢复。从此时起，阿拉伯产油国的资金开始流入埃及。1984年1月，沙特王子塔拉尔·本·阿代尔·阿奇兹访问埃及，这是自1977年以来沙特高层人士的首次访问。同月，约旦和埃及缔结

了贸易协定。阿拉伯旅游者也开始返回埃及。换句话说，1977～1978年因反对埃以和解而组成的所谓阿拉伯拒绝战线最终瓦解了。同时，穆巴拉克总统在以色列入侵和占领黎巴嫩部分领土问题上向美国施加压力，并根据1979年埃以和约的条款冻结了埃以关系的进一步正常化，无限期地召回驻以色列大使。4月，与塞浦路斯恢复了关系——数年前，由于巴解组织刺杀萨达特总统的密友优素福·塞拜而中断关系。这年夏天，埃苏关系恢复正常，12月，埃约关系完全恢复。到80年代中期，埃及初步走出外交孤立状态。

重返阿拉伯联盟

80年代后期，尽管埃及面临国内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困难，但在外交上仍取得一连串的成功。1987～1988年，埃及先后同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北也门、巴林、卡塔尔、突尼斯、南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国恢复了关系。埃及在美国与利比亚冲突中奉行的维护阿拉伯国家利益和中立政策，也终于消除了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成见，这位强硬的反美派政治家逐渐认识到，穆巴拉克并不是他所想像的亲美派。1988年底，卡扎菲主动提议与埃及恢复正常关系，次年两国关系正式恢复。1989年12月，埃及与叙利亚重新和好，并在1990年5月穆巴拉克和阿萨德的达马斯卡斯会谈时达到高峰。接着，在外交上同叙利亚保持一致的黎巴嫩也与埃及复交。至此，埃及同阿拉伯所有国家的关系完全恢复正常。

1989年4月，埃及在缺席15年之后，重新被接纳为阿拉伯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5月，在卡萨布兰卡举行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埃及恢复了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地位，重返阿拉

伯大家庭，阿拉伯联盟机关也迁回埃及。

实际上，到1989年年底，在经历了相对暗淡的八年之后，穆巴拉克总统已经成为中东和非洲的主要政治家（特别是这年9月当选非统组织主席以后）。他几乎像走钢丝一样，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保持了微妙的平衡：一方面继续履行为埃以和约承担的义务，一方面重新走入阿拉伯事务的中心。随着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埃及得到了这些国家更多的财政援助，更多的埃及人进入各国的劳动力市场，从而促进了埃及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埃美特殊关系与埃苏关系正常化

穆巴拉克任总统后第一次访美时，曾对《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这样说："在我的政策中，我既不是苏联人，也不是美国人，更不是欧洲人，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埃及人"。在处理埃及与东西方关系上，他始终从维护埃及的民族利益和中东地区的稳定出发。

穆巴拉克虽然不赞成萨达特完全认同于美国政策的做法，但考虑到美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对埃及至关重要，因而继续维持着同美国的亲密关系。1983年2月，由于利比亚与苏丹关系紧张，而苏丹传统上是埃及的友邻，穆巴拉克同意美军在其领土上部署针对利比亚的AWACS侦察机。1985年11月，一架埃及民航班机被劫持到三角洲的瓦莱塔。劫机者自称"埃及革命"，杀了4名乘客，埃及军队试图营救，引起另外57人丧生。埃及政府怀疑利比亚参与这起事件，为向利比亚施加压力，与美国联合举行了代号"光辉之星"的军事演习。1986年，埃及政府提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公用设施服务费用，引起工人骚乱，应埃及政府要求，美国迅速向埃及提供了1.5亿美元的援助，帮助埃及进行结构性经济改

革。同时,美国答应埃及可以按低利率贷款偿还所欠美国的45亿美元的军事债务。1987年,由于与利比亚关系破裂,埃及从美国购买了16架飞机和响尾蛇式空对空导弹,并再次与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这一年,埃及还与美国重新安排了债务问题。

尽管埃及在军事上、经济上有求于美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美国百依百顺。事实上,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特别是中东地区问题上,埃及都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表现出与美国不同甚至相反的立场。1990年8月,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后,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第一个站出来公开谴责伊拉克侵略行径。埃及还陆续派出3万部队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美国因此免除了埃及71亿美元的债务。海湾战争结束后,埃及从维护阿拉伯世界安全与稳定的立场出发,又第一个明确拒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参与海湾地区战后安全的安排。埃及也反对美英等国对伊拉克长期实行经济制裁,穆巴拉克总统和埃及政府再三声明,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反对在伊拉克建立禁飞区,反对肢解伊拉克或干预伊拉克内政。

在利比亚问题上,90年代以后,埃及和美国立场相左。1996年4月,美国指控利比亚正在兴建一座化学武器工厂,扬言要用武力摧毁它。穆巴拉克当即向美国发出呼吁,要美国用和平手段解决其同利比亚的争端,同时要求美国拿出更多的证据来证明它的指控。1998年7月9日,穆巴拉克不顾联合国对利比亚实行的空中禁运,从开罗乘飞机抵达利比亚,会见日前刚刚接受手术治疗的卡扎菲。此举也拂逆了美国的意旨。

在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的同时,埃及也努力改善同苏联的关系。1984年埃苏关系恢复后,一直在稳定发展,并在1987年达

到高潮。这年3月,苏联文化中心重新在开罗成立,同时两国开始就军事贷款、双边贸易和工业发展等问题举行谈判。苏联同意埃及把一笔30亿美元的军事贷款的偿还期延长25年,以缓和埃及当时沉重的还债压力;埃及政府同意苏联船只进入亚历山大港添加燃料,同时在开罗、亚历山大和塞得港重新设立领事馆。年底,埃及与苏联签订了十年后第一项双边贸易协定。但是至苏联解体,埃苏关系没有更大的发展,始终处于不冷不热状态。

架设中东和平之桥

作为阿拉伯地区的政治中心和阿拉伯世界惟一与以色列建交的国家,埃及在中东事务中发挥着无人能替代的独特作用。为推进巴以和谈、埃以和谈、黎以和谈,特别是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穆巴拉克总统和埃及政府不辞辛苦,做了大量的斡旋、调解和沟通工作,赢得了各方的信任,使埃及成为巴以之间、阿以之间寻求和平的桥梁。

1993年,当巴、以就加沙—杰里科自治达成原则协议后,巴勒斯坦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三次来开罗,与穆巴拉克协商自治计划的制订问题,过去因埃以和约而对埃及产生的愤恨情绪已转变为友好和尊重。1994年4月15日,在穆巴拉克主持下,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总理拉宾在开罗正式签署了关于实施加沙—杰里科自治原则宣言的最后协议。

1996年6月内塔尼亚胡出任以色列总理,他一上台就宣布奉行“三不”政策,即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和建国权;不归还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不就耶路撒冷最终地位问题进行谈判。这实际上拒绝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中确立的“以土地换和平”

的原则。为了保证以前巴以间已成达的诸项协议得以实施，6月8日穆巴拉克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前往利雅得，与沙特国王法赫德商讨内塔尼亚胡上台后的新形势，协调相互立场。接着召开了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和八国外长会议，确定了同以色列坚决斗争的原则和方法。面对阿拉伯国家步调一致、团结统一的局面，内塔尼亚胡于7月18日来到埃及向穆巴拉克表示，以色列将遵守与巴方签署的协定，愿意尽快恢复巴以会谈。在穆巴拉克多方协调下，1997年1月巴以终于签署了希布伦问题协议，和平进程有了转机。

针对以色列在巴自治领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问题，1998年7月5日，穆巴拉与约旦国王侯赛因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在开罗举行三方首脑会谈，并发表联合公报。公报表示坚决反对以色列试图扩建耶路撒冷犹太区计划，敦促以色列立即停建犹太人定居点，停止没收巴勒斯坦人的房屋财产，恪守"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此后，巴以和谈反反复复，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但埃及政府依然坚持不懈地为推进中东和平而努力。

80年代以来，穆巴拉克总统开展的全方位外交，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提高了埃及的国际地位，同时也为埃及争取了大量来自西方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援助，有效地保证了埃及经济的发展。但是应该指出，埃及的对美、对以政策仅限于国家和政府层面，并没有得到埃及民众的认同，许多埃及人迄今仍拒绝接受埃以和约的合法性，媒体也不时掀起反对以色列的浪潮，对美国偏袒以色列的做法也非常气愤。这种反美反以情绪在埃及左翼人士和伊斯兰右翼势力中间尤为强烈。

四、20世纪的埃及文化

教　育

英国占领期间，埃及的教育几乎没有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埃及文盲率高达95%，教育经费在政府预算中不超过1%。埃及独立后，发展教育被列为政府的大事。1923年宪法第19条规定，实行义务初等教育，所有库塔卜学校（清真寺小学）一律免费。1925年的教育法规定，十年内完成义务初等教育，消除文盲。但是这个目标远没有实现，实际上，即使到1951年，在校学生也仅仅占学龄儿童的30%。不过国家教育支出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到1940年，达到国家年度预算的12%。1945年全国有4500所小学，在校学生75万人。

小学教育的发展给中学带来很大压力。由于现有中学的校舍、设施和师资有限，不可能容纳所有的求学者，因而考试成绩成为能否升学的关键。1925年以后，大学入学也要求考试。在这种情况下，中小学便完全根据教育部统一的教学大纲进行应试式教育，以便提高升学率。但教学大纲的规定有许多并不合理，学生们熟记伊斯兰教史、某些物理和自然科学的公式和定理，也学会了阿拉伯文，却并不理解，外语更糟。他们几乎从不自己去广泛阅读课外书籍，很少进行独立思考的训练。

1922年以后，埃及政府也注意发展职业和技术教育，但并不成功。原因是大多数埃及人都把教育目标放在国家雇用上，对此类学校不感兴趣。到1938年，教育部管理的此类学校仅有22个。

二战结束时，职教学校的在校生不超过2万，而当时政府实施的工业化项目需要6～10万技术人员，其中大多数在工程、贸易和技工方面。

1952年革命后，自由军官政权对整个教育体制进行全面重组。1953年的210号法令首先确立了小学6年、预备学校（相当于初中）4年（1957年后改为3年）、中学（相当于高中）3年的学制。1956年的213号法令规定所有公立学校一律免费，并取消升级考试，但升学考试制度仍旧保留。考虑到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导向作用，新政权试图把教学大纲与实际的社会经济问题和国家急需结合起来，使教育同民族目标相联系。但是，1956年以后关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社会的课更像是宣传，而不像真正的学习课程。1956年苏伊士战争后，政府也加强了对外国人学校的监督，并于1958年取消了所有外国人学校。

60年代初，埃及现代教育制度基本确立。1961年全国各类学校学生人数由1951年的180万增加到400万，小学入学率由30%提高到70%，中学数目约500所，学生28万人，职业和技术学校在校学生近15万人。

20世纪埃及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令人注目。埃及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这就是建于10世纪的爱资哈尔大学。1908年，由一些民族领袖和知识分子捐资兴办的埃及国民大学成立，它是埃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过实际上它还够不上真正的大学，因为它只设有文学和艺术专业。1925年，埃及政府决定把国民大学与几个专科学校，包括工程学院、医学院、农学院、法学院、师范学院和商学院，合并为埃及大学，这是埃及第一个国立大学，后在1952年改名为开罗大学。1950年，第二个大学在亚历山大

建立。同年，在赫利奥坡里斯出现了第三个大学，艾因·夏姆斯大学，其学科重点是阿拉伯文学和社会科学。至此，包括爱资哈尔大学在内，埃及共有了四所大学。

1954年10月纳赛尔出任总统后，适应国有化及经济现代化的需要，高等教育发展的步伐加快。1957年，埃及议会决定："大学要向每个要求入学的中学毕业生开放"。同年，艾斯尤特大学成立，这是埃及第一所工科大学。接着于1961年和1962年分别成立了开罗综合技术学院和高等工业学院。从1962年7月起，公立高等院校全部实行免费教育。与此同时，政府对爱资哈尔大学进行了重建，使之进入现代大学体系。根据1961年的第103号法令，爱资哈尔大学开始实施现代科学和应用科学教育，新建了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以及女子学院。

萨达特执政时期，埃及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高等教育因而备受重视，萨达特总统甚至于1971年亲自颁布命令，要求高校录取所有中学毕业生。仅1972~1976年，国家就新建了7所大学，而在整个70年代，埃及高校在校生年均增长高达8.3%。

埃及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极大地推进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教育质量和毕业生水平降低的问题。原因首先是师资力量不足。全国高校师生平均比率为1:50，教师每周17~24课时的讲课负担使其无法进行学术研究。其次，受财政能力限制，资金投入太少，因而教学的辅助设施如图书资料和实验设备十分缺乏，学生极少进行独立研究，他们主要依靠课堂笔记通过考试。另外，许多批评者认为，当局急于发展大众高教的观念脱离了埃及实际。60年代，全国文盲率仍高达60%（妇女更高达70%），初等教育尚未普及，即使到80年代初，适龄儿童的小学入

学率还不到90%。就国家经济和社会服务的直接需要而言，也是应该加强中等技术和职业教育，而不是高等教育。另外，批评者也反对当局在民族革命的名义下，以法令形式规定大学的教学内容。

针对上述问题，1981年出任总统的穆巴拉克对教育进行了全面规划，制定了《埃及大学法》，并实施了一系列高教改革措施。目前，埃及共有12所国立大学，1所立私立技术学院和近百所公立职业技术学院。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有关机构统计，1995年埃及高校在校生达103.2万人，从而使埃及跻身于22个高教大国（指在校大学生百万以上的国家）行列；每10万居民中在校大学生为1 900人（高于世界平均数1 434人）；高校的入学率为20.3%（高于世界平均数16.2%）；外国留学生6 727人，在世界50个主要接受外国留学生的国家中居第29位。著名的开罗大学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该校除在本国的贝尼·苏夫和法尤姆设立分校外，还在苏丹首都喀土穆设有分校，共有39个学院、5个研究所和1个开放大学中心，其中尤以经济学与社会科学享誉中东。2000年注册学生为15.5万人，自成立至今已有100多万名毕业生。

文　学

诗歌历来是埃及文学的主要形式，其体裁则是追求音韵的格律诗，作者大多是宗教学者。19世纪中叶以后，与伊斯梅尔的欧化政策相适应，各种体裁的西方文学作品陆续翻译成阿文出版，但埃及依然没有小说、戏剧等现代文学形式，散文关注的是修辞，说书仅限于民间口头形式，因之诗歌的主导地位仍未改变。

英国占领埃及后，在民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以萨米·帕沙·巴

鲁迪(1834～1904)、伊斯梅尔·萨布里(1854～1923)和哈菲兹·易卜拉欣(1870～1932)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开始模仿穆斯林经典作品进行创作,以表达他们的爱国情,从而在埃及开创了阿拉伯古典诗歌复兴之风。他们的作品通常都是比较冗长且充满激情的颂诗,描述哈里发—素丹面对欧洲威胁时伊斯兰社会表现出来的英雄品质。不过,他们在模仿古典诗歌的同时,对语言进行了革新,因而被称为新古典派。

新古典派诗人中,巴鲁迪最为著名,被认为是埃及第一位现代诗人,阿拉伯诗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代巨匠。他创作了大量仿古诗歌,热情讴歌伊斯兰的灿烂历史,无情地鞭挞凶残的殖民强盗和腐败的统治者,号召人民奋起反抗,驱逐外虏。

新古典诗歌在艾哈迈德·绍基(1869～1932)时达到顶峰。绍基在政治上忠实拥护赫迪夫和奥斯曼素丹,他的大诗人形象在于他发展了诗歌的戏剧形式,这种形式后来被用于戏剧、歌舞和电影。他的几部长篇史诗如《阿里·贝伊·卡贝尔》、《克里奥帕特拉之死》、《莱拉的爱》和《安达卢西亚公主》都被配了音乐。因此,他堪称埃及戏剧和音乐之父。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埃及出现了不同于巴鲁迪和绍基流派的现代派诗人。他们更多地受到欧洲文学的影响,并且都不同程度地参加了1919～1921年的埃及独立运动。他们认为,诗歌是个人情感的表达,不是当局的颂文和社会说教的工具,批评其前辈盲目歌颂宫廷,一味仿古,专注于韵律的倾向,以及普遍的伤感和激愤情绪。他们把对埃及新民族主义的关切与现实主义的方法结合起来,以表现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现代派的代表人物有两位,一位是阿巴斯·马哈茂德·阿卡德(1880～1965)。他是纳赛尔时代文

学界尤其是诗坛激进现代派的主要评论家，曾获国家文学鉴赏奖。另一位是阿布·沙迪（生卒年代不详）。他曾在30年代发起成立“阿波罗诗社”，吸引了从纯感觉主义派到现实悲观主义派等形形色色的诗人，他们出版了多卷本的诗选和诗集，并使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在黎巴嫩获得新生。由于30年代国王和西德基政府的残酷独裁统治，迫使现代派诗人脱离现实而走向极端浪漫主义的歧途。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埃及政治形势的恶化使社会现实派得以兴起。面对诸如埃英关系、大众贫困和地区问题尤其是巴勒斯坦等爆炸性政治问题，现实派诗人号召回到具有社会寓意和民族目标的诗歌上来。他们反对无目的抒情诗，喜欢主题鲜明地表达政治和社会理想，其诗歌主要集中于对民族问题和社会生活现实的描写，因之诗人成了“民族解放的战士”。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新闻业和报业的发展，埃及涌现出大批优秀的政论作家和杂文作家。在他们之中，有宗教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布杜、政论家卡西姆·阿明、穆斯塔法·卡迈勒、阿里·优素福、艾哈迈德·卢特菲·赛义德。阿布杜以他的《一神论》闻名于世；阿明的《妇女的解放》和《新女性》为女权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后面三个人则通过他们主编的《旗帜报》、《埃及人报》和《杰里丹报》发表了大量各具特色的社论和评论。这些散文作品体现了一种新政论文写作风格，免去了旧韵文的累赘，并采用了一些外来的或杜撰的技术词汇。这一切标志着埃及现代散文的形成。

1914年，作家侯赛因·海卡尔（1883～1956）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宰纳卜》，这是第一部纯埃及小说。此前，曾有人尝试改编法国小说。作品描写了农村姑娘宰纳卜的爱情悲剧，表现出浓郁的

乡间生活气息。然而真正给埃及小说以第一推动力的是穆罕默德·台木尔(1892～1921)和马哈茂德·台木尔(1894～1974)兄弟,尤其是后者,被认为是现代埃及短篇小说之父。两人都受到近代法国作家莫泊桑的影响,其作品都涉及农民和普通埃及人的生活、困苦和忧伤,而且对地方特色的气氛的描述多于人物活动的情节。

1937年,陶菲克·哈基姆(1898～1987)发表了根据其个人经历写成的长篇小说《乡村检查官手记》。同年,阿巴斯·阿卡德(1889～1964)也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萨拉》。然而就长篇小说而言,更著名的是埃及现代派的巨星塔哈·侯赛因(1889～1973),他著有长篇自传体小说《日子》三部曲。作品以质朴生动的语言,描写一位埃及青年从偏僻的乡村进入首都高等学府、最终出洋留学的经历,深刻揭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埃及社会的变动和各种思想冲突。

战后,埃及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空前繁荣。50年代,一名前军官优素福·西拜与罗斯·优素福出版社共同创办了"纳迪·其萨短篇小说俱乐部",宗旨是组织创作队伍,评论既有的成功小说,并主编小说月刊《金书》和《银书》。70年代,达·马来福的《阅读丛书》和达·希拉尔的《希拉尔丛书》开始出版。这些不同的刊物和丛书不仅促进了如马兹尼、阿卡德等老作家的写作,也为青年作家提供了发表其作品的园地,一批新现实主义小说由此涌现出来,其中许多作品成为电影创作的基础。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中最受推崇的是阿布德·拉赫曼·舍尔加维(1920～1987),他的《土地》(1954)和《农民》(1968)两部小说,以细腻的笔触描了埃及农民的深层问题,包括他们与地主的不合理关系,充满了乡土气息。

在当代埃及作家中,最重要的当数被称为"阿拉伯小说之王"

的纳吉布·马哈福兹。遵循陶菲克·哈基姆的传统,他先后创作了《新开罗》、《哈利利市场》、《三部曲》(《宫间街》、《思宫街》和《甘露街》)、《平民史诗》等46部中长篇小说,内容大多描写开罗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变迁,着力表现在同一家庭内由于受新的力量、新的观念的影响而在两代人之间造成的差异。他的名著《三部曲》由于对开罗土著区居民——他们远离现代开罗——的生活、爱情和死亡的现实主义描写而蜚声阿拉伯文坛。由于他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马哈福兹荣获1988年诺贝尔学奖,成为阿拉伯世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艺　术

埃及的造型艺术从17世纪即开始受到西方的影响。1908年,开罗建立了一所美术学校(后改为美术学院),教师从法国和意大利聘请。二十年后,从这所学校毕业、曾留学法国的埃及雕刻家马哈茂德·穆赫塔尔(1891~1934)在开罗塑成第一座纪念雕像《埃及的觉醒》。这座石雕以中世纪埃及艺术的洗练手法,表现一位农妇昂首挺胸,左手掀起面纱极目远眺,右手轻按一尊狮身人面像,象征着埃及悠久的历史和独立后的远大前程。穆赫塔尔还创作了民族运动领袖卡迈勒和柴鲁尔的塑像及其他作品。1932年,画家穆罕默德·纳吉(1899~1956)创立了亚历山大画派,他的作品描绘了农民的劳动、日常生活和埃及秀丽的自然风光,其人物刻画富于装饰性,风景画则色调鲜亮明快。战后新一代埃及画家和雕刻家反对前辈的形式主义和学究主义,他们的作品主要表现当地的环境和个人的思想情趣,在色彩线条的运用和组合上同样反映出个性特点。

埃及音乐在19世纪开始复兴，形成了融传统音乐、舞蹈、诗歌于一体的"木卡姆"。穆罕默德·阿里任埃及总督时期，从土耳其引入军乐，并建立了5所音乐学校，延聘欧洲乐师，欧洲的乐器、记谱法、作曲法、古典音乐、轻音乐和歌剧等随之传入埃及。20世纪20年代，音乐家赛义德·达维什（1892～1927）对埃及传统音乐进行挖掘整理，并刻意创新，使具有埃及特征的民族音乐一时盛行。此后，音乐家、歌唱家阿卜杜·瓦哈（1902～1991）创作了大量抒情歌曲、爱国歌曲、宗教歌曲和"木卡姆"民歌，并大胆把西洋乐器引入民族乐队。50年代成立的开罗交响乐团演奏的主要是阿拉伯音乐。

埃及传统舞蹈以"东方舞"和"棍舞"最为出名。前者俗称"肚皮舞"，表演时，舞女袒胸露腿，大幅度地扭动腰胯，以显示迷人的青春活力；后者则表现粗犷骁勇的勇士形象。从19世纪后期开始，西方舞逐步流行，民族舞蹈受到排挤。战后民族舞蹈再度复兴，并被引入戏剧和电影。在城市，民族舞蹈逐步规范化，融入芭蕾舞和西方现代舞风格，并配以现代化的舞台和背景，而交谊舞和迪斯科则成为城市青年的新潮舞蹈。70年代以后，一些宗教人士对东方舞大加指责，斥之为"淫秽下流"，败坏世风，东方舞遂呈衰落景象。为挽救这一传统艺术，政府一方面要求舞女演出时要服饰高雅、得体，不得有任何挑逗性动作，另一方面则保护其发展。

传统的埃及戏剧起源于法老时代的宗教剧，主要有皮影戏和滑稽剧等。19世纪下半叶，叙利亚移民把欧洲戏剧引入埃及，马伦纳卡什和后来的乔治·阿比亚德等人经常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地演出翻译改编的欧洲戏剧，但在很长时间里，却没有埃及剧作家创作的民族剧。20世纪20年代，一批在西方接受过戏剧训练的

埃及演员回到国内，成立了自己的剧团。同时艾哈迈德·绍基、马哈茂德·台木尔和陶菲克·哈基姆等名家创作的剧本陆续上演。1935年，埃及国家剧院落成，首次上演的剧目是哈基姆的《洞中人》。战后初期，埃及流行的是用方言演出的地方剧或大众剧，且大多是娱乐性的轻喜剧和滑稽剧。

50年代中期后，埃及戏剧同其他文艺作品一样，有了更多的社会主题。新一代青年作家专注于对他们同时代人的直率描写，同时也学会使用基本的艺术象征手法。其中最重要的戏剧家之一是优素福·德里斯。作为一个医学博士，他善于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并以纯朴而活泼的风格和调皮式幽默的语言见长。另一位重要的剧作家是努曼·阿殊尔，一位年轻的官员，他的令人快乐的戏剧《人民楼上的人们》在1956年首次演出即获成功。该剧触及了人们普遍要求的社会平等问题。1958年和1963年他又先后创作了《人民楼下的人们》和《正直人家》，以象征手法尖锐地讽刺革命后埃及社会的特权集团。

传媒与影视

报纸是最早的传播媒介。19世纪后期埃及出现的报纸不仅把欧洲的启蒙运动思想、进化论、浪漫哲学、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引入这个国家，而且也引进了欧洲的法律、科学知识和文学艺术。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民族解放斗争的兴起，报纸日益成为传播民族主义思想的工具，如著名的《旗帜报》、《埃及人报》和《杰里丹报》等都是民族思想家和活动家进行宣传鼓动的主要平台。埃及独立后，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妇女杂志激增，如拉比巴·哈什姆的《东方姑娘》、罗斯·哈达德的《新夏娃》、胡达·萨拉维的《埃及

妇女》和多利亚·沙菲克的《尼罗河之女》等。这些杂志的内容多涉及女权运动诸问题，特别是埃及妇女的个人和社会问题。到1938年，埃及共有近200种报纸和期刊，大约65种外文期刊。

1928年，埃及建立了阿拉伯世界最早的广播电台，从而打破了报纸垄断新闻的局面。50年代，埃及也建立了电视台。埃及电台的国际广播以30种语言播出，播音时间一度居世界第三位。但是，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埃及的广播电视节目大量依赖国外进口，其中广播节目有1/3从国外输入，电视节目进口量更占到一半以上。

电影在埃及出现较早。1896年1月，发明不足一个月的电影就在埃及上映。1917年，埃及国内已有18家影院在营业。同年，埃及拍摄了第一部阿拉伯喜剧片《海为什么笑》，此片奠定了埃及作为"阿拉伯电影之母"的地位。1927年，由阿齐扎·爱米尔主演的埃及第一部故事长片《莱拉》上映，影片取得了巨大成功。电影业诱人的利润刺激了民间大量投资，30年代末40年代初埃及全国出现了100余家电影公司，每年生产的故事片约20部。战前的埃及电影多为歌剧片和故事片，偶尔也有历史片和现实主义影片。1952年革命后，埃及电影业更加繁荣，50年代每年摄制多达70部影片。当代埃及电影突破男亲女爱的俗套，现实主义成为主流。如影片《我要一个解决》，触及离婚法和妇女地位问题。《亚历山大里亚为什么》则是一部优秀的反战片，描述这个世界性城市由于1948～1949年的巴勒斯坦战争而在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相互排斥的民族主义之间开始了冲突。1967年和1973年两次阿以战争后，更涌现出了如《小个子》、《咖啡馆》和《子弹仍在我口袋里》等一批与阿以冲突有关的影片。进入80年代后，随着电视剧的异军突

起，电影业逐渐萧条。1989年的电视连续剧《白旗》把各阶层和各种政治色彩的埃及人吸引到了电视机前。该剧表现出埃及民众对现代消费社会的反复无常和种种问题的忧虑。

第十一章　埃及和中国的关系

一、悠久的历史交往

古籍中的友好交往记录

中国和埃及同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历史悠久，遥相呼应。纵有万水千山，也阻挡不住它们的友好交往。中埃两国在经济、贸易、文化、科技、宗教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密切的交流。早在公元前 11 世纪，中国西周的丝绸就经中亚、西亚，辗转运抵埃及。

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城的声名远扬到中国，成为在中国史籍上最早出现的非洲地名，称之为“黎轩”、“黎鞬”、“乌迟散”、“阿荔散”等。但由于路途遥远，交通落后，中埃两国只建立起间接的交往关系。埃及人利用西南季风从红海起锚，直航印度，运回珍贵稀有的中国货。当时消费中国货是埃及上流社会的一种时尚。中国丝绸深受埃及人的青睐，据说，埃及艳后克列奥巴特拉就享用过来自中国的丝绸。

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后，中西交通日益兴盛，使者相望于道，络绎不绝，“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在《史记·大宛列传》中，留下了汉武帝派使臣到黎轩的记载。

据《后汉书》记载，公元120年，海西（即亚历山大城）杂技和魔术演员抵达洛阳，登台表演。他们“能变化吐火，自肢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是十。”

在埃及，最早记载中国的是天文、地理学家托勒密。他在亚历山大城从事科研，在其巨著《地理志》（约成书于150年）一书中称中国为秦尼国或赛里斯国。6世纪时，出生于亚历山大城的希腊富商科斯马斯，在《基督教各国风土记》中，称中国为秦尼策国或秦尼斯塔国。

中国古籍中，最早提到“埃及”的可能是唐朝学者段成式，他在《酉阳杂俎续集》中称埃及为“勿斯离”。1178年，宋朝周去非在《岭外代答》里，沿用了这一名称。对于埃及的译名，以后各朝代有过少许变化：南宋地理、历史学家赵汝适《诸蕃志》作勿斯里，元时称密昔儿；《明史·西域传》叫米昔儿和密思儿。《诸蕃志》约成书于1225年，较为准确地记述了埃及与巴格达的隶属关系，以及埃及的气候特征和尼罗河等情况。但是，也有言过其实之处，如对亚历山大灯塔的描述过于夸张，不足为信。

据中国史书记载，第一个到过埃及的中国人是唐代的学者杜环。他是《通典》作者杜佑的族人。751年，唐玄宗派兵西征石国（今塔什干一带），杜环随军出征。石国向阿拔斯王朝求援，唐军战败，杜环被俘。他随阿拉伯军队西行，云游中东，直到762年才搭商船出红海，横渡印度洋，回到广州。回国后，他将亲身经历和见闻写入《经行记》，其中包括他在埃及、苏丹和摩洛哥等地的经历。但此书已佚，只能在《通典》的引文中找到个别原文，约1 500字。杜环目睹当时埃及医疗技术的发达，他赞道：“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除虫。”

元朝大旅行家汪大渊曾两度浮海远航，遍游印度洋沿岸各地，所至远胜前人。1349年，归国10年后，完成《岛夷志略》，涉及220个国家和地区。他亲眼目睹了“临溪通海”的尼罗河人海口特番里（今杜姆亚特）的富庶，赞叹道：“海口有闸，春月则放水灌田耕种。时雨降则闭闸，或岁旱则开焉。民无水旱之忧，长有丰稔之庆，故号为乐土。”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及其航海事迹，对郑和下西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政治经济交往

中埃直接经济交往可能开始于二三世纪之交（一说公元1世纪），中国人沿丝绸之路到达安息西界的安谷（希拉附近）后，分水陆两路前往埃及。3世纪中叶鱼豢在《魏略》中介绍道：从安谷南行的水路是人红海北上，在乌丹（乌姆克达夫湾的贝仑尼赛）登岸后，沿尼罗河下到亚历山大城；从安谷北上的陆路是到达地中海东部的驴分（土耳其南部的安塔基亚）后，又可分海陆两道。若是改乘船，只需6天就能抵达亚历山大城；如果继续陆路，沿地中海东岸南下也可到埃及。

除陆上丝绸之路外，沟通东西的另一条渠道是海上丝绸之路，又称“瓷器之路”。因为瓷器易碎沉重，不便随身携带，所以向西运输瓷器主要借助平稳载重的船只。《中非交通史初探》（张铁生著）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约始于2世纪下半叶，埃及是通往欧洲的中转站。这条海路是越过印度洋，入红海，在苏伊士港附近登陆，乘骆驼至开罗，顺尼罗河而下至亚历山大城，然后渡过地中海抵达欧洲。《马可·波罗游记》里也有类似的记载。

通过丝绸之路，大约公元2世纪，埃及玻璃制品开始流人中

国，一直延续到五六世纪。20世纪初在河南出土的古玻璃，经光谱分析，断定是2～4世纪的埃及制品。在洛阳发现的古玻璃瓶上，还刻有代表雅典娜头像的奖牌形装饰图样，制作十分精巧，现收藏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

阿拉伯帝国形成后，阿拉伯人基本上控制了自古以来沟通东西方经济贸易的陆上和海上路线，尤其是横跨印度洋的海上贸易，与唐帝国并驾齐驱。两大帝国均奉行对外开放政策，开辟了政治经济交往的新时代。《中阿关系史》统计：在中国史籍里，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到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的148年中，阿拉伯帝国共派使节访华40次。作为阿拉伯帝国的行省，埃及也被卷入对外交往的大潮。在帝国政策的保护下，埃及与中国开展广泛而深人的直接交往。越来越多的埃及人到中国经商、传教，其足迹遍布中国的广、泉、扬、杭诸州。他们贩运各种香料、宝石、珍珠、象牙等到中国出售，然后把中国的丝绸、瓷器、宝剑、麝香、肉桂等运回埃及，进而转销到欧洲，牟取暴利。

从12世纪起，法蒂玛王朝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埃及的转口贸易趋于鼎盛。亚历山大港经常停泊着许多来自欧洲、非洲各地的商船，准备贩运中国的瓷器、丝绸、香料等商品。

13世纪，蒙古帝国崛起，旭烈兀建立的伊尔汗国继续扩张，与埃及马木鲁克王朝发生三次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均以失败而告终。合赞汗之后，伊尔汗国再无力侵略埃及。1323年，蒙古汗派使节访问埃及，赠与纳绥尔苏丹700匹丝绸，标志着双方关系正常化。

蒙古帝国的大一统为对外交往铺平了道路。一方面，“穿越中亚的陆上贸易在蒙古人统治下复兴”，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另一方面，造船和航海技术超过前代，海上贸易繁荣发达。另外，元承宋

制，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伊本·白图泰游记》里就记述了元朝政府对外贸的组织和对外商的管理。因此，形成了“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局面。埃及人就在“回回”之列，在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中起了重要作用。经济实力强大的埃及卡里米商团，在红海和印度洋有几百艘商船，其商业网已经扩展到中国的南部。

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埃及人在中国世居不返。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游览杭州时，就暂住在埃及侨民奥斯曼后裔家。富商奥斯曼，定居杭州后，积极传播伊斯兰教，创建清真寺，设立医院，开展慈善事业，在当地和阿拉伯侨民中颇有名气，阿拉伯侨民甚至称杭州为奥斯曼城。

到了明代，中国与埃及的政治经济交往远远超过了前代。明朝政府采取“怀诸侯”、“柔远人”的政策。据《明史·西域传》记载，永乐年间（1403～1425），埃及马木鲁克王朝派使节访华。明成祖设宴招待，命五日一给酒馔果饵，所经地皆置宴。明英宗正方六年（1441年），埃及苏丹再次遣使节到中国，明英宗赠埃及苏丹“彩币十，表里纱罗各三匹……王妻及使臣递减。”

与此同时，中国海外交通日益发达，东南沿海地区手工业和商业趋于繁荣。指南针的发明，造船技术的进步，航路的开辟其航海经验的积累都为航海事业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海船可远航到埃及。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前后到过亚非30多个国家。从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航海地图——《郑和航海图》得知，船队最远到达埃及的艾得哈布，从而打破了以前朝贡贸易有来无往的被动局面，使中埃交往向前迈进一大步。与此同时，以民间往来为主体的海外贸易，也出现了广阔的前景。

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交往

在中埃两国悠久的历史交往中，影响深远和作用最大的是相互间的文化交往。用今天的话来说，可谓“强强联手”，意义深远，几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

一方面，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在埃及文化的沃土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撒播四方。

丝绸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之一，如前所述，它是中国人民送给埃及人最早最精美的礼物。希腊化时代，中国丝织技术传人埃及后，中国丝成了埃及纺织业的重要原料。据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埃及人已能织出一种混有细小羽毛的绝妙织物，其技术可能是直接从中国或通过波斯传人的。埃及考古学家曾发现了4世纪时用中国生丝织加工的丝织品。5世纪，埃及与拜占庭、叙利亚并列，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丝织业中心。7世纪，中国的蚕种和养蚕技术终于传到埃及，从而使埃及成为除中国之外，世界上最重要的丝绸产地之一。

中国被誉为“瓷器之母”，中国瓷器是继丝绸之后，又一个令埃及人叹为观止的杰作。埃及人称瓷器为“西尼”，意为“中国的”。唐代海路畅通，瓷器远销海外，大约9世纪传人埃及。弗斯塔特是中古时期埃及重要水陆交通枢纽，中国瓷器从这里转销到欧洲和非洲各地。在开罗南郊弗斯塔特遗址曾出土了数以万计中国瓷片，包括唐代的唐三彩、青瓷和白瓷；宋代的影青及龙泉青瓷；元代的莲瓣纹碗、龙珠纹大盘等，还有明清的青花瓷、彩瓷等，品种繁多，质地优良，制作精美，实属罕见。如今，在埃及博物馆里收藏有中国古瓷，是中埃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法蒂玛王朝时期，龙泉窑生产的“梅子青”瓷，大量输入埃及。20世纪80年代，在亚历山大城古罗马剧场附近的罗马澡堂废墟中，发现了许多龙泉窑青瓷碎片，经鉴定是12～14世纪南宋至元代瓷器残片。这一时期，埃及手工业者已学会仿造中国瓷器，最初从形制到花纹一概仿制，后来才有了自己的特色。11世纪上半叶，埃及的制瓷技艺已相当精湛，生产的瓷器“十分美妙和透明，以致一个人能透过瓷器看见自己的手。”在弗斯塔特遗址曾出土了大量的此类碎片，由此可见中国瓷器对埃及影响之大。

中国的四大发明是中国科学技术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而埃及人在四大文明的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将它们传到欧洲。

8世纪中叶，造纸术传到西亚。900年前后，开罗有了生产中国纸的手工作坊。10世纪末，中国先进的造纸术取代了埃及传统的纸草纸工艺。与造纸术紧密相连的是印刷术。在法尤姆出土的10世纪刻印的《古兰经》，说明中国的印刷术已传入埃及。12世纪，埃及人用上了指南针。他们用水上木片托浮磁针，或用磁鱼浮在水面指示方向。中国火药大约在13世纪传入埃及，埃及人把制造火药的主要原料火硝称作“中国雪”。

此外，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知。”虔诚的埃及穆斯林在先知穆罕默德的教导下，不畏路途艰辛，翻越崇山峻岭，战胜狂风恶浪，来到中国求学，并传播伊斯兰教，有力地推动了中埃两国间的文化交往。

另一方面，璀璨夺目的古埃及文化跨越万水千山传入中国，在医学、数学、天文学、建筑、音乐、绘画等方面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3000年,埃及人开始使用一种叫"琼克"的竖立弹拨乐器,公元前2000年传入亚述、波斯等地。西汉年间,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原,叫竖箜篌。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新疆五河流域的塔克西拉和兴都库什山麓的帕格曼,出土了一批古代雕塑,其中最早的是1世纪前后的赫波克拉特青铜像,带有明显的亚历山大城徽记。此外,还有来自亚历山大城的银器浮雕残片。

在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前阶下须弥座束腰部位,刻有狮身人面浮雕。石阶的东、西两侧各有狮身人面雕刻37个,它们形状不一,神态各异:或毛发蓬松,伏卧在地;或仰首怒目,张牙舞爪;或双耳垂肩,爪握莲花,或向前奔驰,回首顾盼。很显然,它们与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据考证,它们原是一座婆罗门寺庙的雕像,后被搬迁至此。由此推测,其传播途径是经海路,自印度传入泉州。

埃及历法对中国历法的改进起了很大的作用。元代郭守敬(1231~1316)集诸家之大成作授时历,其蓝本就是由埃及著名天文学家阿里·伊本·优努斯编著的哈基木天文历表。

二、近现代的埃中交往

晚清中国人笔下的埃及

19世纪中叶以后,埃中两国的地位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埃及不仅继续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藩属,而且日益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俯仰由人,不能自主。中国已不再是"天朝上国",而是一

个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国家，穷于应付西方列强的侵扰，难以顾及拓展对外关系。而且，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也限制了对外交往。尽管如此，埃中两国的交往并未完全中断，人员往来、文化交流和双边贸易仍继续进行。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不断有宗教人士、外交人员和政治家或借赴欧之便，或在朝觐之余，游历埃及，他们的著作中对埃及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多有描述。

1840 年，云南穆斯林马德新赴麦加朝觐，完毕后于 1844 年九、十月间游历埃及，亲眼目睹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马氏在其《朝觐途记》中赞扬穆罕默德·阿里"大智大勇，善治理，其治谜思尔（即埃及），条建树，蓄货殖，各种技艺由浦浪西（今译法兰西）习来，诸凡制造，无求于他国"。又言开罗"穆斯林甚众，朝堂百余所，其至伟丽者车米尔阿兹借（即爱资哈尔清真寺）"。书中述称赞亚历山大"其城极壮丽"，"商贾辐辏"。

1859 年，基督教徒郭连城前往欧洲途经埃及。他在《西游笔略》中写道：苏伊士一带，"地无树木，浑若焦土，天气酷热"；开罗"房屋高耸，树木差池"；亚历山大"在地中海之滨，大西洋之火船货船，多往来此处，生意茂盛"。在埃及期间，得知开罗主教白耳多去世，郭氏"闻尔心酸，因成七律以吊"，"又绝句云：记得先生名久长，为何不得寿而康？多因浊世是逆旅，未若天堂永福乡。"

1865 年，同文馆首批学生之一张德彝作为翻译人员随使出国访问，据其所著《航海述奇》描述，自苏伊士至开罗，"一路皆荒山旷野，沙厚二三尺"，"民房甚少，隔数十里一堆，皆在地中，如穴居然"；而自开罗至亚历山大，则"一路惠风和畅，阡陌盈盈，二麦成熟，六畜繁衍"。书中对埃及人的衣着打扮、风俗习惯等情况以及

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萨拉丁城,描述颇详。

1869 年,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后,赴欧中国人对这条沟通红海与地中海的人工水道多有赞词。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 1876 年赴英上任途经运河,后在其《使西纪程》中对船过运河的情景作了详细描写,并称赞运河管理良好,虽河道仅容一船通过,但秩序井然,无拥塞喧嚷之情。湖南按察使薛福成在其《出使英、法、义(意)、比四国日记》中提到,苏伊士“从前禁止夜行,近有电灯,夜间无需停泊”。又言运河开通后,“苏伊士已成市镇,贸易颇盛”。1905 年,原户部侍郎戴鸿慈与闽浙总督端方等 5 位大臣出使各国,回国途中经过埃及,至塞得港,望见主持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法国人莱塞普斯的铜像,即赞扬他“建此大业,利便无穷,功在欧亚,名不朽矣”。戴氏也许不知埃及人为运河开凿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而谬奖莱塞普斯,但对运河开通意义的评论还是精当的。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逃亡国外,1904 年前往欧洲,途经运河时,他由开凿运河面联想到兴修水利和便利交通,不禁大发感慨:“盖通者,为人身治血脉第一法,亦治国便民兴利第一法。其地塞者,国不治,民不富而弱。其地通者,国治,民富而强。”至运河口,见莱塞普斯铜像,康氏又连声称赞:“美哉禹功,民之不能忘也。”

一些中国游历者对埃及古文字也饶有兴趣。如清末政治家王韬在其《漫游随录》中称埃及古文字“系象形为多,或间有中国蝌蚪籀篆文者”,并据此推断“原始造字之意,六者俱备,原无分于中外也”。薛福成也认为,埃文形状与中国篆书相近,大概为会意象形文字。

清末,中国一些学者还撰写或翻译了有关埃及的著作。

前述马德新在亚历山大游历时，曾凭吊埃及著名诗人穆罕默德·蒲绥里之墓，并将其代表作《卡西达·布尔达》带回国内。后云南回族学者马安礼用诗经体裁把这部诗集译成汉文，1890年于成都出版。译名为《天方诗经》，又名《衮衣颂》。把阿拉伯诗集译成汉文，这在中国尚属首次。

清末政治家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到广州查禁鸦片时，为了解西方情况，请人翻译英国人慕瑞的《地理大全》及其他外文书报，编辑成《四洲志》，于1841年刊行。书内记录了世界五大洲30多国的地理和历史，其中包括埃及，主要叙述它从第18王朝雅赫摩斯二世至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历史、地理、财政、军队、宗教、风俗和物产等情况，尤其赞许穆罕默德·阿里自立为王，学习欧洲的技艺后“队伍雄甲东方”，甚至迫使奥斯曼帝国将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等地割让给埃及。

清末官员徐继畲1844年从美国传教士雅稗理处看到西洋地图集，并与之多次交谈，编成《瀛洲考略》，继而摘录中外有关著作，对各国史地沿革、风土人情及社会变迁等加以论述，于1848年编成《瀛洲志略》。书中对埃及地理、历史、人口、军队和物产等均有记述，尤对尼罗河与埃及农业的关系记述较详。作者称尼罗河“北流人地中海，两岸涂泥，淤为良田。河每岁一涨，且粪且溉，涨甚则灾，中则稔，故近河之地，阡陌云连，户口稠密。而去河稍远，则平沙浩浩，旷无人烟，地少阴雨，沙漠薰灼，炎气逼人”，下埃及“临地中海，坦阔膏腴，支河交络，为埃及上壤”。

此外，日本人的《埃及近代史》和美国人的《埃及惨状》等著作也于清末翻译出版。

许多进步的中国人士不仅全面地介绍埃及，也对埃及在19世

纪下半叶沦为英国殖民地深表关切和同情，并希望中国引为鉴戒，免蹈覆辙。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逃亡国外，赴欧途中经苏伊士，感慨赋诗曰："莫令形胜地，再见血模糊。"曾任京师大学堂地理总教习、后任驻英公使刘瑞芬随员的邹代钧，在其《西征纪程》中谈及1878年埃及请英人威尔逊和法人布里尼叶代为理财，"而利权为英法人所掌"之事，断定"吾华之用赫德(英国人，1861～1911年管理清廷税务40年，屡次干涉中国内政与外交)治税务为非计"，并感叹"吾华以声名文物之多，地大物博之盛，蹈其辙而不顾，此漆室所以长吟，贾生所以痛哭也"。

1906年，戴鸿慈回国，与前往日本的埃及军官同船。后者与戴氏谈论埃及形势时，沉痛万分，谓"埃及为英人所制，不能自拔，言之慨然"，并劝中国在谋自强之法时，"不可专信欧人，语甚痛切"。戴氏联想到当时中国的处境，深以为然，故"书志之，以警吾国民"。同行的闽浙总督端方也感叹"埃及国势式微，受役外族。文明古国不能自强，至于如此"。

埃中官方关系的建立

20世纪20年代以前，埃及与中国之间的交往基本上仅限于民间，不存在官方关系。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和1922年埃及独立后，尽管两国仍未完全摆脱列强的控制，但双方都谋求在相互之间建立现代的、双方独立平等的外交关系。因此，从30年代起，埃及与中国之间有了官方来往。

1930年6、7月间，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与埃及驻英使馆代办马默洽谈中埃友好通商条约，双方同意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1931年长江流域遭受水灾，埃及政府派遣两位医生来华救治灾

民。十年后埃及发生霍乱，中国政府立即用飞机运去霍乱针剂。抗日战争时期，埃及慈善组织曾捐助金钱，作为中国受伤官兵的医药费。经过十多年的相互接触与了解，两国于1942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43年11月22～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会议期间，蒋介石未能与因病住院的埃及国王会面，但派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代表他会见埃及宫廷大臣，对国王和王后表示慰问。埃及各报对中国参加三大国会议予以积极评价，并预期战后中国将在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947年7月，埃及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英埃条约纠纷案，要求英国全部撤走驻埃军队。中国代表不顾英美反对，对埃及提案表示支持。

1948年6月21日，中国的林甫号巡洋舰和重庆号驱逐舰由英国驶往南京，途经塞得港，对埃及进行了礼节性访问。埃及国王令运河区市长贾马尔·法克瑞亲自主持宴会，招待中国官兵。

1948年9月21日，埃及驻英大使卡米勒·阿卜杜勒·拉希姆拜会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就中埃关系问题进行磋商。拉希姆谈到，中国有不少穆斯林学生在埃及学习，而埃及却从未派过一名学生去中国。他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加强两国文化关系。

1948年9月28日，中埃双方决定把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

日益密切的宗教文化交流

在中埃两国交往中，伊斯兰教历来起着十分重要的纽带作用。进入20世纪后，由于海外交通发达，以伊斯兰教为特色的中埃文化交流进一步增多。中国西北、上海、北京、天津、成都、南京等地

不断有回民学者到埃及求学。1920年前后，上海的哈德成阿訇去麦加朝觐，在埃及游学多年，1924年归国，次年与马刚侯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回教学会”。1928年，他又与曾游学埃及的南京阿訇达浦生等创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北京阿訇马松亭在1932年和1936年两次去麦加朝觐，事后到埃及等伊斯兰国家考察伊斯兰教育和文化。他第一次去埃及时，曾谒见国王福阿德一世，请派两名教授到中国教阿拉伯文。第二次去时，他会见爱资哈尔大学校长麻洛格，获准在该校增加中国留学生名额。他还曾谒见国王法鲁克，请求给予20名中国学生以补助，并帮助筹办福阿德图书馆。法鲁克国王同意以其私人资金津贴这20名中国留学生，并购赠图书441部(每部多达20余册)，以支持其在华创办福阿德图书馆。

这一时期，来自埃及的宗教典籍被更多地引进到中国。天津王静斋阿訇1922年进入爱资哈尔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时带回阿拉伯文经典上百部，后在天津创办中国阿拉伯大学，并从事《古兰经》译释。埃及近代著名思想家、宗教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穆罕默德·阿布杜的名著《教义学纲要》和《伊斯兰教》两书，由回民学者马坚教授译成汉文，先后于1934年和1936年在上海出版。15世纪的埃及学者贾拉尔·苏优替所著的《古兰经注》是中国各清真寺宗教学校通用的教本。其他教本也主要是埃及出版的。

30年代，中埃教育交流十分活跃。1931年，上海中国回教学会和云南回教俱进会派遣第一批公费留学生5名，到爱资哈尔大学学习阿拉伯语文、伊斯兰教教义和教律。当时云南明德中学自修部主任沙儒诚竟辞去职务，自费护送这批学生前往。爱资哈尔大学立即成立中国学生部，聘沙氏为部长。此后至1938年，中国回族和维吾尔族学生先后有6批到埃及留学，他们在埃及大受欢

迎。尤其第6批16人，因是由国王法鲁克资助，以"法鲁克留学生团"的名义去的，埃方更给予高规格的接待。热心伊斯兰文化的北京《月华》旬刊主编赵斌还借远送留学生赴开罗之机，在开罗购买了一套阿文铅字，万里迢迢运回国内，解决了阿文活字铅印问题。30年代中国的留埃学生回国后，多从事阿语教学和翻译工作，其中著名者如马坚、纳忠等。

1933年，爱资哈尔大学曾派小学部的两位教员到北平成达师范学校教授阿拉伯语文和宗教学科，并且以埃及国王福阿德的名义赠送大批阿文图书。1941～1942年，中国的庞士谦阿訇也在爱资哈尔大学讲授过两年汉文。

同一时期，中埃还开展了其他方面的文化交流。埃及水利发达，中国水利部在抗战期间曾派工程师粟宗嵩到埃及实习，为期三年。埃及历史悠久，古文物众多，考古工作也很有成就。中国考古学家夏鼐在伦敦获得埃及考古学博士后，曾去开罗博物馆从事考古工作，作实地研究。1948年2月，李馨敏女士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钢琴独奏，使馆邀请埃及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和外交团成员300余人出席，这是中国女音乐家在埃及首次演奏，留下极好印象。

三、当代埃及与中国

外交关系的重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埃及报刊普遍主张埃及应仿效印度和英国，立即承认新中国，但法鲁克王朝的埃及政府对承认

新中国还是承认已逃往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举棋不定。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在西方大国的压力下,埃及最终在对华政策上追随了西方。

1952年"七·二三"革命后,埃及国内要求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呼声很高。如华夫脱党的《埃及人报》和《消息报》都发表社论或文章,主张埃及应面对现实,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为埃及开辟一个新市场。据首任埃及总统纳吉布透露,实际上埃及政府曾作出承认新中国的决定,但因受到美国的警告而搁浅。

1954年12月,埃及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向中国非正式试探,可否在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向中国派驻总领事。周恩来总理答称,这种办法等于承认"两个中国",中国不能接受,但可考虑接受埃及派贸易代表以半官方身份常驻中国。

1955年4月万隆会议的召开为中埃发展关系带来契机。纳赛尔在赴万隆途中顺便访问印度和缅甸,在仰光他会见了周恩来,提出购买中国武器的要求。周恩来表示,中国无多余武器出售,建议埃及向苏联购买,并乐意代为联系。万隆会议上,纳赛尔对中国的外交原则有了更多了解,并同周恩来总理结下个人友谊。两人商定,两国将从贸易开始,逐步实现关系正常化。

万隆会议后,中埃开始频繁交往。1955年5月,埃及宗教事务部部长艾哈迈德·巴库里正式访问中国,双方就政治、贸易、文化、宗教等关系进行了广泛讨论,并签订了中埃文化合作会谈纪要。中国领导人在接见巴库里时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支持埃及和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侵略的正义斗争。埃及代表团曾参观中国穆斯林居民区和清真寺,并赠送中国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穷人各1000英镑。巴库里回开罗后发表了《人民中国见闻》一文,指出中

国伊斯兰教徒拥护毛泽东，他们的受教育权和宗教信仰权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这次访问，有助于埃及和阿拉伯人民消除因西方对新中国的歪曲宣传所造成的疑虑。

同年8月，埃及工商部部长穆罕默德·努赛尔率贸易代表团访华，双方签订了贸易协定及议定书。据此，中国将在继1954年和1955年从埃及进口3 637万美元棉花和棉纱之后，1956年再购买1 000万英镑埃棉，其中现汇支付590万英镑。在西方大国因埃及坚持反帝、反殖、维护民族独立主权而大量减少购买埃及棉花，使埃棉严重滞销的情况下，这笔贸易对埃及是一种巨大支持。1956年初，两国正式互设商务代表处。

1956年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兼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鲍尔汉率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访问埃及，受到热烈欢迎。双方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同年8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达浦生率领的朝觐团，应埃及宗教事务部长巴库里的邀请，到开罗访问，受到纳赛尔总统的接见。

贸易和文化关系的发展，推动了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1956年5月，埃及内阁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撤回对台湾“政府”的承认。5月30日，中埃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级外交代表。中埃建交是中国与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大突破，此后，叙利亚、也门、伊拉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突尼斯、毛里塔尼亚等一系列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支持埃及人民的反帝反霸斗争

中国人民始终真诚支持埃及人民争取独立、自由和捍卫国家

主权的正义斗争。1956年7月26日，埃及为打破美、英对它的政治讹诈和经济控制，宣布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8月15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指出：埃及此举“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主权和独立而采取的正义行动，不论从法律上或是道义上来说，埃及这一行动都是完全正当的。”针对英法政府发表的武力威胁声明，中国政府警告，任何武力威胁和干涉的行为，必将引起亚非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对英法决不会有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表明了支持埃及的态度，并赞扬“纳赛尔总统是亚非地区的民族英雄”。

英、法伙同以色列出兵入侵埃及后，中国政府当即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法两国政府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动，坚决支持埃及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神圣斗争”，要求英法立即停止对埃及的侵略，就苏伊士运河问题进行和平协商。11月3日，北京40多万群众集会，表示中国人民将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起，坚决制止英法对埃及的武装挑衅。中国政府还赠送2 000万瑞士法郎的现金给埃及，以支持埃及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中国红十字会也向埃及红新月会捐款10万元人民币，用于购买医药物资。

1967年“六·五”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埃及、叙利亚等国的武装侵略，并向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各提供了一笔紧急援助。北京百万群众连续三天举行游行，对阿拉伯国家人民的斗争表示坚定的支持。

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为收复失地而主动向以色列发动进攻，萨达特总统希望中国予以支持。11日，周恩来总理分别向萨达特总统和阿萨德总统发去支持电，并通知两国驻华大

使，中国将向两国各提供一笔现汇和一定数量的小麦援助。

1976年3月，埃及为摆脱苏联对它的政治和军事控制，宣布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中国外长乔冠华在会见埃及驻华大使萨拉哈丁·阿卜德时，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坚决支持埃及的这一正义行动，称赞这是萨达特总统和埃及人民为维护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所采取的“果敢行动”。鉴于苏联经常以不提供武器零配件作为向埃及施压的手段，中国还向埃及提供了一些零配件。埃及领导人视中国援助如雪中送炭，多次表示感谢。

埃及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

埃及与中国建交后，始终支持中国实现祖国统一，主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1958年9月纳赛尔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占领台湾是对中国的直接侵略，表示埃及和阿拉伯各国人民把中国人民的斗争看做他们自己的斗争。

1960年9月27日，纳赛尔总统在联大讲话，要求联合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敞开大门。他强调说，埃及人民简直不能想像，联合国竟对地球1/4的居民关闭着。1965年11月末，纳赛尔又在埃及议会讲话中表示：“我们相信，继续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是对他们、对联合国及对世界和平极端明显的错误。”

近年来，台湾当局一再鼓吹台独，国际右翼势力也一再玩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对此，埃及领导人多次表示，埃及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

香港回归前夕，埃及总理卡迈勒·詹祖里在与李鹏总理会谈中表示，埃及高兴地看到香港即将在“一国两制”的方针下回归祖国。

6月18日，埃及副总理、埃中友协主席尤素福·瓦利在对中国记者谈及西方一些新闻媒介预言香港回归后其地位将受到影响时指出："事实将逐渐证明，这种预测是荒谬的。"6月下旬，开罗大学政经学院院长阿里丁·希勒里博士告诉中国记者：如今埃及人关注香港，就像当年中国人关注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一样，他认为"这是了不起的历史性事件"。香港回归后，詹祖里总理电贺李鹏总理，认为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中国的范围，埃及人民与中国人民一样感到欢欣鼓舞。因为这是真理的胜利。"

埃及也支持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反对西方某些国家利用人权干涉中国内政。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政治风波过后，西方国家以中国侵犯人权为借口，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埃及立场鲜明地反对西方的做法。总统穆巴拉克不顾国际上的种种谣传和风言风语，于1990年5月亲自访华，以实际行动表明埃及是支持中国的，中国是不会被孤立的。在1996年和1997年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埃及作为人权委员会成员国，两次投票支持中国的动议，即主张对某些国家的反华提案"不采取行动"。

拓展经贸往来

1950年，中埃之间就有民间贸易往来，贸易额为313万美元。1953年4月，埃及委托商人昆地访华，达成中国购买埃及棉花的协议，当年双方贸易额达1 040万美元，其中中国出口63万美元，进口977万美元。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期间，中埃开始商谈两国贸易问题，于8月签订了两国政府之间第一个为期三年的贸易协定。1956年初，中、埃互设商务代表处，同时中国在开罗举办大规模商品展览会。

中埃建交后，两国贸易交往增多，贸易额稳定上升。1958年12月，双方签订第二个政府间三年贸易协定和支付协定。1959年，两国贸易额达5 783万美元，比1956年的3 773万美元增长53%。

60年代中埃贸易继续发展，但贸易额波动较大。1965年两国贸易额为7 752万美元，1969年急剧降至2 646万美元。主要原因是，埃及经历了“六·五”战争，中国从1966年起开始文化大革命，两国经济发展都出现严重问题。

70年代后期，两国贸易关系重新加强。1977年3月双方签订了两个易货贸易换函。1979年双方贸易达到了1.2592亿美元。从1985年起，两国开始把记账贸易改为现汇贸易。但由于双方有关外贸公司一时不能适应，以及中国进口埃棉锐减、国际油价下跌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中埃贸易额大幅度下降，1985年降至4 427万美元。后经双方共同努力，情况迅速好转，1986、1987两年连续增长，1988年达到1.65亿美元。

90年代是中埃贸易大发展时期。1992年6月，两国成立经贸混合委员会，并举行了首次会议。1993年11月，天津市和塞得港省达成在塞得港设立长期的出口产品展厅的协议。1995年3月和1996年10月，中埃经贸混合委员会举第二、第三届会议，两个会议纪要都认为中埃贸易尚有潜力，应在互利平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贸易和合作领域。1996年中埃贸易额达到4.0792亿美元，1998年进一步增到6.07亿美元。埃及成为中国在非洲最大贸易伙伴之一。

在发展贸易的同时，中埃也展开了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1984年，中国承包了埃及“十月六日城”1 000套住宅工程，由于速

度快，质量好，受到穆巴拉克总统的高度评价。1986～1989年，中国援助埃及建造了开罗国际会议中心。该中心把埃及古建筑的粗犷纯朴和中国建筑艺术的玲珑精美糅合起来，造型别具一格，雄伟壮观，富丽堂皇，为中东地区最大的国际会议大厦，是中国对外援建的最大公共建筑项目。穆巴拉克赞扬说，这座雄伟大厦如此完美地建成，是中埃两国人民合作的硕果，中埃友谊的象征。

1994年穆巴拉克访华时希望中国在埃及自由工业区建立大型商品分拨中心，中国有关公司据此在塞得港创办了一个保税仓库，并在亚历山大自由区建立了一个分拨中心。

1993年3月，中埃签署科技合作协定和中国向埃及"穆巴拉克科学城"赠款300万人民币的换文。根据协定，中埃两国科学技术人员将在人造纤维、有机硅材料、等离子物理、激光和岩石矿石化学分析等领域开展共同研究和合作。

扩大文化交流

中国和埃及都是具有悠久文化的国家，自古以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一直继续不断。50年代以来，文化交流更是日益扩大。1955年5月，双方签订《文化合作会谈纪要》，1956年4月又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此后，两国在文化、教育、卫生、体育、艺术、宗教、法律、新闻、广播、影视、考古等领域展开广泛交流与合作。

阿拉伯文学一直为中国人民所喜爱，建交以来，中国翻译出版了埃及的《古代故事》、《短篇小说集》和《现代短篇小说集》等作品。在埃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夏衍、艾芜、沈从文等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某些作品被译成阿拉伯文出版。

1956年上半年，中国出访中东和非洲国家的第一个艺术团抵达开罗，受到埃及方面的热烈欢迎和友好接待。1989年12月，中国艺术团在访问埃及期间，与埃及艺术家在中国援建的开罗国际会议中心大厅同台演出。中国不仅多次派出艺术团访问埃及，还为埃及培训杂技、舞蹈演员。

1956年10月，埃及在华举行艺术品展览，周恩来总理亲自为展览会剪彩。展品有绘画、织绣、雕塑、陶瓷等共400余件。这次展览，增进了中国人民对埃及艺术的了解。

苏伊士战争后，中国电影《鸡毛信》曾在埃及开罗等大城市公开放映，轰动一时。反映中世纪阿拉伯民族英雄萨拉丁反抗十字军东侵事迹的埃及电影《萨拉丁》来华放映时，也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1992年，开罗举行第16届开罗国际电影节，48个国家的180部影片参加展评。在正式参赛的14部影片中，中国影片《留守女士》被评为最佳影片，荣获"金金字塔奖"，该片女主角演员修晶双获最佳女主角奖。

教育是中埃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之一。1956年中埃建交后即开始互派留学生。埃及艺术家黑白和图玛德夫妇，就是1956年埃及第一批来华的留学生。他们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中国画和版画，曾师从著名画家李可染先生。留华五年，二人不仅学得一口流利的中国普通话，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厚感情，1961年曾回中国访问，至今家中陈设还是传统的中国样式：有整套的红木家具、宫灯、文房四宝、中国字画等，还挂有李可染、吴作人、叶浅予、黄永玉、黄胄等大师的真迹。中国在埃及的公派留学生通常每年为数十名，此外还有不少自费留学人员，如1989年仅在爱资哈尔大学就有34名，主要学习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

中埃教育交流的成果从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所取得的成就可见一斑。该系现有教师30名，其中中国教师6名，在校学生250多名，开设语音、语言、文章阅读、文学史、文学和文学评论、笔译、同声传译、翻译理论等17门课程。学位论文题相当广泛，有《汉语动词的词态》、《北京语音的音节》、《汉语中之同义现象》一类纯语文的研究，也有对中国现代作家及作品的研究，如《鲁迅小说中的现实主义》、《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杨沫与〈青春之歌〉》等。至1997年底，该系已培养出450多名毕业生，其中20人获博士学位，15人获硕士学位，他们多在各行各业中从事发展中埃友谊的工作。例如，在该系获得博士学位的纳赛尔·阿卜杜勒·阿勒毕业后专门从事翻译工作，已翻译出版了巴金的小说《雾》、张贤亮的小说《土牢情话》，并参与翻译和编写的《阿拉伯古代文学》和《埃及名胜古迹系列》等书。

携手跨进新世纪

中埃同为文明古国，近代都遭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两国人民都进行了漫长曲折、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当今世界上，两国同属第三世界，都面临着改革发展、振兴国家的重任。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共同的发展目标，奠定了两国关系的坚定基础。在过去的岁月里，两国人民相互支持、相互鼓励、相互帮助，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从纳赛尔、萨达特到穆巴拉克三任埃及总统，与中国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人，都始终保持着友好关系。

世纪之交，随着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和在国际政治中影响力的显著增强，埃及更加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希望中国作为安理

会常任理事在解决中东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也希望中国改革经验对埃及的经济发展有所借鉴。埃及作为中东大国，同样受到中国的高度重视，希望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更加巩固和发展。近年来，两国高层互访不断，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都曾访问埃及，而穆巴拉克已8次访问中国。1999年4月5~9日，穆巴拉克与江泽民主席会谈后，确定了两国面向21世纪的战略合作关系。2001年1月22~26日穆巴拉克访华时，再次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了战略合作问题，并就国际形势达成广泛共识。可以预见，中埃之间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将在新世纪步入更高的阶段。

编后记

一

埃及国家通史是一个时间久远、空间辽阔和富有文明特征内涵的研究领域。

埃及国家通史是一个历史上形成的发展整体。它的整体性是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相结合而构成的有机历史整体。它既不是埃及国家断代史简单相加，也不是埃及国家专门史的一般性综合。它应当有一条"通识"的理论线索贯通其中。在我看来，这条理论线索就是同一文明之内和不同文明之间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的经纬交织的文明交往论。

埃及国家通史中最了不起的结果就是"交往"。"交往"造就了埃及悠久多变的文明发展史。我不能离开"交往"去讨论埃及国家通史，也不能离开埃及国家通史去谈"交往"，一定要把文明交往与埃及国家通史联系起来，考察其中的变迁。埃及文明的生命在于"交往"，埃及"交往"的价值在于文明。古埃及在地缘上的特殊地位，它处于亚洲和非洲的交合点，通过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环岛区把两个大洲联系起来，这种地理上的有利于相互交往的条件，导致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两大地区最先跨入人类文明社会之中。埃及早

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出现了人类最早的城市国家。这是古埃及人历经漫长的蒙昧和野蛮时代之后，登上了人类社会的第三个阶梯。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构成了古埃及文明社会的物质基础，而国家则是古埃及文明社会的最重要的标志。

古埃及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与城市国家的变迁，都与交往直接相关。交往是农耕文明和城市国家形成的前提交件。古埃及人定居下来以后，"互相交往"成为强大的社会需要，因为只有"互相交往"才能使社会组织不断扩大，才能由氏族组织转变为最初的国家。交往是生产的前提，而交往的形式是由生产决定的，但交往要突破原始氏族自身的闭塞性，还受到地理环境、气候及迁徙等条件的制约。古埃及的情况就是这样：公元前4000年左右，大于旱使北非植物消失，广大地区几乎变成一片沙漠，游牧和狩猎部落开始定居在三角洲和尼罗河流域，有利的地理条件加快了向农耕经济的过渡。这就是古埃及氏族社会发展到尼罗河沿岸出现城市国家的情况，它说明了交往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在谈到古埃及农耕文明和城市国家问题的时候，人们都会联想起"农耕"和"城市"这两个词，因为这两个词曾经是文明学研究者从语义学上寻找"文化"和"文明"源头的关键词。顾名思义，拉丁文 Colere, Cultus, Cultivate，可由原义"耕作土地"、"耕作"追到"文化"的"农耕"之源；而拉丁文 Civis, Civatas, Civilidas 可由原义的"城市居民"、"社会"追到"文明"的"城市、"国家"之根。这样做，自然有其必要性。然而，对"农耕"、"城市"的字面意义而进一步深究其深层意义，实际上都蕴涵着人类基本实践活动的两种互动能力——生产力和交往力。

"文化"虽语源于农耕生产，实质上意味着耕作土地的生产力，

其中包含着对人作为生产者的兴趣、精神、智能的培养，实际上是社会的交往力。"文明"语源于"城市居民"、"社会"和"国家"，然而它意味着人在城市、国家中和睦相处的能力，它从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体现了新社会集团在城市、国家中存在与发展的生产力与交往力。农耕以农村聚落形态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使人类逐步地、部分地摆脱了采集渔猎文化所从属的自然生态系的约束；而城市与农村的分工和对立，促使国家机关成为必要，城市的城楼已高耸人文明时代了。古文化—古城市—古国家，人类社会以这种递进方式，显示着生产力发展和交往力变迁的社会关系。

人类的文明时代就是人类社会关系在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制度交往和生态交往广泛发展的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交往"(Verkehr)这个术语作了广泛的应用。它包括了个人、社会团体、许多国家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他们认为，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是任何交往的基础。他们在多次提到生产和交往、生产力和交往关系时，使用了"交往形式"(Verkehrsform)、"交往方式"(Verkehrsweise)、"交往关系"(Verkehrsverhältnisse)等术语，实际上就是指广泛的人类社会关系。[①]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生产关

---

① 大约在同时，马克思在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的信中，明确地指出了历史联系、生产力、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这些与"交往"有关的问题。他写道："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了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经是惟一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8页)

系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分离出来，目的只是强调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基本关系。但是他重视经济关系并不意味着轻视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尤其精神交往和政治交往，更不是让生产关系脱离文明交往这个社会关系的整体。

从“农耕”、“城市”而引申出来的“文化”、“文明”的深层涵义——生产力和其相伴随的交往力，都是人类区别于一切动物乃至整个自然界的思维能力和主观能动性。其实，生产力也是人类交往力见之于生产的能力。这里用得上《易经》的一段对“文明”的解释：“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栖息于人文，文明是人的交往能力和主观能动性见之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类自身三种社会关系的人文形态。《易经》这段话以人文为主线，来说人用观察自然而考察其变化，观察人事用教化完善社会，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交往”的历史作用。文明的真谛在于人文精神，我在《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中已有较多论述，这里不再重复。在这里我只是说明，对埃及这样一个文明古国的历史，从文明交往的视角进行研究，实在是太必要了。

二

《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虽为雷钰（古代部分）和苏瑞林（近现代部分）二人分工合著，但在撰写的“通识”上，在用文明交往论来贯通埃及古代、近代、现代史方面，却做到了“共识”。因此，在我通审时，发现现在的书稿，在共同的历史和理论问题上的结合和联系上，都同《卷首叙意》的要求相符。

文明交往具体到分类上，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有物质、精神、制度、生态，有内部、外部，等等。文明的诞生、发展、衰落、消失、分解、转化或复兴，文明的类型、模式、特征，也需要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联系和影响而发现其不同面貌的根源。怎样具体分析埃及通史中文明交往的具体情况呢?

一般认为，古埃及文明是悠久的具有 5 000 年的历史，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古埃及文明确实古老，它曾在 5 000 多年前就进入文明时代。但是，它是一个消失了的古文明。古埃及文明消失后几个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进入了今日的埃及地区。两者之间的一脉传承关系，至今还没有足够的资料证明其延续性。这种情况与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相同，与古印度文明相似，而与绵延至今的中华文明不同。各国历史学家争文明之长短，有的说古埃及文明之悠久为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有的说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持续发展最长的文明。其实，文明历史的时间的长与短，不必自豪或自卑，作为学者，也不必去强求 5 000 年。研究历史的人，要使人明智，首先要使自己明智。他们的职责是实事求是探求各个文明在交往中表现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深究其形成的原因。历史长的文明的衰落和消失可引起警戒，历史短而新生文明也正值得学习，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撇开关于“文明”的诸多观点，就最基本概念而言，文明时代的标志是国家的出现。国家体制发展的特点，历来是文明交往过程中关键因素。文明的延续长短，同国家这个政治和制度文明最重要的内容密切相关。国家是政治交往的主要机制，特别是制度文明的集中表现，它的成熟程度、完备化、组织性、持续性以及主体与更新的关系，决定着文明的兴衰存亡。古埃及的国家体制在漫长

的法老时代中，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具有哪些特点？它在发展中经历了哪些阶段？特别是埃及的法老专制的国家体制在文明的内部和外部政治交往中，如何适应变化而存、而兴，如何不适应而衰、而亡，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大课题。古埃及文明中的政治文明，最值得注意，是它的存在和消亡的真正有意义的问题。这里有三个与法老政治文明交往的大事件。一是与波斯政治文明的交往，二是与希腊政治文明的交往，三是与罗马政治文明的交往。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是埃及法老文明面临的三次最严峻的挑战。亚述帝国的入侵，当然是挑战，但其结果是复兴埃及文明。波斯帝国的多次挑战，动摇了法老政治文明。希腊文明使埃及成为托勒密埃及，罗马文明则使埃及变为基督教埃及。随着法老国家的消亡，古埃及文明就消失了。

到4世纪中期，埃及已成主要的基督教国家了。这是埃及文明与西方文明第一次大交往的最后结果。然而埃及基督国家却依附于罗马帝国和以后的拜占庭帝国，这种政治上的依附性，决定了埃及的历史命运。

埃及国家通史可以有多种分期，因为它的文明交往太纷繁多变了。但是，从最宏观角度分析，它就是两大时期：前伊斯兰文明时期和伊斯兰文明时期。在这两大时期内，还可分若干小阶段。综观埃及国家通史，其交往固然以政治交往为最重要的前提，而经济发展则是它的最重要基础，总括其交往变迁轨迹，中心点或基线又集中表现内化和外化两个方面。法老时代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已显露出内化和外化的灿烂光辉。希腊化、特别是罗马化，在托勒密王朝、罗马及后来的拜占庭统治时期，尽管埃及人还是埃及人，但其文化已经被基督教化了。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总是当时

在国家中处于统治地位集团的文化为主导，埃及国家通史的各时期也不例外。阿拉伯—伊斯兰帝国时期是埃及国家通史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埃及经过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的结合，而进入对埃及历史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时期。从阿拉伯人 639 年进入埃及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就一直深深影响着埃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伊斯兰化时期，随着古典伊斯兰时代（639 ~ 1798）之后，埃及面临的西方的挑战，首先是拿破仑军队的入侵，后来是英国的占领。这不仅是强势军事和政治的挑战，而且是文化的挑战。法国占领为时不长，但开创了现代埃及学的研究先河和开始了穆罕默德·阿里的欧化改革。在英国占领时期（1882 ~ 1922），西方文明对埃及的挑战，长期丧失政治独立和不平等交往的加剧，使埃及从伊斯兰改革运动和世俗民族主义运动两个方面进行了持续性的应战，终于在独立后走上 30 年不成功的立宪政治运动。纳赛尔的民族主义革命和阿拉伯式社会主义实验最终仍未成功，但开创了阿拉伯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前奏。埃及的现代化真正迈出自己的步伐始于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萨达特开始了埃及的全方位转型（1970 ~ 1981）；穆巴拉克开始了现代埃及的稳定与发展。萨达特 1978 年签订的埃以和约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第一个和平条约，从而结束了两国之间长达 30 年之久的冲突，而化解冲突的美国总统卡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继萨达特之后，穆巴拉克作为阿拉伯世界惟一同以色列建交的国家领袖，致力于为巴以冲突筑构和平之桥。这使人想起了古埃及第 19 王朝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国王哈吐什里三世在公元前 1284 年签订的孟斐斯和约。这个早在 3 200 多年前签署的和约，是人类有文字记载的

第一个和平条约。它之所以被引为历史遐思，是因为战争与和平在中东漫长的文明交往史中，一直是最沉重的话题。

三

埃及在文明交往过程中，曾遇到多次严峻的挑战。然而，就其严峻程度而言，没有哪一次挑战可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全球化相比拟。全球性的金融、科技和信息的迅猛发展，把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球化给埃及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念和文化生活等方面带来越来越深刻的相互依赖和彼此冲突。埃及有百分之三十以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现实，显示出全球化带来贫富两极分化的负面影响。经济和金融安全得不到保障，会影响到埃及国家经济独立和主权完整。随着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销蚀侵袭，随着地区冲突、全球恐怖主义和环境恶化等问题的尖锐化，埃及作为中东大国的地位，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的全球化，但对于埃及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却不限于经济、技术或生产结构的更替换代，而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大变动问题。在我们的观察视野中，出现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同时展现的浪潮：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和伊斯兰复兴浪潮。这两股浪潮互为推波助澜的重合现象，是伊斯兰世界的独特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政治文化现象，是全球化在伊斯兰世界交往过程中外化和内化的反映。作为伊斯兰复兴运动重要发源地之一的埃及，这种体现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变化更为典型。埃及有长期的、完整的现代化的痛苦体验。它在全球化大潮中，对曲折的经历和失落，也许比其他阿拉伯国家更能理

性地反思"欧化"、"苏化"、"美国化"、"阿拉伯化"和"埃及化"的现代化的漫长而迂回之路。

各种复杂社会成分都卷人伊斯兰复兴浪潮之中。20多年的汹涌浪潮,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伊斯兰组织因极端思潮的泛滥而走上极端道路。许多极端分子袭击外国游客、制造爆炸事件,不利国家安全和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恐怖活动升级为广泛刺杀政府高级官员,甚至导致许多地区的军事对抗。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如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组织(Gamaa)和圣战组织,都有广泛的国外联系。一些极端主义组织利用政府私有化改革中的问题,在不满的工人中找到了支持者,使工潮成为国内严重的政治问题。

恐怖主义不仅仅表现于政治层面。在文化领域中也出现了恐怖主义现象。极端思想冲击着埃及以及阿拉伯文化界。最典型的事件是对埃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哈福兹的恐怖主义袭击。1994年10月,一个20岁的凶手向走下汽车的马哈福兹连刺两刀。这位83岁的老人虽保住了生命,但这种以"叛教"罪名的杀一儆百行为却震动了阿拉伯文坛。后来揭露的极端主义的黑名单中,除了马哈福兹名列榜首之外,要谋杀的还有30位埃及文学家、思想家和60名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学者和作家。被发现的宣传极端主义思想的录音磁带中,也有一批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学者、杂志主编、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被指控为"叛教",并号召虔诚的穆斯林"用所有的武器与之作战"。首先被指控的仍是以马哈福兹为首的"存在主义作家"。回忆起马哈福兹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上埃及的伊斯兰组织要求将他移交宗教法庭,以及1985年5月埃及道德法庭宣布《一千零一夜》为"淫书"而勒令查收、销毁并对出版

商课以罚款等事件，可以看出文化领域的恐怖主义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穆巴拉克解决埃及极端主义问题时，采取了标本综合的治理办法，并把它置于应对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1996年4月7日的法国《费加罗报》以《埃及：回到伊斯兰教的源头》为题的报道中写道："在穆巴拉克发动了'以伊斯兰教的名义打击恐怖组织'的斗争之后，他就阻止了恐怖组织同宗教的联系。他还同最保守的宗教头面人物，同爱资哈尔清真寺和爱资哈尔大学的头面人物实现了和解。"同时，穆巴拉克调整了私有制改革计划，采取了有利于工人的措施，切断了极端分子同工人的联系。同时对暴乱分子实行严厉镇压，并派特工去国外搜捕恐怖分子。这些治理方法取得了效果，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2年6月29日用《埃及伊斯兰教更温和、更善良》的标题，来称赞"埃及中产阶级对伊斯兰教的更新"。该报说，"现在连埃及最激进的伊斯兰组织的领导人都呼吁放弃暴力。他们说，恐怖主义很糟糕，不是因为它疏远主流社会，而是根据伊斯兰法，它本身就是错误的。"目前，在伊斯兰复兴运动发展比较平稳的情况下，进一步做好协调和引导工作，使之既有利全球化交往、又能维护宗教文化传统，因而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应对全球化挑战最重要的是继续推行经济改革，加速现代化建设；同时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阿拉伯地区和国际经济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并积极采取措施，以减少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穆巴拉克总统在2000年12月20日签署的实现工业和科技现代化的共和国令，是一项主动应对全球化的行动。它决定在21世纪头10年投资100多亿美元来改造旧工业设备、提高纺织、食品、皮革三大传统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其中计划

在未来10年内每年增加250亿埃镑的教育预算、准备投资1 200亿埃镑兴建27 000所中小学,也是有远见之举。从20世纪90年代初埃及就将信息通讯技术作为国家优先发展对象,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高科技产业,这都有利于埃及成功地应对全球化。

2001年前夕,穆巴拉克在向全国的讲话中,表示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时代,埃及决不能回避。埃及已顺利通过发展的"瓶颈",已经以主动、自信、理智态度迎接挑战。埃及教育部长侯赛因·卡米勒·巴哈丁的《无身份世界的爱国主义——全球化的挑战》一书下面一段话,充分表明了埃及人的迎接全球化的明智态度:

"接受全球化是积极、科学地应对全球化,正确做好规划面对全球化的第一步。我们应该辛勤工作,使自己有能力应对全球化;应该进行民族动员,建设自己的力量,具备一个新时代必需的能力和经验;以适当的机制,以我们善于创建的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它们是时代的工具和未来的武器——武装起来,去应对新的现实。"

总之,全球化是文明交往的全球化。全球化对埃及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经历了法老时代、基督教时代和伊斯兰时代的埃及古文明交往和面临纷繁多变的当今21世纪的交往巨变,埃及发展的前景任重而道远。在《今日中国》杂志社工作的埃及籍专家侯赛因·伊斯梅尔,曾在1999年4月9日《光明日报》上写了一篇《我与中国的不解之缘》的文章。他写道:"从埃及的古老文明,从辉煌的金字塔到伟大的万里长城,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在这里,我希望中国人民在实现目前正在进行的伟大变革时,千万要保持其精神文明的精髓。"我想这是中国和埃及人民的共同心愿。我真诚地希望,对中国和埃及这样的文明古国,在全球化文明交往中,如

何维护和发扬民族精神，如何大量引进世界性的先进文化，并进行加工改造，使之与本民族文化融为一体，是我们共同的历史使命。因此，既要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也要在文化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使埃及的文明保持主流的地位。要达到此双重目标，必须采取积极态度，发掘传统资源，吸纳外来因素，加强历史记忆，弘扬民族精神，在全球化文明交往中复兴昔日的辉煌。

彭树智

2003 年 1 月小寒于悠得斋